


汇 添 富 基 金

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 浮华时代

## ——美国20世纪20年代简史



#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美]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Frederick Lewis Allen)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最初出版于1931年的《浮华时代——美国20世纪20年代简史》，追溯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繁荣到1929年股市大崩盘的一段历史。

作为一部初版之后立即获得成功的杰作，本书是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对20世纪最令人心醉的一个十年的生动而权威的描述，叙述了一个充满喜悦与恐怖的时代——从令人晕眩的高度突然降低到令人心碎的低谷。从红色恐惧到道德革命，从哈定丑闻到经济大萧条，从地下酒吧到佛州地产潮……喧嚣的社会风潮，被作者以从容淡定的口吻，娓娓道来。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置身于那个时代的各种潮流及大小事件的漩涡中，而这恰恰有助于今天的读者解构时下的境遇。

关于本书，《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不吝给出“一部将历史记录和综合报道完美结合的伟大作品”的美誉；而《纽约时报》则盛赞“本书的风格完全是神韵与活力的再现……艾伦先生不仅从一个精巧的角度讲述了大牛市的故事，还为我们第一次连贯地描述了石油丑闻案件……”

流年似水，但记忆总是在某一个恰当的时候不断地苏醒——1959年、1964年、2000年、2007年，本书不断再版。

一部活生生的历史，让我们并不觉得，往事如烟……


ISBN 978-7-5642-0108-1

9 787564 201081 >

定价：35.00 元

本社网址：www.sufep.com






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 浮华时代

## ——美国20世纪20年代简史

[美]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Frederick Lewis Allen) 著

汪晓莉 袁玲丽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华时代:美国20世纪20年代简史/(美)艾伦(Allen,F.L.)著;汪晓莉,袁玲丽译. 一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1
(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Only Yesterday: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ISBN 978-7-5642-0108-1/F·0108

Ⅰ.浮… Ⅱ.①艾… ②汪… ③袁… Ⅲ.美国-现代史-1920~1929 Ⅳ.K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5570号

□ 责任编辑 史亚仙
□ 封面设计 未 名
□ 版式设计 孙国义

FUHUA SHIDAI
**浮华时代**
——美国20世纪20年代简史

[美]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Frederick Lewis Allen) 著
汪晓莉 袁玲丽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321号乙 邮编200434)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 @ 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上海远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装订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8印张(插页:2) 294千字
印数:0 001—5 000 定价:35.00元

拨动琴弦
唱一首经典
资本脉络
在伦巴第和华尔街坚冷的墙体间，仍然
依稀可见



千百年后
人们依然会穿过泛黄的书架
取下
这些书简
就像我们今天，怀念
秦关汉月
大漠孤烟
……

# 总　序

“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投资大时代，无数投资人渴望着有机会感悟和学习顶尖投资大师的智慧。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家，素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有句名言：成功的捷径是与成功者为伍。（It's simple to be a winner，work with winners.）

向成功者学习是成功的捷径，向投资大师学习则是投资成功的捷径。

巴菲特原来做了十年股票，当初的他也曾经到处打听消息，进行技术分析，买进卖出做短线，可结果却业绩平平。后来他学习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策略之后，投资业绩很快有了明显改善，他由衷地感叹道：“在大师门下学习几个小时的效果远远胜过我自己过去十年里自以为是的天真思考。”

巴菲特不但学习了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还进一步吸收了费雪的投资策略，将二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称自己是“85％的格雷厄姆和15％的费雪”，他认为这正是自己成功的原因：“如果我只学习格雷厄姆一个人的思想，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富有。”

可见，要想投资成功很简单，那就是：向成功的投资人学投资，而且要向尽可能多的杰出投资专家学投资。

源于这个想法，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携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这套“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开卷有益，本套丛书上及1873年的伦巴第街，下至彼得·林奇之后的华尔街当代杰出基金经理

人比尔·米勒，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汇添富基金希望能够藉此套丛书，向您展示投资专家的风采，让您领略投资世界中的风景。

丛书不乏经典之作。其中的《**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堪称是金融领域的传世之作。该书作者——19世纪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在书中总结了当时的经验与教训，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回味。书中对于银行处理金融危机的意见——“初期警钟到来时，我们必须始终拥有随时可以动用的准备金，这样才可以轻松地走出恐慌。那些认为不需要准备很多的准备金的观念，不仅会引起恐慌，还会将恐慌升级成疯狂”，在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和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都将该书作为经常翻阅的床头书，从中汲取经验和灵感。时隔百年，该书在1999年、2001年、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多次再版，可见其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从书中的另一本——《**攻守兼备——积极与保守的投资者**》，有助于投资人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抽丝剥茧，形成自己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管理层经营能力、股票买入价是否低于公司资产净值等的独立判断，进而利用自己的结论做出投资与否的决策。该书自1979年首次出版以来，2006年再次重版。这也印证了耶鲁大学教授斯坦·加斯特卡的判断：“《攻守兼备——积极与保守的投资者》绝不会过时！”《**价值平均策略——获得高投资收益的安全简便方法**》一书通过市场风险和时机选择的介绍，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公式化投资策略。著名金融史学家威廉·伯恩斯坦将该书与格雷厄姆的《智慧投资者》、麦基尔的《漫步华尔街》相提并论，认为：“自1991年首次出版以来，《价值平均策略》声誉鹊起，已逐步成为经典作品。”1996年、2006年该书不断再版。另一本经典《**浮华时代——美国20世纪20年代简史**》则追溯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繁荣到1929年股市大崩盘的一段历史。《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称之为“一部将历史记录和综合报道完美结合的伟大作品”。1931年出版后，该书迅速销售50余万册，并于1932年登上畅销图书榜（非小说类）的第二位。此后，该书于1959年、1964年、2000年、2007年不断重版，属于常青藤式的书籍。

丛书中汇集了投资大师们的智慧。《**忠告——来自94年的投资生涯**》一书记录了罗伊·纽伯格这位世纪老人神秘且精彩的人生。作为惟一一位经历华尔街1929年和1987年大崩盘却毫发无损的职业投资家，其自传中所介绍的有关投资技术与战略战术等诸多方面，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除了其令人称道的成功投资经验之外，罗伊·纽伯格对于成功、

金钱、艺术和财富的价值观以及对于新技术的积极态度，也是支持其将近一个世纪处于不败之地的不可缺省的重要因素。如果您阅读了《**尖峰时刻——华尔街顶级基金经理人的投资经验**》，您就可以全面了解美国五位杰出基金经理——比尔·奈格伦、安迪·史蒂芬斯、克里斯多夫·戴维斯、比尔·弗里斯和约翰·卡拉莫斯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这些基金经理人的投资风格相去甚远，但他们的交集，即投资中均实践和坚守的共同原则，却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另一本著作《**战胜标准普尔——与比尔·米勒一起投资**》中，叙述的是美国顶尖基金经理人比尔·米勒的成功之道。比尔·米勒所管理的莱格－梅森基金虽然近两年来业绩下滑，但其保持的1990～2005年连续15年战胜标准普尔指数的骄人业绩，至今无人望其项背。书中通过对比尔·米勒分析方法和投资策略的记述，揭开了比尔·米勒保持十余年成功投资的秘诀。《**伟大的事业——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分析**》通过透视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揭示了这个巨大财富王国背后兼具实用性和个性的投资哲学，浓缩了一个价值投资者30余年来的成功经验和心得。巴菲特在阅读该书后，认为作者“对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了解得非常透彻”！

投资者也许会问：我们向投资大师、投资历史学习投资真知后，如何在中国股市实践中应用大师们的价值投资理念？

事实永远胜于雄辩。中国基金行业从创立至今始终坚持和实践价值投资与有效风险控制策略，相信我们十年来的追求探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基金行业成立十年来的投资业绩充分表明，在中国股市运用价值投资策略同样是非常有效的，同样能够显著地战胜市场。2005年和2006年我们旗下基金的优秀业绩，就是最好的明证。价值投资最基本的安全边际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坚守价值投资，肯定会有良好的长期回报。

其次，我们的经历还表明，在中国股市运用价值投资策略，必须结合中国股市以及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勇于创新。事实上，作为价值型基金经理人的比尔·米勒，也是在反思传统价值投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才取得了超越前人的业绩的。

最后，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比巴菲特、比尔·米勒等人更加幸运的是，我们有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这样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我们有一个经过改革后基本面发生巨大变化的证券市场，我们有一批成长非常快

速的优秀上市公司，这将使我们拥有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坚持价值投资理念，不断积累经验和总结教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中国基金行业必将能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的良好投资回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十余年前，当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曾经阅读过大量海外经典投资书籍，获益匪浅。今天，我们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一起，精挑细选了上述这些书籍，力求使投资人能够对一个多世纪的西方资本市场发展窥斑见豹，有所感悟；而其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亦可为我所鉴，或成为成功投资的指南，或成为风险教育的反面教材。我们还拟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一起，推出后续的《华尔街的扑克牌》、《点津——来自大师的精彩篇章》、《福布斯英雄》、《华尔街 50 年》、《黄金简史》等 8 本图书。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悠远的新年钟声，宣告着 2008 年春天脚步的临近。在此，汇添富基金期待着与广大投资者一起，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基金业的不断发展，迎来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张　晖**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2008 年 1 月 1 日







# 译者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进入了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十年。

这十年里，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梦想逐渐破灭，哈定总统立誓让美国“回复常态“，柯立芝总统带领美国进入了“繁荣时代”，而胡佛总统则面临着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萧条”。

这十年里，巨大的红色恐惧一度笼罩着整个美国社会，年轻一代在行为与观念方面的开放让美国父母们日夜忧心，禁酒法令的施行与地下酒吧的盛行不啻是一对具有讽刺意义的矛盾，而佛罗里达地产大潮的蓬勃则又让美国人民经历了一次淘金感觉。

这十年里，普通公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他们所关注的每一件大事小事，报界、电影、无线电广播等媒体淋漓尽致地展现着他们对各种事件的关注与“挖掘”，而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们却冷静而深刻地作出了自己的剖析。

如果想要对这个充满喜悦与恐惧的时代进行一番了解，读者朋友们不妨请花点功夫来读读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品《浮华时代——美国20世纪20年代简史》。

作为美国著名的文化历史学者，艾伦先生在其著作中对这段战后十年的历史进行了生动而巧妙的诠释：从红色恐惧到道德革命，从哈定丑闻到经济大萧条，从地下酒吧到佛州地产潮，艾伦先生无一不细细道来，娓娓而

谈。没有到处罗列的图表公式，也甚少专业人士的权威分析，艾伦先生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更关注的是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各种潮流及大小事件对普通大众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和改变，以及普通大众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对此所作出的回应。

而运用这种方式所叙述出来的这段历史，则不仅有别于其他从专业权威角度讲述的历史，更可以让普通读者有如身临其境一般，去亲身感受和体会战后十年中所发生的一切，从而使正式的历史变得亲切，使遥远的事件走近身边，也能使这部著作在读者心中产生些许共鸣，留下些许痕迹，更可以让艾伦先生成为读者心中可对话的不朽学者。

本书由汪晓莉、袁玲丽两人共同翻译。汪晓莉翻译的部分包括前言、第一章至第九章，以及作者简介；袁玲丽翻译的部分包括第十章至第十四章，以及材料来源与致谢。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存在错漏和不足，还希望读者朋友们原谅。如果这部译作能够让国内的读者对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的这段历史有些了解和兴趣，那也就不枉艾伦先生和译者的笔耕努力了。









# 前 言

从美德战争结束(1918 年 11 月 11 日)开始,到股市恐慌达到顶点的 1929 年 11 月 13 日,这段长达 11 年的历史时期有可能在将来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因为它不仅加速了柯立芝(以及胡佛)繁荣时期的毁灭,也对此进行了戏剧性的表现。本书则试图讲述这一段历史,同时稍作一些解释。

在各种事件结束不久就对这段历史进行描写,显然势必需要一些创新之处。普雷斯顿·威廉·斯洛森(Preston William Slosson)教授的著作《伟大的圣战及以后》几乎已经描写到了这段时期的末期,但是他对作品的安排却与本书有很大不同;虽然其他很多著作也从不同角度对这段历史时期进行了描写,但我却还是有些惊讶地发现,这段时期内的很多历史事件还从来没有被完整地记述过。例如,哈定政府的丑闻事件(到如今也还没有为人所知)除了在某些片段中出现,还从未被完整描述过;而大牛市虽然经过数千次的分析和讨论,却从来没有人还原它的本来面目,并把它当成一个不同寻常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用叙述的方式进行全面的表现。

毋庸置疑,更进一步的研究将会发现本书存在着错误和不足,而时间的流逝也会揭示出作者在判断和解释方面存在着短视。当代史是注定缺乏确定性的。然而,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一半的乐趣来自于努力把此前历史学家从未碰触过的大批史料以一种符合逻辑而连贯的方式进行归纳;我想,有些读者会发现,如此清楚地存在于他们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和历

史背景——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在经过这种方式的组织之后，起码被伪装得如同历史一般，并因此感到些许兴趣或些许开心。与大多数历史著作相比，本书的优点在于：任何读过本书的读者，几乎都能够回忆起本书所描写的这段历史时期。

至于本书将重点主要放在公众思想状态的变化和某些时候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这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故意为之的。对我来说，由于描写的历史距离今天时间很短，并且记忆仍然很鲜明，所以我可以拥有特别的机会记录下当时的潮流风尚和荒唐蠢事，也可以记录下当时数百万人同时考虑、同时谈论、同时为之激动并且触动他们日常生活的万事万物；对我来说，我可以将某些事件和政策，尤其是外交领域的某些事件，谨慎地留给以后的历史学家，因为对普通大众的生活来说，它们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也无法进行完全的估量。[我要感谢马克·沙利文(Mark Sullivan)先生，因为他在后续著作《我们自己的时代》里继续发展了这种描写当代历史的方法。]很自然地，我试图把这段历史中的无数线索进行整理综合，以便揭示 20 世纪 20 年代这段时期内美国在生活和思想方面的基本趋向。



为了省略脚注，也为了表示我对很多人的感谢，在附录中我列出了引用的主要材料的来源。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Frederick Lewis Allen)

# 目 录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 第一章 序:1919年5月

如果时光突然倒流,回到战后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十年)的初期,这时候你环顾左右,什么又会让你觉得陌生呢?的确,自从1919年开始,美国人民的生活环境就已经改变了——可是,具体的改变又是怎样的呢?

就让我们跟随一对年轻夫妇的脚步,一起激活我们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吧。这对夫妇居住在克里夫兰、波士顿、西雅图或是巴尔的摩——事实上这个城市的名字并不重要——生活中等富裕,而我们的叙述就从1919年5月的普通一天开始。(我之所以选择5月这个特别的月份,也就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停火之后的六个月,是因为到那个时候,从很大程度上说,美国已经成功地从战争时代的生活方式转移到了和平时代的生活方式,但是战后十年即将带来的深远影响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这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可以告诉我们,仅仅数年时间就会给你我以及周围的环境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919年5月的这个早晨,当史密斯(Smith)先生走到桌前准备用餐时,他的外表甚至会让你觉得你还是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你也许会惊讶于他的裤腿竟然如此之短)。男人的着装时尚从来都变化不大。但是,对史密斯夫人来说,情况却截然不同。

她过来用早餐的时候穿了一身套装。这身套装的裙子不仅长及脚踝,离地面只有6英寸,而且还紧紧地裹着脚踝。她刚刚从《时尚》杂志上看到

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称裙子竟然还要变得更短，杂志写道："自从波旁王朝以来，时尚女性脚踝以上的部分还没有被人看到过。"但是，6 英寸仍然是正统的离地高度。由于现在是春天，她穿了一双低帮鞋；可是在刚刚过去的整个冬天，她的脚踝始终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或者是裹在鞋罩里，或者是裹在镶有蕾丝花边的高筒步行靴里，又或者是裹在鞋尖嵌有麂皮的高筒黑漆皮鞋里。她脚上穿着黑色的长袜（如果她脚穿褐色皮鞋，搭配的长袜就是褐色的）；而脚穿肉色长袜的想法则会让她大惊失色。就在几分钟之前，史密斯夫人身上还紧裹着筒型女式内衣和衬裙，而内衣上那一层厚厚的荷叶边褶皱则清楚地说明，她习惯于将自己打扮成标准的女性模样。

史密斯夫人也许会搽粉，也许不会。虽然在 1919 年，使用化妆品已经不再被看做是妓女的特别标志，而某些成熟世故的年轻女子也开始故作勇敢地为自己化妆，可是大部分出身良好的女性仍然对涂脂抹粉这件事情心存偏见。这时的美容行业刚刚起步，美发厅数量也不是太多，而整形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艺术，史密斯夫人则根本没有听说过。当她戴上帽子出去购物时，会在头发后部整齐地别上一副面罩。在商店购物时，她有可能会买上一套夏天用的泳衣；这套泳衣可能是一套丝织的束腰外衣，也可能是一套外面罩有印花棉布的紧身内衣，当然，泳衣上肯定有一双长筒袜。

她留着长发，而要一位女士光临理发店的想法在她的脑海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你已经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普通大众对短发女士是怎么看待的话，请听一下纽约棕榈花园经理人的说法吧。事情是这样的：1918 年 11 月的一个晚上，他碰巧将礼堂租给了一些亲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供其集会之用，但这次集会却导致了一场骚乱。当记者向他询问事情的经过时，他解释说，一位穿着得体的女士乘坐一辆精致的轿车前来他处，安排借用他们礼堂的事宜。他接着又补充说："要是那时候我们像现在这样，注意到她留了一头短发，我们就不会同意将礼堂租给她了。"在史密斯夫人和棕榈花园经理人看来，短发女人，就像那些长发男人一样，即使不是和自由性爱有关，起码也和激进主义有联系。

史密斯夫妇坐下来准备享用早餐。在准备这顿早餐的过程中，他们也许考虑到了食物应该提供足够的卡路里（即热量）——可是维他命，很可能他们两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史密斯先生一边吃饭一边打开了早晨的报纸。不管史密斯先生的读报品味多么初级，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绝不会是一份小报，因为尽管赫

斯特先生(Mr. Hearst)已经试验出版了小版本的图片报,但第一份获得轰动性成功的小报此时还没有诞生呢。直到1919年6月26日,《纽约每日新闻》才被摆上报摊,从而开始它的辉煌事业之旅:日发行量在一年内达到了近25万份,在五年之内超过了80万份,而在十年之内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130多万份。

在史密斯先生手中报纸的头版上,赫然在目的是很多对美国海军水上飞机NC—4取道亚述尔群岛飞越大西洋的飞行过程的报道。那次飞行是1919年5月间最激动人心的新闻。[阿尔科克(Alcock)和布朗(Brown)此时还没有开始他们不停顿横跨大西洋的飞行,这一壮举还要再过几个星期才会发生;而林德伯格(Lindbergh)单人飞越大西洋的壮举则更要迟至八年之后才出现。]但是,报纸上也还有很多其他新闻,例如: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此时正处于准备条约的最后阶段;购买超额胜利国债的运动正在成功进行("当然,我们会完成工作的!"这项运动的大海报一直这么呼喊着);海外又有一批士兵返回祖国;有发生一场新罢工的威胁;西雅图市长奥勒·汉森(Ole Hanson)公开指责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是这个时代苦难的根源;《国家选举权修正案》有可能获得通过,并且由此将会使妇女们在"国家生活中发挥更杰出的作用";亨利·福特(Henry Ford)对《芝加哥论坛报》提起诽谤诉讼:他把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称为一个作家,而面对"这个国家是否曾经有过任何革命"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有,在1812年。"

如果史密斯先生仔细观察体育新闻的话,他会发现新闻中模糊地提到了一位名叫卢斯(Ruth)的球员,他是波士顿著名棒球队红袜队一位年轻的投手兼外场手,但是这时候的新闻大标题中还不太容易找到这位年轻人的全名:贝比·卢斯(Babe Ruth)。[1919年4月,卢斯打出了一个本垒打;5月打出了两个;但是体育记者们很快将会发现,卢斯即将创造一个全垒打的新记录—— 一年之中打出29个本垒打;纽约扬基队看到了棒球赛场上这块耀眼的金子,于是在赛季结束之后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将卢斯收入队中;1920年夏天,一位男士因看到卢斯将棒球砸向露天看台过于激动而死。很明显,公众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偶像。不过,在1919年,领导美国(棒球)联盟锦标赛的不是卢斯,而是老手泰·柯布(Ty Cobb)。]

史密斯先生从体育版新闻得知,里卡德(Rickard)已经选定托莱多市作为场地,准备在那里进行一场精彩的拳击比赛。比赛一方是当时的重量

级拳王杰西·威拉德(Jess Willard),另一方则是即将成为公众心中偶像的杰克·登普西(Jack Dempsey)。[你也许能够回忆起来,他们相遇于1919年的7月4日。冷静的市民们将不无恐慌地从报纸上得知,共有19 650名观众如此颓废,因为他们竟然坐在酷热的太阳底下,眼睁睁地看着登普西在第三回合就将身高6英尺6英寸的重量级冠军杰西打倒在地;如果这些冷静的市民们知道,在举行这场比赛的八年之后,登普西将与滕尼(Tunney)展开激战,而那场激战的门票收入竟然要比托莱多的这场比赛高出五倍还多,那么他们又会怎么想呢?]在体育版面,也许会有关于鲍比·琼斯(Bobby Jones)的新闻,他是一位17岁的南部高尔夫冠军;也许还会有关于小威廉·T. 梯尔登(William T. Tilden, Jr.)的新闻,他时不时地赢得网球比赛的冠军。但是,他们两人这时都还没有成为全国冠军。甚至,就算琼斯成为本年度冠军,公众也不太可能将他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流行英雄,因为虽然高尔夫运动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与日俱增,但美国的商界人士还没有把它看成是每周必不可少的运动项目。史密斯先生很可能还会嘲笑那些"花费时间在地上敲击一个白色小球的成年人"呢。可以确定的是,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灯笼裤";如果他真的去打高尔夫的话,他也最好不要穿着灯笼裤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因为孩子们会大呼小叫道:"嘿,看那个男人的裤子!"

我有没有说过,到1919年5月,战争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在史密斯先生手中的报纸上,仍然有很多新闻能够让人想起战争。不仅仅是巴黎和会的消息,也不仅仅是传奇英雄阿尔文·约克(Alvin York)中士正在归国路上的消息;因为除此之外,报纸上还有最让人讨厌的消息,那就是每天的伤亡名单,而这份名单让美国人民根本就无法忘记战争。

史密斯夫妇正在讨论着一个严重问题,即高昂的生活成本。史密斯先生希望薪水能够增加,可是家庭收入却似乎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减少。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食品、房租、衣服,还有税收。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评论说,即使身上1美元都没有的人也要比过去富裕一倍;如果我们制造出7美分面值的纸币来支付有轨电车费用的话,一年之后,我们大概就得转而发行14美分面值的纸币了。史密斯先生要求夫人花费再节约一点,可是夫人却提醒他说,自从1914年以来,牛奶已经从每夸脱9美分涨到了15美分,沙朗牛排从每磅27美分涨到了42美分,黄油从每磅32美分涨到了61美分,而新鲜鸡蛋则从每打34美分涨到了62美分,可是收入





却固定不变，难怪人们的生活正在受苦。很多大学已经开始谈论，要将他们在“自由公债”运动中学到的使钱生钱的方法学以致用，设法增加外界对学校的捐款。而房租的情况比食品情况还要严重。自从停战以后，房屋和公寓越来越短缺，而那些牟取暴利的房东们和中介们，则成为了大众憎恨的对象。史密斯先生对妻子说：“这些不法奸商坏得就跟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似的。”这已经是他情绪最为激烈的评论了。

吃过早饭，史密斯先生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前往办公室。这辆车可能是列克星敦、马克斯威尔、布里斯科，或者泰普勒，也可能是道奇、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或者哈德逊，但却肯定不会是克莱斯勒，因为这时的克莱斯勒先生才刚刚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第一副总裁。不管这时候的汽车构造如何，它的车身比 19 世纪的那些汽车总要高多了，所以乘客可以从汽车里居高临下地环顾周围的环境。十之八九，史密斯先生开的是一辆敞篷车(1919 年制造的汽车只有 10.3%是轿车)。轿车的时尚才刚刚开始，并且在公众的脑海里，轿车仍然和财富联系在一起。于是在报纸的漫画中，那些遭到众人憎恨的不法奸商们驾驶的都是豪华轿车。

如果史密斯先生驾驶的是一辆车身高耸、模样可怕却十分高效的福特 T 型车，就让我们用一分钟时间观察一下他的举动吧。他从车门右边爬上汽车(因为前排座位的左边没有车门)，手伸向方向盘前，将火花塞和油门杆调整到时钟上三点差十分的位置。要是他没有购买电动式起动装置的话，他就要伸出右手，小心地抓住曲柄(因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在转动曲柄的时候弄断了自己的手臂)，将左手食指塞入一个控制阻风门的线圈中。他拉住线圈，用力地转动曲柄，当发动机最后终于发出咆哮声时，他跳上颤抖着的脚踏板，倾斜着身子进入汽车，移动火花塞，将油门杆调到两点二十五分的位置。在发动机熄火之前，也许他已经够到了油门杆；不过如果是在寒冷的早晨，也许不等他够到油门杆发动机就熄火了，那样的话，他只能重新抓住曲柄，再次重复上述动作。因此，史密斯先生希望妻子能够坐在司机的位置上，在发动机熄火之前就拉下油门杆。

最后，发动机终于正常地吼叫了，而史密斯先生也终于安稳地坐在了方向盘前。他松开紧急手刹，将左脚推向低速踏板，当汽车大声吼叫着进入大街的时候，他松开左脚，让汽车以高速档前进。现在，他惟一担心的就是路上那段长长的斜坡。昨天他就是在那段斜坡上烧坏了刹车，因此今天早晨他必须记得用反踏板刹车，或者是用低速踏板刹车，或者是同时使用

两种，或者是轮流使用这三种。（你的脚随便塞在哪个踏板上，汽车都可以减速。）

史密斯先生驶上了比十年之后要开放得多的公路。在他去上班的路上，被他甩在后面的汽车与他将来在 1929 年可以追过的汽车相比，连 1/3 都不到。1919 年，美国登记在册的小汽车不到 700 万辆，而仅仅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 2 300 万辆。在行驶过程中，史密斯先生不太可能在附近发现很多混凝土公路，而缺少这种公路，汽车的驾驶速度就会受到限制。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1919 年的限速为每小时 30 英里，不过其他州的限速一般是每小时 20 英里（1931 年则是每小时 35 英里或 40 英里）。1919 年伊利诺伊州的汽车限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司机在城市的住宅区限速每小时 15 英里，在已建满房屋或其他建筑物的地区限速每小时 10 英里，在转弯处则限速每小时 6 英里。在两个半小时内完成一次 100 英里旅行的想法，在史密斯先生看来是很危险的——虽然 20 世纪 30 年代时，很多自认为很保守的司机经常都会完成这样的旅程——但是在 1919 年的公路上，史密斯先生的谨慎态度还是很正确的。

白天上班的时候，史密斯先生与人讨论了商业情况。情况似乎不错，正在好转。停战以后，有一段时间商业领域的情况不太确定，股票价格下跌，大宗政府合同取消，曾经在战争期间加班加点做出贡献的工厂都开始大批地裁员。不过，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好。所有人都在谈论着国际贸易和美国航运的光明前景，造船厂都在全速工作。固然，仍然有很多罢工正在进行，因为好像工人们希望得到更高工资的要求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似的，尽管史密斯先生也承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不能责备那些工人，因为物价仍然在一周接一周地上涨。不过，由于商业活动非常活跃，所以那些从部队退伍的军人在找工作时很容易被接收，比史密斯先生原先料想的情况要好得多。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去年冬天和今年早春，仍然有很多人在谈论着那些走在大街上却找不到工作的退伍军人。就是在那段时间，《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图中山姆大叔正在问一个士兵："任何东西对你都是合适的，我的孩子！你想要什么？"士兵则回答说："一份工作。"而如今的这些"孩子们"正在逐渐走上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笼罩在商业领域上空的惟一阴云就是罢工以及股票市场充满危险的投机浪潮。

报纸的财经版面上充斥着这样的大标语："大牛市折磨着经纪人的神

经"以及"雇员(应该)长时间工作"。你在这些话语的论调中有没有发现似曾相识之处？因为在1919年的5月31日，关闭股票交易市场的决定竟然会导致报纸这样评论："操纵纽约市场股票和债券买卖的高度专业化机器已经精疲力竭了，需要好好休息了。"如果你对比一下1928年和1929年间的大牛市，你觉得这种论调自然吗？可是就在1919年5月，那段漫长的"150万股"的日子不仅让金融家们忧心忡忡，甚至连联邦储备委员会都在考虑是否需要对投机浪潮发出警告。在那一年诞生了一个新记录：有6天的交易量达到了每天200万股；只有145天的交易量超过了100万股。如果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得知，在11年后的股票市场，一天的交易量就将达到1 600万股；而日交易量300万股的日子则被认为是"事实上的停滞期"，"只有专业人员才会给予无精打采的关注，普通大众对此则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又将会怎么想呢？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一个席位在1919年大约价值60 000美元，最多也不过是110 000美元；而到了战后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却提高到了50万美元，而史密斯先生对此肯定是难以相信的。

1919年5月，关于每天股票交易记录的报道几乎占不到报纸的一个专栏。场外证券市场(路边交易市场)的记录中提到了一个真正的路边交易市场——在纽约布罗德街那个非同寻常的场外交易市场上，操作人员们手里拿着电话听筒，从楼房的窗户缝中挤出脑袋，在一片嘈杂声中，通过面部表情和各种手势，与那些挤在楼下大街上的交易者们进行沟通对话。在史密斯夫人出去购物的时候，她绝对不会考虑的肯定是股票的价格。不过，1919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牛市"却为那些投身股票市场的交易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从2月15日到5月14日，鲍德温机车公司的价格从72涨到了93，通用汽车从130涨到了191，美国钢铁从90涨到了104.5，而国际商用船队的普通股(该股票价格上涨是因为交易者们显然看到了美国航运的无限可能性)则从23涨到了47。

当史密斯先生出去吃午餐的时候，他不得不迂回绕路驶向他的俱乐部，因为刚从欧洲战场返回的大群士兵正在游行，拥挤的人群把城市的中心道路围得水泄不通。1919年的春天，可真是一个伟大的游行季节。从法国布雷斯特返回的船只在纽约港内来回摆晃，士兵们整齐而拥挤地站在甲板上，接受纽约市长海兰(Hylan)的欢迎委员会的接待。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有时候是市长那位整洁帅气的秘书格罗佛·威伦(Grover Whalen)，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既能够把欢迎仪式程式化成一种科学，又能够使之上升为一种艺术。为了纪念归国的士兵，纽约市在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灰泥拱门，据说有 40 名艺术家参与了该拱门的设计。（对此，《纽约论坛报》伤心地评论说："但是，从这件作品中却能够看出 400 位而不是 40 位艺术家的功劳。普通大众们在想，只要是其他任何拱门上出现过的东西，是否都能在这个拱门上找到，包括勃兰登堡门顶上的那四匹马。"）顺着第五大道再往前走，就在公共图书馆的前面，竖立着一座塔门与棕榈树构成的圣殿，那就是战亡英雄纪念馆。对它的装饰效果，《纽约论坛报》简单地评论道："增加了死亡的危险。"在北边几个街区开外的地方，一个珠宝拱门悬挂在第五大道上空，"就像一张宝石织成的网，悬挂在两根白色的柱子之间，而柱子的顶上则挂满了星星"；而这个拱门上的彩色探照灯在夜晚则放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整个第五大道上挂满了旗帜；当 27 师游行经过拱门的时候，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五彩纸屑和自动收报机里的白色纸条，人行道上则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对归国士兵的热情不仅只体现在纽约一个城市，其他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胜利游行：年长者们站在阅兵台上，旗帜在空中飘扬，士兵们手中的刺刀在春天的阳光中闪耀着光芒，乐队则演奏着《漫长的小径》。在这一时刻，人们的幻想还没有破灭，仍然在热情欢迎着自己的英雄们——可这些英雄们只是希望所有的这一切忙乱赶快全部结束，这样他们就可以换上便装，睡个懒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把这一切全部忘掉。

由于史密斯夫妇受邀参加傍晚的一个茶舞会，所以史密斯先生一下班就立刻驱车前往举办舞会的酒店——那个充满狂欢气氛的场所。如果这个酒店足够时髦的话，为舞会伴奏的就会是一个爵士乐队，而不是传统的管弦乐队。不过，这个时候的舞场里是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的：萨克斯手站在舞场最显著的位置，吹奏出被威廉·伯利梭（William Bolitho）称之为战后年代"时代精神"的那首动人心弦的音乐，"无尽的悲伤，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没有过去，没有记忆，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爵士乐队可能会演奏《追逐彩虹》，这首歌的曲调是哈里·卡罗尔（Harry Carroll）在战时根据肖邦（Chopin）的《幻想即兴曲》改编的，因为哈里森·费希尔（Harrison Fisher）对他说肖邦的这首曲子有条件成为一首非常优秀的拉格泰姆音乐。乐队也有可能演奏《微笑》、《达达尼尔海峡》、《印度斯坦》、《日本的睡精灵》、《我爱星期天》以及《我说她会的》等曲子，而"我说她会的"这句话已经成为





战后十年里一个使用时间最长以致让人们都感到有些乏味的俚语。在旋转着狐步的舞者中，有很多人穿着部队的制服，其中还有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法国军官。在这段时间举行的舞会上，如果有一位身着制服的外国军官露面，肯定会增加很多战争时期罗曼蒂克的气氛，因为人们对战时的热情还没有消失。在光线更加暗淡的卧室里，也许有青年男女正在举行爱抚晚会，但是史密斯夫妇对此大概是不会在意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普通大众还没有听说过 F. 斯科特·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年轻一代的问题"，因此，对此还不会出现惊恐万分的心情。

几支舞之后，史密斯先生走出酒店，信步走进了一家酒吧(如果这个州不禁止饮酒的话)。酒吧里一大群男人们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布朗克斯鸡尾酒和加冰的苏格兰鸡尾酒，一边怀着沮丧的心情讨论着即将实施的禁酒法令。7 月 1 日，所谓的战时禁酒法令就要正式生效了(这项法令原本是作为战时措施制定的，但是直到停战时才被总统签署通过)，而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的批准也确定了这项禁酒法令将会永久生效。即使在现在，蒸馏和酿酒都是被禁止的，所以饮酒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这一点只有那些午夜场的常客们在付出代价后才能知晓。不过，现在的这个酒吧仍然在这里合法地做着生意。当然，在酒吧里绝对不会看到女人，因为在 1919 年，女性饮酒仍然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而在酒吧里饮酒就更是男性独享的特权。虽然今天晚上邀请史密斯夫妇做客的主人在晚宴之前有可能奉上鸡尾酒，但是对于以后将代替茶舞会存在的鸡尾酒舞会，史密斯夫妇还从没有听说过。

史密斯先生站在黄铜栏杆边，听着周围的人们交换对禁酒法令的看法。虽然有人对此表示愤慨，但并不是这里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其中有个男人，在饮下手里的布朗克斯鸡尾酒后，说他将来对酒肯定会怀念一段时间的，不过他同时又认为，"在一个没有酒的国家里，我的儿子们将会生活得更好"；对这番说话，两三个人表示了赞同。禁酒法令得到了美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因为战争时代那种斯巴达式的热情还在人们的心中燃烧。当酒吧里的这些人一心以为，只要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开始生效，整个国家就再也看不到酒的影子，他们的这种想法中并没有什么讽刺的意味，他们只是在茫然地期待着一个永久没有酒精年代的到来。

在史密斯夫妇参加的这场晚宴上，有些年轻女性如果足够大胆，她们会抽烟，但她们吐烟圈的动作很可能是故意的，甚至是带有一种挑衅的色

彩。(1919 年的香烟虽然尺寸很大,但是全国的消费量却还不到 1930 年的一半。)

吃过晚饭,人们也许会去看电影,或者是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的《从军记》,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的《纽约牧童》,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的《长腿叔叔》,也或者是蒂达·巴拉(Theda Bara)和珀尔·怀特(Pearl White)的电影作品,也有可能是格里菲思(Griffith)执导的那部受到热烈吹捧并且让很多人潸然泪下的的《凋谢的花朵》。如果他们不看电影,可能会玩拍卖式桥牌(当然不是合约桥牌)。在几年之后将会风靡全国的麻将,这时还没有露头。或者,他们也许会讨论当时的畅销书,例如《四骑士血洒自由魂》、塔金顿(Tarkington)的《伟大的安巴逊家族》、康拉德(Conrad)的《金箭》、布朗德·维特劳克(Brand Whitlock)的《比利时》,以及韦尔斯(Wells)的《不朽的火》。(《世界史纲》这时候还没有写出来呢。)或者,他们也有可能去剧院。1919 年 5 月的纽约剧院里,有很多成功的戏剧自从战时就开始上演,直到现在也还是常演不衰,例如《友好的敌人》、《三张东方脸》以及《更优秀的奥勒》。除了这几部戏之外,还有《听,听》、吉里特(Gillette)主演的《亲爱的布鲁图斯》,以及弗朗西丝·斯达(Frances Starr)的《老虎! 老虎!》。另外,由于人们开始对卧室闹剧逐渐产生兴趣,也出现了《在梅布尔的房间里》这样的描述花边新闻的戏剧。剧院协会正准备推出其第一部戏剧,即埃尔文(Ervine)的《约翰·弗格森》。普林斯顿的上层人士们刚刚通过投票选举,选出了最受喜爱的戏剧是《莱宁》(排在该剧前面的是《麦克白》和《哈姆雷特》,因为这两部戏剧会得到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支持),而最受喜爱的女演员按照得票多少的顺序则依次是诺玛·塔尔梅奇(Norma Talmadge)、埃尔西·弗格森(Elsie Ferguson)、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uerite Clark)、康斯坦斯·塔尔梅奇(Constance Talmadge)和玛吉·肯尼迪(Madge Kennedy)。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史密斯夫妇这个晚上肯定不会做的。他们肯定不会听收音机。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无线电广播这个东西。到处都有喜欢摆弄机械的孩子,手里会有个无线电机,如果他懂得摩斯电码,他可以用无线电机收听来自海上船只的讯息,也可以收听那些拥有发送装置的陆地站发出的讯息。无线电话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坐在曼哈顿上空飞机里的乘客可以与坐在地面办公大楼里的人通话。但是,要想通过广播传递演讲





和音乐——数年前德・福雷斯特(DeForest)曾经尝试过，可是却"一无所获"——要等到1920年的春天，匹兹堡西屋公司的弗兰克・康拉德(Frank Conrad)才发现，自己在为了业余研究需要而简单装配的机器房内发送的各种节目，包括灌入电唱机的音乐和棒球比赛得分，竟然有数量众多的业余无线电操作者们收听。由于这些节目大受欢迎，匹兹堡的一家报纸甚至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做广告推销收音机配件，而广告词中则宣扬说，拥有了这些配件，"就可以收听康拉德博士的节目"。直到这份广告的出现，西屋公司的领导层才决定创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广播站，目的则是促进这些收音机配件的销售。

关于史密斯夫妇，我们还有一句话要说，说完这个我们就可以暂时与他们告别了。这个时候的他们不仅没有听说过无线电广播，还有很多东西也闻所未闻，包括：库埃、德顿小镇的审判案、填字游戏、泳装选美比赛、约翰・J. 拉斯科布(John J. Raskob)、诈骗钱财者、蒂波特山、珊瑚阁、《美国信使》、萨科—万泽蒂审判案、试婚、经纪人的贷款统计、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华尔街爆炸案、忏悔杂志、霍尔—米尔斯案件、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地下酒吧、阿尔・卡彭(Al Capone)、汽车交通灯，或者是查尔斯・A. 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

战后十年即将来临。





# 第二章　回复常态

## 一

1918年11月11日的清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用铅笔在白宫的一张普通信纸上，写下了下面这则给美国人民的通告：

“我的同胞们：停战协定今天早晨已经签订。美国获得了为之而战的所有事物。我们如今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责任通过榜样、冷静友善的忠告以及物质支持，旨在于全球范围内惠助建立公正的民主氛围。”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白宫的文件这样体现典型的威尔逊特色。这三句话让人们看到的，首先是一位清教徒教师，在充满强烈感情的时代里却保持着冷静，用平静的态度为学生定下一天的课程；其次是一位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他决心寻求的是充满和解的和平而不是充满仇恨的和平；同时也是一位武断的民主主义提倡者，他无法想像，他终其一生所信奉的制度却不一定是适合世界所有地方的最好制度。不过，如果另外一位战时总统——林肯（Lincon）总统——在世的话，他所撰写的通告里也会表现出与此类似的精神。

但是，如果威尔逊总统在撰写通告时想到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n

Lincon)的话——毫无疑问他确实想到了——却有可能忽视了某些东西。在和平来临时，为理想主义辩护的人们却有可能会在随之而来的松懈状态中失败。对于战后十年的“冷静友善的忠告”政策，林肯总统没有能够活着看到结果，因为他在胜利刚刚到来的时刻就已经被夺去了生命。

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则没有这么幸运。

## 二

11 月 11 日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啊！还不到凌晨三点，国务院就向那些仍然睡眼朦胧的新闻界人士披露消息：停战协定已经签订了。四天之前，一则失实报道称对峙状态已经结束，从而使整个美国陷入了极度兴奋的状态：人们从办公室和商场中蜂拥而出，在大街上游行欢呼，他们猛敲铃铛，狂按喇叭，撕碎彼此的帽子，为身穿制服的士兵们喝彩欢呼，将国旗裹在身上，在新闻通告板前挤成一团，将那一天喧闹成了一个疯狂的节日。纽约的第五大道已经无法通行，到处都是蜂拥而至的人们，从城市的窗户里飞扬而出的，是总重量达到了 155 吨的自动收报机纸条和撕碎的报纸。这么剧烈的感情爆发似乎不再可能重现。可是，它重现了。

11 日凌晨刚刚四点半，在美国的数十个城市中，警报声、汽笛声和铃声就吵醒了熟睡的市民，而报童则在黑暗的大街小巷中大声呼喊。人们并没有马上相信这则报道，因为他们已经被愚弄了一次，他们可不想再次上当。在华盛顿的一条大街上，在政府官员住所的窗户下，一个报童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喊道：“战争结束啦！政府证实这条新闻啦！”他没有像一般的报童那样小声咕哝；因为他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只有这种直接而特殊的方式才能使那些怀疑者相信。这则消息让人们得到了难以置信的解脱。一个充满和平与希望的新时代开始了——已经开始了。

消息就这样传遍了整个美国。数不清的城市中，还不到中午，办公室就已经半空，店铺外贴着“为德国皇帝的葬礼而歇业”的告示。人们像四天之前一样在街道上游行；漂亮的姑娘们亲吻着她们看到的每一个士兵；汽车在拥挤的人群中缓慢地爬行，并故意发生逆火，在已经充满喇叭声、咔嗒声和其他各种声音的喧嚣环境中再增加一份噪音。800 名巴纳德大学的女学生们在纽约的晨边高地上跳起了蛇舞；在时代广场有一个为了战时运

动而建造的“自由厅”，而这天的一大清早，就有个年轻女孩爬上了自由厅的平台，在肃静的人群面前唱起了《上帝赞美诗》。

然而，与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冷静友善的忠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有的庆祝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不是虔诚的感恩，而是洋洋得意的仇恨，这不啻是一种讽刺。拥挤的人群烧毁了德国皇帝的雕像。在纽约，人们用灭火的水龙带冲刷着华尔街上的德国皇帝假人；第五大道上，人们扛着用肥皂盒做成的棺材走来走去，一边大声呼喊着，德国皇帝已经“被打成碎片”躺在里面了；在第七十街的百老汇，一个男孩坐在人行道上不停地画着德国皇帝的图像，然后一张一张地分发给路过的人们，供他们在这些图像上践踏以享受泄愤的欢乐。

就这样，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开始了。

但是，人们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与战争完全脱离关系。仍然有超过350万的美国人在部队服役，其中在欧洲服役的就有200多万人，身穿部队制服的军人随处可见。即使在11月11日那场狂欢的骚乱结束以后，远征军仍然身处战壕，整装待发准备开始对德国进行漫长谨慎的大进军；普通百姓们仍然储存着白糖和煤炭，嚼着他们不习惯的黑面包；直到十天之后，燃料管理局才撤销了不点灯的法令，百老汇等十数条街道才开始重新闪耀灯光；铁路仍然由政府运营，人们得通过铁路管理局统一的售票厅购买车票；此前爆发的那场流行性感冒曾经让数千人心惊胆寒，甚至出门时都要戴上白布口罩，因为在这场感冒中丧生的美国人甚至要多于丧生于德国人手下的美国人，而这时候这场流行性感冒刚刚开始消退；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欧洲军队的报道，例如德国革命、威尔逊总统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准备，以及联合战争运动的消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新闻；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报纸上的伤亡名单仍然在持续增加，而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人们每天都在恐惧中搜索着这些名单中是否有自己亲人的名字。

正常时候的11月正是美式足球赛季的最高潮季节，可是如今的大学校队几乎都是由学生军训练队队员们临时拼凑起来的，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义赛，以便超额完成为战争基金募捐的目标；同时，为了加强人们的捐款意识，哈佛大学的查理·布里克利(Charlie Brickley)甚至没有等到球落地，就一脚将球踢了起来，越过华尔街，直接飞到了此时正在股票交易所阳台上的耶鲁大学的杰克·盖茨(Jack Gates)的臂弯里。在报纸上，无论是新闻专栏还是广告专栏，都仍然体现出浓厚的战时情绪：既有《憎恨德国丘

八的权利》的社论，也有提出惩罚德国皇帝建议的读者来信，信中建议说，最好的处罚方法就是每个国家都把他当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并将其驱逐出境。可是，无论是在社论还是读者来信旁边，你总会发现联合战争基金所作的大篇幅广告，总是在要求你捐款——捐款——捐款！而翻开报纸的另一版，在“为美国重建世界而准备”的大标语下，你又会发现一股爱国主义的冲击波：“自由已经胜利，权利的力量已经开始了对人性道德的重建，如今世界面临的是一个同样巨大的重大任务”，只有在你艰难跋涉越过更多引人入胜华丽绚烂的词句时，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重大任务”只有使用布兰克公司的钢窗才能够完成。

复员进程在确定无疑地进行，士兵们开始离开军营返回家乡，审查制度已经取消，电灯开始重新点亮，妇女们心情轻松地购买白糖；即使这种光明灿烂的和平气氛已经开始成为事实而不再是梦想，这个国家的人们仍然习惯于用战争时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在此前的 19 个月中，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对付他们所憎恨的东西：没有争论，没有犹豫，而是直接的攻击。在他们看来，德国虽然已经被击倒，可是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危险事物”，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从俄国向欧洲蔓延，因此很有可能继续蔓延到美国的土地。因此，他们决定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是攻击他们自认为的目标。停战协定签订一周之后，纽约市长海兰宣布，禁止街道上出现红色旗帜，同时命令警察“驱散所有非法集会”。几天之后，正当一群社会主义者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集会的时候，500 名士兵和水手从周围的街道上集结过来并试图冲进房门，总共动用了 22 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才把乱成一团的人群驱散并重新恢复了秩序。第二天晚上，在更靠近市中心的棕榈花园门口，又发生了一起动乱。当时，这里正在国际女性和平自由联盟的资助下举行一个同情革命俄国的集会，而这一次发动攻击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士兵和水手。他们把第 58 大街上的一个街区紧紧堵住，在大喊大叫中试图冲进棕榈花园。在这场混战中共有 6 人被严重打伤，其中包括一位非常无辜的保守派股票经纪人。当时，这位经纪人正和一位女士走在列克星敦大街上，正好看到了骚乱的场面，于是他就问了一声这是怎么回事。谁知其中有个水手立刻大声喊了起来：“嗨，大家伙儿，这儿还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呢。”于是瞬息之间，就有十来个人跳上了他的身体，扯掉了他的领带，将他痛打得几乎不省人事。上述的这些例子都说明，一系列漫长的战后暴乱行为已经开始。

在战争期间，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立刻行动的习惯，而不久更把这种习惯变成了自然。环境改变了，可用的方法也改变了，仅此而已。那些对增加工人工资一直持怨恨态度的雇主们，现在觉得报复的机会来了，因为他们得到了不想引起工人任何不满的政府的鼓励。德国已经被打倒，下一个要教训的该是劳工阶级了。无论如何，那些煽动劳工闹事的人肯定是一帮布尔什维克分子，现在是时候让雇主们在所从事的行业中得到像样的利益了。与此同时，工人们一方面发现生活成本仍然在稳步上升，一方面又发现罢工并不是不爱国的表现，因此他们也决定，要教训一下那些衣食无忧、大获暴利的雇主们。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充满痛苦的罢工和停工事件。

面对饮酒问题，美国人同样也采取了立即行动的态度。在战争期间，酒精显而易见是一种会影响战斗效率的危险物品。此前很多州和地区根据当地的法律已经禁止饮酒，如今国家决定一劳永逸地废除酒吧。人们的心理仍然受到战时的巨大影响，任何不彻底的措施都不会管用。战时禁酒法令已经被写进《法令全书》并即将在 1919 年 7 月 1 日生效，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国会在 1917 年的晚些时候已经通过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这将会使得禁酒法令永久有效（人们是这么认为的），而很多州在战争结束之前也已经批准了这个法令。1919 年 1 月，各个州的立法会召集在一起，将批准这项法令的运动进行得速度惊人。《纽约论坛报》说，这就“好像一艘帆船在无风的海洋中勇往直前，而推动它的却是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纽约时报》的社论则宣称：“禁酒法令似乎成为了时尚，就如同饮酒曾经是时尚一样。”停战刚刚结束 9 个星期，使法令生效所必需的 36 个州就于 1 月 16 日签署了批准令，就连纽约州在数天之后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如同社会主义者曾经遭遇过的那样，威士忌和“饮酒场地”如今也遭到了恶毒的打击。自然，会有些疑虑。有些人指出，300 万军人可不一定喜欢这种新安排，但这个国家却不会有心情再仔细考虑。禁酒法令在“没有妥协”的战争精神中继续前进。

然而，虽然人们在战争期间形成的轻率脾性在停战以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和平时代的到来在某些方面还是带来了深远的变化。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国家以一种极其兴奋的态度进行着自己的事业。陆军军事长可能会说，仅有的德国好丘八就是死丘八，而诸如缔造世界安全以求民主的谈论全都是胡说八道；“四分钟”演说家可能会大吼说，应该将德国皇帝油





烹。可事实仍然是:数百万的美国人仍然坚信,他们是为一个神圣的事业而战,是为了被压迫国家的权利而战,是为了永久地结束战争而战,也是为了威尔逊总统全力提倡的所有事物而战。时代广场的那个女孩演唱《上帝赞美诗》的行为,就如同人们烧毁德国皇帝雕像的行为一样,都代表了他们真实的感情。然而,自从签订了停战协定,一种微妙的变化就已经开始了。

有些人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威尔逊,因为他们认为,他置身于战争之外的时间太长,他血管里流淌的是牛奶和水,而不是血液;他曾经如此对待罗斯福(Roosevelt)和伍德(Wood),因此永远都不应该得到原谅;他内心里是一个危险的极端分子,因此会对资本主义体系带来危险;他绝对不应该要求召开民主党大会进行选举,而他亲自参加巴黎和会的做法则是自大狂的表现。如今这些人都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厌倦了为法国人鼓掌叫好,他们对英国人以及英国人对待爱尔兰的态度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通常对"我们高贵的联盟"这一说法感到恶心,他们认为我们参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救自己,他们认为威尔逊那种缔造世界安全以求民主的讲法纯粹是危险而伪善的胡说八道。他们如今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今的人们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而不会受到惩罚:"我们已经打败了德国,我们即将打败这帮该死的布尔什维克人,该是我们攻击威尔逊和他那帮和平主义者的时候了。"战争的紧张情绪开始放松,理想主义的泡沫已经被刺破。和平时代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可是人们似乎有些怀疑:美国是否像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认为的那样,已经准备好"在全球范围内帮助建立公正的民主氛围"。

## 三

但是,威尔逊先生的想法,同样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从 1917 年 4 月起,他的意愿就变得不可违抗。在美国,事实上任何反对威尔逊领导的公开意见都受到了压制:如果谁与总统的意见不同,那他就是不爱国。他发表的通告和很多讲话已经为普通大众确定了美国战争的最终目标和实现最终和平的条件。在欧洲,他的雄辩口才非常有效,使得政治家们不仅心甘情愿地追随他的领导,并且还同意按照他的条件起草停战协定。在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的人们把他的讲话当成耶稣基督的圣音。既然他对一个

建立于国际联盟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怀有自己的构想，那么，他亲自前往巴黎似乎就是一个必然的举动，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施展他那无比的仁慈力量，将这种构想变为现实。而他自己的头脑也被这个壮丽的梦想完全占据。像洛奇(Lodge)参议员这样的批评家，以及兰辛(Lansing)国务卿这样的助手，也许会反对说，他应该将这种谈判的事情留给下属去做，或者美国应该先跟德国建立和平关系而将建立国际联盟的讨论推后，这样才可以使一个不安定的世界迅速地重新恢复平衡状态；但是，既然他在战争期间就能够迫使批评家们闭嘴，难道现在他不能让他们再次闭嘴？12 月 4 日——此时距离停战还不到一个月——总统乘“乔治·华盛顿号”轮船离开了纽约。当码头上的人群为他欢呼歌颂，当港口的船只为他鸣起汽笛、鸣响礼炮，站在船桥上随着轮船向东航行的伍德罗·威尔逊，肯定认为命运之神在向他垂青。

接下来几个星期发生的事件更加证实了他的这种感觉。他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之行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在英国，他成为该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外国人，他在伦敦街道上的行进只有加冕礼游行才能与之相比。在意大利，街道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都是来对他表示崇敬之情的。而在法国，威廉·伯利梭这样描写道：“从来没有人接受过这样的欢呼，那响彻巴黎街道的欢呼声，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在巴黎的街道上，我看到弗彻(Foch)，看到克列孟梭(Clemenceau)，我也看过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看过将军，看过归国的部队和飞舞的旗帜，但是坐在马车中经过的威尔逊，却听到了某些不同的东西——或者是超人的东西。”当伍德罗·威尔逊听到大批群众发出的热切欢呼，毫无疑问他肯定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参加巴黎和会的人员能够同意他所说的话，那么，那些维护旧秩序的外交家们是无法抵挡他的意见的。命运之神在垂青着他，整个世界在支持着他，而充满希望的光明前景就在不远的未来。







可是不巧的是，命运之神还有其他计划。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浪潮都在逐渐消退。长久以来，劳埃德·乔治一直代表着普通公众意见的反映，现在，他正努力争取在“绞死德国皇帝”的基础上进行重新选举；公众曾经为威尔逊和他所提倡的公正秩序摇旗呐喊，如今他们则决定投票支持劳埃德·乔治及其所提议的复仇计划。既然德国已经被打败，一些对美国充满嫉妒之心的欧洲政客们很想知道，他们从巴黎和会中能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捞到些什么样的战利品回家。他们知道很多民众赞同威

尔逊的想法，但他们也知道民众是最善变的，也会怀有同样的热情对附加条款和惩罚性赔款表示赞同。他们既然去参加巴黎和会，就下定决心要促成一种能够让他们将战利品带回国内的和平局面。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参议院内，对威尔逊提出的国际联盟和十四点计划的反对意见却大量增加。早在 1918 年 12 月 21 日，参议院里共和党的精神领袖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就宣布，参议院不仅在签订条约方面和总统享有同样的力量，并且应该在谈判之前就让公众了解自己的意见。他表示说，在巴黎和会上即使不提出国际联盟计划，也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他同时提出了与威尔逊总统的意见截然不同的关于和平计划的想法：他和助手们希望，在解除德国武装的同时，让它承担数额巨大的赔款，如果可能的话，将德国分割成几个部分。在领土方面，他们准备对盟国做出很大让步。最主要的是，他们希望在和平解决方案中，以后不要再有机会将美国拖扯进欧洲事务。对巴黎和会上提出的任何关于国际联盟的计划，他们都准备进行仔细检查，一旦某计划牵涉到"纠缠不清的联盟"，他们就会立刻表示反对。这样一来，威尔逊不仅遭受到来自欧洲外交家们的反对，在国内又遭受到了来自参议院和公众意见的反对，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反对意见究竟怎样威胁了他，不过这些意见确实正在传播。

如果威尔逊愿意知道的话，事实上事态的发展趋势正在逐渐变得对他不利。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如历史上在每次战争结束时期都会发生的那样，人性开始表现出一种新的特点：再没有对统一的冲动，取而代之的是分割的潮流；再没有对理想主义的冲动，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主义的潮流。

对威尔逊命运产生影响的，不仅有旧世界外交家和新世界参议院爱国者们的意见，同时还有威尔逊自己在思想和性格方面的局限性。他的目的太过单一，他的思想太过不可妥协，这些特质虽然有助于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倡导者，但是在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却使得他背负的责任过于重大，几近于不可能完成。由于这种思想和性格上的局限性，威尔逊无法使同伴们恰如其分地知晓自己在十人委员会或四人委员会召开会议时自己所做的事情，因此也无法知晓他们可能给予的建议或反对意见。同样由于这种局限性，威尔逊无法让在巴黎进行报道的美国记者信任自己，因此也无法通过他们的报道而从国内获得宝贵的支持。他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他虽然又一次表现出了自己视野上的远见，却没有能够通过言语进行表

达。正如瑞·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曾经精辟地形容过的那样，威尔逊"习惯了从书本、文件和书信等书面材料获取信息，而不是通过公众的反映"，因此"低估了人际接触……的价值"。在书面谈判中，他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但是哪怕是在一次小型的口头交换意见过程中，他也始终处于劣势。当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Orlando)要求他加入四人委员会进行秘密会谈时，他们等于已经将他打败了一半，因为在这种场合，他们完全可以将签订条约的过程操纵成一场扑克牌游戏。一个超人也许可以从巴黎胜利凯旋，可是伍德罗·威尔逊却雄风不再，他无法做到从巴黎得胜回还。

我们并不想讲述总统如何在巴黎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那冗长而痛苦的过程，只要说说以下的情况就足够了：他顽强而机智地战斗着，并且令人信服地成功协调了条约的内容。欧洲的外交家们希望在解决领土和军事问题之后再讨论国际联盟问题，但是威尔逊却迫使他们将国际联盟议题放在首要位置。作为起草《国际联盟盟约》的委员会主席，他拿出了一份初步的草稿，并且正如他料想的那样，草稿的主要反对者正是国内诸如塔夫脱(Taft)、鲁特(Root)和洛奇等人。在巴黎，与会者几乎一致要求对德国大片领土以及所有殖民地进行合并；甚至连英联邦自治领的总理们也大胆提出合并的要求，并且在要求殖民地方面都表示了对彼此的支持。但是他仍然成功地说服会议接受了委任统治权原则。通过威胁说自己要离开巴黎和会，他迫使克列孟梭修改了对德国领土主权的要求；通过冒险呼吁全世界的人民看看自己的良心，他迫使意大利接受了少于自己要求的土地。一次又一次，都是威尔逊，而且只有威尔逊一人，在阻止战胜国对战败国领土的瓜分，却对战胜国居民的欲求不加考虑。如果逐日地阅读关于会议的报道，人们会意识到，要是没有威尔逊如此努力地周旋并最终签订出一份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协议，会议的解决方案对未来世界和平的威胁要厉害得多。然而，最终的结果毕竟是一种妥协。这份条约在太多方面都沿袭了战时很多不公正的秘密协定的规定；威尔逊努力想把《国际联盟盟约》牢牢扎根进这份条约，可是这些内容不仅显得过于严格，并且很有可能让美国承担太多的军事义务，而美国人则已经对战争充满了厌倦之情，只希望欧洲事务永远都与他们无关。

在离开美国六个多月之后，威尔逊总统带着这份条约于 1919 年 6 月底乘船回国。此时，他肯定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凡尔赛条约》的可恶缺陷。





同时他肯定也意识到了，不论他如何努力，那些曾经坐在巴黎和会谈判桌前的人已经开始意见摇摆，而引起他们意见摇摆的原因主要是恐惧、憎恨、贪婪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他作为代言人所提倡的那种高尚动机。任何一个有眼睛有耳朵的理性之人都肯定能够觉察出，整个世界的梦想都在逐渐开始破灭，而华盛顿参议院内每天都在出现的反对意见也逐渐发生作用。可是，威尔逊又能做些什么呢？

难道他在回国后能对参议院和美国人民说"在有些方面这个条约真是糟糕透了。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不应该接受山东条款，也不应该接受意大利边境条款，我应该确定好德国的赔款数额，也应该阻止法国掠夺大量的德国领土。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我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我相信国际联盟将会对其余的一切作出弥补"？他不能；因为所有条款的制订他都亲历亲为；是他签订了这份条约，所以他必须为此辩护。难道他能够承认，虽然他事先宣布说所有参加巴黎和会的谈判代表们都会以一种无私的精神工作，可是这并不是事实？当然不能，因为那样做无疑是承认他自己的失败，并因此毁掉他的威信。他既然在会议开始之前就宣布说将会公正地解决所有事情，在会议过程中也一直坚持说正在公正地解决所有事情，那么在会议结束之后，他又怎么能够承认事实上事情并没有得到公正地解决？事件的发展使他陷入了困境，而要摆脱困境，他似乎只有一个出口，那就是回国后他必须发誓说，巴黎和会是一次友好的聚会，每一项重要的决定都建立在十四点建议的基础之上。克列孟梭、奥兰多、劳埃德·乔治以及其他参与巴黎和会的人都怀着对全人类的无限热爱，而要想拯救世界，人们就得把条约看做是建立田园诗般世界新秩序的宪章，并且对此完全接受。

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关于条约的说法并不是真话，而且他肯定对此也非常清楚——起码有些时候他肯定知道自己所说的并不是真话，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威尔逊的故事完全是一个悲剧。他跌进了所有理想主义者都会跌进去的深坑。由于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就选择将事实扭曲。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都描绘了一个存在于自己梦想中的世界，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乐观主义者就这样成为了感伤主义者。于是，当他回国后向美国人民讲述巴黎和会的时候，他的口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里只有好人和真实的劳作，完全没有对人类福利的自私考虑。他说，如果美国不认可巴黎和会上的决定并据此为人类造

福的话，全世界都会伤心。可是惟一被伤的，却是他自己的心。

# 四

亨利·卡波特·洛奇不仅是一位绅士、一位学者，也是美国参议院中一位优雅而善于游说的人物。当他在参议院议事厅的走廊上悠闲地散步时——身材修长，体态优雅，留着灰白的头发与胡须，而这些都是贵族特质的体现——他就像福尔摩斯扮演者威廉·吉尔特(William Gillette)那样，无论在多么拥挤的舞台上，都照样能够吸引他人的目光。他不需要抬高嗓音，他只需要暂时转个身，听上某个同事一两句言语花哨的讲话，然后漠不关心地走开继续散步，就能让来访者确信，那些讲话根本没有值得关注的价值。而对威尔逊的反对意见，都集中体现在洛奇身上。

洛奇信奉美国精神。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应该是使自己的国家避免任何国外的纠缠，除非我们的荣誉受到了牵扯；一旦涉及我们的荣誉，我们就应该做好艰苦战斗的准备；而当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就应该再一次地将自己抽身出来，远远地站在一旁，只管我们自己的事情。(在洛奇的眼中，如果我们的特权受到威胁，就意味着我们的荣誉被牵扯其中；而在威尔逊的眼中，国家的荣誉是一种道德内容：只有某种令人羞耻的行为才会让这个国家失去荣誉。)作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洛奇认为，确保任何国际条约都不会危害美国这项历史悠久的外交政策，这是他的责任。他认为，不可能相信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在以后都会像童子军那样行事；他知道，一份条约只有在感情交好和交恶时同样有效才真正算是有效；可是在他眼里，目前的这个时代只会带来大量的麻烦。

洛奇参议员同时也是一位政客。他知道自己马萨诸塞州的选民中有几十万爱尔兰人，于是要求在巴黎超负荷工作的和平代表们举行一个听证会，对象是包括弗兰克·P. 沃尔什(Frank P. Walsh)、爱德华·F. 顿(Edward F. Dunn)和迈克尔·J. 瑞恩(Michael J. Ryan)等成员的所谓美国争取爱尔兰独立委员会，虽然对其他任何人来说，他们都无法理解爱尔兰的独立究竟与条约有什么关系。同时，洛奇也知道意大利选票的规模巨大，所以当会议讨论意大利危机的时候，洛奇对波士顿的意大利人发言说，意大利应该拥有阜姆，也应该控制亚得里亚海，而这种做法正是他故意为





难威尔逊的表现。最后，洛奇对伍德罗·威尔逊毫无热爱可言。威尔逊认为自己拥有为美国人民代言的权利，但洛奇却强烈认为这种假定毫无保证并且毫不公正，因此，当美国和平委员会中惟一的共和党人亨利·怀特(Henry White)乘船前往欧洲的时候，洛奇向他手中塞进了一份秘密的备忘录，里面是他自己与威尔逊所提倡的截然不同的对于和平条款的想法，而洛奇认为美国人民都将会支持自己的意见。洛奇建议怀特把这份备忘录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展示给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Balfour)、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尼蒂(Nitti)看，并且补充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份备忘录里的想法可以大大加强他们的地位。"任何一个可敬的人都不会给出这样的建议，除非他相信，总统的方案得不到通过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安定幸福得到了保障。

与洛奇一样对这份条约持怀疑态度的，还有很多富有影响力的人：有顽固的保守党人，例如布兰德吉(Brandegee)；有西方的理想主义者，例如波拉(Borah)，他们对任何外国外交家都不信任，就像旧式的情节剧中那个金发的乡村小伙丝毫也不信任狡猾的城市男人一样；有长期持反对意见的人，例如拉福莱特(La Follette)和吉姆·里德(Jim Reed)；有共和党人，他们对使一个民主党总统陷入困境的做法毫不遗憾，尤其是这个总统在战时曾经要求召开民主党大会进行选举；有参议员，他们急切地想让大家明白，如果没有参议院的建议和首肯，任何人都无法制定任何协定，而任何人也无法将参议院甩在一旁；还有另外一些不在少数的人，他们除了有自己的反对理由之外，也和洛奇一样，对威尔逊式的说话方式感到厌恶。而在参议院以外，还有来自很多不同方面的反对意见。对爱尔兰人而言，他们很容易受到煽动而对国际联盟怒火冲天，因为这个联盟"将六个席位给了英格兰"。对意大利人而言，既然威尔逊曾经拒绝让他们拥有阜姆，那他们就随时准备对其进行公开抨击和反对。对许多德国人而言，无论他们在战争期间曾经对美国多么忠诚，但是对于破坏德意志共和国的行为以及国际联盟拒绝给德国提供席位的行为却没有多少热情。有些人认为美国从解决方案中得到的东西太少了。还有一大批人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尤其是在第10条中，看到了美国需要承担的义务，可是他们并不愿意让美国背负这样的责任。

除了上述的这些反对意见，还有一个因素需要对付：数百万美国人对任何会让他们想起战争的东西都越来越没有兴趣。整个欧洲一团糟的情

况只会让他们立刻感到恶心而厌倦，他们只想与其一刀两断。他们再也不想知道又出现了新的牺牲——他们已经做出了太多的牺牲。当时在时代广场演唱《上帝赞美诗》的女孩曾经表达出他们对胜利的感觉，并且让他们精神振奋，可是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如今这一切都结束了，因为出现了很多更加有趣的事情，例如威拉德与登普西之间的比赛，还有英国飞艇R－34号抵达长岛的消息。

1919年7月10日，总统回到了华盛顿。面对参议院，他否认《凡尔赛条约》这份被美国谈判者不得不接受的妥协性的条约已经“在巨大压力下被削减得毫无原则可言”。他的发言仍然一如几个月之前撼动全世界的心灵般雄辩有力：“舞台已经建好，命运已经被揭露。所有这些的到来都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构想，而是源于上帝之手的指引。我们无法回头。我们只能向前，抬起眼睛，振作精神，迈向光明的前景。自我们出生之日起，我们就梦想着这一切的到来，如今的美国将真实地为我们展现这条道路，而只有在美国的这条道路上，才会有灿烂阳光的照耀。”

多么优美动人的词句——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立刻批准这份条约。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厌倦了抬起眼睛向前进，而人们也因为太过熟悉威尔逊那散文诗般的风格而无法振奋起自己的精神。像小说一样冗长的条约被提交给了洛奇领导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但委员会却毫不着急，而是准备气定神闲地慢慢研究。一个月之后，洛奇在参议院发言，认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更加重要。他坚持说，《国际联盟盟约》使“其他强国”拥有了“将美国军队和舰船出动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权利；他同时向威尔逊表示：“我们不愿意让其他国家的纷争转移我们的政治视线并加重我们的苦难。我们不愿意在那些折磨世界人民的大大小小的争吵中掺和，并因此耗干我们的活力或削弱我们的精神力量。”两周之后，洛奇的委员会投票通过了对这份条约的修改方案，虽然在每一个提案中选票的差距都非常之小：将山东归还给中国，美国退出国际委员会，美国和英国在联盟中享有同样的投票权，取消英国自治领代表投票表决影响大英帝国的问题的权利。对条约进行修改和保留的过程似乎将要不确定地进行了，于是威尔逊准备孤注一掷。他决定求助于人民。为了赢得公众对他的支持，他计划在整个美国西部进行一次旅行演讲。

总统的医生却建议放弃这个计划，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几个月以来，他的情绪一直不好，精神始终高度紧张。在巴黎和会时，瑞·斯坦

纳德·贝克就经常发现，在漫长而繁忙的一天会议结束之后，总统似乎被“彻底击败了，他精疲力竭，脸色十分憔悴，其中一边脸颊还痛苦地抽搐着”。有一段时间他甚至都已经崩溃了——他遭到了流行性感冒的突然袭击，剧烈地咳嗽，并且高烧 103 华氏度——而就在几天之后，他就支撑着又开始了工作。如今已经是 9 月份了，持续的超额工作让他精疲力竭，而一想到他付出了所有心血和力量去努力的事情有可能失败，这也让他心烦意乱。他就好像是着了魔似的，头脑里除了条约和国际联盟再也无法考虑任何其他事情，而他惟一所关心的，就是如何能够使这两件事情获得成功。因此，他置其他所有人的劝说和意见于不顾，在 9 月 3 日离开华盛顿开始了他的演讲之旅，而这次旅行则使他的精神更加紧张：他需要在巨大而闷热的礼堂中一天进行一次甚至两次的演讲（由于没有扩音器，他的嗓子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他需要乘坐汽车前往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在行驶过程中，他得站立着向人群不停地挥舞手中的帽子）；他需要面对大批的记者和宣传的耀眼灯光，并且与他们不断地握手；而夜晚，他只能在颠簸不堪的火车上辗转难眠。

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伍德罗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描绘他理想中的关于条约和国际联盟的景象，可是这种描述距离真正的现实却越来越远。他说，巴黎和会表现出了“政治家们慷慨而高尚的合作”；他说，“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等人的心与世界人民的心一起跳动”，而他们签订的条约中跳动的则是人性之心。他代表美国，实际上也代表所有其他国家，对一种崭新的理想表示了颤抖的心动：“在如今的世界上，你可以想像，每一张脸庞上都流淌着热泪，而这些热泪不仅是伤心的泪，也是充满希望的泪。”他警告听众说，如果条约得不到批准，不安定的局面将会动摇整个世界的基础；他同时还预言说，“这个国家正站在一支伟大队伍的前头行进”，前往“只有上帝公正纯洁之光的地方”。40 场演讲的内容场场不同，每一次发言都经过完美的组织，用词优美，充满着令人心动的激情。单纯从技术层面来看，每一场演讲的表现都非常杰出。然而，这个国家却本能地知道，所有这些演讲中所描绘的都是梦想中的世界，梦想中的条约。（也许当总统躺在自己的私人汽车中无法入睡的时候，他在某个神志清醒的时刻，也会惊恐地发现，自己事实上距离真相究竟是多么遥远。）公众并没有像总统期待的那样，对他的事业表现出普遍的积极支持，而参议院则仍然在对条约的保留条款进行讨论。在 9 月 24 日第一次的检验性投票中，43 票对

40 票的结果通过了对总统的反对意见。

第二天晚上，威尔逊总统身上的力量就完全离他而去。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消化不良并且睡眠不足。9 月 25 日，他在普韦布洛进行了一次长篇演讲之后，甚至根本无法入睡。于是火车停了下来，威尔逊夫妇沿着乡间小路散了一会步。可是当他再回到火车上的时候，他就发起了高烧，“当他在镇静剂作用下睡着的时候，嘴角流下了口水，他的身体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说明他正面临着崩溃”。第二天早晨，当他试图起床的时候，他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火车立刻驶往华盛顿，并取消了所有预定的演讲计划。生病的总统回到了白宫。数天以后，由于脑血栓，他的左半身部分地瘫痪了。又一个悲剧性的行为走到了尽头。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事业，可是这些却还不够。

## 五

此后，开始了有总统在位的历史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之一。伍德罗·威尔逊病重了好几个星期，有时甚至都无法在那些等待他签名的文件上签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无法在椅子上坐起来；有五个月的时间，他都无法乘坐白宫的汽车出行。从他身体垮掉到他任期结束的 1921 年 3 月 4 日，这整整的 17 个月中，他身体一直很虚弱并且情况不稳。由于左半身部分地瘫痪了，他只能躺在床上或是坐在病人的专用椅子上。他虽然住在白宫里，却好像被禁闭在医院里。他几乎见不到任何人，只处理办公室中那些最为紧急的事务。能和他联系的惟一方式就是通过信件，而所有的信件都必须通过威尔逊夫人、格雷森(Grayson)上将或者是其他护理人员的手。由于在整个这段时期内，极少有信件收到回复，而信件中提出的建议也极少被付诸行动，所以人们经常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应该为此负责。事实上，有时候人们猜想白宫的很多决定都是威尔逊夫人做出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国家正处于摄政统治时期。

由于总统无法发挥实际作用，这个国家的行政机器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自然，整个国家可以继续它的常规事务；内阁中某个有闯劲的成员，例如司法部长帕尔默(Palmer)，可以心情愉快地抓捕激进分子并将之驱逐，也可以出台针对罢工者的禁令，就好像他身后有总统府的满腔智慧和力量

在支持着他似的。可是很多政策上的事务都仍然需要依靠白宫，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却很清楚地发现期待来自白宫的指导已经不大可能了。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白宫的关注和处理：生活成本极其昂贵，并由此引起了商人的破产和失业的增加；劳资双方处于激烈的对峙状态，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的大罢工就是这种对峙的具体体现；政府部门需要在和平基础上进行重组；外交政策方面有无数问题虽然与条约或者是国际联盟没有关系，却急需解决。然而，对大多数问题，这位病人都根本无法提供领导。同时，他对国会和整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却远没有因为他为国际联盟付出的牺牲而增加，反而缩减到了几乎为零的地步。

这种奇怪的状态对华盛顿官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两年后爱德华·G. 劳瑞(Edward G. Lowry)在其《华盛顿小传》一书中对这种影响进行了精彩的描述：

“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那位病重在床的总统充满了仇恨，同时因为这种仇恨而伤害了自己，因此使得华盛顿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变得凄凉、阴冷而严厉，因为这位总统似乎破坏了所有的人类关系。白宫已经与世隔绝，与国会、当地居民和官方团体都不再联系。它变成了处于空旷地带的一个小小空间，巨大的铁门紧闭，长长的铁链紧锁，警察监管着来往的通道……所有这一切带给人们的，只有普遍的凄凉、痛苦、挫折感和不幸。”

威尔逊先生的头脑仍然清楚。按照报道的说法，他已经无法对自己的政府“履行力量和责任”，因此应该根据宪法规定，由副总统取而代之(这种报道在那些日子里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参议员福尔(Fall)和希区柯克(Hitchcock)代表参议院前来探望，以便确定他的精神状况。他们发现，总统对于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了然于心，却一笑置之；在谈话中他始终笑声不断、玩笑不断，对所讨论的问题显示出完全的掌控。然而，他的身上还是缺少了某些东西：他的消息缺乏生命力，他的头脑缺乏新想法。他无法用一种新的方式去面对新的环境：读着他公开发表的文件，人们会感到他的大脑仍然在围绕着老想法打转，是在将陈旧的词句重新组织，人们也会感到他仍然生活在那个他自己建立起来的梦想世界里，而这个梦想世界还是在那些他为国际联盟而努力的日子里建立的。

他一直都是一个孤独的人；而如今的他则好似魔鬼上身，与那些仍然

试图为他服务的人都逐渐脱离了关系。豪斯(House)很多年来一直担任他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亲密朋友。在巴黎和会的后期,人们注意到威尔逊对豪斯的态度开始变得有些冷淡。当总统不在巴黎的时候,这位喜欢和解做法的人在谈判时也许有点过于温情了,以致总统认为豪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为老谋深算的克列孟梭谋取了方便,虽然他的这种想法并不能确定究竟是对还是错。然而,豪斯仍然希望,当他从巴黎回来的时候,他能够在颓丧的总统和目中无人的参议员们之间达成一种和睦的关系。豪斯写信建议威尔逊接受条约中的某些保留条款,可是没有收到回音。豪斯又写了一封信,仍然没有回音。一直都没有任何解释。很长时间以来,两人之间的友谊和政治关系曾经对总统是如此珍贵,并且曾经大力影响了政策的方向,可是如今就这样走到了尽头——能说的就是这些了。

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以及召开过程中,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在很多事情上与总统都有不一致的地方;然而他仍然担任着国务卿的职务,并且一直相信自己与总统的关系很好。在威尔逊生病期间,他认为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使得政府能够处理事务,所以他在白宫的会议室里召集了内阁会议。可是他被不由分说地解职了。最后一个离开的是忠心耿耿的乔·土莫提(Joe Tumulty),他曾经与总统共同经历了顺境和逆境。早在特伦顿的州长办公室里,他就是威尔逊的秘书,在华盛顿的总统府里,他担任威尔逊的秘书一职也有八年之久。总统与土莫提的关系破裂虽然发生在他离开白宫之后,可是却同样能够说明,生病的总统头脑里究竟是搭错了哪根筋,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1922 年 4 月,民主党即将在纽约举行一次晚宴。晚宴开始之前,土莫提拜访了威尔逊,并且得知了一个他认为是口头讯息的消息,这则讯息大意是威尔逊将“支持任何支持拯救美国事业的人,而对美国的拯救就是对所有阶级保持公正”。看上去这只是一则无伤大雅的讯息,由于与威尔逊有十年的亲密关系,土莫提有理由认为,他知道什么时候威尔逊的话可能会被引用,什么时候可能不会引用。但是,凑巧的是,考克斯(Cox)州长在民主党晚宴上发言,而当土莫提说出这则讯息的时候,被理解成是考克斯认可了这则讯息。对于这件事,威尔逊向《纽约时报》写了一封简单的信件,否认他曾经授权任何人可以将他的信息发布出去。土莫提立刻向威尔逊写信解释,说他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满腔忠诚,并同时以真正朋友的身份对让总统感到尴尬而致歉。他的信件得到了“威尔逊夫人礼貌的回信”(土莫提后来原话是这么说的),然而,威尔







逊本人则再也没有说过一个字。土莫提又忠诚地写了一封信，称自己永远对威尔逊充满爱戴之情，并且“在您需要我的时候永远陪伴在您左右”，但仍然没有回音。

在条约和国际联盟的问题上，伍德罗·威尔逊的态度一直强硬到底。你可以称之为无限忠诚于原则，也可以称之为顽固不化——除了参议员希区柯克提出的某些无伤大雅的“解释性”条款，他对任何保留条款都不同意。而就是这些条款，他同意的时候也已经太晚了，并且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总统病重期间，参议院仍然继续对条约提出一条又一条的保留条款。1919 年 11 月 19 日，条约终于被彻底击败。那时，坚决反对条约的人其实只有半数多一些，但是他们已经足以获胜。他们首先联合那些不希望对条约有任何改动的支持威尔逊的共和党人，组成大多数阵营反对洛奇的委员会所提出的长长的保留条款清单；然后他们又联合洛奇和其他支持保留条款的人士，将去除保留条款的条约击倒在地。这是一个充满讽刺意义的结果，但是这就是结果。几个月之后，这个议题被再次提起，却再一次遭遇了失败。最终，参众两院都同意，决定与德国保持“独自和解”——但是却遭到了威尔逊的否决，因为“这次行动将会使美国的勇敢和荣誉负担上无法消除的污点”。（最终，一项类似的和平决议由哈定总统签署。）威尔逊总统最后的希望是，1920 年的总统选举将会成为一次“伟大而严肃的公民投票”，人民大众们——他一直宣称这些人民是支持他的——将会站出来维护他，维护这个国家。他们确实站出来了——并且以多达 700 万张的选票迫使这位如此热爱国际联盟的候选者接受了失败。

当自己的事业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自己为此而做出的巨大牺牲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嘲讽时，白宫里那位病人的感觉肯定不会是愉快的。而我们却不知道，他究竟花了多长时间才明白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离他而去。当他因病躺在白宫病榻的时候，心中是否仍然怀有希望？这种情况似乎非常可能，因为他所得知的所有外部消息都经过了身边人的过滤。由于他安危未定，这样做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不是无法避免的——为了避免他再受打击，他们告诉他，所有的事情都进展顺利，各种各样的迹象都表明美国人民是不会让他失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和豪斯上校断交了。也许在总统看来，任何建议对洛奇之流妥协的人都是胆小鬼，因为他竟然在胜利的时刻建议竖起白旗投降。但是，不管这个推测是否得到了证实，迟早会真相大白的，因为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结果都对条约

表示了反对意见，并且让总统的生命充满了苦涩的味道。威尔逊与忠诚的乔·土莫提断绝了关系，这一行为说明他对人类已经失去了信任。

## 六

让我们再次回到1919年的早春，那时的威尔逊仍然还在巴黎。塞缪尔·G. 布利茨(Samuel G. Blythe)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问题观察家，他在《纽约晚邮报》上撰文描述了民主党领导人在面对和平问题时候的心情：

"你无法让保守势力学习新的技能……保守势力会屈服但是绝不会死亡。正在这个时刻，那些认为自己控制了民主党命运的年老而过时的民主党人——认为自己控制了民主党的命运！——却仍然以1896年的方式和风格运作着自己的党派。战争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影响……他们只会向后看。"

这种分析很合理，但是民主党的首脑们，无论他们曾经对各种批评如何虚心接受，最起码他们都是优秀的政客。他们拥有优秀政客所必需的灵敏耳朵，并且听到了反对威尔逊及其所代表事物的所有意见。于是他们决定，在1920年的选举中挑选出一位与他们所憎恨的那位理想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民主党领袖，而这位领袖将会给他们以及整个国家展现出一副全新形象。距离1920年的民主党大会越来越近了，他们对候选人进行了一番调查。最领先的候选人是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将军。他是一位说话率直的士兵，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一样对上帝充满畏惧之心，并且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挑战；他确实与威尔逊对比鲜明，可是似乎不太好控制。接下来的是伊利诺伊州州长洛顿(Lowden)，不过他同样不太符合理想中的要求。而曾经解救了比利时危机并且在战时担任食品管理局局长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参选总统的活动中表现得极其业余，因为直到竞选运动开始，他才弄明白自己究竟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于是也被他们毫不留情地排除在外！哈里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也是被考虑的人选。虽然参议员身份是他的有利条件，但是他也有可能非常顽固。所有这些候选人都不符合条件，于是民主党的首脑们灵机一动，选中了沃伦·甘梅利尔·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平凡而谦逊的参议员。





想想看，哈定是多么符合要求啊。威尔逊是一个空想家，喜欢把自己看成一个“有远见的人”；而哈定正如劳瑞描述的那样，如站在雪茄店门口那笨拙的印第安人般守旧，好像“在安全剃刀之前那个时代的一朵花”，哈定相信，政治才能在麦金利（Mckinley）和福拉克（Foraker）时代已经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威尔逊是冷漠的；而哈定则是一个性格和蔼的小镇男人，与“人民”相处和谐；正如他的一个朋友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位理想的伙伴，“可以在任何一个周六晚上与他玩纸牌游戏”。威尔逊一直都难于接近；而哈定则非常容易接近。威尔逊欣赏劳动人民，不相信商人阶级，谈论的是“工业民主”；哈定则对过去那段美好的时光充满了渴望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政府不是用不必要的规章制度打扰商人，而是为他们提供获利丰厚的关税，并且指示司法部别将他们放在心上。威尔逊与国会，尤其是参议院，总是发生争执；而哈定不仅是一个参议员，还是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参议员。威尔逊总是不断树敌；而哈定根本没有敌人。他确确实实就是一个亲切和蔼的人。查尔斯·威利斯·汤普森（Charles Willis Thompson）这样形容他：“从头至尾他都是尺度如一，平滑如一，根本没有凸起和凹下。”威尔逊考虑的是全世界；而哈定首先考虑的是美国。最后，威尔逊想让美国发挥自己崇高的能力，而哈定则想让美国好好休息。在大会召开之前的几个星期，哈定在波士顿发言说：“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而是有治疗功用的措施；不是秘方，而是常态；不是革命，而是恢复……不是手术，而是平静。”这番发言不仅准确地表达了人们日益强烈的愿望，也为美国语言无意中补充了一个新词——“常态”。对一个已经厌倦了承担道德义务和世界希望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人才是他们能够认真对待的。

据可靠报道，早在大会召开前 4 个月，民主党的首脑们就已经做出了有利于哈定的决定。但是，一直到大会进行了四轮投票以后——伍德领先，洛顿第二，哈定排名第五——满脸倦容的代表们已经解散了，首脑们才最终决定让哈定通过。哈定的政治经纪人是一位名叫哈里·M. 多尔蒂（Harry M. Daugherty）的俄亥俄州老板，他曾经预言，大会将陷入僵局，而最终的任命将会由 12 个人或 13 个人在“凌晨两点于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决定。他的预言完全准确。那个房间是位于黑石饭店乔治·哈威（George Harvey）所在的房间。病重在床的波依斯·彭罗斯（Boies Penrose）在费城通过私人电话向约翰·T. 亚当斯（John T. Adams）做出了指

示，随后民主党的领导人都知道了这个指示，于是第二天下午哈定就得到了任命。

威尔逊由于病重而失去了总统候选的资格，民主党人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并适时地提名了另外一个同样平凡的政客，来自俄亥俄州的詹姆斯·M.考克斯(James M. Cox)州长。这位被提名人不得不表示支持国际联盟，并且也这么做了。他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嗓子被喊得嘶哑，手势也做得非常骄傲，可是他却没有任何机会。哈定参议员则仍然待在自己的家乡小镇，进行着麦金利·威廉式的前廊运动；他像一个普通的小镇男人，在屋后和顾问们一起钉马蹄铁，身上则插着一朵麦金利康乃馨；作为"各国联盟"的代表，他说的话恰到好处，既可以让那些支持国际联盟的老牌民主党人投票支持他，又不会让他们感到良心不安；同时，他说的话既反对了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又足以让大多数人相信：如果与他在白宫共事，他绝对不会号召他们去帮助受苦受难的捷克斯洛伐克。于是当 11 月 3 日早晨来临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他们已经用 1 600 万比 900 万的悬殊票数比将哈定送上了总统宝座，而作为牺牲品的受害者考克斯州长，则在朦胧的薄雾中迅速消失了。

美国在深思熟虑之后，对以下的这段话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并最终选择了常态。而这段话就是："通过榜样、冷静友善的忠告以及物质支持，旨在于全球范围内惠助建立公正的民主氛围。"

## 七

在这次彻底的失败之后，伍德罗·威尔逊在华盛顿 S 大街上那栋宽敞而舒适的住宅里又生活了三年多，直至生命最后结束。在这期间前来看望他的人们发现，一个过早衰老的男人，在朝南向阳的房间里蜷缩在壁炉旁一把巨大的椅子里。他坐在那里，双手放在大腿上，脑袋略微偏向一边。他的脑袋和身体都比他当政的时候要沉重得多；他的头发现在已经花白，向后梳在他那几乎已经秃顶的脑袋上。他讲话的时候连脑袋都无法移动——只有眼睛随着来访者转动。在陈述观点时为了突出重点，他的右胳膊前后摆动着，偶尔会打到椅子的扶手上。有时他会说："您必须原谅我没有站起来；我确实非常虚弱。"这样的表达风格仍然可以看出他曾经的优雅

风范，但是一旦谈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他的敌人，他的语调里立刻充满了仇恨。他说，现在不是喷洒玫瑰香水的时候，而是战斗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场党派之争，“不是用游击队的精神，而是按照党派路线进行”。他仍然坚持最后的一丁点儿希望，希望他的政党能够抓住机会。对那些导致他的伟大计划无法成功实现的人，他的措辞毫不留情：“我会情况好转的，到那个时候，我要出去对他们实施报复。”就是这样一位无助而痛苦的老人，心中仍然怀有自己的冤屈。

在纪念战争胜利结束五周年的停战日，他站在自己房屋门口的台阶上——要靠人扶持着才不至于摔倒——对前来向他表示敬意的人群发言。他说：“有些人对自己坚持的信念是否胜利没有丝毫的忧虑，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看过傻瓜反对上帝的眷顾，我也看到了他们的毁灭，而如今，他们将再一次面临完全的毁灭和蔑视。我们肯定会胜利，这一点就像上帝统治着世界一样肯定。”

三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

# 第三章　巨大的红色恐惧

## 一







在战后十年的早期，如果美国人民对伍德罗·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请求充耳不闻的话，那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已经太过厌倦牵扯于外国事务并且为此而付出高尚的努力，因为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有不祥传闻说，一场反对美国政府和机构的巨大阴谋即将出现。他们竖起耳朵听着炸弹的爆炸声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脚步声。他们严肃地认为——至少有数百万人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其他数百万人则是理性的公民——下个月或下个星期，美国可能就将爆发一场红色革命。与缔造世界安全以求民主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使美国保持安全并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那些日子里，报纸的头版充斥着关于罢工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发动暴乱的消息；停战日那天，当激进分子们在华盛顿森特里亚大街上开枪射倒游行者后，爱国的公民们进行了报复。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了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一个成员——请注意，这是一个美国白人——并且对他施行了私刑：他们将绳子套上了他的脖子然后把他从桥上扔了下去；通过正当方式选举出来的纽约州议会成员们被驱逐出境（他们的公民权也被同时剥

夺)，仅仅是由于此前他们曾当选为可敬的社会党成员；在印第安纳州，一个外国人只因为曾经高呼“让美国见鬼去吧”就遭到了枪杀，而陪审团仅用两分钟时间就宣布凶手无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辩手在一次校际辩论赛上赞成“雇主承认工会的存在对劳资双方进行谈判非常重要”的观点，而副总统则认为这是激进主义的危险表现。在那个年代，对法律和秩序的辩护是无法律无秩序的，对宪法的辩护是违反宪法的，并且充满了怀疑和内部冲突——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恐怖统治的年代。

这种全国性的普遍恐慌并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在战争期间，劳工运动无论在规模还是威望方面都得到了稳步的提高。成百起的罢工之所以爆发，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劳动人民生存所必需的物品价格都在上涨，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对自身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为了保持产量并维持工业界的和平，政府不仅鼓励劳资双方进行谈判，让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在华盛顿的战时理事会中享有很大的权利，并且还让工人们有理由希望，一旦和平来临，他们就会得到数不清的好处。和平确实来临了，可是工人们的希望却没有按期得到满足。物价仍然在上涨，雇主们一方面团结一致反对增加工资，另一方面却继续要求工人们长时间工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前往欧洲去寻求世界和平，却把劳动人民忘在了脑后；在愤怒和绝望中，工人们拿起了手中惟一的武器——罢工。全国的工人都在罢工：建筑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堆料场工人、造船工人、地铁站工人、制鞋工人、木匠、电话接线员，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行业的工人。到 1919 年 11 月，据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估计，工业州的罢工者人数至少有 100 万，非工业州的罢工者更多，还有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正式罢工，却自动放弃了工作，如果加上这些人的话，总数要达到 200 多万。

并不是所有的罢工者都只是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或者是减少工作时间等传统要求。有些罢工者还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行业秩序，即把对行业(或至少是他们所在的行业)的控制权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简单来说，也就是某种接近社会主义体制的东西。迄今为止一直很保守的铁路工人表示支持“铅锤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政府将继续对铁路行业提供指导，而工人们也可以参与铁路的管理。1919 年 9 月，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工人们投票进行罢工，他们大胆地提倡矿山国有化。有个代表刚刚在拥挤的人群前开始发言：“国有化是不可能的”，立刻就遭到了潮水般的嘘声、嘲笑声以及“把这个煤矿主扔出去”的喊声。在西北部，世界产业工人组织

在进行斗争，试图通过全球工会联合的大工会争取对资本的控制权。在北达科他州及其相邻的谷物出产州，20 万农民参加了汤利(Townley)的无党派联盟—— 一个被敌人描述成农耕苏维埃的联盟，而这种描述与现实还真有几分相似。(顺便说一下，汤利的无党派联盟在 1916 年有一位名叫查尔斯·A. 林德伯格的瑞典籍美国人成为了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候选人，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家庭注定要和摩根家族联姻的话，他肯定会大吃一惊。)工人阶级和自由知识分子阶级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倾向社会主义思想的潮流。社会主义党派虽然观察着成功的俄国革命，但对大规模暴力运动的想法却并没有认真对待。还有一群主要由俄国人组成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直接从莫斯科接受指导，提出的要求更加激进；而且很可能得到了俄国政府的资金援助，因此他们经常出没于贫民窟和工厂的居民中鼓吹他们的信条。

在激进运动中，由上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群体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尤其是当我们想到，所有骚乱其实都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比例是不合情理地微小。1919 年的晚些时候，伊利诺伊大学的戈登·S. 沃特金斯(Gordon S. Watkins)教授在《亚特兰大月刊》上撰文，他估计社会党大约有 39 000 名成员，社会主义劳动党成员大约是 10 000～30 000 名，而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则大约是 30 000～60 000 名。换言之，按照这个估计，社会主义者最多也不会超过整个国家成人数量的千分之一；三个党派加在一起的话——而其中大多数成员很可能非常满意于通过合法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工作——会将这个比例提高到千分之二。可是，如果要想开展一场革命性的大众运动，这个比例似乎太小了。

但是，一个美国商人可没有情绪来考虑这个比例究竟是大还是小。他从战争中带来了沸腾的热血，随时准备踢走道路上的下一个绊脚石。他很想重新回到生意场上去享受他的成果，而劳工就是威胁他利益的那块绊脚石。从战争中他还带来了好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就像历史上其他所有男人那样，在将空想主义和自私动机结合以后，产生了一种狂热的信念：他认为百分之百的美国精神、美国的安宁幸福以及开国者的教义都意味着商人有权利将工会组织一脚踢开。他对任何国外的东西都不再信任。另外，在战争年代由于听多了各种各样关于间谍和国际阴谋的故事，他因此确信，德国的同情者不仅在山顶用灯光互发信号，还会将毛玻璃放进药用敷料剂，而网球场中则很有可能隐藏着炮台。他变得越来越容易轻信，直到





他准备相信：美国劳工为了更高工资而进行斗争，就意味着一场由托洛茨基(Trotsky)领导的武装起义已经开始；如果一位无辜的教授告诉学生，社会主义总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那么教授肯定是受到了一个留着胡子的东欧游民的指使，这个游民一手拿着钱袋而另一手则拿着冒烟的炸弹。

## 二

1919 年发生的事件支持了这种恐惧的存在。4 月 28 日——那时威尔逊还在巴黎进行着和平条约的谈判，归国的军队正在凯旋门下游行——西雅图市长奥勒·汉森的信件里发现了一个“大得足以炸飞半边办公大楼”的诡雷，而此前汉森市长曾经在全国巡回发表政治演说，使得人们意识到了红色恐惧的存在。第二天下午，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参议员托马斯·R. 哈德威克(Thomas R. Hardwick)的家中，一名黑仆打开了一个寄给参议员的包裹，却被包裹中的炸弹炸飞了双手。而这位哈德威克参议员担任着参议院移民委员会的主席，为了阻止激进主义的进入，他曾经建议限制移民。

第三天凌晨 2:00，纽约邮局包裹部的职员查尔斯·柯普兰(Charles Caplan)在回家途中从报纸上看到了哈德威克家遭到炸弹袭击的消息。他从报道中得知，装有炸弹的包裹长约 6 英寸，宽约 3 英寸，褐色的包裹纸上写着(当然是伪造的)寄信人是纽约的金贝尔(Gimbel)兄弟。他觉得这种描述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几个这样的包裹。于是他开始绞尽脑汁地回想，突然间所有的事情都涌到了眼前。他匆忙赶回邮局——发现在一个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 16 个小小的褐色包裹，寄信人一律都是金贝尔兄弟，而他之所以将包裹放在那里，是因为这些包裹邮资不足。这些包裹的收件人分别是司法部长帕尔默、邮政管理局长博列森(Burleson)、芝加哥的法官兰迪斯(Landis)、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Holmes)、劳工部部长威尔逊(Wilson)、移民局长卡米内特(Caminetti)、J. P. 摩根(J. P. Morgan)、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以及其他很多政府官员和资本家们。警察在附近的消防队里对这些包裹进行了检查，发现里面都装有炸弹。还有一些包裹已经在寄出的路上了，最后总共检查出来的包裹数量达到了 36 个。(其他包裹没有一个被随便打开，这一点几乎无需说明；在接

下来的几天里，身居高位的要人们在解开褐色包裹的时候都极其小心。）包裹收件人名单可以有力地证明，是外国激进主义分子寄来了这些炸弹。

不到一个月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炸弹爆炸案，其中最成功的一起炸毁了司法部长帕尔默位于华盛顿的家宅的前部。爆炸发生的那天晚上，帕尔默先生刚刚离开一楼的藏书室，关灯上床，这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击中了前门，接着就听到了爆炸声，随后在门外发现了一个男人已经被炸成碎片的四肢。而报纸还报道说，附近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份激进主义的印刷物《素语》。

美国人民在报纸上经常能看到关于各种暴行的报道，于是愤怒地决定，要向“这些激进分子们”展开报复。

在接下来的那段日子里，发生了十数起报复事件，就让我们选取其中的两件，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进行报复的。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 1919 年的劳动节——也就是柯普兰先生在邮局的架子上刚刚发现那些褐色纸包裹之后。劳动节那天下午，社会主义者报纸《纽约召唤》的老板和员工们正在举行招待会以庆祝他们启用新办公室，几百名男男女女和孩子们都在大楼里嬉笑谈话。突然涌进来一群士兵和水手要求撕下“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海报，在要求被拒绝之后，他们将桌子上的印刷品统统毁坏，砸烂了办公室，并将人群赶到了大街上，然后对他们进行了一顿痛打——暴徒们在前门外站成半圆形，对从报社出来的人一个一个地痛打——以致报社的 7 名工作人员被送进了医院。

就在同一天，克里夫兰的一群社会主义者正在游行，队伍的前头高高地举着一杆红旗。一名中尉要求他们把红旗举得低一些，并随即带领一伙士兵跳进游行队伍，与游行者爆发了一场混战。警察赶来并且加入了混战——从那时起，一系列蔓延整个城市的骚乱开始了，并导致多人受伤，一名男子死亡，而一伙维护美国制度的暴徒将社会主义者总部彻底毁坏，甚至将打字机和各种办公家具都扔到了街上。

1919 年的夏天过去了。参议院与和平条约的辩论正在进行。议院通过了禁酒法令。选举权修正案得到了国会的批准并开始在全国施行。在英国和长岛的米尼奥拉之间，R－34 号进行了第一次跨越大西洋的可操纵飞行，并且安全返回。人们一边笑着观看《年轻的来访者》，一边猜想，戴西·阿什福德(Daisy Ashford)究竟是否真的就是詹姆斯·M. 巴里(James M. Barrie)。由于生活费用持续上涨，报纸上对通过囤积白糖和食物而大

发横财的奸商们给予了严厉谴责。世界上第一个飞机葬礼举行了。牧师们为年轻人日益衰减的道德意识感到悲痛。不过，随着新的罢工不断爆发，劳工们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而革命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美国民众的心头充满了恐惧和疑虑。而 9 月份发生的波士顿警察大罢工事件，更成倍地加重了人们的恐惧之心。



## 三

波士顿的警察自有他们的委屈：他们的收入最低只有 1 100 美元，其中包括购买制服的费用，而按照 1919 年的价格，1 100 美元所能购买的东西极其有限。他们紧跟潮流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且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建立了联系。不过，柯蒂斯(Curtis)警长却极为顽固而严厉，禁止警察们与任何外部组织有联系，他立刻对工会的 19 名官员和成员进行了控诉，并且暂时剥夺了他们的职务。警察们怒火中烧，威胁说要罢工。于是市长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对这起冲突事件进行调解。委员会建议双方达成妥协，但是对柯蒂斯先生来说，妥协就等同于屈服，所以他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于是，1919 年 9 月 9 日警方晚间点名的时候，一大批警察走出警署开始了罢工。

由于整个城市没有了防御，歹徒们那个晚上开始尽情地享受自由：他们砸碎玻璃，掠夺商店，迫使彼得斯(Peters)市长召来了州地方军。第二天，州长又召集了州近卫军，一批志愿警察开始设法对局势进行处理。可是州近卫军和志愿警察主要由退役警察、哈佛大学学生以及来自后湾区的棉花经纪人组成，他们毫无经验，而歹徒们对此一清二楚。被激怒的州近卫军在南波士顿向暴徒开火并造成两人丧生。断断续续的暴力事件持续了多天，最厉害的一次发生在波士顿公园那个清教徒的花园里，当时他们正在玩双骰子游戏，近卫军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破坏了游戏的进行。伤亡名单继续增长，代表这个城市有组织的商人工会成员利益的中央劳工联合会表示，他们将代表警察举行一次大罢工，而整个国家都怀着惊惶之心在旁观。人们也许认为，令人恐惧的革命正在四处开始。

但是，波士顿和其他地方的公众似乎都对警察表示了压倒性的反对意见，因此中央劳工联合会的行为失败了，于是他们郑重决定，取消这次大罢工。柯蒂斯先生解雇了先前已经被他暂时停职的 19 名警察，并且开始招

募新军。

正在华盛顿的老塞缪尔·冈珀斯意识到这场游戏已经快要结束了，于是试图干预。他发电报给马萨诸塞州州长，称柯蒂斯警长所做的事情是没有根据的专制行为。

马萨诸塞州州长脸色阴沉，行为低调，一向说话不多，而为了避免危害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从来不轻举妄动。不过这个时候他做出了正确的举动。他回信给冈珀斯说，“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没有权力进行罢工来反对公共安全”——于是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国家英雄。如果有人怀疑罢工事件是否真的已经走向崩溃，那么只要看看整个国家的人民在如何热烈支持着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所有的疑问便都会烟消云散。在接下来的许多个星期，那些被迫执行紧急服务任务的业余警察们在晚上回到比肯大街水边的家中时，总会抱怨说，指挥交通比在乡间俱乐部玩上一整天的高尔夫可累多了。虽然招募一支新的警察队伍需要不少时间，但是新军终于建立了起来，而波士顿也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然而，有组织的劳工们仍然带着罢工的情绪。数天以后，与柯蒂斯警长同样顽固的美国钢铁公司总裁盖奇·加里(Judge Gary)，拒绝接待钢铁行业的工会代表，于是几十万的钢铁工人们走出工厂开始了他们的罢工。



如今钢铁行业的罢工者身上已经几乎看不到激进主义了，他们主要是反对低工资和过长的工作时间。他们中有很多人要每天工作 12 小时，并且很有可能患上严重的职业病。钢铁业的大老板们从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中发现，紧张不安的公众会对任何与罢工沾边的事件进行谴责，而他们不费什么工夫就将这些罢工者钉上了激进主义者的标签。在罢工的组织者中，曾经是一名工团主义者的威廉·Z. 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最有活力，也最为聪明。很多报社里都可以看到福斯特编写的工联主义者小册子，而报纸对此也大肆宣扬，足以证明他有多么革命。当时的同业公会受到了像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财团的控制，并且效率低下，而福斯特则试图用各行业组成的工会来代替同业公会。因此，在报纸的报道中，福斯特是一个“来自内部的蛀虫”，而罢工则是激进主义阴谋的一部分。公众非常害怕让别人知道，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击败来自内部的蛀虫，而不是减轻一天工作 12 小时的钢铁工人的负担。







声势浩大的钢铁业罢工刚刚开始几个星期，一场巨大的煤矿业罢工又开始了。矿工们如此热情地投票支持国有化，等于将激进主义者的标签成

功地钉在了自己的身上；而对报纸读者来说，对煤矿业的公开控制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投掷炸弹，以及全面的毁灭。共和国面临着新威胁。必须要做些什么。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政府确实行动了。喜欢被别人称为“战斗的贵格会教徒”的司法部长A. 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看到了大好机会，开始了对宪法的拯救。

## 四

这个政府之所以掌权原本是为了给这个国家带来新的自由，可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作为政府最高法律长官的帕尔默先生所做的一切，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恐惧的幽默色彩。惟一的解释只能是：正在白宫养病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一切事务都不予处理，他惟一所关心的就是他的国际联盟。

在矿工罢工开始的前一天，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联邦法官发布命令，禁止罢工领导人采取任何将会扩大罢工的行动，而司法部长则保证了这条命令的实行。在战争时期曾经颁布过一条食品燃料控制法令，该法令禁止在战时对煤矿工业的生产进行任何限制，而帕尔默先生就是根据这条法令的规定采取了行动。可事实是，战争不仅已经结束，并且已经结束将近一年了；虽然法律上的战争时期还没有结束——因为和平条约仍然躺在参议院中等待裁决。更进一步的事实是，参议员哈斯廷(Husting)在宣布这条食品燃料控制法令时曾经非常清楚地解释说，“劳工部部长威尔逊先生”授权他宣布，“这条法令的颁布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现在或者是将来会禁止罢工与和平的示威运动”，并且这条法令早就已经通过了参议院的批准。可是帕尔默先生要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解释，要么就是对这种解释根本毫不在意，要么就是认为已经出现了某种无法预料的情况。他下达了命令，于是矿工们的罢工注定是要失败了。第二天虽然有大约40万的矿工走出了矿场，但是根据联邦政府的法令，他们却是一次没有领袖领导的行动。

当然，公众对这个破碎的保证毫无所知；即使某个报社老板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也不敢在报纸上刊登哈斯廷参议员的讲话，因为这实在需要非凡的勇气。而《纽约世界》在当时说：“美国的普通警察具有足够的能力，可

以对付任何来自‘红色恐怖’或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危险。”媒体就像曾经对卡尔文·柯立芝表示支持那样，对这项命令拍手称赞。“战斗的贵格会教徒”振作精神，开始指挥下一步的一系列追捕行动。遭到追捕的罢工领导人乘坐“布福德号”轮船取道芬兰，被流放到俄国，而他们乘坐的轮船则被开玩笑地称为“苏维埃方舟”。人们对这些事件充满了热情，可是他们对政府是否有权利将无罪之人与其家人拆散，则几乎毫不关心。帕尔默先生决定再接再厉，继续进行新一轮的搜捕行动，并因此创下了美国历史上行政部门侵犯个人合法权利的新记录。

根据战时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身在国内的外国人如果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他们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或者与任何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或被怀疑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发生联系，那么劳工部部长都有权将其驱逐。如今，帕尔默先生决定与劳工部部长合作，共同对社会主义政党里的外国成员进行大规模围捕并将之驱逐出境。他的秘密特工早就混入了社会主义者的组织；事实上，其中一个据说还成为了他所在地区的领导人。（由此产生了一个哲学问题：处于这种位置的政府特工在劝说同志的时候，是否会对自己的工作造成危害呢？）

1920年新年那天，当美国几十个城市的社会主义者在各自总部同时举行集会时，帕尔默先生派出的特工、警察及志愿者对他们采取了行动——事实上他们行动的对象包括了在场的所有人，因为谁能够说清楚在场的人究竟是否都是社会主义者呢？——不管有没有许可证，将他们全部关进了监狱。所有能够想像得到的证据——印刷品、成员名单、书本、纸张以及墙上的图片——不管有没有搜查证，都被搜集了起来。从这天开始的以后几个晚上，其他社会主义者或者嫌疑犯们也都在家中被捕。被捕的人数超过6 000人，他们在监狱里待上少则数天，多则数个星期——却经常没有任何机会弄清楚自己的被控罪名。至少有一名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美国公民，被误抓进监狱并且被关押了数天，还差点就被流放出国，而原因很可能只是弄错了名字。在底特律，100多个人被塞进一个长30英尺、宽24英尺的房间足足待了一个星期，而那里的条件被市长形容为“令人无法忍受”。在哈特福德，即使嫌疑犯们已经被关进监狱，当局还是采取了进一步的预防措施：他们不仅逮捕并关押那些前来探望嫌疑犯的人，还把每一个友善的电话都当成嫌疑犯与社会主义政党有联系的明显证据。

由于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说明被关押者是社会主义分子，最终大量的

囚犯被释放出狱。同时最终也泄漏出消息说，在这次搜捕危险分子的全国性行动中，惟一的发现只是三支手枪，连炸药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但是，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帕尔默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却总是在说，又发现了新的证据，而这些证据都可以说明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威胁着国家安全。虽然钢铁业和煤矿业的罢工数量逐渐减少，与社会主义政府有关的威胁也在逐渐减少，可是在这种舆论下，很多美国公众相信，红色革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怕。

帕尔默先生正在全力追击。他公开提醒 2 000 万自由基金的拥有者、900 万土地的拥有者以及 1 100 万银行存款的拥有者，红色革命者将会夺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向媒体公布样板宣传材料时，甚至附上了社会主义者的图片——这些危险分子留着胡子并且模样可怕，他询问大众，是否允许这样的人统治美国。有些政客引用盖伊·安姆培(Guy Empey)的话说，"可以在任何五金器具店找到"对付红色革命者的合适工具；有些政客者宣布说："我对红色革命者的信条就是 S. O. S——轮船或者是枪杀。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所有的红色革命者都放上石头船，用铅来做帆，而他们的第一站就应该是地狱。"大学生们呼吁，任何被怀疑信奉激进主义的教授都要遭到开除；学校的老师们做出效忠的誓言；那些持有不够正统的政治或经济观点的商人，如果想保住自己的饭碗，就得学习如何保持缄默。歇斯底里的状态在此时达到了顶点。

## 五

这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并没有很快消退。因为职业性的超级爱国者(以及某些伪装成超级爱国者的特殊宣传人员)刚刚开始起来战斗。数不清的爱国团体开始冒头，每一个爱国团体都有自己的执行秘书，这些执行秘书也得生存，所以他们必须依靠魔咒唤来更加令人恐惧的新威胁。无数绅士们如今发现，只要将其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他们就可以打败任何事物。于是支持各种各样事业的人们，包括海军要人、信奉义务兵役的人、禁酒者、反对烟草者、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者、道德秩序的维护者、书本检查员、仇恨犹太人的人、仇恨黑人的人、地主、制造商，以及处理各种杂务工作的经理人们，无论他们的态度是好、是坏还是冷淡，统统都把自己包裹在

美国国旗和开国者的斗篷中，却将他们的敌人与列宁联系起来。譬如，既雇佣工会会员也雇佣非工会会员的自由雇佣企业变成了“美国计划”。演讲者和作家在很多年里一直继续用“险恶而破坏性的颠覆者”的故事折磨着这个国家。坐在华丽画室中镀金椅子上的老年女士从执行秘书那里听说，政府特工发现了新的激进主义阴谋，但是现在还不是透露这个残忍阴谋的合适时机。她们的丈夫们则在午餐俱乐部中听说，红色思想已经渗透进了各所大学。整个国家的上空都笼罩着一层怀疑主义的阴云，而拒绝忍耐则成为了美国人的一种“美德”。

威廉·J. 伯恩斯(William J. Burns)估计，社会主义者的固有人数大约有 422 000 人，国家安全同盟的 S. 斯坦伍德·孟肯(S. Stanwood Menken)则将这个人数估计在 600 000 左右——至少是沃特金斯教授估计的人数的 10 倍。联合爱国社团主席德怀特·布拉曼(Dwight Braman)则告诉纽约州的州长，红色革命者每周在全国总共要召开 10 000 次会议，而已经有 350 家激进主义报纸在此前的六个月内诞生。

根据全国公民联盟的拉尔夫·伊斯利(Ralph Easley)的说法，俄国饥荒基金委员会里确实有 60 名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成员。一位最有发言权的超级爱国主义者宣称，全国裁军委员会里的弗雷德里克·J. 利比(Frederick J. Libby)牧师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不仅在俄国接受了教育，还借出访俄国的机会去寻求上层的指示(可事实上，这名信奉和平主义的牧师从来就没有踏足过俄国的土地，他与俄国毫无联系，而他的管理委员会中也只有美国公民)。《民族》、《新共和》和《自由民》都被美国防御协会的执行秘书归进了“革命性”出版物的范畴；甚至连《调查》杂志也受到了《拉斯克报告》作者们的公开抨击，因为它得到了“革命团体的认可”。拉尔夫·伊斯利对妇女选民联盟、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和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也都充满了警惕。在这些国家保护者们的眼里，只要是这块土地上由自由主义的公民所组成的团体，几乎没有一个不会让公众感到战栗发抖的。甚至连国家信息局这个由纽约最令人尊敬的罗伯特·W. 德福雷斯特(Robert W. Deforest)先生所领导的调查慈善行动的组织，也受到了怀疑。据宣称，德福雷斯特先生肯定是太过忙碌了，因此没有注意到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身边的很多人都已经受到了激进主义团体的感染，而这些人包括拉比·威斯(Rabbi Wise)、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奥斯瓦德·维拉德(Oswald Villard)、简·亚当斯(Jane Addams)、斯科特·尼尔

林(Scott Nearing)和保罗·U.凯洛格(Paul U. Kellogg)。

剧院和电影院里也潜藏着危险。在联合爱国社团的布拉曼先生看来，莫斯科艺术剧院、“蝙蝠”和费奥多·夏里亚平(Fyodor Chaliapin)都是在为苏维埃的机构进行宣传；而按照美国防御协会的惠特尼(Whitney)先生的说法，“社会主义者的文件中”不仅提到了诺玛·塔尔梅奇，甚至还提到了查理·卓别林和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

同样，书本也要受到仔细的审阅，因为罪恶是无孔不入的。优化美国联盟是一个由加利福尼亚爱国者组成的团体，其发言人赫敏·施韦德(Hermine Schwed)小姐不仅对《大街》持反对意见，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对传统美国美好生活的嫌恶情绪”；还认为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是“对年轻人最具危险”的人物。在中学和大学里，则布满了更加阴险且影响更为深远的各种威胁。在惠特尼先生看来，哈佛大学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和扎克丽亚·恰费(Zacharia Chafee)教授以及耶鲁大学的弗雷德里克·韦尔斯·威廉姆斯(Frederick Wells Williams)和马克斯·所罗门·曼德尔(Max Solomon Mandell)教授都“太过睿智，因此反而不知道他们在公开场合或甚至在教室里说出的话语——保守点说——也能够对社会主义者产生决定性的鼓励煽动作用”。中学必须要受到严格控制；课本必须要接受仔细的梳理检查，以便找出任何对美国的历史英雄存有轻视的内容，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只有保守主义者才允许发言，而所有学校都必须无条件地开设尊重宪法的课程。

这些警告所带来的后果是压迫性的。由于对激进主义者太过恐惧，人们也害怕自己被当作激进主义者。如果你想进入商界，被戈弗·普瑞(Gopher Prairie)或者是中心镇的圈子所接受，你就必须表现出对这个环境的认同。如果你与盖奇·加里及帕尔默先生的意见有任何一丁点儿偏离，就会受到怀疑。一位信奉自由主义的记者前去采访一位以前说话曾经非常坦率的印第安纳州人，这位惊恐的受访者先是锁上自己办公室的房门，然后将窗户关紧(这扇窗户正对着的是一个大约有50英尺宽的通风口，通风口那一头的办公室里也许有人正在偷听他们的异端邪说呢)，最后才敢与这位记者谈论政治话题。有位先生曾经在某个中西部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离开了那里，当他多年以后重新归来的时候，却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害怕着某些东西。他们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中心镇》的作者们引用

一位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话说，在钢铁般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他只能做出让步并被迫接受这种环境，他说："为了逃离这一切，我只有深深埋头于自己的书本中。"他甚至不敢公开发表他的经济主张，因为只要与全国退伍军人协会或扶轮社成员们的著作哪怕有一丁点儿的偏离，他都会被贴上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标签。

直到迟至 1922 年，凯瑟琳·富勒顿·杰罗尔德(Katharine Fullerton Gerould)才在《哈珀斯》杂志中写道："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家；自由正日益成为一个修辞上的符号……我敢说，没有一个理性的公民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诚实的信念。当然，我指的肯定不是那种明显包含罪恶意义的信念。我的意思是，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的身上，自由的发言都找不到出口，因为所有方向的出口都被牢牢地堵住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真正感兴趣的话，要想保持自己表达的自由，他的惟一道路只能是选择一个对他最为同情的犯罪团伙，然后躲在这个团伙的保护之下容忍这一切。"

如此激烈的情绪在以后的日子里频繁地得到表达，可是在 1922 年，这种做法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当杰罗尔德夫人的文章发表以后，《哈珀斯》办公室和她的家中收到了数百封的来信——有些来信用粗鄙下流的语言谴责她是阴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有些来信则非常高兴地认为，最后终于有人站出来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这个国家竟然被超级爱国者们控制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 六

那些日子里，无法忍耐有很多表现形式，其中一种就是对黑人、犹太人以及罗马天主教徒突然爆发的愤怒之情。群体忠诚和群体憎恨的情绪在战争期间得到了膨胀，可是突然之间又遭到了否认，于是这些情绪就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宣泄出来：既迫害那些受到怀疑的激进主义分子，也迫害那些被美国统治群体——白人新教徒——认为是外国分子或者是"非美分子"的人。

由于受到高额工资的吸引，数十万黑人在战争期间涌进了北方工业区，因为那里有非常需要人员的各种制造工厂。不管黑人涌向什么地方，

只要他们的人数增多，他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前往从前只有白人工作的地方，在那里与他们竞争公交车和公共场所，因此在很多方面以多种方式倾覆了种族调节的微妙平衡。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黑人们都感到了身上那种激动人心的独立情绪；难道他们没有和白人一样应征入伍吗？难道他们没有为民主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而战斗吗？如今和平已经来临，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尊严再次受到了贬低，于是有些黑人变得愤恨不平；而在当时那种不安定的环境中，这种情绪已经足够让隐藏在人性表面之下的充满暴力倾向的种族激情爆发。在白人们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非常令人心焦，可是如果黑人也变得无法控制……

1919 年夏天的一个闷热的下午，一个 17 岁的黑人男孩正在芝加哥海水浴场的密西根湖游泳。海岸的部分区域只供白人使用，而另外的区域只供黑人使用，这是双方都明白的事情。不幸的是，这个黑人男孩抓住漂浮在水面的一块铁道枕木，并且游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限。开始有人向他投掷石头，一个白人男孩向他游过来，于是黑人男孩放开了手中的枕木，在游了几下之后沉了下去。他淹死了。那些石头是否击中了他，这一点无人能够确定，但岸边的黑人们却都认为这就是男孩死亡的原因并对此大加谴责，于是一场战斗爆发了。这起事件虽然不大，却点燃了种族仇恨的大火。芝加哥的黑人数量比 10 年之前增加了一倍，他们涌进白人的居住区去发泄他们最原始的怒火。随后整个城市都充满了失控的情绪——结果导致芝加哥将近一周的时间实际上是处于内战状态；黑人们聚众滋事，黑人街区内到处都是打架、刺伤和群伙搜捕，黑人们为了防御而开枪射击，黑人们对房屋和财产进行肆意的破坏；秩序最终得到了恢复，可是却有 15 个白人和 23 个黑人丧生，537 人受伤，1 000 人无家可归并且穷困潦倒。

不到一年以后，塔尔萨也出现了一起大规模的骚乱。只要有黑人的地方，那里的种族关系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压力。虽然很多演讲者和作家鼓吹白人至上——例如，劳斯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在《上涨的颜色大潮》中就宣称说，与德国人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相比，黑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要更严重——但是种族关系的压力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对很多信奉纯粹美国精神的人来说，犹太人也是怀疑的对象。在犹太人这个群体里充满了互相抵触的忠诚，并且不可否认，其中很多成员都是卓越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美国激进主义移民者。亨利·福特(Henry Ford)发现了“国际化犹太人”的威胁，并且在《迪尔伯恩独立报》上

对这个不幸的种族进行了严厉谴责，因为他们不仅策划了对整个世界的征服行动，还为美国带来了无数的痛苦，譬如高额的房租、短缺的农场劳动力、爵士乐、赌博、酗酒、道德沦丧，甚至还有短裙。福特的攻击虽然荒谬，虽然夸张，但对犹太人的偏见和敌对情绪却像空气一样普遍存在。房东们不再愿意将房子出租给犹太人，学校也不再愿意接收犹太人学生；安纳波利斯发生的欺侮犹太男孩事件是众所周知的丑闻；哈佛大学对是否应当限制犹太学生的人数进行了激烈辩论；整个国家的犹太人都感到自己与非犹太人之间竖起了一个高高的屏障。即使在那些罗马天主教徒人数很少的地区，他们也难逃责难。难道这个教堂不是听从外国教皇的命令？难道教皇没有主张世俗的权利？难道天主教徒们没有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教育孩子？难道所有这一切不都是"非美"而不忠的？

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三 K 党的力量壮大成熟并掌控了权力。

早在 1915 年，一名来自佐治亚的威廉·约瑟夫·西蒙斯(William Joseph Simmons)上校就建立了三 K 党，但这个组织在最初的五年里发展非常缓慢，直到 1920 年，也只有几百名成员怀着"爱国主义"情绪在兄弟会中工作。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南部重建时期的三 K 党，总体来说代表的是白人至上主义和伤感的南部理想主义。但是在 1920 年，西蒙斯将三 K 党的组织工作交给了来自南方宣传协会的爱德华·Y. 克拉克(Edward Y. Clarke)。克拉克拥有销售人员的天赋和惊人的力量，曾经完成了很多无可责难的事业，例如罗斯福纪念协会和近东救济工作。他清楚地知道，如今的时机对三 K 党来说已经成熟了。对潜在的成员来说，三 K 党不仅可以作为白人对抗黑人的力量、非犹太人对抗犹太人的力量、新教徒对抗天主教徒的力量，并且因此利用所有新近被激起的对荒诞小塔的恐惧之情，同时，三 K 党的白色长袍和头巾、燃烧的十字形符号、秘密性质，以及仪式上所使用的荒谬词汇，都可以成为工具，去追求对故弄玄虚的言词和幼稚可笑的仪式的热爱，去追求秘密探险的诱惑，而这种热爱和诱惑是存在于所有注定要在单调环境中生活的成人心中的。对一个生活在乡村的存有偏见的人来说，这是使他成为生活在无形帝国中的骑士的机会。这个规则非常完美。还有一个令人动心的事实需要注意。如果组织得好，三 K 党也可以成为盈利的组织。

出售成员身份的销售人员拥有一个令人着迷的头衔：克利格。整个国家被分成几个领域，每个领域由王者克利格领导；领域又被分成不同的属




地，每个属地由大鬼领导；作为最高组织者的克拉克被称为皇帝克利格，而西蒙斯上校则成为了皇帝奇才，从这个头衔中可以看出命名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个成员身份耗资 10 美元，其中 4 美元要被纳入销售者克利格的口袋。于是，事情非常明显：一个勤勉的克利格不需要害怕任何债权人，而做克利格成为了那个十年之中盈利的行业之一。领域的王者克利格和属地的大鬼从其余 6 美元中抽取少量佣金，剩下的就全部归亚特兰大的皇室国库所有。

由于出现了各种关于三 K 党对敌人进行严惩的报告，同时也由于《纽约世界》泄漏了很多关于三 K 党的秘密，1921 年国会对三 K 党展开了调查，并最终导致了皇帝克利格克拉克的被放逐，而西蒙斯上校的皇帝奇才的位置也由一名来自得克萨斯州、名叫希兰·韦斯利·伊凡斯（Hiram Wesley Evans）的牙医继承。伊凡斯将自己称为“美国最普通的人”，这个说法也许带有几分公正性；但是，这个组织的旺盛销售状态已经建立，于是三 K 党继续发展壮大。事实上，三 K 党的发展速度太过迅速，以致到 1924 年年初，经过斯坦利·弗罗斯特（Stanley Frost）的仔细估计，它的成员数已经达到了令人惊愕的接近 450 万。三 K 党在政治领域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在一段时期内控制了七个州：俄勒冈州、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它的主要据点是新南部、中西部和太平洋海岸，但是它几乎侵占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甚至到达了纽约市犹太区、天主教徒区及混合区的门口。克拉克的天才和好客精神在这个时代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 K 党在党章里如此描述兄弟会的目标：“联合美国所有的成年白人男子和土生土长的非犹太人，他们对外国的任何政府、国家、组织、宗派、统治者、个人或民族没有任何性质的任何臣服义务，他们拥有良好的道德和堪为模范作用的名声和职业……将他们联合起来是为了培养和增加对政府的爱国热情；为了在成员之间施行令人尊敬的三 K 党精神；为了一个可以实行善行的表率作用；为了保护家庭的圣洁和女性的纯洁，为了永久维持白人至上主义，为了在高尚的仪式中体现并忠诚地灌输崇高的精神哲学；为了用实际的奉献来保存、保护并且维持富有特色的制度、权利、特权、原则、传统以及纯粹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

这是理论。在实际上，“纯粹的美国精神”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内涵。首先，在南部地区，白人至上是三 K 党的首要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三K党组织的发展，在大多数地区，克利格们的有力论据是对犹太人并且首先是对天主教徒的反对。而当地三K党组织所使用的方法通常也并没有体现“崇高的精神哲学”。这些组织大部分都是不受亚特兰大控制的自治组织，而通常控制他们的因素主要是白人新教徒社区里那些接受教育和训练相对较少的成员。(印第安纳州某个城市的某位观察家坦率直言道：“你以为那些有影响的人属于这里吗？那么看看他们在游行时穿的鞋子吧。床单是遮不住鞋子的。”)虽然皇帝奇才伊凡斯对没有法律的状态进行了猛烈抨击，但是当地的三K党成员却不会总是满足于投票反对允许孩子们进入该教区的学校，或是投票反对允许天主教徒的候选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或是在城镇的小山顶北部燃烧血十字以向黑人们显示白人们不是说着玩的。三K党的秘密性可以引起更多的直接行动。

如果一名黑人男子被控向某个白人女子求爱——即使这种指控根本没有证据，最多只是对方神经质的想像——他就很可能被一伙披着白床单的家伙诱拐到森林里“接受教训”，或者是一番严惩，或者是一顿鞭打。在种族冲突中，如果一名白人男子对黑人表示支持，他就有可能遭到绑架和毒打。如果某个三K党成员想要一名黑人女子的土地，但她却认为价格太低拒绝出售，她就有可能收到三K党的最后通牒——要么出售土地，要么就被赶走。三K党成员还会联合抵制犹太商人，拒绝雇佣天主教徒工人，并拒绝将房子出租给天主教徒。路易斯安那州曾经发生了一起可怕的悲剧，5名男子遭到绑架并且被绑上电线淹死在湖里，而这起犯罪事件的凶手就是三K党。R. A. 帕顿(R. A. Patton)在《当代历史》中报告了一系列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残暴行为：“一名男孩遭到树枝鞭打，直到他的脊背上露出了一条一条的血肉；一名黑人女子遭到痛打，随后被无助地抛弃在外，并由于感染肺炎而死亡；一名离婚的白人女子在家中被打得不省人事；一名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仅仅因为娶了一位美国妻子就遭到了鞭打，脊背已经变成了浆状；而一名黑人也遭到了鞭打，直到他将自己的土地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一名白人男子。”







即使某些地方没有发生这些暴行，但起码也有暴行存在的威胁。身穿白色长袍的军队在游行，燃烧的十字架在山谷间闪耀，人们在黑暗中相互耳语，不知道“这次他们跟踪的对象是谁”，恐惧和怀疑从这所房屋蔓延到那所房屋。不仅如此，流氓恶棍们很快学会了如何利用三K党：如果他们想焚烧某个谷仓或是袭击某些贫民窟，他们可以照做这些勾当而不用担心

被处罚：难道该负责任的不是三 K 党吗？任何人都可以用粉笔在围墙上写上三个字母 K. K. K 并因此确信，长官在采取行动时将会非常小心谨慎。这样，就像红色恐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一样，出自于恐惧的行动使得恐惧永久存在，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形形色色的残暴与罪行。

随着时间的逝去和战时情绪的消退，三 K 党的力量也开始逐渐减退，直到在很多地区它的势力已经消失，而在其他地方，它也只是成为了受分肥者控制的政治小集团。可是在数百万人的心中，它已经成为了恐怖的象征。

## 七

1920 年初，帕尔默的袭击搜捕虽然已经结束，对激进主义分子的追捕仍然在继续。4 月，纽约州议会中的 5 名社会主义分子遭到驱逐，因为（根据审判委员会的报道）他们是“一个完全由永久性的叛国者所组成的不忠组织”的成员。当年轻的小西奥多·罗斯福对这次驱逐行动表示反对时，他受到了发言者斯威特（Sweet）的严厉谴责。斯威特走上发言席，大声朗读着老西奥多·罗斯福说过的一段话，而这使得父亲所代表的美国精神有可能与儿子所代表的非美国精神形成痛苦的对比。在发言过程中，议员库维勒（Cuvillier）发现有两名社会主义者竟然通过选举而占据了两个议员的席位，于是大声叫嚣道：“这两个人坐在这里，脸上带着虚伪的假笑，他们和托洛茨基一样，都是苏维埃俄国政府的代表。他们就是混在我们中间的小托洛茨基。”而随后一边倒的投票结果就将他们赶出了议院。第二天《纽约时报》宣布说：“这是一次美国人的集体投票，这是一次爱国而保护性的投票。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将会赞同并且认可议院的这次行动。”一向出言谨慎的时报都登出了这样的评论，说明这正是当时人们情绪的标准。

虽然如此，这场潮流已经面临着转变的来临。纽约联合俱乐部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由于对议院的这次行动表示反对，差点使他那些安静稳重的同伴们发生中风。他们在想，这样一位大好的共和党的小伙子是否会转变成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1920 年的劳动节如期而至。虽然帕尔默先生此前曾尽职地提醒全世界，激进主义分子们

已经选定劳动节作为发动大规模罢工和暗杀的日子，可是这一天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整装待发的警察们在等待的，只是一场永远都不会发生的革命大冲击。政治大会召开了，虽然卡尔文·柯立芝冲进了竞选副总统职位的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在他的履历上写着他曾经平息了波士顿警察的大罢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大会却并没有将"战斗的贵格会教徒"推举成任何职位的候选人，而与此同时，对他的反对意见却层出不穷，反对者们坚持说应当称他为"颤抖的战斗者"、"伪造的战斗者"以及"颤抖的懦夫"。这个国家似乎正在重新恢复她的幽默感。

罢工、骚乱、反对激进主义分子的立法行动和审判规则仍然在继续，但是随着1920年夏天的到来，至少人们的目光不再只关注这些事件，他们同样注意到了其他事件。有总统大选：和蔼可亲的哈定先生正在自己的前廊上洪亮地发言总结；绝望的考克斯先生正在国内巡回发表演讲，试图帮助伍德罗·威尔逊先生摆脱困境。有难以处理的商业局势：人们对高昂的物价已经抗议了好几个月，全面游行已经举行，费城的乔治·埃尔斯布里(George M. Elsbree)牧师大人身穿工装裤进行布道，纽约举行了一场全体婚礼(牧师、新娘和新郎全部身穿工装裤为报纸的图画副刊拍照)，百货商场被迫降价。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无论罢工和激进主义分子是否存在，商业局势已经出现了一团糟的局面。

波士顿的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由于伪造了一夕暴富的计划而遭到追捕。妇女选举权法案终于在8月18日得到了国家的批准并成为了事实。禁酒法令也已经生效，并且成为了晚餐桌上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那些日子里，人们屏着呼吸坐在那里，听说着某某人在自己的酒窖里造出了非常美妙的杜松子酒，什么样的比例可以将葡萄干的效用发挥到最大限度，以及走私者们如何将白酒从加拿大运到美国。所有这些都是新鲜又激动人心的消息。1920年夏天，美国发生了一场真正的灾难——罪犯很可能是一帮无政府主义者暴徒——但人们却保持了头脑冷静，真是令人吃惊。这种情况说明，巨大的红色恐惧对人们的影响很明显已经开始削弱。

如果美国的土地上有哪个地方可以被称作该国的金融中心，那就是纽约百老汇与华尔街的交汇点。在这里，华尔街的北边耸立着国库分库大楼，大楼旁边就是美国的检验办公室；这两栋大楼对面的东南拐角，一幢朴素的三层石灰石小楼就是J. P. 摩根公司的总部，而这里正是全世界资本

主义的核心地带；西南拐角处则是一个挖好的深坑，在这里将要建起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附属建筑；紧挨着这个深坑旁边的百老汇街上，则耸立着纽约证券交易所那柯林斯式的立柱。耸立在这个区域的紧密相连的建筑，全部都是政府或私人的金融大本营，它们象征着政府、金钱力量和商业方向的联合体系——而正是这个体系受到了激进主义分子的严厉谴责。

几乎就是在这个精确的地点，9 月 16 日临近中午的时候，在附近工作的职员们正准备出去吃午饭，突然出现了一道炫目的蓝白色闪光和一声令人恐怖的撞击声，紧接着从数不清的窗户上落下了大片大片的碎玻璃，接着就是男人女人的尖叫声。就在检验办公室的门前，也就是摩根公司的正对面，一枚巨大的炸弹当街爆炸——致使 30 人当场丧生，数百人受伤，摩根办公室的内部遭到毁坏，好几个街区的玻璃都被震得粉碎，还有一枚金属小块在炸弹力量的推动下甚至穿过了位于公正大楼 34 层的银行家俱乐部的玻璃。

一块巨大的黄绿色蘑菇云在摩天大楼之间缓慢上升，直逼天空。烟云下的空气中充满了灰尘，有些灰尘来自摩根公司和其他公司办公楼的窗户，有些灰尘来自于遭到流散弹啃蚀的石灰墙。而灰尘下的街道则被死伤者的鲜血染得通红。那些纯粹出于偶然而逃脱了炸弹袭击的人们一恢复神志立刻开始惊恐地逃跑，而这时玻璃和石头碎片则从上方的大楼里像阵雨般落下；接着大批的人群开始四处乱转，试图帮助那些受害者，却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反而彼此撞得头晕眼花，大喊大叫；随后消防车和救护车来到了现场，警察和医护人员也从人群中挤开道路开始工作，并最终恢复了秩序。

在这起爆炸事件中，摩根财团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个主任办事员丧生，数十人受伤，17 人被送往医院。而摩根财团的合伙人中，只有一个被飞速经过的玻璃割伤了手，其余人要么在大楼另一端开会，要么不在城内，而摩根先生本人则正在国外。这次爆炸的受害人并不是这个国家中的金融大腕，而是普通的银行职员、经纪人、华尔街收款员以及速记员们。

在不到 200 英尺之外的股票交易市场，正在进行着“大量”的交易——这是那些日子的说法——因为一天的交易额大约能达到 50 万股。股票的价格一直在持续上涨。交易所显示屏上的出价上涨了 2.125 点，已经升到了 93.75，鲍德温机车公司的股票价格为 110.75，走势坚挺；中部石油的股票交易繁忙；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价格是 89.375，形势也相

当不错。可是突然之间，爆炸发生了，大楼震动了，巨大的玻璃被炸成了一片片的玻璃雨；靠近百老汇街道那侧的人们由于拉上了厚厚的丝绒窗帘而没有受伤，否则的话会有数十人遭殃。有片刻时间，股票经纪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四散奔跑着奔向任何看起来能够躲避的地方。几分钟之前，人数最多的交易者都挤在地面中间的显示屏前，可是瞬息之间，他们都跑向房间的边缘，以防屋顶塌下。但是正和那些交易者们站在一起的交易所老板威廉·H.雷米克(William H. Remick)却保持着头脑冷静。他对朋友说："我想现在该是敲锣的时候了。"于是，他敲响了铜锣，结束了当天的交易。(而第二天股市的价格继续上涨，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在华尔街的正当街，躺着一匹已经被炸成碎片的死马，地上到处都是小片小片的钢铁、木头和帆布，而现场还发现了马蹄铁和全套马具。根据这些证据，警方推测，车夫将TNT炸弹留在马车里，然后自己离开了现场，随后炸弹就爆炸了。在以后的日日月月年年里，侦探和联邦调查员们追踪着每一条可能的线索，这个城市的每一辆马车都受到了追踪。那些嵌在周围大楼的金属小块也受到了检查，后来发现那是吊窗锤被割成了两半——但是无论在此后又进行了多少无尽的调查，除了能够确定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爆炸，这条线索却再也没有更新一步的进展。关于马蹄铁，有人在数天以前发现一名西西里人将它们装在了一匹马上，但是线索到此为止。专家们对周围发现的零星钢铁和锡也进行了研究，他们不仅向制造商了解情况，还对销售记录进行了追踪。一块碎铁片被证明是保险柜的把手，接着保险柜的身份也识别出来了。一名侦探对这台保险柜的历史展开了调查，从最初的制造者，到无数曾经拥有过这台保险柜的人，最后发现，它在战争期间跟着军队远去了法国并且回到了霍波肯市——但是在这里它的踪迹就消失了。专家们对所有目击者的证词都进行了测试和分析，并且对商人们收到的关于灾难来临警告的报告也进行了追踪，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受到怀疑的激进主义分子们受到了追捕，但是也没有任何结果。虽然有一丁点儿的证据在那里，但是这一点证据究竟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人能够确定。几乎就在爆炸发生的那个时刻，据说一名送信人在两三个街区以外的邮箱里——这个信箱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刚刚被清空——发现了五张纸，上面很粗陋地印刷着几行字，里面含有很多拼写错误：

记住

我们再也不会

忍受

释放政治罪犯

否则你们肯定会全部死亡

美国 无政府主义者

战斗者

一位著名的煤炭业行家当爆炸发生的时候正坐在摩根财团办公室里，他随后立刻宣布，毫无疑问这肯定是激进主义分子所为。在经过多年的无果调查以后，人们脑海里的这个谜团仍然没有解开。

在对爆炸事件进行调查的初期，整个国家都对此怀有极大的兴趣，但是，反对激进主义的骚乱运动并没有显著增加。如果爆炸发生在更早几个月以前，它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更加糟糕。可是如今，美国人民已经完全恢复了理智，他们意识到，除了一小撮狂热分子，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支持这样一个愚蠢而骇人的阴谋。

# 第四章　美国的复原

## 一

巨大的红色恐惧缓慢地——非常缓慢地——消失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的消失呢？

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从来就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那曾经给这个国家带来如此巨大震动的恐惧为何存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只局限在欧洲存在：如果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淹没在社会主义的大潮中，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还会被其淹没吗？另一个事实是：激进主义也逐渐在美国消失。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战斗的贵格会教徒”的严厉审问起码产生了实际效果。到1921年，美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努力表现得像盖奇·加里一样保守；大学教授们不再订阅自由杂志，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让别人看见他们的桌上竟然出现这样的文学杂志；一两年前的社会改革者们已经厌倦了一场既不讨好也无希望的战斗。另外，反对禁酒的人逐渐增多，他们不再对政府反对红色革命的运动怀有热情，开始对个人自由表现出了迟来的关心，而对那些爱管闲事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则充满了不信任。然而，也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人们对和平年代的向往取代了对战后时期的关注，就像一个商人在过度工作之后开始享受假期，这个国家在度过一段兴奋的不安定时期之后，终于开始学习如何再一次放松和娱乐自己。







幻想破灭的感觉仍然存在；这个国家就像突然之间得到了解脱的度假者一样，觉得自己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尽情地享受，生活琐碎而没有意义，任何事情都变得无关紧要。但是同时，她也要玩乐——跟随潮流，追求时尚，体验全新的消遣方式，用各种有趣的丑闻和琐碎小事娱乐自己。到 1921 年，各种新鲜的消遣方式以及各种时尚和丑闻已经来临，而这个国家则兴奋地抓住了它们。



## 二

第一个就是收音机，而它生来就注定了最终要深刻地改变美国人民日常的生活习惯。

第一个无线电广播站于 1920 年 11 月 2 日在匹兹堡开放——学校的孩子们也许需要记住这个日子——哈定和考克斯就是在那天参加总统竞选的。这个广播站叫做 KDKA，经营者是西屋公司。然而，有一段时间，通讯业和公共娱乐事业方面的新革命却进展缓慢，听众寥寥无几，因为广播站播出的节目不仅主要是留声机里的唱片音乐，而且对无线电报员的工作造成了严重干扰，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当用真正的管弦乐队代替唱片录音时，却发现演奏房间的共鸣又影响了效果；而把乐队安置到室外屋顶上的帐篷里后，却发现帐篷又被吹走了，因此只好把帐篷钉在室内的一个大房间里。直到那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布帘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吸收大量的声音，并因此成为日后广播工作室中的标准配置。

然而，实验仍然在进行；其他广播站陆续开放，广播中开始出现市场报道，匹兹堡的范·埃顿（Van Etten）博士允许将圣墓教堂的布道通过广播传递出去，威斯康星大学在收音机中播出了自己的音乐会，而政客们通过这种陌生的工具滔滔不绝地发言，却不知道究竟是否有人真正在倾听。1921 年 7 月，三名主持人在拳击场上对登普西与卡庞蒂（Carpentier）之间的比赛过程进行了现场解说，并通过广播传递到全国各地，而这个节目的收听率达到了 80 点。《纽约时报》在报纸一角将他们的企业描述成“无线电话技术”的成就。第二年 11 月，阵亡的无名英雄在阿林顿国家公墓下葬，当大批人群挤进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和旧金山的大礼堂收听巨型扩音器里传出的发言时，他们几乎无人会想到，不久之后他们就再也不用坐

在客厅的安乐椅上躁动不安，因为他们可以从广播中收听他们喜欢的任何演讲。伟大的觉醒时期此时还没有来到。

可是，1921～1922 年的那个冬天来得非常突然。倾刻之间，所有人都在谈论的不再是无线电话技术，而是收音机。旧金山的一家报纸这样描述："每天晚上所有地方都有音乐从收音机里传出。任何人都能够在家中通过收音机收听音乐，而任何一个男孩都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安装起一部收音机。"2 月，哈定总统在书房中安装了收听的全套装备，迪克斯摩高尔夫俱乐部则宣布说，它将安装一部"电话"以便让高尔夫球员也能够听到教堂的布道。4 月，拉克万纳列车上的乘客们在收音机里听到了音乐会，而梅纳德（Maynard）中尉则使得基督教变得非常现代化，因为他在飞机上通过广播完成了复活节的布道仪式。报纸上增加了介绍收音机的内容，数以千计对机械完全没有兴趣的人对关于再生电路、钠离子管、格里姆斯来复电路、晶体检波器及中和接收法的文章感到非常诧异。这段时间出现了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描述了一名男子希望他的爱人能够在"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表白，而这首歌甚至挑战了齐格飞（Ziegfeld）"1922 年的时事讽刺剧"中《我的激情玫瑰》的受欢迎地位。无论你在大街上遇到什么人，他都会把你强拉住并且告诉你，在前一个晚上他是如何熬夜熬到凌晨两点，头上戴着耳机，竟然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声音！如果一个人正面临着"如何组装环形天线"这样的重大问题，他又怎么会为红色恐惧这样的问题而烦恼呢？

1919～1921 年的《期刊文献读者指南》中，列出了所有在这段时间里出现在杂志上的文章，其中有两栏提到了激进分子和激进主义，只有不到 1/4 栏的篇幅提到了收音机。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 1922～1924 年的《期刊文献读者指南》中，讲述激进分子和激进主义的部分缩减到了半栏，而讲述收音机的内容则增加到了 19 栏。在这种变化中，人们所能发现的东西要远远多于期刊文学告诉人们的表面内容。



## 三

体育运动则成为了另一个让美国人着迷的爱好。1921 年，杰克·卡恩斯（Jack Kearns）终于说服泰克斯·里卡德（Tex Rickard），让他将登普

西和已经疲惫不堪却魅力仍在的乔治·卡庞蒂(Georges Carpentier)召集到一起，在泽西市波义尔的"30 英亩"场地展开厮杀，而公众的反应程度之高创造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将近 75 000 人付出了超过 150 万美金的费用——此费用是登普西与威拉德比赛中收益的三倍还多——去观看那位温文尔雅的法国人是如何在第四回合被打倒在地的。各大都市的报纸并不满足于仅仅在体育版面用几个专栏进行报道，而是在第二天动用了一页又一页的版面花足功夫去讲述每一个可能想像得到的关于这场比赛的细节。战后十年中，有很多拳击比赛曾经创造了百万美元的收益，而这次则是第一次。贝比·卢斯将自己本垒打的记录提高到了 59 个，而 1921 年的棒球世界大赛则打破了门票收入和观众人数的记录。那些对体育运动如饥似渴却从没想过要去参加高考的人们蜂拥去观看耶鲁大学的马尔科姆·阿尔德里奇(Malcolm Aldrich)上尉与哈佛大学的乔治·欧文(George Owen)之间的比赛，同时对数百个专栏所报道的关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爱荷华州以及中央大学的"祈祷的上校"的预测结果留言表示出如饥似渴的关心。赛跑运动呈现出新的前景。网球俱乐部的数量不断增加，而数十万商人则发现，四杆洞是开会的最好地点。和运动狂热一样的还有食物狂热：人们突然之间对爱斯基摩派变得如此狂热，以致三个月之内纽约市场上的可可豆价格上涨了 50%。

1921 年夏天，泳装美女成为另一件吸引公众眼球的新事物。7 月初，华盛顿的波多马克海水浴场举办了一场服装与美女秀，而获奖者几乎无一受到马克·塞内特(Mack Sennett)及其电影中游泳者的影响，她们都仍然身着束腰外衣式的泳装，长长的卷发上戴着帽子，脚穿高高的长筒袜——只有一名获奖者大胆地将长筒袜卷到了膝盖以下。9 月初，亚特兰大举行了该市的第一次选美庆典，但这次活动却与此前那次大不相同。"如今对裸露膝盖而紧身的泳装已经取消了禁令，"一位记者写道，"数以千计的观众在为这些女子鼓掌的同时也感到非常惊讶。"华盛顿小姐成为了美国城市中最漂亮的姑娘，而连身泳装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泳装美女的正统穿着(虽然平纹皱丝和棉缎材料的泳装在未来的一两年内对真正去游泳的人来说仍然是非常好的选择)，沿海旅游胜地的宣传人员开始计划举办新的比赛，画报和小报的编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光明未来。

确实，诸多小报开始繁荣出现——而且并不是没有产生影响的。当这些小报出现之后，激进主义开始衰退，这个事实并不仅仅是巧合可以解释

的。在小报的报道中，美国人的生活不是一场陷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挣扎，而是由体育、犯罪和性组成的三维生活。出于竞争的压力，其他报纸也开始仿效他们的做法，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当工人们心满意足地欣赏百老汇斯克兰顿小姐（Scranton）的图片时，当他们追随着斯蒂尔曼（Stillman）案件和阿巴克尔（Arbuckle）并对莫维奇（Morvich）的赛跑内幕进行研究时，他们早已将阶级意识抛诸脑后。

那些显而易见拥有更多学识的读者们，也能从每天发生的事情中得到娱乐。虽然他们在看完《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后觉得脑袋发晕，但对《世界史纲》中描述的古生物学知识仍然进行了非常勇敢的研究（而大多数人都在接近成吉思汗部分的时候陷入了泥沼）。他们互相询问，究竟美国是否像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大街》中描写的那样丑陋，而塔希提岛是否像弗雷德里克·奥布莱恩（Frederick O'Brien）在《南海白影》中描写的那样迷人；他们从《酋长》中知道了热带地区那狂热的爱，他们非常喜欢阿斯奎思（Asquith）夫人笔下描写的英国统治阶级的生活，并且还为《如果冬天来临》痛哭了好一阵子。

更多娱乐形式开始出现。如果人们曾经怀疑，在经过对收音机的极度狂热之后，美国人民是否还会用同样的热情去享受另外的娱乐活动，那么，1922 年和 1923 年发生的事件也会驱散这种怀疑。1922 年 9 月 16 日，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附近的一个废弃农场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爱德华·惠勒·霍尔（Edward Wheeler Hall）牧师与其教堂的唱诗班领唱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的夫人被发现在此中枪身亡。如果说苛刻的公众对耸人听闻的事件充满了向往，那么这起案件则拥有了所有令人满意的因素：它恐怖而富有戏剧性（尸体被并肩摆放，似乎在强调某种不洁的关系），它牵涉到财富和令人尊敬的人，它还包含有程度恰好的性的因素——不仅如此，它发生的地点正是美国新闻业大都市的神经中心附近。即使一个不识字的美国人在即刻之间，也熟悉了德拉西小径、“肥女人”和她的骡子、威利·史蒂文斯（Willie Stevens）头脑的精确情况，以及唱诗班成员的流言蜚语。







## 四

在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新的游戏开始征服全国。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头

一两年里，标准石油公司的驻苏州代表约瑟夫·P.巴布考克(Joseph P. Babcock)开始对中国的麻将游戏产生了兴趣。为了使之符合美国人的习惯，他对麻将游戏的规则进行了简化和系统化。麻将首先被怀特(White)两兄弟引进了上海讲英语的俱乐部，并且在那里迅速流行，随后又被带到了美国，同样也迅速受到欢迎。旧金山一名伐木商人 W. A. 哈蒙德(W. A. Hammond)受到启发，开始大规模地进口一副副的麻将牌。到 1922 年 9 月，他已经进口了价值 5 万美元的麻将牌。国内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广告运动，并配有免费的课程培训和展示，从而推动了这项游戏的开展。在此之后不到一年，全国上下对麻将运动充满了热情，仅靠从中国进口麻将牌已经远远不够使用，于是美国的麻将制造业开始活跃起来。到 1923 年，很多曾经对收音机如痴似狂的人在将收音机打开后，就开始挥舞着麻将牌砌起了长城，一边喊着“碰”或“吃”，一边则熟练地谈论着竹、花、四季、南风和红中。富人购买价值 500 美元一副的麻将；麻将制造业涌进了数十名成员；美国麻将联盟成立了；人们热烈地争论着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打牌规则，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记分系统，以及满足什么条件才算是“听牌”；而每一场像样的晚宴总是以这样的形式结束：每个人都坐在铺着绿色羊毛呢台面的桌子旁垒起象牙和竹子做成的小砖头。

早在麻将游戏的最高潮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埃米尔·库埃(Emil Coue)就已经来到了美国，为他打头的是高效的大肆宣传活动；而到了 1923 年初，来自法国南锡的这位身材枯瘦的小个子男人突然之间成为了这个国家里被谈论最多的人。成立了很多库埃学会，大批蜂拥前来的听众虽然很聒噪，可是大师刚一开口，现场立刻归于可怕的平静，而大师的发言每个人都早已经耳熟能详：“日复一日，我所有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好。”几周之后，当发现图坦卡门(Tutankhamen)国王坟墓的消息通过海底电缆从遥远的埃及传来时，全国上下都激动不已，但随后，人们把更加激动的目光又投向了对激进主义分子的审判以及三 K 党的丑闻。而与此同时，服装制造者们已经开始计划在下一季的时装中采用埃及风格。最后，整个国家又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着迷的玩意儿——一首《对！我们没有香蕉》的歌曲。这首歌曲最初的原型是意大利水果摊贩经常使用的一个短语，然后被漫画家塔德·多尔根(Tad Dorgan)当作“插科打诨的用语”使用了一段时间。此后，有人把这个短语加工成歌词，并用选自《哈利路亚大合唱》、《我梦见深居在大理石堡中》以及《黛娜姑姑的大家缝聚会》的音乐为它谱上曲调，

随后在长岛的一家汽车旅馆内对它进行了测试。接着这首歌被带到了纽约，并在那里迅速取代了《盖勒先生和希恩先生》的受欢迎地位，从此就流行了起来。而不久之后，就连最偏远地区的农家小屋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虽然超级爱国者的活动仍然盛行，联邦特工仍然在追捕机敏的社会主义者，受到公开承认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引起人们的热情关注，三K党仍然在继续发展壮大，但是巨大的红色恐惧正在逐渐消失，还有太多其他的事情需要考虑。

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说明红色恐惧的消失。另外一种危险正在威胁着这块土地——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狂怒岁月。

## 五

在战后十年的其余时间里，只有一种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区分出了1919年和1920年间的自由与保守之间的界限。

当巨大的红色恐惧达到最高潮的时候——1920年4月——马萨诸塞州的南布雷特里发生了一起犯罪事件。这起事件非常普通，在当时的全国各地都会发生，所以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对它根本没有提及：一名出纳和一名警卫携带着两箱子的鞋厂工资，遭到了两名罪犯的枪杀，随后罪犯跳进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穿过铁轨开车逃离了现场；两周之后，两个意大利的激进主义分子被当成凶手遭到了逮捕；一年以后——这时华盛顿的泳装美女正在整理着自己的长筒袜让人拍照，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正通过"无线电话"对登普西和卡庞蒂之间的比赛报道进行监控——韦伯斯特·泰尔(Webster Thayer)法官与陪审团宣判这两名意大利人有罪。这场审判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可是几个月以后，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所有人都在询问这起萨科—万泽蒂(Sacco-Vanzetti)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了。

波士顿一间寒冷的办公室内，一名西班牙木匠、一名来自纽约的犹太青年和一名意大利的记者在这里勤勉地工作着：他们对那两名意大利罪犯一直进行跟踪报道，并把文章提供给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欧洲和中南美洲其他国家的激进主义分子和激进主义媒体。而他们勤勉工作导致的




结果是:赫里克(Herrick)大使在巴黎的房屋遭到炸弹袭击。另一枚炸弹在巴黎的萨科—万泽蒂游行中爆炸致使20人丧生。拥挤的人群对美国驻罗马大使馆产生了威胁。还有一枚炸弹企图炸毁总领事位于里斯本的家。蒙得维的亚爆发了大罢工,并企图对美国货物进行联合抵制。阿尔及尔、波多黎各和墨西哥的激进主义媒体都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这起案件在美国弄得满城风雨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炸弹爆炸和联合抵制虽然让公众对这起案件产生了关注,却从未让他们对萨科和万泽蒂产生普遍的同情。这起案件一年一年地拖延下来,一次又一次的上诉被驳回,让公众对两名罪犯产生普遍同情的反倒是他们自身的举止风范。万泽蒂尤其出类拔萃,对这样一位品格高尚的知识分子兼拥有哲学家气质的无政府主义者,人们很难将他与谋财害命的案件联系起来。新发现的证据使得他们的罪行更加值得怀疑。在案件发生长达七年之后,泰尔法官在1927年顽固地驳回了最后一次上诉并宣判他们死刑,可公众却要求马萨诸塞州州长富勒(Fuller)对这起案件重新研究并且考虑是否可以宽恕萨科和万泽蒂。于是州长任命了一个顾问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研究,成员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士,包括哈佛大学校长洛威尔(Lowell)、麻省理工大学校长斯特拉顿(Stratton)以及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法官。然而,几周之后的委员会报告却认为萨科和万泽蒂有罪,因此无法宽恕他们。1927年8月22日晚上,曾经让全世界数百万人为他们担心和期盼的这两名罪犯终于被送上了电椅。

究竟他们是否有罪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确认,而对这起案件的记录则不仅冗长,还充满了学术措辞。持相反立场的人们在讨论案件时其实采取的都是片面态度,而他们意见的分化则说明人们基本上对这起案件怀有两种不同想法:一些人认为激进主义者应该按照普遍原理被绞死;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国家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方面的谨慎程度可以说明该国的文明程度。示威的群众在波士顿的州议院门前游行,要求州长释放萨科和万泽蒂;而波士顿警察——八年之前他们曾经将卡尔文·柯立芝送进了白宫——则对他们实施了逮捕和关押。此时,战后十年早期的那种激情又复燃了。

大牛市正如火如荼,劳工运动正在衰退,社会的繁荣景象对激进主义来说似乎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这两名普通意大利人的困境却让人们暂时地想起了米切尔·帕尔默那红色搜捕的日子,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心中那

消失已久的恐惧和仇恨。很多人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究竟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可是如今却发现自己又一次地处于更痛苦的争论之中。当萨科帽子的身份被识别出来之后，或是当普罗克特(Proctor)上尉给出了关于子弹的证词之后，友谊遭到了破坏。不过所有这一切出现的时间都非常短暂。当人们通过报纸得知萨科和万泽蒂已被处死的消息时，不禁全身打了个冷战，也许他们会想，对两名意大利人来说，这个可怕的结局究竟是罪犯应有的惩罚，还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可是随即，他们的目光又瞥向了另一个专栏，去看看林德伯格今天又在哪里飞行。接着，他们又哗啦一声打开了报纸的金融版面……通用汽车公司又正在做些什么呢?









# 第五章　习惯与道德的革命

## 一

早在战后十年的早期，反对公认秩序的剧烈斗争就已经在美国发生了。但是这场斗争与俄国没有丝毫关系，因为发起人并不是来自国外的煽动者，而是本国的富家子弟。他们本身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知之甚少，并且明显对此也毫不关心。他们蔑视那些已经为大家所公认的美国秩序，但是他们既不是在秘密的激进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表现这种蔑视，也不是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讲来表现这种蔑视，而是坐在家中的早餐桌上通过发表言论来表达这种蔑视，却因此吓坏了他们那仍然保守的父母。人们还仍然对“红色恐惧”感到瑟瑟发抖，但此时他们却突然醒悟到，“年轻一代的问题”同样令人担忧。他们意识到，即使美国的宪法仍然暂时安全，但这个国家的道德准则已经绝对是岌岌可危了。

目前与年轻人有关的道德准则，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女性是道德的守护者；女性被上帝制造得比男人更加精致，因此她们也应该更加优雅。年轻女性必须以纯洁的姿态（也许需要一点生理上的指导来进行调节）期待着浪漫的爱情并走进婚姻的殿堂，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在那个“适合的男人”出现之前，她们绝不能允许任何男人亲吻自己。有些男人可以屈

服于性的诱惑，但这种诱惑只允许来自那个非法的特殊女性阶层，而出身良好的女子绝不应该具有这种诱惑力。少男少女可以成为伙伴，拥有一起工作玩耍的自由，可是这仅仅是因为，道德准则总体来说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使得某种类似荣誉制度的东西可以取代长辈的监管；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他们健康成长的话，就永远不会滥用这种自由。身处不同地区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女孩吸烟喝酒的态度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女孩吸烟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女孩喝酒的模样更是无法想像。

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父母、老师和道德导师们已经开始大声报警，因为那些刚刚走出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正在将这种道德准则折腾得支离破碎。

年轻女孩们——以及大多数年纪稍长的女性——的穿着似乎已经足够让人心惊。1920 年 7 月，一位时尚作家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美国女性……裙子离地的高度已经超出了合适的尺度"，也就是说，裙边如今离地已经高达 9 英寸了。人们直率地预言说，裙子的边缘将会在 1920～1921 年的那个冬天重新降下来，但是与此相反，裙子的边缘不仅没降，反而又向上提高了令人震惊的几英寸。时髦女郎们身穿纤瘦的裙子，衣袖很短，有时(在晚上)衣服甚至都不带衣袖；某些更加开放的女性则将袜子卷到了膝盖以下，令人震惊地露出了自己的胫骨和膝盖骨；而她们中的很多人显然使用了化妆品。桃乐茜·斯皮尔(Dorothy Speare)在《黑暗中的舞者》中认真地解释说："对胭脂口红的陶醉是很多少女必经的阶段，而男人们对此则很难相信。"父母们坚持说淑女绝不会涂脂抹粉，可是这样的劝告根本毫无用处，因为他们的女儿会反驳说，淑女的女儿们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少女们不仅在公开场合润饰脸上的妆容，有些甚至将胸衣都扔在一边，因为"如果你穿着胸衣，男人们是不会和你共舞的"，她们如是说。

而如今跳舞的时尚更是让人惊愕万分。统治舞场的不再是浪漫的小提琴，而是奔放的萨克斯风，在它演奏出的低声吟唱和悲叹哀诉中，舞者们移动着脚步。霍巴特学院《先驱》报的编辑将他们的姿态充满憎恶地称为"粘胶拥抱"，因为他们跳舞的时候，就好像被胶水粘在了一起，身体贴身体，脸颊贴脸颊，两人之间的距离甚至不到 1 英寸。辛辛那提的《天主教电报》对此发出义愤填膺的呼声："音乐如此美妙，舞伴的拥抱——女舞伴竟然半裸着身体——却如此不雅；而他们的动作更无丝毫得体之处可言。现在竟然还有跳这种舞蹈的处所，因为这样的处所按道理早就应该依法关闭

了。”

“优秀”的少女们不仅抽烟，而且喝酒。有这样的故事：那些最值得别人仿效的模范父母们的女儿喝醉了——她们的同伴兴奋地将之形容为“烂醉如泥”——她们在新的禁酒制度下却将酒瓶中的物质一饮而尽，然后在凌晨四点跟随男人驾车出去兜风。最糟糕的是，即使在秩序井然的舞会上，只要那些眼光锐利的年长监护人偶一错眼，据说她们就会躲进黑暗的房间或是停泊的汽车，与男人开始抚摸亲吻的可怕勾当。

F. 斯科特・菲兹杰拉德此时还没有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虽然他肯定知道他们这一代人正在做些什么，但是要直到 1920 年他写出《人间天堂》，父母们才完全意识到有些事情早就已经发生，并且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很明显，“青年男女间的爱抚晚会”早在 1916 年就已经广泛流行，而如今则成为了一种基础牢固的室内运动。菲兹杰拉德如此写道：“所有的维多利亚式母亲——而绝大多数的母亲都是维多利亚式的——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已经习惯于如此随便地接受亲吻……埃莫(Amory)看到，这些少女们做着连他都无法想像的事情：凌晨三点舞会结束以后跑去吃晚饭，可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餐馆还在营业；无论讨论生活里的什么事情，她们脸上的表情都半是认真半是嘲笑，另外还有某种偷偷摸摸的激动，而在埃莫看来，正是这种激动代表着真正的道德沦丧。但是，直到他看到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的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少年男女实施阴谋诡计的大本营，他才意识到这种道德沦丧已经变得多么广泛。”这样的描写让整个国家都感到浑身颤抖。在这本书中，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主人公厚脸皮地坦白道：“我已经吻过几十个男人。我想我还要再吻几十个男人。”而另外一位女主人公则对一名年轻男子(对一名年轻男子！)说：“哦，50 个男人里可能只有一个对性有点了解。我对弗洛伊德(Freud)非常着迷，但是世界上的所有真爱都是由 99%的激情和 1%的嫉妒之心构成，这真是令人不快。”当菲兹杰拉德如此进行描写的时候，难道他代表的不正是这些人的想法吗？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真是令人憎恶。所有的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体面标准都被抛弃了吗？母亲们阅读着这些不贞的文字，想弄明白是否“想到自己的女儿已经习惯于如此随便地接受亲吻”……但是母亲们认为，不，这不是普遍的事实，这肯定是夸大了的报道，只有那些非常堕落的少女身上才会出现如此不体面的行为。好女孩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她们更不会公开讨论激情。可是随后出现的其

他书籍却证实了菲兹杰拉德的发现，例如《黑暗中的舞者》、《塑胶年代》和《烈焰青年》；而杂志和报纸也一再地重复着这些丑闻。当然，很多好社区里的好女孩根本没有做过"那样的行为"；即使在情况复杂的城市中心地区，也有很多女孩没有做过这种行为。但是，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却成为了导火索，使"年轻一代的问题"成为了引起普遍焦虑的讨论话题。

道德力量开始集结起来重整旗鼓应对这种攻击。基督徒奋进会的创始人兼负责人弗朗西斯·E. 克拉克(Francis E. Clark)博士宣布说，现代的"下流舞会"是"对女性纯洁的侵犯，而女性的纯洁性正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源"。宗教期刊对新型舞会进行了严厉谴责，将其形容为"不纯洁的，污染、腐蚀、贬低且破坏了精神性，并增加了淫荡性"。整个国家的母亲、姐妹以及教堂成员都被号召起来，对这些可怕的年轻人进行劝诫、指导，并提升她们的精神品质。佛罗里达大学的墨菲(Murphy)校长怀着真正的南方热情大声抱怨："短裁剪的睡袍、卷起来的长筒袜以及短裙统统来自魔鬼和他的使者，正带领着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前往混乱与毁灭之城。"在纽约，一批拥有大笔财富和崇高社会地位的圣公会女教徒们[包括 J. P. 皮尔庞特·摩根夫人(Mrs. J. P. Pierpont Morgan)、波登·哈里曼夫人(Mrs. Borden Harriman)、亨利·菲普斯夫人(Mrs. Henry Phipps)、詹姆斯·罗斯福夫人(Mrs. James Roosevelt)，以及 E. H. 哈里曼夫人(Mrs. E. H. Harriman)]建议，应成立一个专门组织，对含有"过于裸露"与"不得体的跳舞方式"等因素的流行时尚实施控制。女青年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运动，反对高中女生不文明的穿着行为，同时向报纸提供《工作女性响应谦虚号召》和《高跟鞋即使在法国也不再流行》等印刷材料。在费城，一个由杰出公民组成的服装改革委员会向 1 000 多名牧师进行问卷调查，征求他们对得体着装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意见大相径庭，这一点颇为让人烦恼，但是委员会还是设计出了一种"道德长袍"，并且得到了 15 个教派领导人的认可。与普通长袍相比，这种道德长袍的显著特征在于它宽大而松垮，袖子刚刚到肘弯下面，下摆离地面则不到 7.5 英寸。

很多州对这个道德长袍的样品并不满意，但是他们也不希望遭到责难，于是立法会进行立法，决定对女性服装问题进行一劳永逸的改革。1921 年，《纽约美国人》报道说，犹他州推出了一项法案，准备对那些在大街上身穿"边缘与脚踝之间距离超过 3 英寸的裙子"的女性处以罚款和入狱，而这项法案正在等待最终的通过。弗吉尼亚州的立法会收到这样的提

案:禁止任何女性的衬衫式连衣裙或晚装露出“多于 3 英寸的喉咙”。在俄亥俄州,立法会的提案只允许衣领露出 2 英寸,同时阻止销售任何“过度展现或是着重强调女性曲线的外衣”,并且禁止所有“14 岁以上的女性”穿着“边缘不到脚面的裙子”。

与此同时,无数家庭正在为抽烟、喝酒和整夜开车兜风而引起的纷争伤透了脑筋。父母们难以入睡,想知道子女们究竟是否已经完全迷失;而孩子们却逃避着问题:要么就是痛苦地说着谎话;要么就是突然发火并粗鲁地回答说,起码他们并不是头脑肮脏的伪君子,他们看不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危害,并且将会继续这样行动下去。那些拥有自由思想的牧师和老师,总是对自己能够和新生事物保持步调一致感到骄傲,他们异口同声地安慰道:这些年轻人至少比他们的前辈要坦白得多,也诚实得多;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实验,可以很快发现什么样的标准已经遭到了抛弃,而什么样的标准又代表着自己的种族在道德智慧方面的提升。听到这样充满希望的话语之后,很多父母又振作了起来,他们觉得,也许这种年轻激情的突然宣泄将会很快过去,而再过一两年,少男少女们都将会恢复理智,一切都将重新回复常态。

然而,他们错了。因为年轻一代的这种反叛只是一场习惯与道德革命的开始,而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对这个国家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产生影响。

## 二

各种各样的力量同时作用并互相影响,使得这场革命在所难免。

首先,人们的思想状态受到了战争过程及其结局的影响。与训练营和前线的士兵们相伴相随的是一种“吃喝玩乐明天就死”的精神,而整整一代人都受到了这种精神的影响。不仅快速的战争婚姻成为流行,不那么传统的暧昧关系也成为流行。在法国,200 万男人发现自己距离下流和毁灭越来越近,而距离美国的道德准则及其拥护者却越来越远;美国国旗扛到哪里,卖淫活动就跟到哪里,并且愿意从事这种交易的年轻女子数量极大;被派到国外充当护士和战争工作者的美国女孩们受到欧洲大陆习惯与标准的影响,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但与那些出身良好家庭的欧洲姐妹们相比,她们却并没有像她们一样受到严格的保护。传统的那种克制、沉默以及禁忌

非常自然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崩溃。对这一代来说，当他们所受的折磨结束以后，让他们重新回复常态而没有一丝改变是不可能的。在战争的压力下，有些人接受了一些似乎能够给自己提供防御保护的新道德准则，数百万人则依靠某种无法摆脱的情绪兴奋剂来麻醉自己。他们被撕裂的神经渴望着速度、刺激与激情来为自己止痛。可他们发现，社会不仅期望他们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再次安定下来去接受单调而程式化的美国生活；同时还期望他们接受那些老一辈人的道德信条，可是这些老人似乎仍然生活在充满玫瑰色理想的波利安娜的乐园里，而他们自己的玫瑰色梦想早已在战争中遭到了扼杀。他们没法满足这样的期望，并非常无礼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

"上一辈人在将这个世界交给我们之前，早已经将它毁灭得不成样子了，"1920年9月，约翰·F. 卡特(John F. Carter)在《亚特兰大月刊》中真切地表达了他们这一代人的观点，"他们留给我们的世界不仅漏水而炽热，还支离破碎面临着爆炸；当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以谦恭有礼的热情接受这个世界时，他们竟然如此惊讶，可是要知道，他们接受这个世界的时候可是19世纪的80年代。"

中年一代却并没有这么直接地受到战争神经综合症的影响。在1917年之前，他们就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建立起一种不易破碎的习惯。但是在1919年战争结束之后的松懈状态面前，他们也发现自己变得不太安定并且不太满意，总是想对任何事情都发出质询，而那些事情曾经一度在他们看来是如此的真实而珍贵。他们曾经享受过美好的时光，因此盼望再次出现美好的时光。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晚辈在性的禁地里进行着对各种方法的探求，而如今他们也开始有了自己进行一番试验的想法。同样的幻想破灭曾经击败了伍德罗·威尔逊，曾经导致了罢工和骚乱的产生，也曾经导致了巨大红色恐惧的出现，而如今这种幻想破灭却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可以供新自由的萌芽在其中发展成长。

美国女性日益增长的独立意识也加速了这场革命的进行。她在1920年赢得了选举权，可事实是，一旦她获得了这种权利，似乎又对此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她也投票，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她的选择与周围那些顽固守旧的男人们没什么不同，虽然女性俱乐部和妇女选民联盟都提醒她关注女性公民的机会，可是她却充耳不闻；政府中几乎没有女性工作人员，而即使有，某些人——例如得克萨斯州的玛·弗格森(Ma Ferguson)州长——

似乎也并不是那种过分乐观的精神影响的代表，而在过去，她曾经许诺过这种精神影响将会使公众的生活更加高贵。年轻女性中则很少有人对政治产生哪怕短暂的兴趣，对她们来说政治是一桩肮脏而且无用的事情，没有滋味，也没有希望。尽管如此，女性赢得选举权这件事情还是产生了影响，它巩固了女性作为男性对等物的地位。

更为显著的影响表现在，女性将自己从家务活中解放出来的独立意识日益增强。家庭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并因此变得更加容易照料。由于搬进了公寓，家庭主妇花费在照料家庭上的时间和精力变得越来越少。女性们学习着怎样才能使准备食物的过程更加轻松。出售的罐装食品越来越多，熟食店的数量如人口数量一样快速增长，在1910～1920年的十年间增加了3倍，而在1914～1924年的十年间，面包店的产量则增加了60%。曾经一度要靠家务劳动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要么已经完全退出了家庭，要么就是通过机器得到了简化。例如，从1914年到1924年，专业干洗店的数量增加了57%，对那些仍然在家里洗衣服的人，洗衣机和电熨斗则帮了她们大忙；中心镇——一个典型的美国城市——的电力公司估计说，在1924年，这个城市将近90%的家庭都拥有了电熨斗。家庭主妇们正在学习通过电话决定自己的购物计划；让别人制作成衣，把自己从麻烦的制衣过程中解放出来；购买真空吸尘器，模仿杂志广告中那些可爱而无忧无虑的女孩们，只动动纤细的手指就可以去除灰尘。女性们正在逐步地从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这些“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一方面，她们可以从事自己的工作。在此之前，那些想“做点事情”的中产阶级女孩可以从事的行业只局限在教书、社会工作、看护、速记以及商店里的行政工作。但是现在，从中学和大学毕业的大量女生开始进入各种各样的新行业。她们包围了出版商和广告商们的办公室；她们进入了茶室担任管理人员，以至于鸡肉饼和肉桂面包的烤制者要多于消费者；她们出售古董，出售房产，开办小型的漂亮店铺，并且最终攻进了百货公司行业。1920年，在普通大学女生的眼里，百货公司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场所，只会雇用那些“可怜的女店员”；而到了20年代末期，女大学毕业生们却在排队等候女性运动服商店出现人员空缺，或甚至站在柜台后面做起了销售工作，同时也盼望着幸运之神某天会向她微笑，将自己变成购买者或者是设计师。小镇上的姑娘们曾经一度满足于整天待在索克中心，可是现在她们却从父亲那里借来资本然后前

往纽约或芝加哥去寻找她们自己的出路——在拜斯特公司或玛西公司或马歇尔·菲尔德公司。已婚的女性由于孩子的牵绊，没法出去寻找工作，于是她们这样宽慰自己：毕竟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也是真正的“职业”。这个国家的人们在午餐桌上讨论最多最热烈的话题就是：已婚女性究竟是否应该从事某种工作，而一个母亲究竟是否有权利这么做。对未婚女性来说，她再也不用解释为什么她得在商店或者是办公室工作了；相反，如果某个女孩无事可做，她反倒要设法为自己辩护了。

伴随着工作——或至少是认为工作是一种可能性的意识——而来的是一种相对的经济独立意识。而伴随着这种经济独立意识而来的，则是逐渐减弱的丈夫权威和父母权威。未婚的女性离开家庭的庇护，居住在自己那小厨房式的蜗居里。对城市的居住者来说，家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像一个圣地，而更像是一个宿舍——在她们离开饭店和电影院前往办公室的路上，这个随便的场所可以为她们提供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管理机械化的家庭已经无法为美国女性提供满足感，而工作同样也无法为她带来完全的满足。她仍然还有多余的能量和热情需要燃烧；她已经做好了迎接革命的准备。

与所有革命一样，这场革命的发生也是受到了外国宣传的刺激。然而，这次刺激不是来自莫斯科，而是来自维也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心理分析的著作，并且和荣格(Jung)一起早在1909年的时候就已经给美国的心理学家们作过演讲，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弗洛伊德学说才开始在美国的普通大众中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战争结束以后，科学作为一种伟大的知识力量并没有被毁坏名声；或多或少受过一些教育的公众如今正在大量吸取生物学和人类学方面这些已经普及化的信息，而这些信息让大众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印象，那就是，男人女人都是非常复杂的动物，道德准则并没有普遍的有效性，而它建立的基础经常都是古怪的迷信。出现了肥沃的土壤供弗洛伊德学说的种子生根发芽，如今甚至从卖淫女的嘴里，人们都会听到“科学”告诉我们关于性的崭新而令人心烦的事情，似乎性才是推动人类的主要而普遍的力量。人类的几乎所有动机都是由于性而产生的：如果你是一名爱国者或者你喜欢小提琴，掌控你的就是一种被升华了的性的形式；精神健康的首要条件就是拥有不受约束的性生活，如果你想身体好，情绪好，你就千万不要压抑自己的性冲动。鸡尾酒会和麻将桌上开始传播新词和新短语——自卑情结、虐待狂、受虐狂以及恋母情结。知识女性们前



往欧洲接受分析；分析家们则在美国城市之间不停地奔波，认真负责地使病人的情绪恢复正常；而那些鼓吹自控美德的牧师们则遭到了坦率发言的批评家们的提醒：自控已经过时了，并且非常危险。

还有其他因素加速了习惯与道德的革命，而这些力量则是百分之百美国式的，包括禁酒法令、汽车、忏悔杂志、性杂志以及电影。

当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得到批准的时候，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禁酒法令似乎得到了几乎整个国家的支持。然而，对法律的逃避立刻就开始了，而对禁酒法令热烈而真诚的反对——尤其是在北部和东部的大城市中——也迅速集聚了力量。结果就是出现了酒类走私者和地下酒吧，以及一种故意反抗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使得喝酒在许多社区成为"要做的事情"。这些事实反过来又产生了以下的结果：蒸馏酒取代传统的发酵酒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扁平酒瓶和鸡尾酒会开始流行，而喝酒从以前纯粹是男人的特权发展成为男女共同享有的特权。旧日的酒吧间几乎清一色全是男人；而如今的地下酒吧则对男性和女性同时提供服务。正如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所说的那样："过去那种父亲在卡西迪酒吧间消磨整个晚上而周围都是男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且很可能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卡西迪也许仍然在柜台后面继续营业，父亲们也许仍然去那里消磨晚间的时光，但是自从实行了禁酒法令，母亲们也会与父亲们一起前往那里。"在新统治下，不仅仅是酒和饮料被混合在了一起，饮酒的伙伴同样也被混合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由于汽车——尤其是轿车——使用量的大量增加，一种新形式的自由也成为可能。(1919年，全美国生产的小汽车中只有不到10%是轿车，到1924年轿车量的比例飞升到了43%，而到1927年该比例更是达到了82.8%。)汽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几乎随手可得的服务方式，可以让他们暂时逃离父母和同伴的监管，也可以暂时不管周围人的意见。正如林德夫妇在《中心镇》中指出的那样，如今的少男少女把以下这种举动看得非常平常：跳进一辆汽车立刻开走——不需要征得任何人的允许——前往20英里之外的一个小镇参加舞会，在那里他们是完全的陌生人，因此可以享受到无限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在他们自己的周围无法享受的。不仅如此，事实上轿车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受天气限制的空间，因为无论白天黑夜，人们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钻进汽车，按照自己的意愿行驶在黑暗的道路上或是乡间小路上。林德夫妇在《中心镇》中引用了少年法庭法官的话，

法官宣布说，汽车已经成为了“车轮上的卖淫场所”，并且引用事实说，在一年中因为性犯罪而被带到他的法庭上的30个女孩子中，有19个承认是在汽车上进行性交易的，而这些指控都被记录在案。

最后，随着革命的开始，它为大批性杂志、忏悔杂志以及恶俗电影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这些东西的存在反过来又对一批从来没有听过并且有可能永远不会听说弗洛伊德以及性欲望的读者和电影观众产生了影响。性冒险杂志的出版商们总是为自己的文章加上这样的标题，例如《在我女儿结婚前夜我对她说的话》、《懒散的吻》以及《注意你的进入》，他们这种优雅而精确的命名艺术既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又不会引起当局的审查。而忏悔杂志的出版商们，一边总是要求自己的作者写出合乎道德的结尾和虔诚的情绪，一边却又将精力集中放在如何描述被委婉地称之为“失足”的情节上。他们大部分的小说都是由雇用的“枪手”作家虚构出来的，他们今天可以写出标题为《歌舞团女演员的自白》这样的文章，第二天又仍然可以用第一人称描述某些可以让出租车司机们轻易犯错的诱惑。这两类杂志不仅发行数量惊人并且都非常成功。伯纳尔·麦克法登(Bernarr Macfadden)的《真实故事》迟至1919年才出版，到1923年的读者数量已经是30万，1924年是84.8万，到1925年已经超过了150万，而到1926年数量已经接近200万——这样高速增长的记录很可能在杂志出版业里无人可比。

报摊上摆满的不仅有性杂志和忏悔杂志，还有电影杂志，它在描述“七个银幕之吻”时通常使用这样的说明文字：“你有没有认出你的小小朋友梅·布什(Mae Busch)？她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亲吻，可是她似乎从来都没有感到厌烦。最起码，你得同意，她成功地模仿了那些享受亲吻的人。”电影院每日每夜都在吸引着数百万的观众，并总是不断地播放着同样主题的电影，因为这样的电影能够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某部电影的制片人为其电影做广告说：“美妙的男人，美丽的爵士乐宝贝，香槟浴，午夜的狂欢，紫色清晨青年男女的爱抚舞会，所有这一切都在使你大喘粗气的绝妙的高潮中戛然而止。”而另外一部电影的出售者则承诺有“热情的拥吻者，热烈的拥抱者，炽热的吻，残酷的吻，为享乐而疯狂的女儿，为激情而发疯的母亲……以及大胆、裸露而充满刺激的真相”。虽然广告承诺了这些内容，但真正的电影通常都与此并不相符，无法提供这么多的内容。但是某些电影里的某些内容却足以让一个16岁的少女[爱丽思·米勒·米切尔(Alice Miller Mitchell)引例说明]去进行验证：“你知道，电影里热烈做爱的情节





太多了，于是坐在一起的少男少女们只想站起来走出电影院去找个地方。有一次我和一个男孩在电影结束之前就离开了电影院。我们去开车兜风了。但是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却总得站起来跟她男朋友出去。”

战后十年早期，由于受到教会组织的大量批评，电影制片人们只好让哈定总统的邮政管理局长威尔·H.海斯(Will H. Hays)先生对电影的道德尺度和品味进行仲裁，而海斯先生则承诺说一切将会顺利进行。他站在洛杉矶商会前表示：“这个行业对待神圣之事必须怀有孩子般的心灵；对待纯洁之事与清白的历史记录所造成的影响，必须怀有如最好的牧师或最有灵感的青年们的教师所拥有的那种同样的责任感与关切之情。”而海斯尽职工作所导致的结果是：电影和忏悔杂志一样，都必须加上合乎道德的结尾；60部电影里都被加上了尽责的陈词滥调；多部优秀小说和戏剧都登上了被禁止将其改编成电影的黑名单，因为这个行业非常诚实，很有可能通过非常严肃或是非常聪明的方式对原作进行诠释，并由此对小镇的传统性道德规范提出质疑。海斯先生很有几分天才，能够将那帮教会人士成功地牵绊住。只要审查制度开始变得稍微有点威胁，他就会公布一系列新的道德戒律供电影制片人遵守。然而，从他的监察实际效果来看，很可能上文所引用的话语都来自于他的专政独裁时期。电影制造业虽然口头上表示遵循旧准则，实际上却运用十足的粗鄙行为努力地宣扬着新准则。

这些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包括战后的幻想破灭、女性的新地位、弗洛伊德学说、汽车、禁酒法令、性杂志和忏悔杂志，以及电影——各自都在促进革命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每一种影响因素都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没有哪一种因素仅靠自身力量，就能够显著地改变美国的社会习俗；但是所有因素作用在一起，则发挥了不可抵挡的作用。

## 三

在受到影响的社会习俗中，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女性服装与外表所产生的巨大变化。

保罗·H.耐斯特姆(Paul H. Nystrom)教授在《时尚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曲线图非常巧妙地说明了战后十年里女性裙子的长度变化，而这种曲线图原本经常被商业分析家们采用，用来反映汽车装载量或是股票平均数

的涨跌。在这本书中，曲线图描绘的基础是对《绘图者》杂志中穿戴时髦的人士进行一系列的测量，月复一月，统计学家辛辛苦苦地测量着裙子边缘距离地面的高度与女性身高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描绘出曲线。从曲线图可以看出，在1919年，裙边与地面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女性身高的10%，换言之，也就是大约6英寸或7英寸高。1920年，这条曲线开始向上攀升，从10%升到了20%。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曲线又逐渐朝下弯曲，重新回到了10%，并且在1923年达到了最低点。然而，1924年的曲线又一次升高到15%～20%之间，1925年更是超过了20%；随后这条曲线继续稳步上升，直到1927年的时候越过了25%的标记，换言之，直到裙子的边缘已经升到了膝盖。裙边的这个高度一直保持到了1929年。

不过，耐斯特姆教授解释说，这条曲线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出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情况，因为在特定的某一年或某个月份里，它代表的不是人们实际穿着的裙子的平均长度，而是主宰时尚的人所希望的女性着裙长度，但是这些主宰者却肯定会受到服装行业制造者的影响。事实上，1921～1924年之间裙子长度的下降非常微弱。巴黎的服装制造者们预测说长裙将再度回归，美国的设计师和制造商们也这么认为，因此商店里都采购了长裙预备出售，但是女性们仍然继续到处寻找并购买更短的裙子。1923年秋到1924年春期间，制造商们总是听到零售商们抱怨裙子还不够短的声音。最终裙子变得越来越短，直至短至女性膝盖，而这正是她们需要的长度。不幸的制造商们勇敢地努力着想要改变时尚，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及膝裙仍然成为了女性穿着的标准，并且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

随着短裙的到来，不仅女性的身材出现了变化，女性服装在材料和数量上也出现了非同寻常的变化。那种少年般的苗条身材成为了每个女性的梦想，胸衣已经遭到了抛弃，仅仅在1924～1927年这短短三年里，克里夫兰联邦储备区百货商店里胸衣和胸罩的总销售量就下降了11%。丝绸和人造纤维制造的长筒袜和内衣代替了棉制品，这让棉花生产商们非常沮丧，而人造纤维的生产商们则兴奋不已；美国企业中人造纤维的产量在1920年仅仅只有800万磅，可是到1925年已经达到了5 300万磅。肉色长筒袜和短裙一样，也成为了女性的标准穿着。衬裙几乎从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事实上，女性将身上的服装一层接一层地往下脱的趋势变得如此明显，以致1928年的《商业日报》估计说，在未来15年内，一个女性所有装束的材料用量（长筒袜除外）将会从19.25码减少到7码。她如今愿意





穿在身上的所有装束似乎只包括：一件女式长罩衫(2码)、一条裙子(2.25)、一件背心或衬衫(0.75码)、一条短裤(2码)，以及一双长筒袜——而所有的这些装束全部是由丝绸或人造纤维制成的！后面的这句话确实有点夸张；但是1926年全国纺织品零售商协会收集了全国百货商店的数据并据此出版了一个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所有售出的女性内衣中只有33%是棉制品，36%是人造纤维制品，而31%是丝绸制品。丝袜再也不是富裕的标记；在一个年收入只有1 638美元的工人家庭，妻子对《中心镇》的作者说："再也没有女孩子愿意穿着棉袜去上学了。即使在冬天，我的孩子们也要穿着莱尔线或是仿莱尔线的丝袜。"

女性们不满足于仅仅在着装方面享受自由，又开始追求削短头发的自由。战后十年前几年，短发——你可以回想一下，在1918年的时候，纽约棕榈花园的经理人还曾经将短发看做激进主义的标志——在年轻女孩中变得日益普遍，这主要是出于方便的目的。1922年5月，《美国理发师》杂志预言说，正处于流行状态下的短发"无论如何都很可能持续到整个夏天结束"。而事实上，短发不仅持续到了那个夏天结束，而且越来越受欢迎。1924年，这份杂志对短发风格进行了特别报道，并且向订阅该杂志的用户提供如何护理短发的指导。而与此同时，职业美发师和传统理发师为了争夺这个高速发展行业的精华部分又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份杂志也不失时机地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报道。美发师们非常自然地反对女性前往理发师的店铺；而另一方面，理发师们则试图迫使各个州的立法会通过法令，规定"美发职业"除非和理发师一样得到许可，否则不允许从事理发工作。《美国理发师》从一种最崇高的角度对此事评论说："将女性引向理发店理发的努力实在有违整个公众的最佳利益，因为经常弥漫于理发店里的那种自由而舒适的气氛不适合美国女性的高标准。"但是，所有的美国女性似乎都坚持留着短短的平顶发式。战后十年的后几年，20几岁的女孩们几乎都是短发，短发在30多岁和40多岁的女性中间也非常普遍，而在60几岁的女性中间更绝对称不上稀罕事；并且在某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不仅留着短发，并且留着如男人一般短的短发，头发甚至都接近了头皮。女性的短发上普遍而轻盈地扣着钟形帽，因此制造女帽生产材料的商家也如发网制造商、发夹制造商、棉制品、羊毛制品以及胸衣制造商一样，变得日益沮丧。

不过，战后十年却为另外一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新收益，如今的化妆

品制造商和美容院老板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在 1920 年的时候，胭脂和口红还曾经让年轻一代的父母们如此惊恐，可是如今它们却成为了时尚，并且迅速流行到了最偏远的村庄。在 1920 年的时候，很多女性还会认为涂脂抹粉是不道德的行为，可是如今她们自己也开始迅速地接受化妆行为，并且将此纳入了每天的日常生活；美容院出现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为女性们提供"面部按摩或美容"。他们将润发剂和紧肤水涂抹在女性的头上和脸上，与岁月造成的皱纹和松弛的下巴作战，对眉毛先拔后修理接着再涂上颜色，同时采用其他各种方式使女性的青春风采更加靓丽或是帮助她们恢复靓丽的青春风采；而"整形术"这种全新的外科手术形式也在当时的应用科学领域诞生了。根据弗郎西丝·费希尔·杜布克(Frances Fisher Dubuc)的数据，1917 年的美容行业只有两个人缴纳了个人所得税；而到 1927 年，这个领域已经有 18 000 家公司和个人缴纳了所得税。"美容师"诞生了。

关于美国女性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花费在化妆品和美容业上的整个费用，我们也许可以保守地接受一下保罗·H. 耐斯特姆在 1930 年给出的巨大估计值：7.5 亿美元；而事实上其他人的估计值则要高达 20 亿美元。1929 年，克里斯蒂诺·弗雷德里克(Christine Frederick)夫人利用表格列举出了其他一些同样令人惊愕的数字：在美国，一位成年女性每年消费的扑面粉重达 1 磅，胭脂不少于 8 盒；市场上有 2 500 种牌子的香水和 1 500 种牌子的面霜；如果美国一年售出的所有口红首尾相连排列起来，它们将会从纽约排到里诺这个有名的"离婚城市"——而对某些人来说，这个目的地似乎还真的挺符合逻辑。

也许，通过对 20 年代初和 20 年代尾同一份保守派杂志上的广告进行比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衡量出公众对化妆品的态度变化。1919 年 6 月，《妇女家庭杂志》的各种产品广告中虽然也有四个是介绍胭脂的，但是其中只有一个对胭脂的成分作了评论，而广告词中讲道："如果正确使用，无人能够察觉到你使用了胭脂。"在那些日子里，使用胭脂的女性——至少在阅读这份杂志的圈子里——都希望掩盖这一事实。(1919 年的爽身粉广告普遍是这么表现的：一位母亲俯身向下，将充满慈爱的目光投向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而到了十年以后的 1929 年 6 月，这份杂志在给口红做广告时这么评论："如果你知道这种诱人的鲜红色香气将会陪伴你好几个小时，你肯定会感到身心舒适。"(顺便提一下，这两期杂志上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组对比鲜明的广告。1919 年的李斯特防腐液只是在广告中简单地说道：






"及时使用李斯特防腐液可以阻止小问题发展成为大感染。"可是到了1929年,这个广告竟然是用一首悲剧性的狂想曲开头的:"每个人都感到了春天的来临!只有她例外……")

时尚方面的这些变化——短裙、孩子似的身材、高腰的直筒裙,以及对化妆品毫无顾忌的使用——都说明美国女性理想中的自身形象真正发生了变化(也许,也是男人心目中的女性理想形象)。女性们专心于自由——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玩耍,而不必受到任何束缚,因为迄今为止,她们一直被束缚于相对来说无所作为的生活状态。但是,她们所追求的不是离开男人的自由,也不是不受男性欲望束缚的自由,因为男人的那些欲望曾经在早些时候使得妇女政权论者戴上了粗硬的草帽,穿上了男人的套装和低跟的鞋子。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希望自己哪怕在高尔夫球场上或办公室里都能吸引男人;娇小可爱的时髦女郎留着短发,头戴容易整理的小帽子,身穿灯笼短裤,作这身打扮的女郎在周末经常可以看到,而她们可不愿离开自己的丝绸长袜和高跟鞋。战后女性所追求的理想形象并不要求具有成熟的智慧或熟练的优雅;而是追求苗条的身材,扁平的胸脯,流行的短裙,以及高腰所造成的孩子气的感觉——所有这些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说明,这个十年的女性所追求的不是单纯的青春,而是没有长成的青春:她们希望成为——或者是认为男人希望她们成为——男人随意而轻松的伴侣;她们也希望成为不负责任的玩伴,而不是这个种族大屁股的母亲。青春是她们的风格,但并不是年轻的无知:她们所模仿的青春是一种无情而现实的青春;她们考虑的角度不是浪漫的爱情,而是性;她们吸引男人不是欲擒故纵的狡猾艺术,而是坦率而公开的直接态度。事实上,战后十年的女性会这样对男人说:"你累了,你幻想破灭了,你不想要家庭的照顾,也不想要成熟智慧的陪伴,你只想要激动人心的玩乐,你只想要性生活所带来的陶醉,却不想背负任何后果,我会把这一切都给你。"而对她自己,她又补充了一句:"而我将会非常自由。"

## 四

女性一心追求自由的行为还体现在她们对香烟的迅速接受。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各个年龄阶层的数百万女性都开始仿效1920年那些时髦

女郎的做法，开始抽起烟来。虽然社会对女性在大街上或是办公室里抽烟仍然普遍地表示出不赞成，而旧日的禁忌也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新教会统治的那些偏远地区，但在饭店里，在晚宴和舞会上，在剧院大厅以及其他很多地方，女性们却发出了激烈的诅咒。我们可以再一次通过广告的变化来了解公众意见的改变。战后十年初期，广告商们明白，如果广告敢于表现一个女性抽烟的话，那么就会招致致命性的打击；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他们就敢于表现这样的画面：漂亮的女孩子在恳求男人朝着她们的方向吐出烟圈；而到了战后十年末期，广告牌上则开始大胆地描绘漂亮女孩手拿香烟的场景。在有些杂志上，尽管农村读者仍然有大批的抗议意见，但是烟草制造商们仍然宣布："如今的女性可以和丈夫及兄弟一起享受好友般的香烟。"1918～1928年的十年间，美国香烟的总产量竟然翻了两番还多！香烟的产量竟然增加如此之多，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首先，男人们曾经认为，与抽雪茄或者吸烟斗相比，抽香烟体现不出那么强烈的男子气概，而如今这样的偏见已经消失，因此导致了雪茄和烟叶产量的下降；其次，与抽雪茄或者吸烟斗相比，香烟抽起来非常方便，因此烟草的消费量大大多于以前；而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却是：如今的女性不仅在餐桌上撒着烟灰，举手投足之间不时猛喷几口烟，还迫使百货商店在女鞋部的椅子中间摆上了装饰漂亮的烟灰缸。男女两性之间的可怕障碍被打破了。虽然正式的晚宴在结束之后仍然按照传统将男女宾客分开，但这已经纯粹变成了一个礼节性的行为。主人虽然仍然会为男性客人摆上一托盘的雪茄，却经常发现这些雪茄根本无人问津，因为餐厅里的男人们和客厅里的女性们正在吸着同一个牌子的香烟。

然而，更具有社会意义的则是男人和女人一起饮酒的事实。在富人中间，晚餐前奉上鸡尾酒几乎已经成为了社交礼仪上的必然做法。男男女女们蜂拥进入拉上窗帘的地下酒吧，并且要讲出神秘的暗语，女孩子们也和男人一起进入酒吧，而一只脚则搁在老旧的黄铜栏杆上。傍晚举行鸡尾酒会成为了一种新习俗。旅店里举行的舞会上开始流行一种奇怪而令人憎恶的做法，那就是租用旅店的房间，然后在这里非常秘密地享受某些非常可靠的饮料；男女客人都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将具有高能量的混合饮料一饮而尽。由于住房和公寓变得越来越小，乡间俱乐部成为了小城市、郊区及避暑胜地的社交中心；每个周六晚上，男男女女们都驱车（在某人家中结束了一轮鸡尾酒会以后）前往那些俱乐部会所参加宴会舞会。一瓶瓶的加





冰块的奶和姜汁无酒精饮料堆放在桌上，男人们从宽大的屁股口袋里掏出装有杜松子酒的扁平酒瓶（杜松子酒曾经是酒吧招待们最鄙视的饮料，可是如今却成为了最受欢迎的酒精饮料），而女人们则和男人们一起开怀畅饮，享受着喧嚣的释放快感。可是就在几年之前，她们对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受到酒精饮料影响"的想法还要倒吸一口冷气。而宴会的第二天就会有人在闲谈中提及，某某夫人昨晚之所以 11 点钟就从聚会消失，是因为鸡尾酒喝得太多跑到洗手间呕吐去了；某人因为砸碎了东西将会收到俱乐部要求赔偿的通知；某某夫人真的不应该喝那么多，因为三杯鸡尾酒下肚她就已经在桌子上乱扔面包了。而舞会上也会出现丑闻：很多已婚男人对服务员百般挑剔并因此获得愉悦；而专心于爱抚晚会的年轻人则直接驾车行驶在高尔夫球场上，并在第 18 果岭留下车轮的印迹。

当然，上述这些事件都是非常例外的，在许多社区里从来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总而言之，虽然反对禁酒法令的人并不承认，但禁酒法令确实成功地减少了这个国家饮酒的总人数，而工业地区那些饮酒的工人们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大多数经验丰富的大学管理者们都认为——而这一点却让某些学生们非常烦恼——与禁酒法令颁布之前相比，男学生中饮酒的人数减少了；女学生们的饮酒行为，起码当她们在校的时候，还构不成一个严重问题。然而，事实却是：在那些制定全国社会行为标准的人群中，酒精饮料不仅流动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也将人们的行为方式滋润得前所未有的随便。

而酒精饮料同时也加大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坦率程度。由于科学怀疑论的传播，尤其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学说的传播，保守的伦理论者所持有的信条逐渐衰退，新信条开始流行：要想完成救赎，就得面对有关于性的一切事实。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谦虚、寡言和骑士精神逐渐过时；女性们再也不想成为"淑女"，她们也无法再要求她们的女儿成长得"健康"；人们普遍认为，旧式的淑女是伪装的产物，"健康"的女孩只不过暂时压抑了她们肮脏的脑筋，最终她们都不会有好结果。"维多利亚式"和"清教徒式"逐渐成为耻辱的称呼：在新时代人们的心中，维多利亚式的女性就是穿着裙撑并抑制着自己想法的年长女性，而清教徒式的女性则是长着一副青鼻子又令人扫兴的粗鄙不堪者。如果变得时髦当然更好——每个人都希望变得时髦——世故，聪明，打破传统，并且非常坦白。而当你手里端着鸡尾酒的时候，最起码表现得坦白是很容易的。

1927年,玛丽·艾格尼丝·汉密尔顿(Mary Agnes Hamilton)写道:"如果你倾听一场现代的对话,首先让你感到震惊的是如此有限的词汇量,其次让你震惊的是如此频繁出现的被旧日行话称之为'没有淑女会使用'的语言。"由于人们喜欢味道强劲的酒精饮料,相应地,人们也开始喜欢效果强烈的语言。当纽约的舞台上出现"他妈的"或"该死"等词语时,观众再也不会因为震惊而发出尖锐的笑声,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每天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语。高贵的桥牌桌上如今也充斥着以前只有在酒吧才可以听闻的逸事。每个人都想表现出不会受到震惊的模样,而每个人又都想表现出一丁点儿令人震惊的模样,因此,在谈话中究竟应该使语言大胆到什么程度的话题,被人们热烈讨论了好一段时间。正如汉密尔顿夫人描写的那样,礼貌的谈话就像是完全用猩红色装饰起来的房间——太过强烈、刺耳,并且令人厌烦。

由于谈话变得空前坦率,书籍和戏剧也表现出了公开坦率的特征。看看战后十年纽约出产的最优秀戏剧作品的主题吧。《光荣何价?》反映了海军士兵的恋爱生活,对话中夹杂着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出现过的全新语言;《罗马之路》最主要的喜剧点就在于,一名罗马护士长如何渴望着被迦太基人掠走;《奇妙的插曲》的主要情节是,妻子发现丈夫的家族精神不正常,但她又想为丈夫生一个孩子,于是决定与一位迷人的年轻医生完成这件事情,没想到却立刻爱上了他;《奇耻大辱》中,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孩公开与一位歌剧演员发生了一夜情;而《迷惑》则让数千名纯洁观众了解到竟然还有同性恋这种社会现象。在战后十年之前,像这样的戏剧甚至连纽约都无法忍受;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戏剧作品不仅得到了广泛的流行,更受到了观众的真正崇拜。以下这个小故事可以说明观众对这些作品的热烈反应:一位上了年纪的淑女在看完两幕《光荣何价?》后,对小孙子申斥说:"讨厌!约翰尼(Johnny),坐下!"

而战后十年间出版的小说,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从《尤尔根》、《黑色的笑声》到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的故事,再到《美国悲剧》、《太阳照常升起》、《孤独之井》和《旋律和对立》,它们在谈到性的时候,要么坦率而公开,要么冷嘲热讽,要么就纯粹是不带任何道德评论的客观叙述,而这些态度都是讲英语的读者从来没有见过的。清教徒信条的保卫者虽然苦苦地努力着试图去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但是却无法阻挡这股强大的潮流。他们对《尤尔根》颁布了禁令——却让此书成为了畅销作品,并且让作

者更加有名。他们把玛丽·威尔·丹尼特(Mary Ware Dennett)拖上了法庭,因为她向孩子们分发关于性知识的小册子——但是她的行为反而得到了一位怀有自由精神的法官的支持,并且得到了睿智的公众的认可。在波士顿,在顽固的清教主义和罗马天主教义的联合支持下,他们禁止批发出售书籍,禁止在舞台上表演《奇妙的插曲》,并且确认某个出售《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书商有罪——却发现自己遭到了整个国家知识分子的嘲笑,于是最终被迫允许了书籍的发行,而在十年之前,他们会提出动议颁布禁令。尽管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这个国家却还是要求出现一种崭新的阅读材料。

战后十年早期,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写文章声称,生育的自然过程对很多女性来说是具有羞辱性的。她把文章送给当时最好的杂志的编辑看,结果两人都认为不应该刊出这篇文章,因为太多的读者会对这个主题感到厌恶并且被这篇文章吓坏。仅仅在几年之后的 1927 年,这位编辑偶然想起了这篇手稿,于是他询问说是否可以再看看那篇文章,结果他非常纳闷当初为什么竟然对这样的文章宣判了死刑,因为文章里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坦率性在如今不仅得到了允许而且非常自然。于是文章刊登了出来,而引起的轰动只有那么一点点。

1918 年,如果某个在著名杂志工作的编辑在来稿中看到两个匪徒这样的对话——"看在基督耶稣的面子上,乔,把汽油给她吧。他妈的恶心狗杂种杀死了埃迪"——他会迅速拿出蓝色铅笔对其进行修改:"为了迈克的爱,乔,把汽油给她吧。可恶的讨厌鬼杀死了埃迪。"而在 1929 年,声誉最好的杂志在收到这样的来稿时,也会对文章不加任何改动就直接刊登出来。即使有读者反对这样的措辞,但是人数并不多。时代已经改变了。即使在那些发行量很大并且非常受欢迎的期刊上,标准的改变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位短篇小说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这么说道:"过去,如果我想挣点钱,我就把无伤大雅的故事投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画报评论》这样的杂志;如果我想写一点透彻而诚实的文章,我就会提供给《哈珀斯》和《斯克里布纳》。而现在我发现,我同样可以将诚实的文章投递给大型的流行杂志。"

## 五

随着习惯的改变,道德的改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少男少女们小

小年纪就对性表现得驾轻就熟，以下的事实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中心镇》的作者询问241个男中学生和315个女中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见，像"每十个中学生中就有九个参加过青年男女的爱抚晚会"这样的陈述是否符合实际，几乎半数学生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年轻人中间究竟发生过多少性行为当然无人能说清楚；但是林赛(Lindsay)法官在讲述某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时曾经提过，少女们在自己的手提包里装着避孕用具；法官还提到了一个名叫卡洛琳(Caroline)的女孩，她曾经告诉法官，她认识的人中有58个女孩有过不止一次的性体验，但是都没有怀孕。这些故事都是和许多城镇流传的流言蜚语相吻合的。在这个十年中，卖淫行为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同样也是无法确定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妓女们第一次面对着数量惊人的业余者的挑战。

同样，对已婚夫妻间不贞行为的数量，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数据，因为有关夫妻之间的私人关系是否幸福这样的信息是统计学家无法拿到的。不过，离婚率却一直在持续稳步地上升；1910年，每100对夫妻中有8.8对离婚，1920年是13.4对，而到了1928年则是16.5对——几乎每6对夫妻中就有一对劳燕分飞；而离婚行为所带来的羞辱感也随之下降。在城市的社区中，离婚男女如今已经为周围人坦然接受；当然事实上，有些人还是认为离婚者不够传统或是不够贞洁，也有人认为离婚者相当勇敢并且令人向往。有个纽约女孩这么说道，在战后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她正在考虑要和亨利(Henry)结婚，虽然她并不是很爱他；她解释道，即使两人相处不好，她也可以通过离婚来结束夫妻关系，而且"与其做一个老处女，还不如做一个离婚女人更加令人激动"。而许多年轻女性也许都和这个纽约女孩怀有类似的想法。

在战后十年的头几年，青年男女间的爱抚晚会还只限于在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之间进行，但是不久也出现在了年纪稍长的男女之间：在旅馆卧室里举行的舞会上，当杜松子酒瓶在人们手中传递的时候，或是在乡间俱乐部的周六宴会上，当萨克斯手停止吹奏时，绯闻缠身的男人和已有半大孩子的女人也开始了他们对原始性生活的小小体验。人们开始听说：出身良好家庭并且年轻聪明的女孩子们早在婚前就与不同的男人共度周末，而且将这些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们未来的丈夫。谁知这些男人们不仅立刻原谅了她们的做法，还对她们说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这些男人认为，一点点"经验"对任何女孩子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此前

的早些时候，有个喜欢锦衣玉食的男人曾经认为，道德的恰当状态就是“性行为的标准相当低”，而如今数百万人都开始接受这个说法。

当然，很容易发现与以上事例形成鲜明对比的事情，也就是说，战后十年末期的很多男人女人们仍然像卫理公会主席希望的那样思考和行动。有两位女性在报纸专栏上为恋爱事件提供建议，她们证实，从数量急剧膨胀的信件来看，正在使年轻的美利坚感到困扰的问题不是是否要对男朋友说明私生子的事情，而是：如果男朋友没有收到同看电影的邀请却出现在面前，在门廊上当面再邀请他的做法是否合适；或者是：社交聚会上的蛋糕是否应该用刀子切开。在偏远地区，对性仍然存在着很多旧式的看法，正如联合女性俱乐部门前的标语上写的那样：“男人是上帝造出来的树，而女人则是男人的花。”为了要维持道德的原状，通过法律采取了很多疯狂的努力，而其中最独特的做法就是1925年阿肯色州的诺费尔特通过的法令，其中包含着以下的规定：

“条例1：从今往后，任何男人和女人，无论雄性或雌性，在上文提及的城镇中的任何地方进行性行为都是有罪的。”

“条例3：规定的条例1不适用于已婚男女之间的性行为，也不适用于丈夫和妻子之间，除非这种行为非常不得体并且非常下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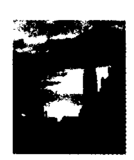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性关系与夫妻关系的哲学却非常清楚地迅速偏离了旧日的美国准则，发展成为一种对这个国家来说全新的潮流：人们认为，纯洁与忠贞的美德过去被看得太高了，人人都拥有被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夫人定义为“男女共同享有的、将男女从性体验中解放出来”的权利，女孩子在婚前没有必要剥夺自己的这种权利，而婚后的夫妻之间也没有必要剥夺彼此的这种权利。这种认识迅速传播并且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因此在1927年，林赛法官建议，在合法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伙伴式婚姻”。他希望将节育行为合法化(此时的节育行为名义上仍然是非法的，不过除了最无知的阶级以外，很多夫妻都普遍节育，并且认为这种行为毫无问题)；他也希望，如果夫妻双方同意并且没有生育孩子，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离婚结束他们的合法婚姻。他的建议引起了公众的极度惊恐并遭到了广泛而严厉的谴责。但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如此严肃的争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旧日的准则已经受到了震撼。道德的革命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

# 六

然而，一个正在革命的时代并不适合居住。打破旧的准则容易，要在原处重建新的准则却困难得多，而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肯定会出现令人不快的事情和情绪。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告诉自己：女性抽烟喝酒是有罪的，在午餐桌上公开讨论性是丑陋的，而一个女孩子宽恕男人对她不怀好意的注视则是不可想像的，因此这样的人不可能立刻完全忘记童年所受到的警告。而某些新式自由的传道者似乎又认为，思考习惯可以一夜之间就被改变。他们认为，如果你把关于性秘密的话题拿到太阳底下讨论并且让每一个人都随心所欲地行动，整个社会立刻就会进入如同最遥远的南太平洋群岛那样的无比纯洁的状态。但是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当你把性的秘密拖到阳光底下的时候，讲究礼节的那些人家里，子女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极其殷勤地行动起来让自己的模样尽量好看，而这段时间里他们根本就考虑不到任何其他的事情；如果你让每一个人都随心所欲地行动，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将自己折腾得十分惹人讨厌。甚至，他很有可能迅速发现，这么做毕竟不是赢得永久幸福的处方。这就是在战后十年，当旧日准则被打破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

这场革命最显著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对性普遍陷入了深深的着迷状态。听听讲究礼节的那些人家里子女们的谈话吧，他们的谈话肯定会让你想起那个父亲说她不会谈论任何事情的女孩，而事实是：她几乎不会谈论任何其他的事情。给大家再看个例子：这个时期人们反对女校的原因非常时髦，但这个原因既与课程无关，也与女毕业生以后的学术前景无关，而是有人指出，在周围都是女性的大学校园里生活、学习四年将很有可能扭曲一个女生的性生活。公众在阅读材料方面的品味也揭示了这种对性话题的着迷：不用说那些性杂志和性小报，也不用说报纸上每天都有大量的版面刊登布朗宁爸爸(Daddy Browning)与其"桃子夫人"的新闻，有一点就非常重要：几乎所有得到战后知识分子高度评价的小说家都不满足审查者们的意见要求，而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也发觉要找出满足获奖要求的小说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根据要求，获奖小说应该"展现美国生活的健康气氛，展现美国方式与状态中的最高标准"。最后，评审委员会不得不对获奖条件





进行了修改，将“健康”改成了“总体”，删去了原文中的“最高标准”。因为那些著名的小说中极少有几部能够在展现“健康气氛”的同时，又能够不对此进行一番解释性的保留。那些认为自己“思想时尚”的读者并不需要这样的小说；他们需要的是：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男女们那充满哲学色彩的乱交，迈克尔·阿伦笔下的堕落者那弥漫着香气的轻率举动，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对布莱特·阿什利(Brett Ashley)因为醉酒而偶一为之的偷情行为的大胆描述，安尼塔·卢斯(Anita Loos)描写的两个情妇与其绅士朋友的喜剧故事，以及雷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对同性恋的研究。几年之前还在支持激进经济学说或政治学说的年轻男女们，如今支持的却是新的道德标准，并且随时随地谈论着这些，考虑着这些。性被摆在了最显著的位置，而讲究礼节的家庭中的孩子们更是无法将目光移开了。

这场革命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习惯不仅变得不同于以往，而且——在未来好几年内——根本毫无礼貌可言。以下的这些事实也并不是巧合：在这个十年中，即使在一些小晚会上，女主人也会发现，客人们都不愿意费功夫去听主人讲明到达或离开的时间；不加通知就来参加舞会成为了人们公认的做法；数千名男男女女都强调说，为了防止别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享乐生活，千万不要早于约定时间一个小时之前去参加晚宴；在乡间别墅举行的连续数日的宴会上，时髦女郎们和她们那身穿宽大长裤的情郎们离开时直接把香烟丢在红木桌子上，把烟灰毫不在意地撒在地毯上，把门廊上的小垫子带上小船，然后就将垫子扔在船上任凭风吹雨打，却根本不会道歉；有些人拥有——就像古老的短语所说的那样——“优越之处”并且认为自己非常文明有礼，却在喝下几杯鸡尾酒之后立刻就把一场晚宴变成了一个喧闹不堪的嘈杂场合，可是他们忘记了，这种嘈杂不堪的聚会并不是回归希腊美好生活的标志。旧日的栅栏已经被推倒，新的栅栏还没有建立，因此猪只有在草地上胡乱撒欢了。也许有一天，战后的这个十年会被人们冠以另外一个名称：糟糕习惯的十年。

同样，在抛弃旧日的道德准则而代之以新准则的同时，要想不引起混乱和悲伤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人们宣称说，已婚夫妻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随地拥有自己的性冒险经历，因为婚姻是独立于性行为之外的一种东西。这么说是一回事，但真正的现实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对自从童年时候就开始感情扎根然后拥有这么一段理想的罗曼蒂克的婚姻的夫妻来说，当

这种性冒险经历真正发生的时候，要让他们忍受彼此的不忠是完全不可能的。林赛法官讲过这样一个女人的故事：她下定决心可以让丈夫爱任何他爱上的人，她将会表现得非常现代并且依然爱他；可事实是：她只要一看到自己的情敌，就会感到非常恶心。她发现，自己的无情只是停留在表面。在道德革命中，与这个女人拥有同样感受的人还有很多。在严酷的离婚数据背后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丈夫与妻子都在享受着新式的自由，却突然发现这种自由中隐藏着大量的炸药，而这种炸药将相互间的信任与尊严毁坏得体无完肤，可是如果没有了这种相互信任与彼此的尊严，婚姻——即使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也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新的准则在幻想破灭中诞生了。虽然新准则的拥护者进行着虚张声势的行为，谈论着关于进入新时代的话题，但是这种幻想破灭仍然存在。这个十年不仅态度粗野，而且心情也不愉快。随着旧日秩序的逝去，曾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充实与意义的那套价值体系也随之消失，而取而代之的价值体系却没有立刻出现。如果道德被赶下了台，什么东西将会取而代之呢？“正直，”有些新时代的预言家们提出了这个词，“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忠诚于你所做的事情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勇敢的理想——但是这也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因为这个词不仅太过模糊而严厉，并且也难以实现。如果浪漫的爱情被赶下了台，什么又将取而代之呢？性？但是正如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解释的那样：“如果爱情逐渐变得不再是罪过，那么它也会逐渐变得不再是一种最高特权。”沃尔特·里普曼(Walter Lippmann)在《道德序论》里引用了克鲁奇的话之后又补充道：“如果你一开始就认为爱情只是瞬间的愉悦，那么，当它只给你带来瞬间愉悦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非常诧异吗？”对单纯的性的追求，到最后只能产生空虚与无聊——而对《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莱特·阿什利夫人和她的朋友们来说，这种空虚与无聊则是她们注定要面对的。

固然，战后十年的美国并没有很多的布莱特·阿什利们。但是，却有数百万的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在某段时间里感觉到了同样的幻想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样不开心。他们不能忍受没有价值观的生活，而他们自小被训练理解接受的惟一的价值观就是遭受破坏。所有的事情都显得毫无意义，毫不重要。是的，至少人们可以将数杯酒水一饮而尽，发发牢骚以发泄心中的感情，将这个世界正在破碎的事实暂时忘记……于是，萨克斯风吹奏着悲伤的曲调，杜松子酒瓶一轮又一轮地传递，舞者们半闭着眼睛不

停地、单调地旋转着，而外面那残忍而愚蠢的世界则可以在这个不安宁的晚上与他们完全隔绝……

建立新的准则是需要时间的。直到这个十年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开始出现一些迹象表明，革命者们又一次学会如何在他们的世界上舒适地生活。他们从对性的着迷状态中解脱出来，调整情绪适应这个世界正在改变的传统和标准，在这个新时代中优雅地过着更加自由、更加真诚的生活，并且在那些旧日教规的废墟中，发现可以带来长久满足的一套新的生活信条。



# 第六章　哈定与丑闻

在沃伦·G.哈定成为俄亥俄州的议员之前，在他担任议员期间，直至他去世为止，我一直担任他的私人律师。

——在哈定当选为总统之前以及他去世之后，我为哈定夫人担任过数年的私人律师。

——我一直担任俄亥俄州华盛顿法院中部国家银行的律师，也曾经为我的兄弟M.S.多尔蒂(M. S. Daugherty)担任律师。

——在哈定总统就任期间，我一直担任美国的司法部长。

——哈定总统去世之后，我为柯立芝政府也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司法部长。

——无论是作为律师、私人朋友或是司法部长，我为上述人士提供的参考意见都是非常机密而专业的。

——我拒绝对给我的问题做出回答或证实，因为：

我可能给出的回答或是做出的证词可能会被用来指控我有罪。

1926年3月31日，撒切尔(Thacher)法官在纽约传召哈里·M.多尔蒂并要求他向联邦大陪审团提供信息时，他给出了如上的书面回答。







# 一

1921年3月4日早晨——这是一个灿烂的早晨,霜气在空中漂浮,华盛顿的旗帜在风中摇摆——重病缠身的伍德罗·威尔逊弯着腰从白宫大门蹒跚而出,坐上一辆正等着他的汽车,沿着宾州大道行驶前往国会大厦,坐在他身边的是已经当选为总统但尚未就职的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当威尔逊重新回到位于S大街上他那与世隔绝的私人住宅时,哈定已经宣誓就职,成为了美国的新一任总统。常态的统治时期开始了。

1921年3月4日:这几个冷冰冰的数字对你意味着什么?就让我们暂时回到那一天,看看周围的情况吧。

停战协定签订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凡尔赛条约》仍被参议院搁置一旁,伍德罗·威尔逊仍拒绝与参议员们妥协,但是技术层面的战争状态依然存在于德国与美国之间。繁荣发展的商业到1920年中期开始进入萧条状态,由此导致价格水平下降,而此前高昂的生活成本曾经引起公众巨大的骚动。虽然超级爱国者们仍然情绪狂躁,泰尔法官此时还没有对萨科和万泽蒂进行审判,但是巨大的红色恐惧已经逐渐减弱。三K党正在招募最初的几十万名成员。已经是宪法第十八修正案通过的第二年了,酿私酒者和酒类走私者开始找到了自信。整个国家都被时髦女郎那不受传统习俗约束的行为所困扰;也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费城出现了"道德长袍",《文摘》杂志刊登了《年轻一代正在冒险吗?》的特写。第一个无线电广播站在国内出现还不到四个月,公众对收音机还没有出现全民性的狂热。裙子的边缘升高到了膝盖中间,而很有可能这个高度将再一次下降;一个犯罪委员会正在对芝加哥的犯罪潮流进行调查;兰迪斯法官成为了棒球领域的独裁者;登普西和卡庞蒂签约决定于第二年夏天在波义尔的"30英亩"场地举行比赛,而《大街》和《世界史纲》正在成为畅销书。

这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已经疲倦不堪。他们不愿再为战争感到兴奋激动,也不愿再为巨大的红色恐惧感到紧张不安,他们只希望能够得到平静和康复。他们对威尔逊本人以及他宣扬的美国应为全人类负责的言谈都非常厌恶,他们对政治理想也相当冷淡,他们只想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并且将所有的公共事务抛诸脑后。"常态"这个词

语也许在词典上无法找到，但这正是他们需要的状态。

华盛顿的每一届新政府上任时，都充满着对友善情绪的向往，但是当这一届政府上任时，萦绕在首都华盛顿上空的气氛尤其柔和温暖，而新任总统脸上的微笑则如同严冬过后刚刚解冻的春天那样温暖人心。在过去漫长的四年里，白宫的大门不仅一直紧锁，还受到岗哨的严密保卫。但是哈定上任以后的第一个正式行动就是敞开大门，允许大批观光客在白宫里漫步徜徉，任他们把鼻子紧紧地贴着办公室的玻璃，任他们在宏伟的北门廊下拍照留影；也允许廉价的小汽车和卡车从宾州大道沿着车道绕道而行，哈哈大笑着经过总统府的大门。这个行动似乎象征着政府开始重新回归于人民。威尔逊被人们谴责为一个独裁者，骄傲地保持着自己专有的智囊团；而哈定则谦虚地说，他将向那些"最有才能的智者"请教，并且在就职宣誓中引用了弥迦书的语句："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威尔逊似乎永远都在窥探着商人们的行为却对绝大多数商人都不信任；而哈定则想给予商人尽量多的自由，以便让他们"恢复正常的前进道路"。最后，威尔逊始终是一位严肃的学术理论家，而哈定则是"一位忠厚老实的人"：他让周周的人始终能感受到自己温厚自然的好脾气，他在白宫会见记者和访问者时总是与对方温暖地握手并且给予亲切的话语，而他在白宫养了一条名为"小老弟"的小狗的举动更是让美国人民那柔软的心灵深受感动。"如今华盛顿的气氛就好像旧式的周末家庭聚会或大学同学聚会的气氛，" 爱德华·G. 劳瑞在哈定上任不久后这么写道，"这种变化真是令人惊奇。普通大众都露出了明朗的微笑。"充满友善气氛的新时代似乎即将开始。

沃伦·哈定拥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伟大优点。首先，他看上去就好像是美国总统应有的模样。他非常英俊。他的面庞和姿态都透露出华盛顿式的高贵与尊严，而双眼则充满了仁慈与和善；他很上镜，他登在报刊上的照片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与尊敬。他是历届总统中最为和善的一位。他似乎对每个人都充满了喜爱之情，他希望为每个人都能做点事情，他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快乐幸福。他的和蔼可亲不是那些冷血政客们硬挤出来的伪善，而是显而易见又令人感动的真善。当战争期间他与赫伯特·胡佛第一次会面时，他就说道："邻居，我希望能够有所帮助。"他确实是这个意思；如今他成为了总统，他希望不仅能够帮助那些来自马里恩和竞选运动总部的邻居们，也能够帮助所有如邻居般友好的美国公众。

他的责任一开始并没有这么明显，然而，可悲的是这些责任确实真实存在。除了有限的政治经验，他"所知不多，闭塞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描述他的原话。他的头脑模糊不清，这一点在他公开发言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讲话时思路不畅，他的语言夸张而笨拙(例如，"拒绝介入"欧洲事务，"支持"某个条约)，他对单词的词缀总是弄不清楚(例如，把 normality 说成 normalcy，把 betrothal 说成 bethothment)。一旦问及政策问题，他总是显得非常无助，而如果没有清楚的头脑，单靠好脾气是无法给出问题的答案的。怀特讲述了哈定的一段故事。哈定在听完顾问们对某个税收问题整整一天的争论以后，一走进秘书的办公室就大喊了出来："约翰，这个他妈的税收问题我看不出一点眉目！我听完这一方的意见，觉得他们说得很对，然后——上帝啊！——我和另一方谈过以后却发现他们说得也不错，我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我知道在某个地方肯定有本书能够告诉我真相，可是，该死的，我读不了那本书。我也知道在某个地方肯定有个经济学家知道真相，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没法认识他，而就算找到他以后，我也不知道是否要相信他。天哪！这是什么工作啊！"由于他无法运用自己的脑筋发现事实思考问题并得出结论，他只能完全依靠那些比他精明的下属和朋友了。

如果在选择朋友和顾问方面他具有鉴别力的话，也许问题还不会很大，可问题是，他似乎根本就不知道鉴别力是什么东西。查理斯·埃文斯·休斯、赫伯特·胡佛和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统统被他安排进了内阁，仅仅是因为他模糊地认为，这些人可以增加政府的政治家数量；可另一方面，他已经做好了仿效多尔蒂、福尔或福布斯(Forbes)做法的准备。对什么样的职位应该安排什么样的合适人选，他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他就像仁慈的圣诞老人，将政府的各个美差一个接一个地送了出去，而首先获益的则是他马里恩的那些哥们儿。他的姐夫被任命为监狱总监；来自马里恩索亚疗养院的一位小人物索亚(Sawyer)医生，不仅成为了哈定的私人医生，还获授"准将"军衔，被委派前去研究政府卫生部门所可能出现的协调工作；而对通货监理官一职，哈定挑选了一位名叫 D. R. 克瑞辛格(D. R. Crissinger)的马里恩律师，可这个人的经历中惟一与银行业有关的，仅仅是他在马里恩担任过几个月的国家城市银行信托公司主席一职。

同样，哈定似乎也缺乏分辨诚实行为与无赖行为的能力。他在充满实用主义、唯利是图的俄亥俄学派中接受了政治训练，并且有数年时间，他都

以一副高贵庄重的骗人外表出现在人们面前。在他的支持下，俄亥俄州的说客、毒贩子以及购买特权者不仅讨论着自己的“商务事业”，而且以欺骗的手段成功地做成了“小生意”。在哈定成为总统之后，这些人与他在马里恩的哥们儿一起，也跟着他来到了华盛顿。其中有些人被哈定委派了美差，而其他人则等待着美差的出现。由于对他们非常熟悉，哈定肯定知道——如果他能够花一分钟时间进行一番清晰而不带偏见的思考的话——这些人将会不可避免地滥用手中的权力；但是他非常喜欢这帮旧日密友，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分享自己的好运，因此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而等到他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时间已经太晚了。他喜欢溜出白宫前往H大街上的宅邸，俄亥俄州那帮恶棍和他的熟人们都在那里，他们或是纵酒狂欢，或是沉湎于牌桌前的恣意享乐，而禁酒法令和国家大事都被他们抛诸脑后。对人们来说，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太过仔细地去探究这帮国家重臣们正在做些什么，也不要奢望他们能在贪污受贿行为之外表现得稍微有点理性，更不要奢望他们不做那些令哈定失望的事情。

那么，哈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伙伴呢？原因在于，虽然哈定拥有令人难忘的外表，但他本质上仍然只是一个小镇男人，一个“普通的俗世中人”。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解开背心的纽扣，嘴里叼着雪茄，手里拿着足量的酒瓶和冰块，与旧日老友相聚在某个小咖啡馆，共同享受周末的快乐时光。他的私生活充满了与性有关的粗鄙插曲；他的情妇南·布里顿(Nan Britton)在《总统的女儿》一书里承认说，他们孩子的出生时间距离哈定当选总统不到一年，而如今这个孩子正接受着哈定的资助。书中所描述的整个故事由于太过卑鄙粗陋而令人们备感震惊：他们的秘密会面地点包括参议院办公大楼、邋遢的小旅馆(南·布里顿认为他们的孩子就是在那里怀上的)，甚至还有白宫办公室里的衣橱。(虽然《总统的女儿》里的这个故事让读者感到怀疑，但是，要虚构出由这么多不光彩经历所构成的自传性质的故事，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吗？)虽然南·布里顿在描述哈定性格时可能掺杂着自己的看法，但人们仍然能很清楚地看出这个男人本质非常普通。这种普通的男人本质在很多其他事情上都有所体现：他喜欢说“嗨，小宝贝”和“哈，亲爱的”这样的粗俗语言，他曾经在火车上玩牌赌博时被骗走了100美元，他与布里顿在百老汇的旅馆里亲热时却被侦探们逮个正着，而他还天真地安慰她说不会遭到拘捕，因为如果一个参议员“正在赶往华盛顿去为人民服务的路上”，警方对他实施拘捕就是非法的。沃




伦·哈定的妻子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女人，她把哈定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位备受外界尊敬的富人；然而在本质上，已经入主白宫的哈定和俄亥俄帮仍然是同类。虽然哈定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能够彬彬有礼地对待本质高于自己的人，但只有在H大街上那个烟雾缭绕的小房间里，他才真正地感觉舒服自在。

哈定刚刚进入白宫不久，华盛顿就出现了一大群麦金利—福拉克式的实用主义政客，于是白宫的旅馆里随时可以看到大批衣冠不整的绅士：嘴里斜叼着雪茄，口袋里竖插着100美元的钞票。人们到处传说：如今只要你能够找对合适的人，你就可以和政府进行交易。油商们开始垂涎欲滴；当初在芝加哥的大会上，不正是他们大力游说人们投票给哈定并且推举他为候选人吗？难道哈定的内政部长艾伯特·B.福尔(Albert B. Fall)会不给予他们有利而宽松的条件供他们开采这个国家的资源吗？俄亥俄帮对即将到嘴的盛宴暗自窃笑：与联邦政府的掌舵人即将为他们提供的机会相比，他们在哥伦布的贪污受贿行为简直就是胆小鬼的机会。沃伦·哈定曾经说过他想提供帮助。好了，现在就是他提供帮助的时候了。

## 二

然而，普通大众却对幕后正在发生的这一切知之甚少，并且也不甚关心。他们的眼睛——如果他们愿意看的话——都盯着那个灯火通明的舞台，哈定政府正在这里上演着一出展现贤明而适度的政治才能的戏剧。

美国与德国的和平问题一直被长时间地拖延，而1921年终于在总统签署决议后得到了解决。根据1921年通过的预算法案条款，美国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以统一预算为基础的政府，而查尔斯·G.道斯(Charles G. Dawes)则成为了预算署长。他那独特的语言，他那下垂的烟斗，以及因为效率问题在对办公署的首脑们滔滔不绝进行呵斥时他那挥舞着扫帚的表演，都让报纸的读者感到兴致勃勃。由于配额的缘故，移民受到了限制，这一点让劳工们非常满意。国会提高了关税，而所有优秀的共和党国会都应该这样做。梅隆部长由于要求降低大笔收入的高额附加税而获得了金融巨头们的欢心；虽然国会中的农业集团与民主党派人士要求将附加税保持在50%的水平，但起码华尔街认为政府的心脏在和他们一起跳动。当司

法部长多尔蒂向罢工的铁路工人下达了一条连米切尔·帕尔默都会感到心惊的命令时，所有工会的敌人都跟华尔街怀有相同的想法。1923 年 1 月，资助英国偿还美国战争债务的协定在华盛顿签订，并迅速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然而，毫无疑问，主要以限制海军军备为目的的华盛顿会议——或者，正如报纸坚持的那样，将其称作为"武器会谈"——是哈定政府的一次非常伟大的成就。

自从战争开始，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世界强国就又一次地展开了军备竞赛，都开始拼命地建造船舰。随着太平洋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日本在战争期间抓住黄金机会将自己扩张成了一个商业帝国：由于对手都被牵扯在其他地方，日本开始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特殊利益范围，使中国沦落到类似于保护国的地位，并因此在商业领域享有比其他国家优先的权利。而通过与英国的结盟，日本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当查理斯·埃文斯·休斯成为美国国务卿以后，他开始为美国在东方争取权利，再次实行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于是，日美关系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日本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美国却持反对意见，而一旦出现冲突，菲律宾很明显会与日本抱成一团。如果三大强国——英国、日本和美国——能够就太平洋地区的冲突问题达成友好协议，用三角协议代替日英联盟，并能够安排好限制舰队发展的事宜，那么三方都将受益。在波拉参议员的建议下，哈定和休斯决定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此事。于是，1921 年 11 月 12 日——此前一天，阵亡的无名英雄刚刚在阿林顿国家公墓下葬——与会代表聚集在了华盛顿。

会议伊始，哈定总统就热烈地表达了欢迎情绪。随后，正如他所表达过的那样，他实施了将困难的问题留给那些"最有才能的智者"去解决的政策，让休斯国务卿和他的副手们去进行实际的谈判工作。在这次事件中，他的"不插手"政策实施得非常不错。休斯不仅拥有睿智的头脑，对这件处于危险状态之中的复杂事情掌握得非常清楚，并且制定了一个明确的计划。哈定总统刚刚走出大陆会议纪念堂，会议主席休斯就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刚开始发言的时候，别人只不过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欢迎致词——但围坐在长形会议桌旁的所有代表们马上惊讶地发现，休斯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而详细的计划：实行一个长达十年的海军假期，在这段时间里，不允许建造任何大型军舰，而所有已经成型的或是正在谋划中的大型军舰建造计划也必须放弃；三个国家都要拆毁已经建造好的或者是正在建

造的船舰，而这些船舰的总重量达到了 200 万吨；三国的海军规模按照5：5：3的比例分配：美国海军和英国海军保持同样的数量，而日本只能拥有两者规模的 3/5。

会场一片寂静。“如果接受这个计划的话，”休斯国务卿总结说，“可以减轻满足海军军备要求的负担，可以节省大量的金钱用于文明进程的建设。而这个计划也完全能够满足规模适度的国家防御要求，在海军休假的十年里，所有国家都可以有足够的机会去考虑本国未来的道路。即将停止的，是对进攻性海军战争的准备工作。”

这个直接而明确的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海军假期的计划，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向大批的记者用充满喜悦之情的欢呼声表达了他的热情。当休斯结束发言时，所有的代表们都发出了长久的掌声。而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媒体也随之发出了掌声。休斯这个大胆而有效的计划激起了人们丰富的想像力，因此这个会议获得成功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经过三个月的谈判，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代表们签订了一份条约，基本上遵从了休斯计划的总体大纲；三国同时与法国一起，同意互相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小岛上的占有权，并且通过调和性的谈判解决彼此间的不一致；三国为日本从山东和西伯利亚撤退铺好了道路；同意尊重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条约立刻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太平洋地区各国之间产生摩擦的直接原因消除了；虽然愤世嫉俗者可能会指出，巡洋舰和潜水艇之间的竞争几乎没有多少减弱，而无论如何战舰已经陈旧不堪，但这份《海军条约》最起码正如休斯国务卿已经预言的那样，不仅减轻了竞争的负担和压力，并且还建立了一个意义深刻的先例：人们公认一个国家的军备与国际利益有关，并且必须服从于国际条约。

此后，从外界来看，沃伦·哈定各方面似乎都进展得不错。他个人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他对商业的友善态度吻合了这个国家的保守情绪；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两三个银行家或实业家聚在一起，他的财政部长就会被称为“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来最伟大的财政部长”；他的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在贸易方面的帮助与他曾经给予比利时人的帮助一样成效卓著；连那些气馁的理想主义者都不得不承认华盛顿会议是一个伟大成就。虽然也有传闻说，政府的某些部门里存在着贪污受贿、浪费行为以及管理不善，而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不得不带着耻辱离

职，更有人批评国会将油田出租给了多赫尼（Doheny）和辛克莱（Sinclair）两位先生，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关注。当哈定在1923年夏初离开华盛顿前往阿拉斯加访问时，几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哈定政府已经出现了根本问题。哈定在返回的路上病倒了，病因似乎是尸碱中毒，而当他抵达旧金山时，病情已经演变成了肺炎，所有人都怀着极度的关心密切注意着每天报纸上的头版头条。而正当危险似乎已经就要过去的时候，他却于1923年8月2日突然去世了——医生们认为死亡原因是中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深切而真诚的悲痛中。

总统的遗体被放上专列，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华盛顿。在整个返程的路上，成千上万的大人和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等候火车从身旁经过；在西部山区，牛仔们脱下帽子肃立马旁；在城市，拥挤的哀悼者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以致列车不得不减慢速度，结果比预定时间晚了好几个小时才抵达华盛顿。《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这么写道："这个场景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对死者最充满爱戴、尊重和崇敬之情的例证。"沃伦·哈定的遗体首先被庄重地安置在华盛顿，随后被运回马里恩安葬，他的继任者宣布为总统哀悼一天，降半旗致哀，所有的生意场所歇业，整个国家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哀悼和纪念仪式，而所有的大楼都披上了黑色的帷幕。

那天，无数发言者表达着真诚的哀悼之情；人们普遍认为，一位鞠躬尽瘁的伟人在为国家服务的征途上像一位烈士那样逝去了。逝去的总统被称为"如巨石般坚定的伟人"；据说"他的视野总是来自于精神层面"；而在纽约的圣约翰大教堂，曼宁（Manning）主教则在纪念仪式上哭泣着发言，表达着他对那位逝去英雄的爱戴："如果我能够在他的纪念碑上写一句话，那就是'他教给我们兄弟之情的力量'。这是人们所能教导我们的最伟大的课程。它是基督教的精神，只要拥有兄弟情谊和仁慈善良的精神，我们就能够解决所有面临的问题……让上帝永远赐予如同我们正在哀悼的这位伟人一样忠诚、睿智而拥有崇高精神的领袖吧！"

但是看起来，有些问题——最起码对一位美国总统来说——却是仅靠兄弟情谊和仁慈善良的精神所不能解决的。你一直像兄弟般亲切善良地对待某些人，可是现在他们却让你的政府陷入了贪污受贿的泥潭，你知道这样的丑闻不可能长时间隐瞒下去，你感觉到你毕生的事业都被拖进了耻辱的深渊。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能够做些什么呢？这就是导致沃伦·哈定总统死亡的问题。

虽然一直有传言说总统是服毒自杀，但是直到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出版了主要以哈定政府为原型的小说《狂欢》之后，人们才广泛接受了这一说法。加斯顿·B.米恩斯(Gaston B. Means)是司法部的一位侦探，也是以多尔蒂为核心的俄亥俄帮的成员之一，他在《哈定总统的奇怪之死》中再清楚不过地暗示说，总统是被他的妻子毒死的，而索亚医生则默许了事情的发生。按照米恩斯的说法，谋杀有两个动机：一方面，哈定夫人发现了南·布里顿及其私生女的事情，因此非常痛苦而嫉妒，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另一方面，她太了解哈定那帮牌朋酒友的诡计了，也很清楚那些人对哈定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她认为，只有死亡才能把哈定从遭人漫骂诽谤的命运中解救出来。自杀理论和米恩斯的故事听上去都很有可能。据说，总统在乘船从阿拉斯加返回时因为吃了螃蟹肉而造成尸碱中毒，但是轮船厨房间里的供货单上却根本找不到螃蟹的影子，而且参加总统宴会的其他客人没有一个出现问题；不仅如此，致命性的"中风"发生的时候，总统的肺炎已经即将痊愈，在那个时候，很明显只有哈定夫人独自陪伴在总统身旁；而医生们没有解剖尸体就给出了结论，这最多也只能算是个人意见吧。然而，要人们接受这种情节曲折的悲剧性解释并承认哈定总统是由于身处困境而成为了受害者，并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他对发生在自己政府里的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在阿拉斯加之行中，他很明显处于一种极度恐惧的状态；威廉·艾伦·怀特描述说："他向胡佛部长和他身边更值得信任的记者不停地询问，如果总统的朋友们背叛了他，他应该怎么做。"不管是什么夺去了他的性命——毒药或者是心力衰竭——做到这一点都很容易，因为他本人已经失去了求生的欲望。

当然，当时的整个国家都根本不会想到这一切。他们的朋友兼总统去世了，他们哀悼着他的去世，当哈定纪念协会计划建造一座纪念哈定总统的伟大纪念碑时，他们都欣然同意。而真相，是在事情过后，才一点一点被发掘出来的。

## 三

为国献身的总统先生刚刚入土不久，参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就开始挖掘关于蒂波特山和埃尔克山的海军石油保留地出租情况的特殊事实。随

后，这个也许是哈定政府历史上最为严重且影响最为深远的丑闻被一点一点地泄漏出来。这起丑闻最终被人们所接受的事实，可以用如下的描述进行简单概括：

从 1909 年开始，三块含有石油的政府土地就被依法保留，以备美国海军将来的可能之需——在情况紧急时如果出现石油短缺，这项政策可以当作某种形式的保险措施。这三块保留地分别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山的一号海军保留地，加利福尼亚州博伟的二号海军保留地，以及位于怀俄明州蒂波特山的三号海军保留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危险倾向：储藏在这三块土地下的石油很可能会被邻近的油井开采走。由于石油可以流动，所以当你钻了一口油井以后，你开采上来的不仅有你自己土地下的石油，也可能有你邻居土地下的石油。对这些特殊财产究竟可能会遭受多大程度的威胁，人们的意见非常不一致。但是当埃尔克山石油保留地旁真的出现喷油井的时候，国会采取行动了。1920 年，国会授予海军部长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让他自由行动以保护石油保留地。在海军部长的面前，很清楚至少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他可以安排沿着保留地的边缘打一些邻井，这样就可以压制石油的排出；第二，他可以将保留地出租给私人经营者，但他们必须要为政府将来的国防需要储存下数量合适的石油——或者是燃油。丹尼尔斯(Daniels)部长本人倾向于第一个方案。

但是，艾伯特 · B. 福尔成为了哈定政府的内政部长，而他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1921 年——也就是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前夕——海军部的某些高层人员对与日本之间可能出现的问题感到非常紧张，并且宣布，海军必须立即建立并充满燃油储藏库，以备海军在珍珠港以及其他战略要地使用。这个想法正好与福尔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是作为大石油利益者们的同盟进入政府的，也是一个没有幻想的政客，他如今发现了一个为自己集团牟取利益的好机会。他准备把所有石油保留地全部出租给私人经营者，并用政府石油来满足海军部的需要，而这些政府石油需要由这些私人经营者们提供给政府以购买燃油箱并且填充满燃油箱。固然，海军部长一个人就有权力出租这些石油保留地，而福尔并不是海军部长；但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哈定总统上台不到三个月就签署了行政命令，把对海军石油保留地的监管权从海军部长那里转移给了内政部长。1922 年 4 月 7 日，福尔在没有

竞标者的情况下把位于蒂波特山的三号海军保留地秘密出租给了哈里·F.辛克莱(Harry F. Sinclair)的马默斯石油公司。1922年11月11日,他又在没有竞标者的情况下把位于埃尔克山的一号海军保留地秘密出租给了爱德华·F.多赫尼(Edward F. Doheny)的泛美石油公司。有人认为,如果允许合同生效的话,这些出租对政府来说是公平的,而承租人也不会得到非法利益。还有人认为,由于出租事件是出于军事安排而有必要保守秘密,因此有充分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竞标者,而为什么公众对此事也一无所知。可是后来人们才发现,福尔不仅收受了辛克莱价值约260 000美元的自由债券,还从多赫尼那里"借来"了既没有利息也没有保证金的100 000美元现金。

接下来的几年里,参议院对此案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诉讼,而罪犯也受到多次审讯,最后多赫尼租赁案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因为它是"非法而具有欺诈性的";辛克莱租赁案也被宣布无效;福尔部长因为收受多赫尼的贿赂被判入狱一年;海军部长邓比(Denby)则由于恭顺地接受了将石油保留地监管权转移给福尔的决定而受到了公众的批评,被迫下台。但荒谬的是,多赫尼和辛克莱两人都被宣布无罪。不过,辛克莱还是因为双重罪名于1929年入狱:首先,由于他拒绝回答公共土地委员会的问题,他犯了藐视参议院罪;其次,由于在第一次受审期间雇用伯恩斯侦探对陪审团员进行跟踪,他犯了藐视法庭罪。(某个陪审员宣称,一个男人走过来对他建议说,如果他正确投票的话,他就可以得到一辆"像这个街区一样长的"汽车。)

以上就是石油出租交易事件的基本事实。但是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小部分。1924年初,参议院委员会首次公布了事件的重要情况,随后柯立芝总统任命精明能干的欧文·罗伯茨(Owen Roberts)先生和只起装饰作用的前参议员阿特利·波莫雷内(Atlee Pomerene)作为两党共同的公诉人,代表政府可以采取任何需要的法律行动。不久,罗伯茨和波莫雷内就发现,辛克莱交给福尔的债券来自于一个名叫大陆石油公司的加拿大公司,而这个公司的名字从来没人听说过。随着事件的逐步曝光,人们发现,这个公司的历史不仅非常耸人听闻,而且从商业道德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个案。以下就是事情的经过:

1921年11月17日——此时距福尔与辛克莱签订合同还有几个月——纽约范德比尔克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有几个人正在召开商务会议,他

们分别是：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麦克西亚油田的老板 E. A. 汉弗莱斯(E. A. Humphreys)上校；中西石油公司的哈里·M. 布莱克默(Harry M. Blackmer)；普雷里石油公司的詹姆斯·E. 欧尼尔(James E. O'Neil)；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罗伯特·W. 斯图尔特(Robert W. Stewart)上校；辛克莱联合石油公司的老板哈里·F. 辛克莱。在这次会议上，汉弗莱斯上校同意将自己油田出产的 33 333 333 桶石油以每桶 1.5 美元的价格出售。可是他发现，直接的买主并不是在场的那些石油大老板，而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刚刚成立的公司，即大陆石油公司，而辛克莱和欧尼尔代表这家神秘的大陆石油公司对出售合同进行了担保。接下来大陆石油公司立即转手将这些石油卖给了辛克莱和欧尼尔的公司，不过每桶的价格已经不是 1.5 美元，而是 1.75 美元——这样每桶就有 25 美分的利润转移到了大陆石油公司的保险箱，否则的话，这些利润就会前往在场的其他公司。可以计算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利润总额将会超过 800 万美元。

事实上，这笔利润从来没有积累到这么多。因为大约在一年之后，参议院突然不合时宜地变得非常好奇而喜欢调查起来，因此，有人认为最好结束所有与大陆石油公司有关的事情，并且销毁所有记录。但就在这些事情完成之前，范德比尔克旅馆里签订的那份合同所带来的收益已经超过了 300 万美元。

随着这数百万美元收益的滚入，大陆石油公司的老板，一位名叫奥斯勒(Osler)的加拿大著名律师，用这笔钱购买了自由债券，并把这些债券(在扣除了给自己的 2%的份额之后)转交给了当时在范德比尔克旅馆参加会议的四位绅士。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给哈里·M. 布莱克默，大约是 763 000 美元。

给詹姆斯·E. 欧尼尔，大约是 800 000 美元。

给罗伯特·W. 斯图尔特上校，大约是 759 000 美元。

给哈里·F. 辛克莱，大约是 757 000 美元。

那么，这些绅士们在收到债券后，是否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各自公司的董事们和股东们了呢？他们又是否将这些债券交给了公司呢？没有。

首先来看一下布莱克默。事情发生很久以后，他的律师在证词中说，布莱克默将债券一直放在纽约公正信托公司的保险箱里，直到 1928 年的时候债券还在那里。

欧尼尔虽然把债券交给了公司，但是时间却已经是1925年的5月了。

斯图尔特将他的债券交给了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雇员，让这位雇员把债券放在公司的保险库托管，但是这件事情斯图尔特除了告诉公司的一位处理法律事务的职员之外，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同事。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也从来没有告诉公司的董事们，直到1928年他移交这些债券的时候才告诉他们，而当初那份托管合同只是草草地用铅笔写成。

至于辛克莱，他在证词中说，由于1928年之前他认为公司的董事们和职员们不值得信任，所以一直把债券放在自己家中的保险库里。当然，他并没有能够将这些债券保存很长时间，因为那样的话，大陆石油公司的伟大历史就永远都不会大白于天下了。这笔债券中的很大一笔（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被他移交给了福尔；另外一大笔价值185 000美元的债券，则被他"借给"了（连同一份价值75 000美元的礼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而后来他只收回了100 000美元。这笔款项实际上是"借给"威尔·H.海斯的，而这位海斯先生曾经在哈定和考克斯1920年的竞选运动中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后来被哈定总统任命为邮政管理局长，而在辞职后成为了电影行业道德规范的监察者，就是在这段他身为电影行业独裁者的时期，他收到了辛克莱的债券。由于他对自己的工作尽职尽责，他努力想把1920年总统竞选活动中共和党欠下的债务还清，为了完成这个事业，他试图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来使用辛克莱的"借款"。他和助手们前去拜访了一批有可能捐助这个事业的富人并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愿意捐款去弥补竞选运动中的债务赤字，他们就可以得到同等数额的辛克莱债券，但是却并没有说明这些债券他们能保存多长时间——起码在海斯提供给参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的证词中并没有提及。而这种隐藏大量辛克莱债券的方法则被海斯先生委婉地称为"为了筹集资金弥补赤字而使用债券"。

## 四

上述的政府行为，以及代表股东利益的公司执行者如何对待自己信用责任的行为，都可以让我们得到一点小小的教训，不过这一点就讲到此为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石油丑闻中轻松的一面，之所以说轻松，这是对那些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牵涉到此案中的人来说的。在蒙大拿州参议员沃尔

什(Walsh)毫不留情的交互审问中,那些并不情愿的证人们身上体现出了一丝残酷的幽默,而如果没有这些证人足智多谋的表现,这件事情的真相可能永远也不会公之于众。在很多事实中——例如调查中所揭露的某些事情发生的场景,有关当事人在海外的逗留,以及受到时间欺骗的记忆——都不乏某些令人愉悦的成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持续了很长时间,现在我们就来重新回顾这次调查工作的记录,并对其中的某些部分逐项逐项地进行一番研究。

**第一项　谁把钱借给了福尔**

1923 年秋天——哈定刚刚令人遗憾地辞世不久——沃尔什参议员的委员会听说福尔部长突然发财了。就在不久以前,福尔的经济状况还非常窘迫,他甚至连自己的地方税款都有好几年没有缴纳了。但是如今一切都改变了。福尔先生竟然在自己新墨西哥的农场附近又购买了一块土地,而这次购买行动花掉了他很多张百元大钞。沃尔什的委员会像猎犬一样立即做出了反应:对调查者来说,百元大钞就像拒绝作证或者拒绝放弃豁免权那样令人激动。福尔是从谁那里收到这些钱的呢?福尔给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断然否认他曾经从多赫尼或辛克莱那里收受过任何金钱,并且用充满无辜而受伤了的语气解释说,是爱德华·B. 麦克莱恩(Edward B. McLean)借给了他 100 000 美元,而这位麦克莱恩先生是一位报业的百万富翁,经常慷慨地对哈定和助手提供资助。

麦克莱恩此时正在棕榈海滩,因此无法来到华盛顿对此事给出证词。也许有人希望委员会让事情就此了结,但是他们没有,反而传讯了麦克莱恩——而看上去他非常不愿意受到讯问。他和朋友们通过大量的密码电报与在华盛顿的助手们通信,用如下的方式讨论事态的进展:

Haxpw sent over buy bonka and householder bonka sultry tkvouep prozoics sepic bepelt goal hocusing this pouted proponent

最后,沃尔什参议员非常礼貌地前往棕榈海滩,亲自向麦克莱恩取证。不错,麦克莱恩确实曾经借过一笔款项给福尔,但并不是现金而是三张支票。福尔部长不久就归还了支票;他们甚至都没有经过银行,而关于这笔交易也没有任何记录。

很明显,对福尔的暴富或者是使用大笔数额的现金,这次短暂而不同寻常的交易起不到什么作用。事情还需要其他解释。因此——1924 年 1

月 24 日—— 一号海军石油保留地的承租人爱德华·F. 多赫尼出庭作证了。他曾经借给福尔 100 000 美元，这笔钱是放在一个背包里从纽约带到华盛顿的。但是这笔借款与租用石油保留地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一位老朋友出于关心而做出的好心举动。这位年长的石油巨头为他与福尔之间的长年友谊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心动的画面。用现金的方式借出100 000美元是否数额太过巨大了？当然不，对他来说，这仅仅是“九牛一毛”。这笔借款有借据为证吗？当然有；多赫尼会把借据找出来的。后来他确实给出了借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借据的一部分，因为借据上的签名已经不见了。他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害怕自己死后某些冷酷的遗嘱执行人会强迫福尔立刻还钱，多赫尼把借据一撕两半，并把带有签名的那一半交给多赫尼夫人保管——可是她想不起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这个解释非常完美——虽然数年以后，最高法院对此似乎产生了怀疑。

**第二项　六头或八头奶牛**

就在慷慨的多赫尼给出证词之前，有人向多家报纸提供了最好的封面故事，这个人就是阿奇·罗斯福(Archie Roosevelt)，他的父亲是伟大的老西奥多·罗斯福，而他的哥哥则是曾任哈定政府海军部副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他来到沃尔什的委员会主动要求提供证词。阿奇·罗斯福是辛克莱麾下一家公司的职员，他的哥哥要求他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讲出来，而他所知道的信息都是从辛克莱的机要秘书 G. D. 沃尔伯格(G. D. Wahlberg)那里得来的。沃尔伯格告诉阿奇，辛克莱曾经向福尔农场的经理支付过 68 000 美元，由于沃尔什参议员正在无情而勤勉地到处搜索信息，这件事很明显让沃尔伯格感觉到非常不安。而且，辛克莱已经乘船前往欧洲——并且是悄无声息地离开的，因为他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在乘客名单内。于是委员会传召了沃尔伯格，而当这位绅士来到委员会的时候，他比在告诉阿奇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还要紧张不安，但是他对以上所讲的事情给出了很动听的解释。罗斯福肯定是误解了他的话，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关于 68 000 美元的事情。他肯定说的是，辛克莱曾经向福尔的农场送过“六头或八头奶牛”。(经过某种方式的解释之后，这似乎是真的：辛克莱确实给福尔送去过牲畜，但不是“六头或八头奶牛”，而是一匹马，六头肥猪，一头公牛和六头小母牛。)你看出来这种误解是怎么产生的了吧？因为“六十八千”和“六头或八头奶牛”的读音在英语里是多么的

相似啊！

但是，公共土地委员会好像并没有看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他们全体都竖起了眉毛表示怀疑。因此，不久之后，沃尔伯格又一次受到了传讯。他这次的解释更加令人愉悦。他仔细地回想了一下，自己所说的话之所以会被听成好像是在谈论福尔农场的经理收到 68 000 美元，那自己说的肯定是“马的场”经理收到了 68 000 美元——而这个“马的场”经理，他指的是为辛克莱那著名的兰科克斯马厩工作的驯马师。这笔 68 000 美元的款项是驯马师希尔德雷思（Hildreth）的工资，以及包括赛马泽夫在内的辛克莱的赛马所赢奖金的分红。

不过“马的场”这个词似乎不是那么符合语法。委员会委员们竖起的眉毛并没有落下来。

### 第三项　斯图尔特上校和其他人的保持沉默

参议院的委员会在热切地追寻着线索。但是自此以后，那些能够提供宝贵线索的绅士们却显得非常不愿意发言，而当他们真正发言的时候，他们的记忆力似乎又受到了时间的欺骗而表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福尔部长的医生说福尔身体“非常不好”，因此不应该被强迫提供证词。当福尔最终作证的时候，他拒绝回答那些很可能“羞辱”他的问题。而辛克莱，正如阿奇·罗斯福曾经告诉委员会的那样，已经前往欧洲了；当他回到美国后，他同样拒绝回答问题；正是这个拒绝行为导致他被判藐视法庭罪。随后他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指控，被指犯有欺骗政府罪，而在他被宣判无罪后，他终于开口了；他承认说他曾经将债券转交给福尔，但是坚持说这笔钱是支付给福尔的农场及牲畜养殖方面收益的 1/3 利息。









布莱克默前往了欧洲，并且无法劝诱他回来。欧尼尔也去欧洲了，也无法劝诱他回来。大陆石油公司的奥斯勒正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而斯图尔特，则是在小约翰·D. 洛克菲勒的坚持劝诱下才从古巴回来。当 1928 年年初他终于站在委员会面前的时候，他给出了如下的证词：“我个人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债券。我从这次交易中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好处。”不到两个月以后，由于辛克莱的被判无罪在某种程度上使紧张状态得到了缓和，他才承认说，他确实收到了超过 75 万美元的债券，但事情过去好几年他都没有向公司的董事们交代。

### 第四项　海斯先生的证词

1924年，电影产业道德规范的仲裁者威尔·H.海斯先生受到了委员会的传召。委员会问他辛克莱向共和党捐助了多少钱，他的回答是7.5万美元。

1928年，当大陆石油公司债券的历史变得比以前更加清楚之后，海斯先生又一次受到了委员会的传召。这次他告诉委员会说，辛克莱除了送来礼物之外，还送来了185 000美元的"借款"。那么为什么他之前不说出这些呢？他说因为"没有人问过他关于任何债券的事情"。

### 第五项　梅隆先生的沉默不语

海斯先生在给出第二次证词之后不久，查尔斯·普拉特公司的出纳受到了委员会的传召，要求他对价值50 000美元的辛克莱—大陆石油公司自由债券作证。这笔债券是海斯留给已经去世的约翰·T.普拉特(John T. Pratt)，以便让他按照自己那别具心裁的计划，将同样价值的债券交给共和党委员会的。这名出纳出示了一张卡片，在上面普拉特先生注明了对债券的分配情况以及对捐款的支付情况。在这张卡片的一角，有一个小小的用铅笔标注的记号，这样写着：

50 000美元

安迪(Andy)　威克斯(Weeks)

杜邦(DuPont)

巴特勒(Butler)

沃尔什参议员检查了卡片。

**沃尔什参议员**：我可以辨认出"威克斯"、"杜邦"，我也可以辨认出"巴特勒"，但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名字？看上去好像安迪。

**出纳**(用放大镜在看)：这是威克斯、杜邦、巴特勒，另外一个名字肯定是坎迪(Candy)……是的，有可能是安迪。

**奈(Nye)参议员**：谁是安迪？

**出纳**：我不知道谁是安迪。我想不出来谁叫安迪。

这句话引起了房间中旁听席上的一阵轩然大波。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安迪指的是谁。沃尔什参议员马上派人送了一张纸条给财政部长安德鲁·M.梅隆，问他能否解释一下这个标记的情况。梅隆先生立刻态度

和善地做出了解释。

梅隆先生解释说，1923 年晚些时候——也就是刚刚开始对蒂波特山一案进行调查的时候——海斯给他送了一些债券。“海斯先生过了一段时间打电话给我，说这笔债券是他从辛克莱那里得到的，他建议我保留这笔债券，并且用同样数目的金钱向基金会捐款。我拒绝了他的提议。”

梅隆先生确实按照他自己说的那样做了。他把债券送还了回去，并且捐款数额是50 000美元。他补充说，他“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正在进行的蒂波特山出租案的事情”。

也许，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个供词是在 1928 年给出的。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参议院委员会，以及柯立芝总统任命的公诉人罗伯茨和波莫雷内两位先生，都一直在努力工作试图查出大陆石油公司债券的去向情况，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这位财政部长根本一直都知道 1923 年他曾经收到过的那笔债券来自于辛克莱，可是他却什么都没有说，直到这张标有铅笔印记“安迪”(或者也可能是坎迪)的小卡片出现在公众面前。也许这只是一件小事，可是这件事情却很清楚地向人们展示出：在自己的证词会给党派筹集钱款的方法带来耻辱的时候，这位财政部长的表现堪称一位沉默不语的楷模。

这样，轰动一时的关于蒂波特山、埃尔克山以及大陆石油公司的故事就讲完了。哈定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转让了海军石油保留地的监管权，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开始，到了 1921 年的 6 月，这件事情就传播开了。这个时候，哈定总统刚刚入主白宫，斯蒂尔曼的离婚案即将开始，登普西正准备和卡庞蒂比赛，年轻的查尔斯·林德伯格还没有开始他的第一次飞行。而当辛克莱和斯图尔特讲完了他们的故事，海斯修正了自己的供词，梅隆财政部长不再沉默不语时，林德伯格已经飞到了欧洲，赫伯特·胡佛正在召集代表准备参加共和党的竞选；当哈里·辛克莱结束自己不受欢迎的任期成为了华盛顿监狱里一名药剂师的时候，大牛市已经走向了毁灭，战后十年正在走向尾声。福尔部长作为哈定政府国家资源保护人的任期虽然短暂，但是所引起的后果却是悲惨、漫长而发人深省的。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要补充一下，那就是石油：当时海军部门的爱国者们是如此迫切地需要补充石油资源以便太平洋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立刻派上用场，可引起整个事件的石油如今究竟情况怎么样了呢？人们对那批债券以及百元大钞一直都充满了极高的热情，可是似乎每一个人都

忘记了那批石油。出租给辛克莱和多赫尼的油田里已经停止生产石油;但是你可以回想起当初我们说过,在 1921 年的时候,人们一直在热烈讨论石油有可能会流向隔壁油井的危险。确实,临近的油井一直在不停地出产石油,而据说,这些油井中出产的石油中有一部分——很可能包括石油保留地的石油——竟然是被出售给了日本政府!



## 五

这起石油案件属于哈定政府丑闻中的高贵案例,但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粗鄙下流、臭气熏天的丑闻案件。就让我们暂时捏住鼻子,简单地看看其中几个吧。

譬如,在查尔斯·R. 福布斯(Charles R. Forbes)领导下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就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浪费和腐败行为。这位福布斯先生是哈定在访问夏威夷的时候结交的,他简直就是一名赤裸裸的抢夺财富的海盗(同时也曾是一名军队逃兵)。哈定对福布斯非常信任,于是在 1921 年的时候任命他为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让他代表政府负责那些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肢体致残的战争英雄们的事务,每个人都认为大家应该为这些战争英雄留下赞赏的泪水。福布斯在任一共不到两年,但是就在这段时间内,据估计他所领导的退伍军人管理局竟然以极度过分的形式花费了两亿多美元。尤其臭名昭著的是福布斯的公费旅行行为,他走遍了全国的所有地方,名义上是选择医院地址,但实际上这些医院的地址早就已经定好了。他的管理局在签订建造退伍军人医院的承包合同时,几乎对价格根本不加考虑;例如,在北安普顿的退伍军人医院被承包给一家农场建造,而这家农场的要价是大约 30 000 美元,远远超出了底价。福布斯被指控说他与某些承包商之间存在某种契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整个工程款 1/3 的利益进入福布斯的腰包。而在购买医院设备方面福布斯的行为更是荒谬。举例说,退伍军人管理局购买了价值 70 000 美元的地板蜡和地板清洗剂,而据说,所购买的这些东西数量太多,足足可以用上 100 年——而这批清洗剂是以每加仑 98 美分的价格买进的,可是根据事后专家们的估算,除去清洗剂中水的分量,这批清洗剂的价值不会超过每加仑 4 美分。大批的剩余物资也被轻易地出售,而对价格也是根本不加任何考虑:84 000 条全新

的床单以每条 26 或 27 美分的价格卖出，可是每条床单的实际价值却是 1.37 美元，而就在当时，退伍军人管理局还在以每条 1.03 美元的价格又买进了 25 000 条新床单。布鲁斯·布利文(Bruce Bliven)报告说："刚刚买进来的床单从这头进入(马里兰州的佩里维尔)仓库，而与此同时，刚刚卖出去的床单却从那一头离开仓库。而其中有些床单由于失误根本就直接从这头进入仓库接着又从那头离开了仓库。"75 000 多条毛巾以每条 3.375 美分的价格卖出，而实际上每条却价值 19 美分。这么一点点事实就已经足够说明福布斯在花钱方面是多么不负责任地慷慨，而这些浪费掉的钱本来都是为了那些共和国的保卫者们服务的。1926 年，福布斯由于欺诈罪被迫前往利文沃斯监狱。

而在外侨管理处的办公室内，同样猖獗地进行着贪污受贿行为。加斯顿·B. 米恩斯要求，那些来到华盛顿要求偿还在战争期间被德国接管的财产的律师们，都要听从建议前往波士顿一位名叫瑟斯顿(Thurston)的律师处进行咨询。只有在这位瑟斯顿向他们收取数额不菲的咨询费之后，偿还申请才能得到批准，而这笔费用则会在高层之间进行分配。美国金属公司的案件足可以显示出，这样的交易行为在当时是完全被允许的。

美国金属公司是一家国际公司，其中 49%的股份因为属于德国而由外侨管理处在战争期间接管，并以 6 000 000 美元的价格出售。1921 年，一个名叫理查德·默顿(Richard Merton)的人来到外侨管理处办公室，宣称这 49%的股份不是属于德国，而是属于瑞士，因此应该把这些股票还给他所代表的瑞士老板。虽然默顿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是他却付出了价值 441 000 美元的自由债券，而获益人则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约翰·T. 金(John T. King)，因为他将默顿介绍给了看门人 T. W. 米勒(T. W. Miller)上校和司法部长多尔蒂的得力助手杰斯·史密斯(Jess Smith)。在对米勒的审讯中得知，这笔价值 441 000 美元的债券中起码有 200 000 美元的债券被交给了杰斯·史密斯，因为"由于他与华盛顿之间的熟悉关系，可以加速偿还事宜的进程"；而司法部长的兄弟马尔·S. 多尔蒂(Mal S. Daugherty)则将至少价值 40 000 美元的默顿自由债券出售，并且不久就将 49 165 美元存到了司法部长的账户；米勒上校也得到了一笔钱。1927 年，米勒由于犯有欺骗政府罪，被判入狱一年半。马尔·S. 多尔蒂也受到了审讯，但是却被无罪释放，因为两个陪审团无法统一意见，判定他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于是取消了对他的指控——但就在

此前的 1925 年，这位政府的前任首席法律官员却前往他兄弟位于俄亥俄州的华盛顿法院中部国家银行，从那里取出了涉及他们兄弟两人的分类账账页并将之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涉及另外一个名叫“杰斯·史密斯”的人的账页。

就是在美国金属公司案件之前的这次著名的陪审团调查过程中，哈定政府的司法部长写下了我们这一章开头的那一段著名陈述。在对多尔蒂的审讯中，他没有为自己出庭作证，他的律师马克斯·斯图尔(Max Steuer)后来用另一段同样著名的陈述解释了这件事情：

“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有任何和这起案件有关的事情迫使他无法出庭为自己作证。……他担心……巴克纳(Buckner)先生会反复盘问他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情，而那些事情虽然不会将多尔蒂先生牵涉其中，但多尔蒂先生却知道那些事情他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如果陪审团知道了烧毁那些账页的真正原因，那么他们不仅不会谴责多尔蒂先生，反而会对他进行表扬。可是多尔蒂先生选择了保持沉默。”

还有比这番讲话更为直接的暗示吗？这分明是在说，哈定政府的司法部长之所以不能说出真相，是因为担心让去世的哈定总统名誉受损。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将多尔蒂的沉默看成是忠诚的沉默，也可以看成是他想要为死去的哈定总统遮掩。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哈定政府都被笼罩上了一层奇怪的浓雾。

而 1930 年，加斯顿·B. 米恩斯则大胆地提出了一项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指控。他说，身为俄亥俄帮的党羽之一，他过去经常在纽约的一家旅馆内租用两个相邻的房间，以便向酿私酒者收取因违反禁酒法令而支付的贿赂款项，因为这些人愿意付出这笔保护费；他在其中一个房间内的桌子上放上一个很大的金鱼缸，而自己则在另外一个房间内通过门缝偷窥这个房间的情况。每一个酿私酒者都会在他指定的时间来到旅馆的这个房间，将一沓沓的千元大钞或 500 元大钞留在金鱼缸里；而每个酿私酒者一离开，米恩斯就会走进这个房间，清点这些钞票并进行核对。就是用这种方式，他收取了总共 700 万美元的赃款，然后他将这笔钱转交给杰斯·史密斯，因为他是俄亥俄帮的总收款员，而这位总收款员则在华盛顿与司法部长多尔蒂共享一套公寓。

米恩斯还进一步声称说，还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赃款被藏在——每次大概有数万美元—— 一个金属盒子里，而这个盒子被埋在了自己位于华

盛顿第 16 大街 903 号的一套房子的后院里；他描述说，这套房子包括里面的院子都有钢丝篱笆保护，配备有密码识别系统，同时还有另外一些可以让孩子们高高兴兴玩海盗游戏的秘密装备。

1923 年，在和哈里·多尔蒂共享的公寓里，杰斯·史密斯自杀了——至少官方的定论是这么说的。米恩斯宣称说，就在这场悲剧发生之前，俄亥俄帮发现史密斯手里保存有一份所有经他手处理的现金记录，而史密斯由于害怕自己的罪行和秘密被发现，曾经半真半假地考虑过要为政府作证指控俄亥俄帮。按照米恩斯的说法，俄亥俄帮因此决定必须要除掉史密斯。虽然史密斯很害怕武器枪支，但是他还是在一次去俄亥俄旅行的时候购买了一支左轮手枪。于是随后的"自杀"就发生了——米恩斯是非常清楚明白地这么表示的，而其他很多人则早就怀疑了——这根本就不是一桩自杀案。

最后，米恩斯还让人们对另一个事实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与俄亥俄帮秘密有关的人都神秘地死亡了。除史密斯之外，还有曾经收受过默顿债券的约翰·T. 金，一个名叫 C. F. 哈特利(C. F. Hately)的司法部职员，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律师 C. F. 克拉默(C. F. Cramer)，代表客户向外侨管理处要求偿还财产的波士顿大律师瑟斯顿，哈定小组的律师 T. B. 弗尔德(T. B. Felder)，哈定总统，哈定总统夫人，以及索亚将军。所有这些人都不在了——而且大多数人都是突然离开的——并且都是在哈定任期的最后几年内。

不管人们对后来这些指控及其隐含意义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那些已经非常确凿的证据还是足以说明，在短短两年零五个月的任期内，哈定政府需要为很多掠夺和流氓行为负责，而这些行为要比联邦政府整个历史上其他任何一届任期内的都多。

## 六

那么，美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这些败露出来的丑闻的呢？他们是否准备义愤填膺地站起来惩罚这些罪犯呢？

1924 年初，当石油丑闻案初次出现在报纸头版上的时候，公众的情绪极为激动，这种强烈的情绪足以迫使邓比和多尔蒂辞职，并迫使新任总统

卡尔文·柯立芝任命一个特殊的顾问组来处理这起石油案件。但是受到媒体和公众最无情、最苛刻的谴责的，不是那些欺骗政府的人，而是那些坚持要把整个事实曝光的人。沃尔什参议员负责对石油丑闻案进行调查，惠勒(Wheeler)参议员负责调查司法部，他们两人都被《纽约论坛报》称为“来自蒙大拿的专事诽谤者”，被《纽约晚邮报》称为“造谣炮手”，而《纽约时报》虽然倾向于民主党，也称呼他们两人为“个性的暗杀者”。在全国上下的报纸上，人们都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来自民主党的中伤者”，“言语恶毒的党派偏见，纯粹的蓄意犯罪，以及喋喋不休的歇斯底里”，而对罪犯的质询则被描述为“言语直白、粗鄙而令人恶心”。

普通读者也对这样的描述怀有同感。大批商人非常严肃地互相告知说，有可能是哪个地方出了岔子，谴责他们不仅是不爱国的表现，还会“让政府蒙羞”；而那些坚持将丑闻调查到底的人们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是一路货色”。国内超级爱国者的代表人物——“美国关键人物协会”的弗雷德·马文(Fred R. Marvin)说道，整个石油丑闻就是“一个巨大国际阴谋”的结果，而这个“国际阴谋”的策划者就是“国际主义者，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呼他们为社会主义者”。在那段时间内，一个每天乘坐地铁从郊区去城区上班的人会观察到，在七点钟的火车上，人们对丑闻案非常愤慨；在八点钟的火车上，人们对丑闻案被揭露出来感到愤慨；而在九点钟的火车上，丑闻案则根本不会被提及。几个月之后，民主党的约翰·W. 戴维斯(John W. Davis)在参与总统竞选活动时利用了哈定的丑闻案，但是大多数人却似乎都认为他选择这样的角度品味太差，因此戴维斯在民意调查中大败。真实的原因在于：对丑闻案的任何无情调查都可能会带来——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对现状的威胁，而现状产生任何微小的变动，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商人阶级或是普通大众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他们曾经投票选举了常态，并且现在他们仍然对此非常信任。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政府不要干涉商业(但是不时地通过有利的关税等手段给予商业某些支持措施除外)，并且不要多嘴多舌。他们不企盼华盛顿的领导有多么大胆或者是多么富有远见，他们对总统的统治才能提出的要求就是：他应该让事情自由发展，为工业和商业提供赚钱的机会，而不是设置“障碍”。他们意识到，他们选择哈定总统本身就已经为他们这个理想的实现打下了不牢靠的基础。哈定有点太过于友好了，他的这种友好热情的个性虽然让他结交了很多朋友，可是这种亲热的关系却为

他不幸地进行了过度的宣传，而这种不幸的宣传效果却很容易会设置他们所不需要的“障碍”。不过他们仍然要坚持基本的原则，整个国家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总统：在对待商业活动方面他既要不多嘴多舌，又要友好亲切；而这样的一个总统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在哈定总统走后留下的那个空缺上，上帝已经安放了一个可以完全体现这种要求的理想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从不多嘴多舌；他永远都不会试图带领国家这艘航船驶向未知的水域；同时，他也足够诚实并且严谨，会阻止一切可能在这艘航船的甲板上发生的不妥事件。因此，每一件事情都已经是人们所需要的模样。为什么还要削弱公众对哈定所在党派的信任呢？而当人们调查过去那些不幸丑闻的时候，不也肯定会削弱公众对哈定继任者的信任吗？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过去的就过去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曝光的丑闻数目越来越多，程度也越来越重，看上去1921～1923年间政府所犯下的“错误”，比那些支持常态的朋友们在大肆攻击沃尔什参议员时所料想到的要严重得多。但是时断时续出现的那些证词却总是令人困惑，人们无法将它们拼凑在一起；普通的公民对那些关于大陆石油公司债券或多尔蒂银行账户的复杂事实总是难以弄清；而稳步前进的时间却使得后来进行的调查好像是在清洗一块非常古老的脏抹布。商业发展良好，柯立芝保持着常态社会的发展并且让人们满意，柯立芝是诚实的；那么有什么必要仍然沉湎于过去呢？对丑闻和专事诽谤者的愤懑之情都让位于一种意义深远而平静的冷漠之情。当大陆石油公司的故事为众人所熟知时，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大股东约翰·D. 洛克菲勒开始向斯图尔特上校开战，试图使他离开公司的管理层；但总体来说，整个商业领域却似乎并没有发现斯图尔特的表现有什么问题。因此，约翰的呼吁就成为了旷野中的呼喊。

不过，过世总统的声誉却在缓慢并且大幅度地下降。位于俄亥俄州马里恩的总统纪念碑，整个国家的人民曾经那么哀痛而慷慨地捐款建造，但是纪念碑的落成仪式却迟迟没有举行。很明显，一位美国总统的纪念碑只有另一位美国总统才能主持落成仪式，可是哈定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似乎都觉得去马里恩举行这个仪式非常不方便。1930年末，在哈定死去七年之久以后，哈定纪念协会的成员们召集在一起，考虑究竟该如何处理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作为哈定总统的大胆而无畏的朋友，哈里·M. 多尔蒂曾经因为知道一些“他永远都不会说出去”的事情而没有出庭为自己作证，

而如今则发表了一次华丽的讲话。他在发言中宣布，美国人民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自由之口或虚假之舌”的欺骗，因此他建议说，纪念碑落成仪式被不确定日期地推迟下去，而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通过。然而后来，这个国家的高层人士们却觉得，不能总是把这件事情搁置在这样一种令人不快的状态，那些友好的共和党人最好还是快点把这件事情了结吧。于是胡佛总统和柯立芝前总统接受了邀请，于 1931 年 6 月参加了纪念碑的落成仪式。不过在整个仪式举行的过程中，很多方面都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毕竟，在 1931 年的时候，对曾经在 1923 年“教给我们兄弟之情的力量”的那位好脾气的总统，是不大容易给予太过赞誉的颂词的。

# 第七章　柯立芝繁荣时代

## 一







当沃伦·哈定去世的时候，商业世界一片繁荣。与此同时，在佛蒙特州一间农家小屋内的老式煤油灯旁，约翰·柯立芝(John Coolidge)上校正在向他的儿子卡尔文传授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的誓词。1921 年那曾经无望而萧条的经济状况，在 1922 年看到了希望并得到了改善，而如今的 1923 年则迎来了经济复苏的勃勃生机。

确实，普通股的价格有理由让人们展现他们的乐观情绪。1923 年 8 月 2 日，也就是哈定去世的那一天，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支付 5 美元的分红)价格是 87，阿音逊公司(分红为 6 美元)价格为 95，纽约中心公司(分红为 7 美元)价格是 97，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分红为 9 美元)价格是 122；而纽约证券交易所一整天的交易量刚刚超过 600 000 股。大牛市虽然还很遥远，但繁荣的浪潮已经蓄势待发了。

统计学家们用各种各样的曲线图来衡量战后十年的经济涨落，就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个吧。你会发现，1920 年的时候，商业活动的曲线达到了一个锯齿状的高峰，到 1920 年底和 1921 年却陡然下降到了谷底，经过 1922 年弯弯曲曲的攀升，1923 年再次达到峰顶，到 1924 年曲线再次开始

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没有1921年那么厉害),而1925年和1926年则再次向上攀升,等到1927年底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短暂而轻微的下降,随后在1929年终于蜿蜒曲折地上升到了繁华的最高点——可是却在1930年和1931年跌进了无底深渊。

如果你把这份曲线图再看一遍的话,你会发现,1923~1929年间基本上都是不规则却相对稳定的平原,而1924年和1927年的两次下降只不过是两个小小的缺口。这块平原代表了将近七年时间的空前繁荣与富足。在这将近七年的时间里,人们也许对政治、宗教和爱情都不再抱有幻想,可是却始终相信在彩虹的尽头,最起码肯定会有美国工业和美国销售业联合创造的金钱效益;在这将近七年的时间里,正如斯图亚特·蔡斯(Stuart Chase)所说的那样,商人成为了"控制我们命运的人",商人将"制定道德标准与行为标准的人,即那些政治家、牧师和哲学家们"都驱逐了出去,并且成为了"美国社会行为规范的最终权威"。在这将近七年的时间里,繁荣号客车一直沿着《大街》不停地前进。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登上这辆客车。农民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拥有这个机会,当然,和他们紧紧靠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奶牛场的工人、水果种植者以及商品蔬菜园的园丁。由于人们发现了维他命的功效,更加充满变化的菜单得到了广泛宣传,同时还发明了很多运输易腐烂食物的更好方法,整个国家的饮食习惯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919~1926年期间,全国牛奶和奶制品的产量增加了1/3,而仅冰淇淋一项就增长了45%。1919~1928年期间,很多家庭都知道了维他命存在于芹菜、菠菜和胡萝卜中,并且已经习惯于一年到头都要消费新鲜蔬菜(当然还有新鲜水果),因此,19个商品蔬菜园的种植面积几乎增长了一倍。但是那些种植小麦、玉米和棉花等传统农作物的农民们却境况不佳。他们的海外市场由于受到其他国家的竞争而萎缩了很多,越来越少的女性身穿棉制品衣服,而在汽车、收音机和电力经济中,农业原材料更是使用得很少。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贫穷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就会购买更多的机器来增加产量,却因此更加无法避免生产过剩这个恶魔的缠身。所有农场价格的指数从1920年的205降低到了1921年的116——"也许是美国农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滑坡",我们这里再一次引用斯图亚特·蔡斯的表达——而到1927年,价格指数虽然回升到了131,但已经失去的大部分领地却再也无法收回。穷苦的农民大声地抱怨,他们和诺里斯(Norris)们、布鲁克哈特(Brookhart)们、

席普斯蒂德(Shipstead)们以及拉福莱特们一起,绝望地争取着联邦政府的帮助,而成千上万的农民则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前往城市。

还有很多其他行业也没有出现在前进的凯旋大军中,例如煤矿业、纺织业、造船业,以及制鞋业和皮革业。整个国家的所有地区在这些行业内都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南方的发展由于棉花种植业而受到阻碍,西北部农业区的发展由于小麦种植者的糟糕情况而受阻,而新英格兰的发展缓慢则归咎于纺织业和制鞋业的瘫痪。尽管如此,繁荣号客车并不缺少乘客,而与待在路边哀号的那些坏运气的人们相比,这些好运气的乘客不仅分量更重,也叫得更响。

## 二

汽车制造商坐在繁荣号客车上的时候,心中尤其充满了自豪。他的好运气到来了。到这个时候,数量众多的公路、维修店以及加油站使得驾车者不再有后顾之忧:他们可以随时出发而不用担心被困在污水坑或者是搁浅,因为他们随时有油可加;他们也不用担心因为火花塞熄火而受阻。现在的汽车制造得十分精密,所以驾车者几乎都不需要知道火花塞是什么模样;而数千辆汽车的车主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要看看发动机是什么模样。如今轿车大量生产,而那些时髦的新款也非常养眼。在战后十年初期,大多数的汽车颜色都非常阴暗,但是随着硝基抛光技术的发明,汽车的颜色突然之间(1925 年和 1926 年)就像彩虹一般绚烂多彩,从佛罗伦萨式的奶油色到凡尔赛式的紫罗兰色,各种颜色应有尽有。车身降低了,设计师们在探寻线条之间的新和谐,低压轮胎出现了,最后,甚至连亨利·福特也向流行时尚屈服了。









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如果曾经有某辆汽车占据过他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的话,那么这辆车肯定是 1927 年 12 月露面的福特公司 A 型车。从前一个春天开始,福特就已经关闭了他的巨型生产厂,将所有 T 型车以及数千台生产 T 型车的机器全部报废,并宣布说,他将要向市场上投放一款最新的车型,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普通美国人的心里埋下了极大的悬念。很明显,他必须得做出巨大的改变。在庞大的低价车市场上,T 型车一直比不过雪佛兰汽车,因为这时候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丑陋的外形和最高只能

达到 65 或 75 公里的时速；当他们驾驶 T 型车爬坡的时候，车子不仅速度慢、噪音大，而且驾车者还不得不用左脚紧紧地踩着低速踏板，而就在这时，蓝色的雪佛兰汽车却在他们身旁呼啸而过。所有这一切都令他们无法容忍。不过同样明显的是，亨利·福特是这个时代的机械天才。他这次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奇迹呢？

各种各样的传言挤满了大小报纸的头版。人们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以致布鲁克林的一位汽车经销商"从他兄弟亨利的电报里得知了某些关于新汽车的消息"这样的新闻都能成为头版头条。当密西根州布莱顿的《阿耳弋斯周刊》的编辑确实拍到了一辆新福特汽车在外试驾的镜头后，所有的读者都扑向了报纸上的图片，热切地讨论着这辆汽车上的每一根线条。激动人心的伟大一天终于来到了，这个时代的发明天才所生产出来的最新型的汽车产品终于要在公众面前露面了。福特汽车公司动用了 1 300 000 美元在 2 000 家日报上连续 5 天作了整版的广告，使所有能够看到报纸的美国人都对这个系列广告耳熟能详。1927 年 12 月 2 日，当 A 型车终于揭开面纱，共有 100 万人——这个数字是《先驱论坛报》给出的——设法进入福特公司的纽约总部一睹新汽车的真容；查尔斯·梅尔兹(Charles Merz)后来在描述自己福特生涯的时候写道："在底特律，10 万人涌向福特公司的陈列室；在克里夫兰，由于人群太过拥挤，全副武装的警察被召来维持秩序；在堪萨斯城，有太多人挤进了会议大厅，只得新建一个平台让新型汽车站在上面供每个人参观。"这样的情况在美国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福特公司收到了数千张订单，要么是订购尼亚加拉蓝款的跑车，要么就是订购阿拉伯沙款的旅行车。在以后的好几个月里，大街上只要一出现新款的福特车，就总会吸引大量的人群。对热爱汽车的美国人来说，一辆新款汽车的首次亮相并不是一件简单小事，也不仅只和商业利益有关，那是 1927 年的大事件之一。它虽然没有林德伯格的飞行那样激动人心，却和以下这些事件——例如，萨科和万泽蒂的被执行死刑、霍尔—米尔斯的谋杀案审讯、密西西比河的洪水，以及登普西和滕尼在芝加哥举行的拳击比赛——一样，都能够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

1919 年的美国共有 6 771 000 辆小汽车在提供服务；而到了 1929 年，小汽车数量则不少于 23 121 000 辆，这也许是能够说明柯立芝繁荣时代的最有力的数据。不过，为了再增加一点说服力，我这里说得再详细一点。早在 1923 年年底，在典型的美国城市中心镇，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两辆汽

车。林德夫妇和他们的调查者们访问了中心镇的 123 个工人家庭，发现其中 60 个家庭都有汽车。而在这 60 个家庭中，26 户人家的住房都非常简陋，调查者们认为有必要问问他们家中是否有洗澡盆，结果他们发现 26 户人家中的 21 户都没有洗澡盆。汽车竟然比洗澡盆还要先进入这些家庭！

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美国的面貌也随之改变了。那些因为“处于路边”而曾经一度繁荣过的村庄如今都由于经济贫血而逐渐萎缩；61 号公路边上的很多村庄现在则布满了汽车修理厂、加油站、热狗摊点、炸鸡饭店、茶室、旅行者休息处和野营地，到处都是一派富足景象。城市间的电车也萎缩了，或者仅仅是由于可怜的时代错误还幸存着。很多铁路都放弃了增加支线，因为发现有数量众多的城间巴士和卡车在混凝土公路上疾驰而过，而这一切都导致铁路线急剧缩减。整个国家布满了客车线路。在数千个小镇上，战后十年初期的时候，主要街道和中心街道交叉口只要一个交通警察就足够维持交通秩序了；可是到这个十年的末尾，情况变化得太大了！——红绿灯、闪光警戒灯、单行道、林阴大道商店，以及越来越严厉的停车规则——可即使有了这么多工具的帮助，每个周六和周日下午的主要街道仍然经常是堵车堵到好几个街区以外。虽然进程缓慢，但蒸汽时代即将被汽油时代取代的趋势却是确定无疑的。



## 三

收音机制造商在繁荣号客车上占据的位置虽然略次于汽车制造商，但他的非凡之处却在于，他是这辆客车上最年轻的乘客。你可能还记得，直到 1920 年秋天，无线电广播这个新事物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可是到了 1922 年的春天，人们对它已经产生了极大的狂热，总是热切地谈论着收音机——而在接下来的 1923 年和 1924 年，人们将同样热切地谈论着麻将和填字游戏。1922 年，收音机及其零配件的销售额达到了 60 000 000 美元。人们在揣摩，当人们对从收音机里欣赏爵士乐队在希昼纳特迪市或艾奥瓦州的达文波特演奏《盖勒先生和希恩先生》不再感到新奇时，将会发生什么呢？真实发生的情况可以从以下这组收音机销售额的数字中看出一点端倪：

1922 年：60 000 000 美元（这个数字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1923 年：136 000 000 美元



1924 年：358 000 000 美元

1925 年：430 000 000 美元

1926 年：506 000 000 美元

1927 年：425 600 000 美元

1928 年：650 550 000 美元

1929 年：842 548 000 美元（这个数字比 1922 年增长了 1 400%！）

请先不要急着把眼光从这些数字上移开。我们再看一会这些数字就可以想起来，在国家的经济曲线出现下降的时候，几乎所有流行商品的销售额也很可能会相应地出现下降。例如，1927 年的国家经济状况有所下降，你有没有看到它对收音机销售额的影响？1924 年的国家经济状况也出现了下降，但是就整个战后十年期间来说，收音机的销售额在那一年却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在那一年，四面楚歌的民主党人正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集会选举自己的领袖。一天又一天，麦卡杜(McAdoo)的主持人和阿尔·史密斯(Al Smith)的主持人之间的僵局始终持续着，数百万美国人从扩音器里听到的，都是精神抖擞的"阿拉巴马州，安德伍——德(Underw—ood)获得了 24 票！"的呼喊声。人们发现，可以把这种政治大会当作一个精彩的节目来收听，而坐在收音机旁则要比站在花园里好多了。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拧开旋钮收听《巴尼谷歌》或《再也不会下雨了》。虽然才只有三年半的历史，但收音机已经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喜爱。

在这些收音机销售额的数字后面，隐藏着的是战后十年人们的生活画卷：全国上下每三户人家就有一台收音机；巨大的无线电广播站布满了全国；经济公寓住宅的屋顶上布满了天线；罗克西(Roxy)和他的伙伴、幸福男孩、AP 吉普赛以及鲁迪·瓦利(Rudy Vallee)都在古老而小巧的佛罗伦萨式无线电里浅吟低唱；格拉汉姆·麦克内米(Graham McNamee)的嗓音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最熟悉的声音，不停地在你我的客厅内大声呼喊："他做到了！是的，先生们，他做到了！触地得分啦！先生们，我想告诉你们这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1927 年的政府声称要在竞争激烈的无线电广播站中间分配波长；广告客户们付出大笔的费用试图取得这样的特权：在介绍贝多芬的时候用几句精选的话语介绍一下他们的发酵粉或者是牙膏；而迈克尔·米汉(Michael Meehan)则亲自操纵着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普通股股票，使它从 1928 年 85.25 的低价上涨到 1929 年 549 的高价。

在这辆繁荣号客车上还有很多其他乘客。人造纤维、香烟、冰箱、电话、化学制品(尤其是化妆品)以及各种各样的电器设备,人们对这些物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当那些独立的私人店主们还在挣扎着想要保住自己商店的时候,连锁商店和百货公司的零售额却在急剧地上升。1919 年每 100 美元的生意,到了 1927 年那些廉价连锁店能做到 260 美元,香烟连锁店能做到 153 美元,药品连锁店能做到 224 美元,而杂货连锁店则能够做到 387 美元。如今的史密斯夫人再也不用光顾附近的小商店,而是直接开着她那辆价值 2 000 美元的汽车前往杂货连锁店购买物品,而在那里她一天就能够省下 27 美分。电影业也非常繁荣。通过大屏幕,查理·卓别林、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葛洛莉娅·斯旺森(Gloria Swanson)、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以及克拉拉·鲍(Clara Bow)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甚至连遥远的爱斯基摩人、马来人和中国人都知道了他们的名字。而在国内,1923 年 12 月的时候,中心镇的居民们基本上是一个月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可是现在,整个城市的人们一个月要去电影院四次半。也就是说,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也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中心镇的居民们平均每个星期就要去看一次以上的电影!

柯立芝时代的这种繁荣景象是真的吗?农民们可不这么认为。也许纺织业的制造商们也不这么认为。但是各个公司的利润、工资和收入数据却让人们很少有怀疑的空间。譬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财富杠杆相反两头的两个重要事实:在 1922~1927 年期间,美国人工资的购买力以每年超过 2%的速度上涨;而在 1924~1927 年这三年时间内,每年支付所得税超过 100 万美元的美国人就从 75 人迅速攀升到了 283 人。

## 四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呢?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变得这么繁荣昌盛呢?

有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整个欧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可是美国却几乎没有受到一点儿破坏。当和平来临的时候,美国人发现自己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主宰。他们年轻的祖国不仅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同时还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于是他们准备好好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美国发展了规模生产,并因此提高了机械效率和管理

效率。福特公司始终坚持在机械化劳动最精细的分工基础上实行高工资、低价格以及标准化生产，而这种信条不仅仅在高地公园运作良好，在数千家其他的工厂里也运作得非常顺利。那些一想起1921年堆积如山的积压货就浑身战栗的经理人们，如今也学会了小心翼翼地进行买卖；在他们的周围，还有那么多的专业技术顾问、研究人员、人事经理、统计学家以及商情预测员，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而他们对共和党政府的信任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认为政府就是自己身边无敌的同盟，这种信念也同样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同时，汽车制造业的繁荣景象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作为主体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汽车制造业直接或间接地为将近400万人提供了工作，同时也将新的生命活力注入了其他人的身上。

为这场繁荣景象提供支持的还有两种刺激购买欲望的新形式，这两种形式都是以将来作为抵押，但同时却让工厂始终在维持运转。第一种是日益增加的分期付款。人们开始认为，被现金余额限制住自己的购买行动是一种过时的行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支配自己的信用”。到战后十年后半期，经济学家计算出，所有零售额的15%是用分期付款的形式完成的，而大约有60亿美元的商业证券业务也是通过“分期付款”完成的。第二种就是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当股票价格在1928年和1929年一路疯长的时候，很可能有数十万的人们正在用金钱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而这些金钱从本质上来说，则代表着对20世纪30年代商业利益的一种赌博。当这种情况持续的时候，真是非常有趣。

如果这些就是出现柯立芝繁荣时代的主要原因，那么推销员和广告商们最起码也是这个繁荣时代的代理人和福音传播者。商业界直到今天才如此清楚地明白，终端消费者对他们有多么重要。除非消费者能够被说服购买，并且是大量地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否则所有那些六汽缸的汽车、超外差式收音机、香烟、胭脂以及电冰箱都会在市场上遭受严重失败，而推销员和广告商们则掌握着通向市场大门的钥匙。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他们的手段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在如今这个时代，如果仅仅用谦虚直白的语言介绍自己的产品，把产品摆放在柜台上等着终端顾客下定决心来购买他们的产品，这种做法已经是远远不够了。广告商必须在全国范围制订一个复杂的推广计划，向心理学家进行咨询，再动用诗人所特有的甜言蜜语、忠诚劝诫或者是威胁恐吓等语言手段，才能说服顾客购买他们的产品，也就是——“攻破顾客的抵御防线”。不单每一个私人企业都挣扎着想在自己

的领域里争取更大的份额，所有的行业都在公众的耳边不停聒噪，互相竞争，争取更大的利益。美国烟草公司提出了“伸手去拿‘幸运’牌香烟，而不要去拿糖果”的口号，而被逼应战的糖果制造业则利用报纸的整版广告做出回应。《读者文摘》引用贸易期刊的内容，向人们报告各行各业所做出的努力：家具制造业让人们要“留意家具”，而服装制造业则提醒人们“留意各种晚礼服”。推销员们必须具有狂热者的激情，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甚至不惜通过欺骗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家中，必须扫除横亘在推销员和顾客消费之间的一切障碍。正如经理人们所说的那样：“你再也不能只做一个接收订单的人了——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推销员。”而总体来说，公众也足可以依靠，他们沾沾自喜地任由广告商们公然地对自己的信任度进行袭击，也任由推销员们对自己的隐私进行最为粗暴的打扰；因为公众们愿意原谅任何以商业的名义而犯下的罪行。

推销员们从来没有经受过这么巨大的需要获得结果的压力。许多公司都采用了配额制度，向每一个销售代表都布置了业绩目标，他们的销售额必须比前一年的业绩高出 20%～25%。如果他们完不成任务，他们就会失去雇主的好感，甚至会失去自己的工作。为了刺激销售动力，开展了各种各样的销售竞赛，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独出心裁的手段。芝加哥的达特内尔公司是一家拥有上万个美国商业机构客户的大公司，他们提出了很多种不同的销售计划，其中一个就是：购买各种各样新奇的小玩意，然后把这些东西每隔一个星期就寄给他们的推销员：这个星期是一个小型的鸡毛掸子，上面拴着一个标签，要求他“打扫自己的领地”；另一个星期则是一个大爆竹的模型，要求他“制造出大噪音”，诸如此类，等等。美国切片机公司在圣诞节的时候为旗下每一位超额完成销售计划的推销员提供一只火鸡。事后销售经理解释说：“我们让每一位推销员挑选自家的一个孩子担任吉祥物的角色，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让这个孩子过上一个快乐的圣诞节。这些年轻人对待这个计划的态度非常有趣，有时候，看看他们的兴趣那么浓厚，都让人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另外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则开心地报告着“他的妙计之一”是“用另外一个推销员的优秀业绩不停地嘲笑某个推销员，直到这个推销员痛苦不堪，不得不准备进行战斗。”而根据杰西·雷恩斯福德·斯普拉格(Jesse Rainsford Sprague)的说法，还有一个公司发明了——并且对此非常炫耀—— 一个刺激旗下销售人员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则纯粹是一种不人道的残忍做法，其不人道的程度都可以





在柯立芝繁荣时代创下记录了：在这个公司举行的宴会上，销售业绩最好的推销员面前摆放的是牡蛎、烤火鸡以及最精心制作的冰淇淋；销售业绩次之的推销员面前摆放的晚餐除了没有牡蛎之外，大体和前者相同；以此类推，销售业绩越差的推销员面前的晚餐就越寒酸，而业绩最差的推销员面前摆放的，只有一小碟煮豆子和几块饼干。

如果连销售人员有时都会遭受这样的压力，那么消费者也会感受同样压力的事实肯定不会让人吃惊。这里有两个极端的例子（都引用自杰西·雷恩斯福德·斯普拉格的材料），足可以说明商业方法上的潮流。一个批发药品的公司把自己的"特别产品"放在一张小桌子上进行展示，产品的四周用栏杆围起来，而这张小桌子就直接摆放在顾客必经的道路上，按照《油墨》的说法，"这些商品肯定会吸引顾客们的注意力，无论是当他们跌倒在这些商品上的时候，撞到这些商品的时候，脚踝骨踢到这些商品的时候，还是用其他方式和这些商品发生接触的时候"。《销售新闻》杂志则把自己的"销售好点子"现金大奖颁发给了一个出售电子清洁器的推销员，这位推销员给人们讲述了下面这个表现商业威力的例子。一天，他在大街上抬头看到二楼某扇窗户内的一位女士正在抖动一块小毯子上的灰尘。"通向二楼她家的门是开着的。于是我直接走了进去，没有敲门就顺着楼梯走到那位女士的面前。我对她说：'您好。我准时来了。您希望我先从哪个房间开始打扫呢?'她非常惊讶，说我一定是把门牌号码弄错了。但是在我非常诚心有礼的道歉声中，我已经把清洁器接上了电源并且开始动手了。结果当我走出她家的时候，手里的清洁器已经不见了，拿在手里的是一份合同以及支付定金的支票。"很明显，社会希望，当一个陌生男子以虚假借口未经允许就进入一位女士的公寓并且安装清洁器的时候，《销售新闻》的读者对此应该充满热情。因为如果你能接受这种剥削的话，商业就会受益，良好的商业运行有助于创造繁荣景象，而繁荣景象则对这个国家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 五

面对新时代的竞争，广告商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手段，包括更优秀的设计、极具说服力的现实主义图片，以及大量的广告投入：根据弗朗西斯·H. 斯森(Francis H. Sisson)的数据，1927 年的广告费用超过了 5 亿美

元。面对竞争，他们不仅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坦白态度，向那些固定的杂志读者介绍除臭剂和高洁丝卫生巾的优点；同时在技术上也进行了微妙的改变：广告文的撰写者最关注的不是产品的特殊品质和优点，而是那些守旧的普通公众的心理，因为这样就能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些什么——年轻、受人喜爱、富有、不输给身边的邻居，并且让人嫉妒。而要想取得成功，就得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产品和公众的需要产生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符合逻辑还是不符合逻辑，是真实还是虚假；就得让人们知道，最时尚的人即使蒙上眼睛也能选出正确品牌的香烟；就得通过金光闪闪的鉴定书——而这些鉴定书经常都是付钱买来的——告诉人们，使用这种广告产品的人都是时尚圈中的名媛、电影明星和直飞飞行员们。据说，一位女电影明星从加利福尼亚一路直飞来到纽约，却只待了一天，而在这精疲力竭的一天中，她一直不停地换着装束，不停地使用各种产品，就是为了给这些产品拍摄鉴定书上的照片，可是其中大部分的产品大概她此前从来都没有见过——而她之所以愿意在这么多鉴定书上露面，只是因为这可以为她的新电影进行极好的宣传。来自实验室的朴素事实有什么价值呢？为了应对充满深情噱头的牙膏广告，难道牙粉制造商没有引用医学权威的数据吗？可是这种应对措施不是却好像一阵微风瞬息即逝了吗？在战后十年初期，人们认为广告是一项事业；在柯立芝繁荣时代早期，那些令人生厌的预言家们将其称为一种职业；而到了战后十年末期，当很多广告界的从业人士看到从街头小报学来的方法也非常有效时，开始在业内人士之间将广告称为一条有利可图的生财之道。

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一个人足够睿智，他也许会说，他不介意谁制定这个国家的法律，只要他能够写出全国的广告，因为从这些广告里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传奇，里面有描述各种人物的浪漫故事和悲剧情节，而这些人物的故事比任何小说里的情节都要为普通大众所熟悉：有个男人能够清楚地记得西雅图的阿狄森·西姆斯(Addison Sims)……5个人中有4个人由于没有使用弗汉牌产品，都患上了牙槽脓溢，因此他们只能戴上白色的面罩遮盖住自己那可怜的嘴巴，真是令人同情……曾经的高尔夫冠军现在却只能在明星球手后面蹑手蹑脚地随行，成了“一个可怜的旁观者”，而他那糟糕的健康状况只不过是因为忽视了对牙齿的护理……一个可怜的家伙蜷缩在出租车的一角，妻子正在斥责他一个晚上竟然没说一句话[而如果他参考了埃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剪贴簿，他本来是可以





在那天晚上轻而易举地闪亮全场的]……那个男人的谈话让周围的人都震惊不已,使得那些充满羡慕之情的旁观者们只能吃惊得大口吸气,“我想他引用的是雪莱的诗句吧”……这个女人本来肯定会处理一下身上的狐臭的,只要人们将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她……有个男人在与侍者用法语讲话时,遭到了朋友们的哄堂大笑……有个女孩认为烤里脊肉是一种鱼……一对穷苦的夫妻在客人离开之后充满羞辱地面面相对,妻子仍然紧握住门把手,使劲憋住自己的眼泪,而丈夫则满面含羞地咬着自己的指甲(当你的客人离开的时候——你是否后悔邀请了他们……让所有的尴尬都离你而去吧！让这本著名的《礼节入门》告诉你,什么样的场合你应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写些什么以及穿些什么吧)……那个女孩,只戴了雏菊花环,但是却有一双运动员的脚……广告页上的这些男人女人,无论是成功还是受苦,都成为了这个时代民间传奇中的精彩部分。

而有时候,这些人所取得的成绩非常令人吃惊。举个例子,看看下面这个购买了尼尔森·道伯戴(Nelson Doubleday)的《口袋大学》的男人吧。某天他去参加一场晚宴,其中有位客人提到了阿里巴巴,而他就立刻开始表现自己的能干:

“阿里巴巴？我向前坐在了椅子上。我可以为他们讲述与这个浪漫独特的人物有关的所有故事。”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们都围在我的身边。我跟他们讲了那艘驶过七片海域的金色航船,那个与驴子一起在未知的土地上晃悠的著名男人,也讲了身为我们祖先的那个残忍的人。我讲了他们从没有听说过的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故事,我还讲了古怪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讲了罗穆卢斯(Romulus)和罗马的建立。我跟他们讲了拉里(Raleigh)先生的不幸过失,也讲了可怜的安妮·波琳(Anne Boleyn)的悲惨结局……他们说:‘你肯定环游过整个世界,才知道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怀疑论者可能会一笑置之,庆幸自己并没有和那么多人一起度过那个冗长的夜晚;但是这个广告会在他们的脑海里萦绕不去。而对其他头脑没那么复杂的人来说,这个广告则毫无疑问打开了一扇通往美好前景的大门。只要填写一下订货单,那么他也能够让整个晚宴上的客人为自己着迷……

到目前为止,战后十年最为引人注目的广告是一个长篇系列。广告先

是展现了各种人物的不幸遭遇，对口臭所造成的可怕后果进行了充分的说明，而这些可怜的人，连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都不会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通常是伴娘，却从来不会成为新娘……埃德娜(Edna)的遭遇真是太悲惨了"……

"为什么她以那样的方式离开他呢"……

"这就是你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随后，广告利用人们在看完这些悲剧故事后所产生的恐惧之情，对产品进行了一番别出心裁的展示：一个女孩看着李斯特防腐液的广告对自己说："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虽然美国医学会坚持声明李斯特防腐液不是"一种真正的除臭剂"，它只不过是"用一种味道掩盖了另一种味道"，但是这样的声明毫无用处。同样，生命延续研究院发现"每 20 个人中才有一个人患有牙槽脓溢，而不是弗汉广告所说的每 5 个人中就有 4 个"(这里再一次引用斯图亚特·蔡斯的材料)，可是这种发现也毫无用处。口臭的背后有巨大广告力量的支持，而李斯特防腐液则从公众潮涌般的恐惧中赚取了越来越丰厚的利润。



## 六





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繁荣，财富的传播在市场上也带来了影响。战争一结束，高等教育的发展就立刻蓬勃兴旺起来。此后的高等教育事业虽然步调稍微有点减慢，却仍然持续着自己的蓬勃势头，直到大学的理事们发狂般地焦急纳闷，究竟怎样才能为那些蜂拥而来的申请者找到住宿的房间。那些已经迅速致富的人们如今也想迅速变得有教养，为了满足他们能够在社交方面游刃有余的愿望，有关于礼节的概要知识和书籍开始流行起来。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是 1921 和 1922 年非小说类的最畅销作品，随后是房龙(Van Loon)的《人类的故事》和 J. 阿瑟·汤姆逊(J. Arthur Thomson)的《科学大纲》(这两本书都是 1922 年的畅销作品)，双日公司邮购的《礼节入门》和艾米丽·波斯特(Emily Post)的《礼节入门》(1923 年非小说类作品的领军人物)，《为什么我们像人类一样行为》(1926 年大获成功的作品)，以及在 1927 年将非小说类其他作品远远甩在后面的《哲学的故

事》。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股出国的浪潮。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仅仅在1928年一年，就有超过437 000人离开美国，乘船前往外国，另外还有14 000人经由铁路进入加拿大和墨西哥，更有超过300万辆汽车驶进加拿大，在那里待上一天或是多天。这些人花钱很随意：事实上他们留在国外的金钱(1928年总额为大约650 000 000美元)在一定时间内解决了美国国际金融方面的一个难题：在不允许国外商品通过高额关税障碍大量进入美国的同时，如何才能够使得美国继续收取她在外债和国外投资方面的利息。

美国成为了全世界的银行家和金融主宰者。当德国和同盟国之间的财政关系需要清理的时候，查尔斯·G. 道斯将军和欧文·D. 杨(Owen D. Young)正担任国际委员会的领导人——这不仅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的判断是睿智的，认为他们在欧洲国家之间做出的决定是不偏不倚的，同时也是因为美国已经处于一个操纵者的地位。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邀请美国人前去改组他们国家的金融状况。美国人在海外的投资呈跳跃性的增长。位于百老汇和华尔街拐角处的那栋矮墩墩的石灰石大楼，虽然墙上还仍然保留着1920年那场大爆炸留下的伤疤，但是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无可争议的金融中心。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美国才会通过武力介入来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美国海军统治了海地，并且恢复了尼加拉瓜的秩序；但是总体来说，美国扩展自己庞大帝国的方法，不是军事征服或政治独裁，而是经济渗透。

在国内，柯立芝繁荣时代产生的最明显的结果之一就是：整个国家都被城市的品味、城市的服装以及城市的生活方式所征服了。乡巴佬已经一去不复返。新罕布什尔州和怀俄明州的乡间女孩与纽约的同龄女孩一样，都穿着同样的短裙，抹着同样的口红。最底层阶级——也就是巨大的红色恐惧时代那些激进分子们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人们——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已经逐渐失去了关注；美国劳工联合会无论在会员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在急剧削弱；这个时候的工人们已经拥有了二手的别克车，为吉米·沃克(Jimmy Walker)欢呼喝彩，并且似乎对他精美的衣着、贴身男仆以及经常光临百万富翁遍地的棕榈海滩的行为毫不反感。因此，下述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梅隆、胡佛和莫罗(Morrow)等人发现，他们的财富并不是公共办公室的债务，而是一种资产；而公众则普遍地举行运动，希望亨利·福特在

1924年成为美国总统。拥有百万财富成为了成功的象征，而成功则受到了整个国家的尊敬和崇拜。

## 七

人们看待商业本身也带有了新的崇敬之情。过去，人们曾经认为做生意没有那些有学问的职业高贵威严，但如今人们认为，如果一位牧师被称为优秀的生意人的话，那就是对他给予了很高评价。参加年度宴会的大学生们都热切地赞同那些银行家理事们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教育是美国最伟大的行业之一，而大学的校长院长们则被比作生意场上的经理人。很多大学本身也组织了不少商业课程，对那些攻读艺术学位或理学学位的学生，如果他们在广告文案设计、市场营销方法、初级速记法以及药店实习等方面做出成绩的话，学校也会非常高兴地承认他们的成绩并给予学分。哥伦比亚大学为了吸引学生攻读本校的函授课程，不仅采用了追踪调查系统，并且派出专门人员，对那些哪怕只表现出一丁点儿兴趣的人们实行上门推销政策。伟大的芝加哥大学利用了安德烈·齐格费里德(Andre Siegfried)口中的"成功的神秘"，以如下的劝诫之语开始了本校函授课程的广告："在家中提高能力，只要调查并坚持就能获得成功"……哈佛商学院设立了年度广告大奖，对为商业产品作出精美广告宣传语的作品授予学术荣誉。而对教堂来说，要想抵制住这股对商业的滚滚热情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人们从《美国信使》中得知，纽约的瑞典以马利公理会向所有那些为教堂建造工作捐款100美元的人颁发了"投资天国首选股本的证明文件"，从而承认了商业比精神需求更具有优越性。而纽约住宅区一个教堂的公告牌上也出现了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话语："到教堂来吧。对基督教的崇拜可以提升你的效率。基督徒F. 赖斯纳(F. Reisner)，牧师。"







在美国的每一个大城小镇，士兵俱乐部里都聚集着很多中产阶级人士，他们每周都举行一次正式的午餐宴会，气氛虽然嘈杂却非常温馨友好。这些士兵俱乐部发展得很快，而扶轮社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它成立于1905年，到1930年成员已经达到了150 000名，而该俱乐部还夸耀说，它在全世界44个国家中拥有3 000个俱乐部，充分说明它具有国际影响力。除扶轮社之外，基瓦尼俱乐部的数量从1920年的205个增加到了1929年

的 1 800 个;狮子会迟至 1917 年才成立,但到战后十年的末期,俱乐部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1 200 个。这些俱乐部不再满足于唱唱歌或做一些公益事业,他们普遍表达了"向商业施加补偿性而重生性影响"的信念,而这个说法是俱乐部的创建者之一提出的。在提倡者的描述中,商界人士是一个创建者,一个做大事的人,并且梦想着能够找到为全人类服务的新方式。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注解,因为在数百个主管人的房间里,在数百张会议桌旁,柯立芝繁荣时代的美国商人都把自己看做是拥有广阔视野的人,他们的眼光坚定地望向长远的未来。在战后十年末期,《纽约客》曾经刊登过一幅漫画,对商业领域的过度情感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经理在会议上对他那下巴肥厚的同事说:"我们有主意了。也许我们可以撬起风车——七个唐璜撬起风车(唐璜是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撬起风车"的典故出自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书中的主人公认为他看到的风车是些巨人,于是与之展开博斗。——译者注)。"而士兵俱乐部则对这种神秘主义非常擅长——在艾奥瓦州的滑铁卢,一名演讲者对扶轮社成员宣布说:"扶轮社就是上帝的表现形式。"而这一幕则被引用进了《美国信使》。

确实,商业与宗教之间的联系是这个时代意义最为深刻的现象之一。当美国个人信用调查协会在纽约举行年度大会的时候,圣约翰大教堂为 3 000名与会代表组织了一次特殊的祷告仪式,五轮祈祷由一位新教徒牧师、一位罗马天主教牧师和一位犹太教拉比共同主持进行,而 S. 帕克斯·卡德曼(S. Parkes Cadman)博士题为《商业中的宗教》的布道则大大地振奋了这些信用调查员们的精神。同样,当广告俱乐部联合会在费城集会的时候,卡德曼博士发表了题为《想像与广告》的基调演说;而在教堂广告部的集会上,讨论的话题包括"广告中的精神原则"以及"通过媒体和广播为天国进行广告宣传"。虽然会议期间每个晚上的 23:30 到凌晨 2:00,酒店都会为这些虔诚的代表们提供各种歌舞表演,而大西洋城的选美大赛也在现场举行,但这个事实只不过说明,即使是怀有崇高信仰的人,也得拥有自己的娱乐生活。

《圣经》被频繁地引用以解释商业,而商业也被频繁地引用以解释《圣经》,以致有时候人们很难说清,从这种联系中获益更多的究竟是《圣经》还是商业。纽约一名建筑商兼房地产行业人士弗雷德·F. 弗兰奇(Fred F. French)对自己的推销员说:"世界上从没有'不成功的原因'这种东西,我们可以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上找到这个理论的有力证

据，有史以来在人性研究方面最伟大的专家这么说过'你敲门，这扇门就会为你打开'。"弗兰奇接着又引用了"最伟大的指令"——"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对推销员们说，如果他们能够遵循这种崇高原则，就能够"无可限量地增强自己的个性和力量，因此今年，他们不仅能够以更低的佣金率为公司的股东服务，也能为自己赚得比去年（1925年）更多的钱"。在这个例子里，《圣经》很明显被当成了一种标准，而如果商业遵循这个标准，就能够为自己挣来金钱利益。不过在其他例子里，商业也可能成为标准，《圣经》则被提升到商业的水平，这也是对《圣经》的一种褒扬。

例如，让我们来看看都市不幸事故保险公司出版的一本名叫《摩西，人类的推销员》的小册子（为此书作序的仍然是不知疲倦的卡德曼）。小册子宣称，"摩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推销员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房地产推广人员之一"，并称摩西是"一位占统治地位的无畏而成功的伟人，出现在有史以来一种最伟大的销售运动中"。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在《无人知晓之人》中所宣扬的非同寻常的理念。这本书通过显示基督教与商业的相似之处对基督教进行了大力推广，让美国人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并在1925年和1926年连续两年成为美国非小说类的畅销作品。巴顿在书中说，耶稣不仅仅是"耶路撒冷最受欢迎的晚宴客人"和"户外人士"，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经理人。"他从商业阶级的底层挑选了12个人，并将他们打造成了一个征服全世界的团队……在其他地方再也无法找到这样的成功典范，因为无人能够像他那样伟大，能够把这些人组成团队。"巴顿的比喻成为"历史上最为有力的广告……如果在今天，他会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广告人"。事实上，耶稣是"现代商业的奠基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服务理想的作者。

由于布鲁斯·巴顿的描述，福音书满足了人们普遍的要求。在柯立芝繁荣时代的有益影响下，商业几乎成为了美国的国教。数百万人都希望得到这样的保证：这种宗教不仅正确而恰当，在赚大钱的规则之中还可以找到所有的法律和预言家。

在巴顿理念大力传播的这些日子里，销售和广告运动却更加充满了冷嘲热讽，而美国的商业世界也对蒂波特山丑闻的曝光和大陆石油公司的肮脏历史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担忧焦虑，这难道不奇怪吗？也许确实奇怪；但是必须记住，在所有的宗教里，崇高的信仰和实际的操作之间都有可能出现不一致。商人头上的光环并不永远都是那么适合，但是他们始终骄傲地

顶着这圈光环。

## 八

繁荣号客车就这样长鸣着汽笛、大开着油门一路向前驶去。但是驾驶这辆客车的司机，也就是这个时代以之命名的那个人，又是什么模样呢？

他既没有突出的下巴，也没有突出的个性，更不是滔滔不绝卖弄口才的人。如果你来自提姆巴克图并在一群商会的拥护者中发现他的话，你绝对不会认为他就是这群人的守护神。他从来没有踏足商界，却被大量生产和高压销售术的主人当成圣人般膜拜，这个事实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但是很大程度上，这个矛盾却也能够得到解释，因为卡尔文·柯立芝本人，几乎就是柯立芝繁荣时代最非同寻常的标志。

他来自佛蒙特州，身材瘦弱，沙色的头发，短柄斧般的脸，嘴唇紧闭，而脸上的表情，正如威廉·艾伦·怀特形容的那样，总是"眼睛朝下看，想要找出那些似乎总是侮辱他的罪恶的东西"。他是苍白而且缺乏自信的：在私底下，他也能够滔滔不绝；但是在公共场合，他就像一块冰那样沉默不语。在波士顿警察罢工案中，他的坚定不移吸引了整个国家的视线，并因此成为了华盛顿的副总统，但是就连哈定总统那和蔼可亲的温情也融化不了他这块寒冰。身为副总统的柯立芝不得不参加很多正式宴会；他也去参加——但是却一言不发，令华盛顿的女主人们都觉得非常沮丧并且困惑不已。爱德华·G. 劳瑞在书中写道："他们认为，意大利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山顶，但是由于从来无人能够爬到峰顶，因此他们不能确信山顶的风景是否值得他们去为此攀登。"柯立芝成为了总统，但是冰霜仍然在继续。

但是这种沉默却掩盖不住一个思想开阔的头脑。柯立芝知道自己祖国的历史，但他却从来不愿去了解国外的历史，而即使他愿意，他也无法了解国外的历史。在他所有的演讲中，在他那自鸣得意的《自传》中，你所能够发现的最具有独创性的地方就是他那不折不扣的缺乏独创性。卡尔文·柯立芝仍然对美国那些古老陈腐的格言深信不疑，而其他人要么已经忘记了这些信条，要么开始对此产生了怀疑。"所有行业的成功几乎都是根据投入进去的辛勤工作的数量来衡量的……我只对一种形式的政治策略拥有信心，那就是尽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这样就有可能取得成功……如

果社会缺乏知识和美德，它就会走向毁灭……拥有最伟大道德力量的国家将会取得成功……”这种认同辛勤工作和简朴生活才能获得成功的哲学很有可能是从佛蒙特州某个阁楼顶上找出来的，而在这个阁楼上连《麦加菲读本》都蒙上了灰尘。但是正因为这种哲学如此古老，才更显出它的新鲜；数不清的美国人曾经趴在母亲的膝盖上学过这种哲学，只要他们的心中仍然还保留着开拓精神，就都会受到感动；同时，柯立芝阐明这种哲学的方式非常与众不同而简明扼要，因此这种哲学完全征服了全国人民的心。人们在想，如果总统宣布说直线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报纸是否也会发表社论对总统如此精确表达的智慧送上溢美之词呢？

他不是一个大胆的领导者，他也不想做这样的领导者。他从不遵循冲动之下的想法，也不去攻击别人的防守阵地。他在白宫整整服务了五年零七个月，但身为总统，他却交出了一份令人吃惊的负面记录。可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在外交政策方面，柯立芝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美国人民相信：他们并没有被外界幸福地隔离在外。银行家也许会参与决定德国的赔偿数额，非官方的观察家也许会出席欧洲谈判，但是柯立芝政府仍然记得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被拒与失败经历，因此精明地选择了一种不大关心的态度。像之前的哈定总统一样，柯立芝提议说，美国应该参加国际法庭，但是他的态度并不强硬。参议院最终在带有某些保留条款的条件下批准了这个提议，可是那些保留条款却是其他成员国所无法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柯立芝的提议等于得到了一个失败的结局，可是从来没有人觉得他的声望受到任何影响。1927 年，第二次海军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却以失败告终。尼加拉瓜的革命事件，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在亨利·L. 斯廷森（Henry L. Stimson）提出由美国监管进行新选举的计划后，在大量的骚乱和耻辱中得到了解决。而美国利益集团手中油田的法律地位，导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产生了更大的纷争，经过柯立芝在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同班同学——德怀特·W. 莫罗（Dwight W. Morrow）大使充满智慧的斡旋，这件事情才得到了平息。但是，柯立芝政府在外交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则是：美国在保护《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的过程中占据着领导地位，而这份协定宣布战争不是国家政策的工具——这个表态是每一个国家都乐意做出的，但却对国际关系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除了对尼加拉瓜问题迟到的解决、对墨西哥困境的摆脱，以及对那个无伤大雅的协定的捍卫之外，柯立芝政府的





政策就是收集钱财(甚至不惜以受到极度反感为代价),并对美国人金融帝国的扩张保持警惕,而对其他方面的事情都是任其自由发展。

而国内事务方面,除了他的小心谨慎,柯立芝政府更是找不到什么令人激动的建树。当哈定政府丑闻曝光的时候,他采取的措施都是最基本的:对丑闻案提起公诉,并敏捷地将多尔蒂骗出了内阁,而此后则始终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平静态度。当国内出现无烟煤煤矿罢工事件的时候,他也没有立刻插手;他只是让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弗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去处理此事。在当时国内最为火爆的政治事件,即禁酒法令事件上,他只说法律必须要执行,却没有表达任何其他意见。虽然禁酒法令危机四伏,但卡尔文·柯立芝却始终站在安全距离之外,而目光则关注着其他事情。

他为了维护商业利益而保持着国家的现状。他两次否决了农场救济法——这种做法让工业领域和银行业领域的人士感到非常满意,而正是这些人给予他最多的支持——理由是,麦克纳里—豪根提案从经济角度来看一点都不省钱,根本站不住脚。他也否决了士兵奖金提案,因为这项提案的花费太大,不过他的这次否决遭到了驳回。他最夸耀并且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他通过系统化的节约措施削减了政府运作的花费,减少了公共债务,并且四次降低了联邦政府的税收。从这些举措中受益的虽然有低收入人群,但高收入人群的受益则尤为明显。他的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在对商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在政府的各种任命中,只要情况允许,那些对当代商业行为持批评态度的人都被对商业持友好态度的人所取代;白宫的气氛一直保持平静,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当白宫以一种奉承的态度赞扬商业,或是向公众保证说美国的繁荣时代安全又牢固的时候,这种安静的状态才会被打破。

你是不是认为,这种政策既缺乏创意又胆怯懦弱?但它却是真诚的:卡尔文·柯立芝真诚地相信,只要富人的纳税负担得到减轻,自己又尽量不要表现出太多的权威,他就是在使整个国家受益——也许他自己也能够同时受益。而这种政策与这个时代那种既缺乏创意又胆怯懦弱的政治气氛是极其一致的。因为那些充满贪欲的商人在这个富裕的年代里已经成为了国家意见的仲裁者,他们认为,政府绝不会按照商人的意愿改造这个社会,因此他们也不会将政府看成是人类权利的拥护者或错误行为的修正者。繁荣号客车正在载着他们快速驶向他们心中向往的地方,而政治则有

可能阻拦他们的去路。他们不希望总统的位置上出现一个行为大胆的人；他们希望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而自己付出的代价也越小越好；而柯立芝这位不爱说话的新英格兰人在驾驶这辆繁荣号客车的时候并不怎么太操纵它，因此就体现了他们对最高政治才能的想法。

卡尔文·柯立芝确实体现了某种形式的政治才能。柯立芝繁荣时代有着不可否认的优点，而这位总统则深谙如何在鼓励这种繁荣景象继续发展的同时又让自己从困境中抽身的艺术，因此当他在《自传》里表现出扬扬得意的情绪时，很可能会得到人们的原谅。对柯立芝所表现出的审慎态度，也许人们也会给出高度的评价，因为在这种态度下，他不仅有意接受某些不可避免的情况，并且哪怕环境非常安全，他也不会试图表现得更加大胆或是更加宽宏大量。在这块土地上，伟大的商业占据着最高地位，而卡尔文·柯立芝由于在神坛面前表现出一种谨慎的顺从，非常幸运地充当了半个上帝的角色。







# 第八章　喧嚣的岁月

## 一

所有国家，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时不时会被时尚或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引发起普遍的激动之情。不过由于这些事件的性质各不相同，因此这些激动情绪的浪潮在出现的规模和频率上也各不相同。柯立芝繁荣时代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数百万的男女们以空前飞快的速度，将他们的关注目光、谈话内容以及情感兴趣空前一致地全部转向了数量巨大的琐事——例如一场重量级的拳击比赛、一次谋杀案的审判、一款新型汽车，以及一次横跨大西洋的飞行。

从历史学家的传统观点来看，引起整个国家这种激动情绪的那些事件中，绝大多数都是微不足道的。无论是霍尔—米尔斯的审判案，还是对被困肯塔基州洞穴的弗洛伊德·柯林斯(Floyd Collins)营救工作，它们对人们未来的命运几乎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然而这些事情却能够引发数量空前的人们的希望和恐惧，这个事实就绝对不能说不重要。这个国家已经厌倦了"重要事件"，因此才蜂拥去关注那些奇怪的事件，任何描写柯立芝时代的作品要是不把这一点写进去的话，就是不完整的描写；同样，任何作品要是不对产生英雄的一系列情景进行描写的话，那么它也是一部不完整

的作品。而这个时代所塑造出来的英雄既不是为大众服务的伟人，也不是改革家，更不是勇士，而只不过是一位为了赢取奖金而横跨大西洋飞行的特技飞行员。

在卡尔文·柯立芝入主白宫的时候，战后十年早期的那种紧张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缓解。虽然伍德罗·威尔逊仍然在S大街上那所阳光明媚的住所里艰难地维持着生命，但国际联盟这件事情已经基本宣告结束，只有极少数不愿意妥协的理想主义者还仍然梦想着这个协议能够有起死回生的一天。激进主义者的情绪已经懈怠，劳工运动自从巨大的红色恐惧之后就失去了活力和威望，而在那些轻易致富的富人——或者至少是轻易致富的福特们和雪佛兰们——有利的影响之下，个人资本主义已经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三K党的成员数量达到了数百万，但是已经开始失去它那曾经在数千座山头点燃烈火的天真的热情，它变得越来越不像是一场宗教运动，反倒更像是一场嘈杂的政治活动。能够让大量公众感到情绪热烈的真正的公共事件，实在是少之又少。固然，有禁酒法令，所有人都会对此产生激动之情；但是由于不同党派对此事的意见大相径庭，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尽其所能地希望将它推向幕后的次要位置。在西北部和中西部的农业地区，人们大声疾呼要求实行农场救济，但全国范围内只有零零散散的人对此表示出些许的关心，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正在变得日益都市化。公众的热情正在消退；总体来说，他们对国际法庭、石油丑闻及尼加拉瓜局势等事件都不愿操心。他们将精力都投入到了充满胜利气氛的商业中，而对其他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抱着一种度假的心态。他们会说："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有这么多精彩的表演可以观看，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欣赏出现的任何节目。







与其他任何国家和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相比，如今的美国有更多的人们可以同时观看一场精彩的表演节目。批量生产不仅仅局限于汽车产业；新闻报道和各种观念也同样可以批量生产。因为那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讯的方便体系从前只能使富有的文化人受益，并让他们成为引领时尚的人，可是现在却得到了飞速的广泛传播，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也更加有效。

首先，报纸的数量越来越少，但发行量却越来越大，并且由于对新闻协会材料和报业辛迪加特写内容的利用日益增多，报纸的标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1914～1926年期间，正如赛拉斯·本特(Silas Bent)指出

的那样，整个国家的日报数量从 2 580 家下降到了 2 001 家，周报数量从 571 家下降到了 541 家，而每份报纸的总发行量却从 2 800 万份增加到了 3 600万份。在克里夫兰，25 年前这个城市拥有 3 家晨报，但现在只剩下 1 家；明尼苏达州的底特律和圣路易斯的晨报都只剩下了 1 家；在芝加哥，在该市人口翻番的那段时间内，晨报的数量却从 7 家减少到了 2 家。整个国家的报纸都在或多或少集中化的领导下进入了连锁经营模式：到 1927 年，由于赫斯特和斯克利普斯—霍华德系统的成功，加上人们看到了降低管理成本的希望，55 家连锁商号控制了 230 家日报，而总发行量则超过了 1 300 万份。

过去，地方报纸的编辑非常依赖本地的作家和漫画家，因为他们能够为报纸提供富有当地特色的内容，不过现在这种依赖性已经不复存在；连锁商号的总办公室或者是位于纽约的报业辛迪加，就能够为他提供各种各样的内容，包括社论、健康访谈、连环漫画、伤感文章专栏、家居小锦囊、体育方面的漫谈以及周日特写，而这些内容保证能够让全国范围内的读者感到心动愉悦。安迪·冈普(Andy Gump)和桃乐茜·迪克斯(Dorothy Dix)拥有数百万崇拜者，遍布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的全美各地。而一个记者在杰克·登普西训练营中冥思苦想出来的话语可以同时被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商和西雅图的打铆钉者尽情享用。

与此同时，拥有巨大发行量的全国性杂志开始越来越多，全国性的广告也越来越多，于是大批宣传人员学会了推销自己产品的诀窍，那就是把他们的产品与当时公众恰好都非常关心的事情联系起来，而最后他们发现，无线电广播的风靡全国是一个非常新颖的重要现象，因为收音机可以使大量家庭在同一时间收听棒球世界大赛的赛况，或是林德伯格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全民想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被少数人利用的工具。而正如本特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些少数人正在学习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利用美国人的想法——使他们的注意力每次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他们并不是经过商量才故意决定这么做的，是环境和利己主义使得这样做几乎成为他们无法避免的选择。他们发现——那些成功的小报每天都在告诉他们——公众每次只会为一件事情而关注、激动。报社老板和编辑们发现，在发生德顿审判案或维斯特里斯号轮船沉没灾难的时候，如果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对事件进行报道——启用明星记者、辟出报纸头版、花费大量版面——报纸的销量就会比平时大出很多。他们对这个发现进行

了充分的利用；根据本特先生的编辑，无关紧要的格雷—斯奈德（Gray-Snyder）谋杀案审判在媒体上所受的关注程度比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还要多；林德伯格的飞行比停战协定和欧洲帝国的覆灭所受到的关注也要多。报业辛迪加的管理者、记者、广告商、媒体代理商以及无线电广播员，所有人都意识到，要想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法宝就是提及当时所发生的最主要事件，而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而结果就是，一旦真的发生了某件可能会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事件，人们就能够在各种媒体上不停地听到并且看到对这件事情的大肆报道：它会出现在报纸的大标题中，会出现在报纸上一页又一页的联合大讨论中，会出现在收音机的广播中，会出现在那些为了寻求宣传效果而不知疲倦的演说者和传教士口中，会出现在周报的图片中，也会出现在电影中。所以，（只要你不是极端执拗的个人主义者，）你就会感受到引起大批公众激动情绪的那种震动所产生的共鸣。

这个国家已经拥有了面包，但是他们想要的却是马戏表演——现在，各种各样的表演马上就要向他们走来了。

## 二

1923～1924 年冬天那段时间，麻将仍然流行——在这个冬天，卡尔文·柯立芝已经习惯了白宫的生活，博克和平奖已经颁出，石油丑闻已经曝光，伍德罗·威尔逊已经去世，道斯将军出国去主持赔款会议，《如此巨大》成为销量最多的小说，人们对《对！我们没有香蕉》已经产生了厌倦之情，而图坦卡门法老坟墓的石棺盖在卢克索被揭开，则让所有报纸的编辑都兴奋不已。麻将仍然流行，却已经失去了当初的新奇。

正是在那个冬天——准确地说是 1924 年 1 月 2 日——纽约有一位年轻人在拜访姑妈的时候得知，这位姑妈有一个亲戚，对每周日都出现在《纽约世界》增刊上的填字游戏非常着迷。姑妈问这位年轻人是否知道填字游戏方面的书，因为她觉得这样一本书可以当作很好的礼物送给她的亲戚。虽然填字游戏早在至少 1913 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并且在《纽约世界》上刊登出来也有不少年头，但是这位年轻人却发现找不到这方面的书。但巧的是，这位年轻人[他的名字是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自己当时经营的正好就是图书出版生意，合伙人是他的朋友舒斯特（Schuster），而全部

职员就是一位女孩。西蒙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主意，并且第二天就和舒斯特商量：他们自己将出版一本关于填字游戏的书。这两位年轻人请《纽约世界》杂志负责填字游戏部分的三位编辑普罗斯佩·布拉纳利（Prosper Buranelli）、F. 格里高里·哈茨威克（F. Gregory Hartswick）和玛格丽特·皮瑟布里吉（Margaret Petherbridge）准备内容；尽管书商对这本书的前景态度冷漠，并且对他们说，公众是"不会对关于填字游戏的书籍感兴趣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于 4 月份推出了这本书。

他们的促销行动非常具有独创性，并且被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通过列举以下几个类似之物为他们的书籍进行广告宣传：

1921——库埃

1922——麻将

1923——香蕉

1924——我们的填字游戏书

不到一个月时间，这本模样奇怪并附赠一支铅笔的书就成为了畅销书。到第二年冬天，这本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数十万本；其他出版商开始争先恐后地出版相关书籍，希望能够从人们对填字游戏的狂热中也分到一杯利益之羹；如果一份报纸不是每天都刊登填字游戏，那它就是一份非常无趣的报纸；词典的销量直线上升；对职业作家罗杰特（Roget）的杰出著作《分类词汇编》的需求急剧上升；有个人为了完成一个填字游戏，坐在饭店里长达四个小时都拒绝离开，因此被判入狱；芝加哥的玛丽·扎巴（Mary Zaba）夫人被报道称为"填字游戏寡妇"，因为她的丈夫整天都沉湎于填字游戏，甚至挤不出时间去挣钱养家。有报纸报道说，匹兹堡的一位牧师将布道的文本内容编成了一个字谜。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上，所有主干线的火车上都摆放有词典。一个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往返的旅客说，火车上 60％的乘客都在忙于填字游戏，而餐车里的五个服务生一直在想，究竟是哪一个由五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意思是"能够产生恐惧"。无论你在街上遇到什么人，他都能够告诉你埃及太阳神的名字，或者是告诉你哪一个包含两个字母的单词意思是打印机的量度标准。

对填字游戏的狂热情绪在 1925 年逐渐消退。随后出现的是对问答书籍的迷恋，不过这个潮流规模较小；有一段时间，那些记性不好的绅士们和女士们经常会在晚宴后感到丢脸，因为他们无法辨认出谁是约翰·休斯

(John Huss)，也不知道欧姆是什么。直到合约桥牌在 1926 年被引进美国，他们的呼吸才变得畅快起来。尽管对填字游戏的狂热开始减退，但是在战后十年接下来的几年里，它仍然出现在大部分报纸每天的特别栏目里；而西蒙和舒斯特在 1930 年推出了他们的第十六个系列之后，计算出这本书自从 1924 年以来的总销量已经达到了 75 万本，而如果包括英国和加拿大售出的数量的话，总数则达到了 200 万本。

## 三

对填字游戏的这种狂热，与此前对麻将的那股狂热一样，都是很新鲜的迹象，可以表明美国人民对时尚和流行是多么敏感，可是这种狂热却绝对不是报业进行大肆宣传的产物。直到这种大肆宣传的新技术发展得几近成熟，各种报纸才开始对它进行利用。能够说明媒体如何勾起数百万人对琐碎小事浓厚兴趣的最有力的证据，现在还没有出现呢。

当然，在 1924 年和 1925 年早期，当每个人都在玩填字游戏的时候，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有总统大选：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民主党大会由于威廉·G. 麦卡杜(William G. McAdoo)和阿尔·史密斯两派之间的斗争而充满了白热化的情绪，但最后却以人们对约翰·W. 戴维斯半心半意的支持结束，所以总体上说，这件事情进行得是虎头蛇尾。人们的感情力量都在西方人对坦慕尼天主教徒的仇恨情绪和坦慕尼教徒们演唱《纽约人行道》的行为中消耗殆尽，因此民主党再也没有真正能够平静下来重拾元气。卡尔文虽然缺乏激情，却始终平静地支持着商业发展和降低税收，并且懂得如何使自己成为这个繁荣时代代表的诀窍，因此被绝大多数人拥上了台。在芝加哥，有对谋杀了博比·弗兰克斯(Bobby Franks)的罪犯利奥波德(Leopold)和洛普(Loeb)的审讯。有威尔士王子访问长岛的新闻，在访问期间，他不仅经常跳舞、打马球、乘坐摩托艇，还阅读了《沃尔特·海因斯·佩奇的生活与信件》。(顺便提一下，在 1924 年，从英国还进口了很多其他事物，例如被称为“牛津书包”的裤口宽大的灰色法兰绒长裤，就开始第一次出现在那些积极进取的年轻男性的腿上。)在法国贵族的代表人物和好莱坞贵族的代表人物之间出现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联盟，那就是葛洛莉娅·斯旺森与法莱斯·古德雷侯爵(Marquis de la





Falaise de la Coudray)的联姻。有那次著名的日食，就好像天意注定要让东海岸城市的居民高兴似的。还有帕佛·纳米(Paavo Nurmi)：他把手表拿在手里，脚后跟离开跑道，就开始起跑，连自负的出租车司机都输给了他，而他后来又取得了一项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在不到九分钟之内跑完了两英里的路程。还有一件事情也闹得沸沸扬扬：血清被带到诺姆从而结束了白喉的流行，而这件事情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里奥纳德·塞帕拉(Leonard Seppalla)、冈纳·卡森(Gunnar Kasson)，以及小狗巴托(Balto)成为了全国人民心中的英雄。除此之外，还有弗洛伊德·柯林斯陷入洞穴的新闻。

也许，正是这起弗洛伊德·柯林斯的悲剧事件，可以作为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说明美国公众是如何空前一致地对某件虽然微不足道却引人注目的事件迸发出无比的激动之情的。

弗洛伊德·柯林斯是肯塔基州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他当时正在对距离猛犸洞穴5英里处的一个地下通道进行探险，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找到一些能够吸引游客的好景点，以便为自己和当地带来些利益。但是在距离地面125英尺的地方，在一块巨石下面有一个陷坑，而他不幸跌入了这个陷坑。由于通道非常狭窄而陡峭，那些试图将他从陷坑里挖出来的人们不得不用钩子拴在彼此的腰部连成一串，在冰凉的黏土和冷水里用锤子和喷灯将泥土和石头打散，然后再用双手将它们一捧捧地传递到地面上。如果《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记者W. B. 米勒(W. B. Miller)既无奉献精神也不大胆能干，那么可能只有很少一些人会知道柯林斯的困境。米勒顺着滑溜而拐弯抹角的通道爬入陷坑去采访柯林斯，全神贯注地设法营救柯林斯，并且将有关这一切的生动报道用急件的方式送回报社——而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整个国家的目光都投向了这起事件。柯林斯的遭遇不仅包含着戏剧性的悬念，还有个人与命运的冲突，而这些都是制造一个伟大新闻故事的要素，因此，每个城市的编辑都在每天报纸的头版对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进行报道。当米勒初次到达沙穴的时候，他在洞穴口只看到了3个人，他们一边靠在火堆旁取暖一边考虑着他们的朋友还有多久才能被救出来，但激动的情绪并不是太明显。可是两周之后，那里光帐篷就有100多个，人群情绪骚乱，不得不依靠铁丝网和手拿刺刀的州立部队来控制秩序。1925年2月17日，甚至连《纽约时报》都在头版用三栏大标题对这件事情的结局进行了报道：

弗洛伊德·柯林斯被发现在受困的第十八天死于洞穴内;死亡时间至少已有24小时;必须把脚切除才能将尸体运出。

此事发生之后还不到一个月,正如查尔斯·梅尔兹后来提醒《新共和》的读者那样,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煤矿出现了一次坍陷事件,共有71名工人被困,其中53人随后遇难。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这"只不过是一次矿难罢了"。然而,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肯塔基州沙穴一个寻找旅游景点的普通人却吸引了整个国家的目光。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表演,新闻发布者们已经开始学习将他们的聚光灯一次只对准一场表演。

然而,即使像柯林斯事件这样令人激动的新闻,在几个月后也已经被人们忘在了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发生在田纳西州德顿小镇上的对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的审判案,而他之所以受审,是因为他在中心中学向人们传授进化论的学说。

斯科普斯事件具有真正的重大意义。因为它以一种戏剧化的形式表现了当时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对立之一——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然而,虽然这起审判案受到了如此勤勉、如此嘈杂的大肆宣传,却仍然带有某些马戏表演的特点。



## 四







如果宗教在战后十年走向衰落的话,最方便采用的教堂统计数据也不会给出一点迹象。固然,数据会显示出投入使用的教堂数量增长得非常缓慢;但是这部分是由于对现有教堂进行巩固的趋势,部分是由于大量人口涌向城市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公众前往越来越少的教堂,但是教堂集会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教堂成员的数量增长如同人口增长一样迅速,而教堂的收入和花销则增长得更加迅速。参加教堂仪式的确切出席人数虽然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在平时非常忠诚地前去教堂做礼拜的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礼拜日的早晨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去做。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很明显教堂在美国人的生活中依然维持着与从前相差不多的地位。

然而,人们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维持宗教地位的主要是惯性的力量——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们对恺撒拉丁皇帝的事情投以持续不断

的注意力；到处采纳在布鲁斯·巴顿看来完全可以接受的福音；是任务艰巨的吸纳成员和筹集钱款运动（例如，曼宁主教在纽约采取高压措施迫使人们给“为所有人建立的祈祷屋”捐款，但结果却发现这只是一栋完全由新教圣公会主办的祈祷屋）；同时，教堂上演的戏剧、开放式讨论会、篮球场地和游泳池以及年轻人锻炼肌肉的场所，这些都是吸引人们继续前往教堂的长期诱惑。但是某些精神上的东西已经离开了教堂——也就是那种确信教堂是通往救赎道路的信念。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宗教，数量空前的宗教书籍在人群中流传，名牧师们不停地为流行杂志撰写文章；然而，所有这些事实只不过是说明，对数百万公众来说，宗教已经不再是人们毫无疑问接受的传统惯例，而是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如果去教堂的人数减少了，也许是因为，像沃尔特·里普曼说的那样，人们并不是非常确信自己去教堂是否真的是去与上帝会面。如果牧师的威望下降了，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牧师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非常确信自己怀有一种明确而权威性的使命。查尔斯·斯特茨勒（Charles Stelzle）牧师是一位非常精明的宗教问题观察家，他在《世界工作》上撰文坦率地指出：教堂之所以影响力下降，是由于“那些认同它的人并不是真正地信仰宗教”。斯特茨勒讲述说，他曾经询问过好几批清教牧师，如果他们身为局外人，他们教堂有哪些活动会让他们立刻说出“真伟大；这值得排队去等”，但是却没有收到过任何一个直接的回答，而这种回答甚至连回答者自己都不能满意。在教堂圣会中，人们，尤其是年轻男女，对教堂的忠诚度无可否认地在削弱，而对自己究竟能够从教堂得到什么认识也无可否认地模糊——例如，只要看看当很多大学在取消强制性小礼拜的时候，人们对此进行讨论的语调就行了。

精神动力的减少总体说来要归咎于在战争紧张情绪后道德力量的松弛；要归咎于社会的繁荣景象，因为它滋生了这样一种安逸信念：如果一个人得到一辆凯迪拉克汽车或者是受到《美国杂志》文章的赞扬，那么他就会获利良多；要归咎于日益流行的周日高尔夫运动和开车驾驶行为；要归咎于人们对某些政治团体游说教堂组织的不满，以及人们对很多牧师纵容三K党顽固势力的反感。然而，比这些原因都更重要的是，科学观念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对教堂产生了重大影响。

科学的威望是巨大的。无论是大街上的男人还是厨房里的女人，每天都面对着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各种新机器和新设备，因此他们很愿意相信

科学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完成；同时，铺天盖地的各种科学信息和理论也将他们团团包围。报纸每天都在用大量篇幅将最新的科学发现告诉大众（虽然有时候这种信息并不准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新发表的声明现在已经成为头版内容，虽然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理解他说的话。媒体用各种各样的概要性知识对人们进行普及：向人们讲述星子假说和原子构成，用没有根据的细节向人们描述史前石器时代穴居人的日常生活，让人们了解什么叫电子、内分泌、荷尔蒙、维他命、反射和感觉心理。在水平稍低一些的智力普及上，数百万人第一次发现了有进化论这样一种古老的理论。那些年轻时没有遭遇过什么灾难的人，都是从韦尔斯、汤姆逊、伊斯特（East）、威格姆（Wiggam）、道尔西（Dorsey）以及无数其他科学知识普及者和翻译者那里吸收到了这些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更加新奇也更加令人不安：在茫茫的宇宙中分散着数量数不清的星系，我们的银河系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太阳又只是银河系中一颗非常普通的恒星，而我们则是太阳身边一颗微不足道的行星——地球——上的居民；我们的行为主要是由染色体和内分泌腺决定的；霍屯督人所遵循的神经脉冲与激活第一浸信会牧师行为的那些神经脉冲是类似的，而即使现在让这个霍屯督人按照浸信会密码行事的话，他也很可能已经更加适应霍屯督人的生活环境；性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性压抑是绝不能容忍的，犯罪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说法，大多数不幸的行为都是由于人生早期阶段的各种情结引起的，男人和女人只不过是行为方式的结合体罢了。如果某些科学原理和伪科学原理在人们的脑海里互相矛盾，这似乎也无关紧要：公众的脑袋似乎已经准备好一方面相信伊斯特和威格姆在遗传学方面的权威，而另一方面也相信沃特森（Watson）在环境学方面的声望。







在各种各样的科学里，一门最年轻也最不科学的学科却最让普通大众着迷，并且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最富瓦解性的影响。心理学成为了主宰。弗洛伊德、阿德勒（Adler）、荣格以及沃特森都拥有数万名的信仰者；智力测试者走进学校为学生测试智商；精神病学家在企业公司里就职，为招聘解雇职员和制定广告政策出谋划策；人们必须要靠看报纸才能够完全相信，只有心理学才能够解决任性、离婚和犯罪的问题。

“科学”这个单词已经成为了一种口号。要想平息一场争论，只需在说话的开头使用“科学教导我们”。如果一位销售经理希望通过自己的促销方案，或是一位牧师希望自己组织的慈善行为受到欢迎，他们都会不加考

虑地说，这些都是“科学”的做法。

科学的威望对教堂的牧师们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被哈利·爱默生·弗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博士在战后十年末期总结得非常清楚：

“牧师为了自己的职位，可能会宣扬古老的传统、实际的用处以及精神的需求，可是只需一个问题就可以将这些气泡全部戳破：它科学吗？这个问题在宗教中搜寻违禁物品，剥掉宗教古老而迷信的外衣，迫使宗教改变思维范畴和工作方式，并且从总体上说，这个问题让宗教感到如此害怕而怯懦，以致很多头脑现代的宗教信仰者……一听到别人私语中提及宗教，都会本能地举起手来投降。如果一位著名科学家坚决支持宗教，所有的教堂都会感谢上天并且重新拾起勇气，就好像如果艾廷顿(Eddington)信仰上帝，那就是对上帝最高的赞美和崇拜似的。科学已经成为这一代人思维行动的仲裁者，当评价先知者和预言者合乎科学的时候，这已经达到了赞扬的最顶点。”

由于科学思想入侵的力量非常强大，也由于人们对被证明行为的依赖性非常强大，清教徒开始分化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而在美国，每8个成年人中就有5个是清教徒——有些教徒始终信奉《圣经》，拒绝接受任何新事物，甚至包括科学，因为科学似乎与《圣经》的内容互相抵触，这部分教徒从1921年开始称自己为原教旨主义者。其他教徒则被称为现代主义者(或者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希望自己的信仰和科学思想之间能够产生一种和解；他们把过时的内容抛弃出去，只保留那些基本的并且受到尊重的知识，因此，总体上调停了基督教和这个时代怀疑精神之间的冲突。

原教旨主义者的地位似乎接近于无助的地步，因为他们与理性时代理性思维的浪潮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他们的数量众多，并且至少，他们的坚守毫无疑问是有根据的。尤其是在南部，他们控制了巨大的清教教派。并且他们进行了非常勇猛的斗争。他们迫使自由主义者弗斯迪克博士离开了基督教长老会讲道坛，重新做回自己的浸信会教徒，甚至迫使他因为异端主义而受到审判(虽然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他们将很多联合提案引进了将近半数州的立法会，而这些法案都是为了禁止讲授进化论学说而提出的；在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他们的法案在立法会的这个房间里刚刚通过，但是却在另一个房间里

又失败了；在田纳西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他们则确实成功地将自己不合时代的愿望写进了法律。

现代主义者虽然有时代精神支持他们，但是他们自身并没有联合起来。他们对上帝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既说上帝是最重要的事业，又说上帝是绝对的能量，既说上帝是理想化的现实，又说上帝是创造过程中的正义愿望，还说上帝是所有最高尚和最优秀的人都朝之前进的理想与目标——但是这些解释本身却是各不相同而且含糊其辞的。有些解释几乎无法让崇拜者感到满意：新英格兰的一位牧师说，当他想到上帝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某种长方形的模糊不清的东西"。同时，现代主义者抛弃了很多旧有的教义，而大部分美国清教徒却是在信仰这些教义的过程中长大成人的（例如童贞女生子、基督的复活以及代替赎罪论），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现代主义者的宗教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宗教的内容，除了一种模糊不清的信仰，一种普遍的仁慈，以及倾向于对每一个人保证说他们一样虔诚。沃尔特·里普曼说，离他们而去的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深沉的、情不自禁而朴实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对许多人来说是宗教的本质。只有极少数人例外，因为他们可以生活在自己内心的神秘世界里，或是可以依靠他们理解的力量而活"。不仅如此，现代主义者需要斗争的不仅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在科学概要知识养育下成长起来的怀疑论者；不止一位现代主义者领导人在他们所做的布道中让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现代主义试图不通过求助权威证据而应对怀疑论者的辩论，结果却导致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削减自己的信条，甚至削减到了无可削减的地步。

在整个战后十年中，这三方的冲突一直持续不断。而 1925 年的斯科普斯案件则将这种冲突推到了最高潮。

原教旨主义者控制下的田纳西州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说："在接受该州公立学校基金全额或部分资助的任何大学、师范院校以及其他公立学校中，如果该校老师讲授任何否定《圣经》所说的上帝创造人类的理论，并且讲授人是从低一级的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就都是属于违法行为。"

这条法律刚刚被写进书本不久，田纳西州一个普通小镇德顿就有几个人决定对此进行一番试验。乔治·拉普利亚(George Rappelyea)是一位采矿工程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则是一位招人喜欢的 24 岁的小伙子，他在中心中学教授生物学。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他们两人，还有其他两三

个人，当时正在罗宾逊的杂货店里喝着柠檬味的磷酸果汁汽水。拉普利亚建议说，斯科普斯应该向一个天真的孩子讲授进化论的学说，并且规划好时间，正当其这么做的时候被当场抓住；而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的斯科普斯则同意了。他们很明显动机不纯；因为拉普利亚宣布说他们的行为将让德顿小镇一举成名，而他的这种说法非常具有时代特征（这起事件的叙述者，和蔼可亲的阿瑟·加菲尔德·海斯(Arthur Garfield Hays)，是这么认为的）。无论如何，这起犯罪行为很快就完成了，并且斯科普斯也被捕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立刻自愿为这起案件提供法律服务；拉普利亚打电报给纽约的公民自由联盟，为斯科普斯向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达德雷·菲尔德·马龙(Dudley Field Malone)和阿瑟·加菲尔德·海斯请求法律援助。案件决定在1925年的7月开庭审理，而德顿小镇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一下子就如此出名了。

有些东西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纳税人有权决定那些用他们的税款建立起来的学校应该教些什么，哪怕他们的决定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但是这起斯科普斯案件，正如数量众多的读者在报纸上看到的那样，并不是纳税人权利和学术自由之间产生的难以理解的纷争。在公众的眼睛里，这起审判是一场原教旨主义和20世纪怀疑论（受到了现代主义的支持）之间的斗争。斗争双方的拥护者都是经常上报纸大标题的著名人物。布莱恩曾经三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曾经做过国务卿，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他完美地体现了旧式的美国理想主义——友善、天真而带有乡土气。而丹诺则是一位激进主义者，是那些受压迫者的朋友，也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最近刚刚因为对利奥波德和洛普的辩护案件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人物。为了一起如此富有感情色彩的案件，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连泰克斯·里卡德几乎都无法转移人们对这场斗争的关注目光。

这是一起奇怪的审判。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到了德顿这个平静的小镇：消瘦憔悴的田纳西农民们带着家人，坐着骡车和摇摇晃晃的福特车来到小镇；他们是一群安静而正直的人，穿着黑色的外罩和条纹棉布衫，准备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而对那些“外国人”表示反对，然而同时他们又很好奇，想知道这种新鲜的进化论学说究竟是什么东西。各种各样的信仰复兴运动的人也大批来到小镇，他们在灯光闪闪的小镇郊区举行集会，在法院周围的树上粘贴标示——“每周读一次你的圣经”，以及“你的罪恶肯定会将你揭发的”，而就在法院的大门上，粘贴的标示上则写着：

**天国**

基督耶稣的仁爱和天堂街道就在身边。你想成为一个甜美的天使吗？只需要40天的祈祷。为了永生，将你的罪过逐条列出吧。如果你清白地来到天堂，上帝就会亲自与你对话。

不过，德顿小镇的气氛也并不全是充满乡土气的虔诚。卖热狗和柠檬水的小贩们沿着街道摆摊设点，就好像这是看马戏的日子。书商们运来大量关于生物学的书籍沿街叫卖。100多个报社记者来到了小镇。西联汇款在一家杂货店里派驻了22个电报操作人员。随着审讯时间的临近，法庭里挤满了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和他们挤在一起的则是脸色严肃的田纳西农民；人们谈话的声音嗡嗡不断，脚步拥挤碰撞的声音不断，电报机发电报的嘀嗒声不断，空气中充满着紧张的悬念，就好像戏院里即将开始首场演出。法官、被告，还有律师，衣着都很随便，只穿着衬衣而没穿外衣——布莱恩穿着一件茧绸衬衫，脖子部分的衣领朝里折了进去，丹诺身上的背带是淡紫色的，而劳斯顿(Raulston)法官身上的吊裤带更加具有一点法庭的色调——但是并不是一点都看不到时尚的影子。整个国家通过电报机上传出的新闻都得知：法官的女儿们在跟随父亲一起走进法庭的时候，脚上穿的是滚边长筒袜，和大城市的那些时髦女郎打扮得一个模样。虔诚的祈祷仪式拉开了审理的序幕——电影操作员们爬上桌椅，从各个可能的角度对这场审判里的主要角色进行摄影。各种各样的证据应有尽有：从14岁的霍华德·摩根(Howard Morgan)走进法庭，向人们讲述斯科普斯虽然对他讲授了进化论，但这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到一位动物学家给出自己的估计，他说生命早在大约6亿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论断引起了观众席上那些农民不相信的喘气声和窃笑声)。与此同时，有200万字的新闻报道通过电报的形式飞出了德顿小镇，《芝加哥论坛报》的无线电广播站WGN对这场审讯进行了广播，康尼岛的梦乡马戏团为斯科普斯的辩护中"存在于类人猿与人类之间的过渡生物"而造势。电报公司报告说跨越大西洋的电报费用上涨巨大，伦敦的新闻社被团团包围，因为很多国家，包括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中国和日本都向他们要求更多的新闻材料。德顿小镇迎来了喧嚣和躁动。

这是一场痛苦的审判。田纳西州的首席检察长斯图尔特(Stewart)大





声抱怨说，这种阴险的学说“破坏了田纳西儿童的信仰，并且掠夺了他们获得永生的机会”。布赖恩指控说，丹诺的惟一目的就是“让《圣经》蒙污”。而丹诺则指控说，布赖恩的目的是“愚弄宗教”。然而，一次又一次，现场却接近于一场闹剧。最终，闹剧的最高潮在7月20日的下午出现了，而痛苦的情绪也达到了最顶点。海斯出于一时冲动，要求法庭允许布赖恩充当圣经专家的角色，而布赖恩也同意了。

由于那天下午现场的人群非常拥挤，法官决定移师户外，将法庭设在枫树底下面向法院的一个讲坛上，而长椅则摆放在对面。记者们坐在长椅上、地上，或是其他地方，潦草地写着手中的故事。在这群坐着的人外围，还有一大群人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而阳光则穿过枫树继续直射下来。坐在讲坛上的是只穿着衬衣的克莱伦斯·丹诺，他膝盖上放着一本圣经，对最博学的原教旨主义者进行了一番法庭审判史上最为奇怪的审问。

他提出的问题包括约拿和鲸鱼，约书亚和太阳，该隐娶妻的地点，洪水暴发的时间，以及巴别塔的重要意义。布赖恩确认了自己的信仰：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创造的，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348年左右；夏娃确实是用亚当的肋骨造成的；巴别塔是世界上出现多种语言的原因；“一条大鱼”吞掉了约拿。当丹诺提问说，他是否发现了该隐娶妻的地点，布赖恩回答说：“没有，先生；我让不可知论者去搜寻她了。”当丹诺提问说：“你是不是说，你不相信这个地球上在5 000年前就存在文明?”布赖恩坚定地回答说：“我对我所看到的证据不够满意。”神经紧绷的两人由于紧张和炎热都变得精疲力竭；当丹诺宣布说，他对布赖恩审问的目的是“揭发原教旨主义……以阻止顽固分子和不学无术者控制美国的教育体系”，一听到这话，布赖恩立刻脸色发紫地跳了起来，向丹诺边挥舞着拳头边大喊道：“保护《圣经》，反对美国最顶级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

这是一场残忍的对决，而对前任国务卿来说则是一场悲剧。他在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辩护。这也是他在伟大的美国人民面前的最后一次露面——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去世了)——那些人民曾经给予他很多荣誉，而包围着他的则是无尽的羞辱。他所代表的那种宗教信仰无法让证人席感到信服，也无法面对理性的质询。

7月21日早晨，劳斯顿法官仁慈地中止了对布赖恩的继续审问，并且消除了前一个下午那场证词的痕迹。斯科普斯的律师在陪审团面前无法给出任何科学证据，而现在他们发现，他们能够按照计划为此案进行辩护

的惟一机会就是放弃这起案件，然后向田纳西州立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斯科普斯立刻被宣布有罪，被判罚款 100 美元。州立最高法院后来对这条反对进化论的法律给予了支持，但是通过技术处理释放了斯科普斯，因此避免了进一步的上诉。

从理论上说，原教旨主义赢了，因为法律仍然继续生效。但是实际上，他们却输了。立法者可能仍然会继续通过反对进化论的法律，偏远地区那些虔诚的人们也可能仍然将他们对宗教的信仰锁闭在自己的头脑里，拒绝科学知识的进入；但是所有地方受过教育的人们却都怀着惊讶和娱乐的心情看待德顿小镇的这场审判，而原教旨主义者的确定性却逐渐被人们抛弃。

记者们、电影人们、报业辛迪加的作者们以及电报操作员们将德顿小镇上的尘土从自己的脚上抹去。这次耍猴戏般的审判曾经是头版上的精彩表演，可是它的含义却有点太文绉绉了。下一场表演又是什么呢？……来一场纯粹一点的不涉及生物学的比赛，怎么样？

## 五

1925 年缓缓地走向了年尾。由于伟大的仙纳度号海军飞艇失事，全国上下饱尝了持续多天的恐惧之苦。佛罗里达州的房产热潮达到了令人眩晕的最高峰。而随后的美式足球赛季则让人们看到，大肆宣传的技术手法究竟能为一个美式足球明星带来什么。任何人都不需要生物课程就能够欣赏瑞德·葛朗奇(Red Grange)。

战后十年是一个伟大的体育时代。打高尔夫球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身穿肥大的灯笼裤，膝盖处垂着流苏，腿上则是格子图案的长袜。全美共有 5 000 个高尔夫球场，据说有 200 万名球员，而据估计，每年花在这项运动上的费用达到了 5 亿美元。会打高尔夫球几乎已经成为了所有心怀抱负的商界经理人的必备能力。乡间俱乐部在数以百计的社区里都成为了社交生活的中心。但是在这个运动的时代，观看体育比赛的人更要多于亲自进行体育运动的人。公众对体育节目充满了狂热，公众也愿意相信这个时代的伟大运动员都是超人，而推销员、商会成员、报社老板、体育记者、新闻广告员以及无线电广播员都发现，对公众这种激烈情绪




的利用可以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利益。因此，美式足球球场、棒球球场和拳击场则第一次将大肆宣传的炫目灯光全部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那些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弄明白铜头高尔夫球棍和铁头高尔夫球棍之间区别的人们，贪婪地从第一流的期刊上阅读关于鲍比·琼斯的故事，看他是怎样用手中那可怕的轻击棒打败克拉米提·简(Calamity Jane)的。做一个成功的职业高尔夫选手收入非常可观：瓦尔特·哈根(Walter Hagen)几年间的收入都大约在4万～8万美元之间；并且因为允许佛罗里达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用他的名字冠名并且出席该公司的活动，而获得了一年3万美元的收入和一栋房子。棒球世界大赛吸引的观众数量打破了以往的记录。人们对美式足球的激动情绪也是非常高涨，只要出现重要球队的比赛，那些只能够容纳5万名、6万名或7万名观众的体育场馆经常人满为患，甚至连最后一个座位都能够坐满，而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坐在家中温暖的客厅内通过收音机收听比赛的现场报道，而格拉汉姆·麦克内米则通过电波对听众说，圆形露天剧场外围的座位真是非常寒冷啊。据说耶鲁运动协会仅仅一个赛季的门票收入就超过了100万美元。那些代表学校的球队经常一次巡回比赛就得花上好几个星期，而吸收学术知识的机会大概就只能是在卧车上了，车子或者是行驶在扬基体育场和芝加哥之间，或者是行驶在得克萨斯和巴沙迪那市的玫瑰杯美式足球锦标赛之间。有很多美国人可以认出纽特·罗克尼(Knute Rockne)是圣母队的教练，却不一定能够知道美国参议院议长是谁。当然，相对于高尔夫领域的琼斯、棒球领域的卢斯或是网球领域的梯尔登，美式足球领域明星运动员的声望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像阿尔德里奇(Aldrich)、欧文(Owen)、波·麦克米林(Bo McMillin)、埃尼·尼维斯(Ernie Nevers)、葛朗奇、四骑士、本尼·弗里德曼(Benny Friedman)、卡德维尔(Caldwell)、卡格尔(Cagle)以及阿比·布斯(Albie Booth)这样的美式足球明星，统治的时间都很短暂。但是瑞德·葛朗奇的例子却可以说明，在卡尔文·柯立芝当政时代，当人们怀揣鼓鼓的钱包，当大肆宣传的艺术仍然非常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时候，一个体育领域的英雄究竟可以享有多么崇高的名望。

在送往媒体的一份宣传资料中，伊利诺伊大学这样称赞着自己最伟大的产品："瑞德·E. 葛朗奇——中间的名字是爱德华——于1903年6月13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沙利文县的福克斯维尔。他的父亲莱尔·N. 葛朗奇(Lyle N. Grange)，年轻时代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州山区最为杰出的

伐木工人，因其力量、技术和胆量而享有威望。他的母亲是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士，在瑞德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父亲才决定离开宾夕法尼亚州搬到伊利诺伊州的惠顿……他的父亲终生没有再娶，如今是惠顿的副治安官。"

但是，这份宣传资料（以这种狂想曲般的论调撰写了很多段的赞美诗）也许有点太过随便了。只要说一下这几句话就足够了：瑞德·葛朗奇——"惠顿杀手"是他的外号——在代表伊利诺伊大学队踢球的过程中表现非常优秀，因此在1925年赛季末尾的时候（这一年他大学四年级），他决定不再继续学业，而是享受他的声望所带来的丰硕果实。就让下面这一系列电报语言般的条目总结一下他的重要成就吧：

11月2日——学生们抬着葛朗奇走了两英里远。

11月3日——他的球衣将被伊利诺伊大学装框收藏。

11月11日——崇拜者们之间传递着一张陈情表，提名还不到年龄的葛朗奇进入国会。他对纽约巨人队给出的三场比赛40 000美元的开价沉默不语。

11月17日——一家房地产公司向他开价一年120 000美元。

11月21日——代表伊利诺伊大学队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此后成为职业球员。

11月22日——与芝加哥签约。

11月26日——代表熊队进行了第一场职业比赛，收入12 000美元。

12月6日——进行了在纽约的第一场比赛，收入30 000美元。

12月7日——与箭电影公司签订了一份300 000美元的电影合同；到6月份的时候可以赚取100 000美元。

12月8日——受到柯立芝总统的接见。

然而，公众却是薄情的。仅仅几个月之后，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母亲格特鲁德·埃德尔（Gertrude Ederle）在纽约受到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登普西和滕尼正在准备他们的费城激战，而聚光灯已经离开了瑞德·葛朗奇。五年之后，有报道说他在好莱坞的一家夜总会里工作，而此时另外一位曾经的美式足球明星，耶鲁大学的后卫卡德维尔则在纽黑文经营着一家餐厅。

公众对参与体育运动的狂热情绪在登普西和滕尼的两次拳击比赛中达到了最高潮，第一次对决于 1926 年 9 月在费城举行，第二次于一年之后在芝加哥举行。曾经一度被视为非法的职业拳击比赛如今在美国人民的眼中变得如此高尚，以致上流人士都蜂拥进入拳击场地观看比赛，长岛的一位牧师甚至被迫推迟所在教区委员会的会议，以便让委员们通过收音机收听一次重大的拳击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前的好几个星期，报纸上就用大量的篇幅对来自训练营地的各种小道消息和预言进行报道；公众的兴趣被署名文章这样的策略大大地勾了起来——这些文章都是通过稿件辛迪加被广泛出售的——在这些文章里，比赛双方对彼此严厉斥责（有一次，双方的文章竟然是由同一名枪手撰写的），甚至对体育运动一向传统而保守的《纽约时报》都在头版上用整整三排大标题宣布了一次重要比赛的结果。滕尼在费城打败疲惫的登普西那场比赛共吸引了 13 万人观看，而这场比赛的门票收入达到了 200 万美元；一年之后在芝加哥举行的第二场比赛共吸引了 14.5 万人观看，而门票收入则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60 万美元。对比一下 1919 年当登普西在与威拉德比赛中赢得冠军时那微不足道的 45.2 万美元收入，你就会衡量出在这几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芝加哥的露天圆形剧场如此之大，以致坐在最外围座位上的观众有 2/3 在比赛结束之后甚至都不知道究竟谁是赢家。而欣赏比赛者也不局限于芝加哥这些拥挤的人群，因为还有另外数百万人——电台工作人员宣称人数是 4 000万——通过收音机收听了这场令人屏住呼吸的比赛。在第七回合——当滕尼倒下时，裁判推迟了数秒的时间，直到登普西退到了拐角，他才开始数秒，给了滕尼 13 秒钟的恢复时间——而在这段时间，有五人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突发心脏病死亡。另有五人则在知道结果后因过于激动而死亡。

同样精彩的是这两场非凡比赛的后果。在战后十年开始的时候，登普西是一位拳击手；但是到了战后十年的末尾，他已经变成前拳击手了。不过滕尼没有这么不幸。他从声望的顶点稳步走进了文雅而时尚的社会圈子的上层，在那里像他这样的重量级拳王，被公众戴上了名望的光环，属于很受欢迎的新鲜一族。滕尼在三年的比赛中，以自己的高超技艺赢得了 1 742 282美元的收入，在耶鲁大学菲尔普斯（Phelps）教授的课堂上作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与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一起步行前往欧洲作了一次旅行（后者是当年畅销小说《圣刘易斯雷的桥》的作者），并且娶了康

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位年轻的贵族小姐为妻。在遍游国外之后，他带着新娘回到了美国，并且在抵达家乡时发表了一次演讲。这篇演讲稿即使不是非常具有莎士比亚或怀尔德式的风格，起码也能够看出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当我们的船只经过纽约湾海峡的时候，真是很难相信自从我乘坐毛里塔尼亚号驶往地球的另一端以后，15个月已经匆匆而过了。在这15个月里，滕尼夫人和我游历了很多国家，结识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我们非常享受我们的旅行，但是却发现，最令我们高兴的事情仍然是回归祖国，与我们的人民和朋友相聚。

我在意大利听说，在国内有传言说我正在考虑重新回到拳击场地，为捍卫重量级拳王的声誉而战。但是这个传闻绝不是真的，因为我已经永久地结束了公众生涯。我如今的伟大工作就是平静而简单地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给我带来了最幸福的感受。

体育记者们对滕尼结束拳击生涯以后的日子表现出一种绝然的冷漠。但是他只是在行使着古老的民主特权，使自己的地位高于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喧噪的大肆宣传将他推向了名声的顶峰，而他利用了这一点，离开了拳击世界那种不确定的气氛，去寻求更加健康的氛围。

## 六

随着1925年的即将结束，1926年缓步走来。公众的注意力已经离开了瑞德·葛朗奇，转向很多其他的事情。例如：公众对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和艾琳·麦凯（Ellin Mackay）之间联姻的关注，表明数百万人由于受到好奇心的驱使而忘记了要去尊重别人的隐私。此外，公众关注的事情还包括：罗斯福总统的弗雷德（Fried）上尉在大洋中央英勇地救起了安提诺号轮船上的受难者；加斯卡特·维拉（Cathcart Vera）伯爵夫人由于道德败坏而被逐出了美国；拜德（Byrd）驾驶飞机大胆地飞越了北极。而到了1926年夏天，人们则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一桩失踪案，失踪者是艾米·塞姆浦·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加利福尼亚州四方福音教会的

创立者，而失踪的地点则是一个海边浴场。这起失踪案成为了一系列滑稽歌剧中的第一幕戏，将在随后的数年之内都吸引着好奇的游客成群结队地前往麦克弗森夫人的安吉利斯主教堂。

夏天结束了——在这个夏天里，英吉利海峡挤满了游泳者，数千个家庭的小屋桌子上都摆放着褐色封面的《特洛伊的海伦的私生活》，身着及膝短裙和横条纹毛衣的少女们在学着跳查尔斯顿舞，而在费城，虽然有登普西和滕尼之间比赛所带来的巨额收入，但是费城150周年纪念还是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赤字。而在这个夏末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能够淋漓尽致地说明，那些精明的媒体代理人可以如何制造出令全国上下集体轰动的新闻事件。一位名叫鲁道夫·阿方索·拉斐尔·皮埃尔·菲力柏特·古列尔米·瓦伦蒂诺·安东古奥拉（Rudolph Alfonzo Raffaele Pierre Filibert Guglielmi di Valentina d'Antonguolla）（他更喜欢被称作鲁道夫·瓦伦蒂诺，这一点可以理解）的31岁年轻人在纽约去世了，而前来百老汇大街的殡葬所为他吊唁的人群竟然站满了11个街区。虽然他在银幕上的缠绵爱抚令无数影迷脉搏加快；虽然他被称为"酋长"并以自己的连鬓胡和热情洋溢的气质为男人给出了性魅力的标准；但如果不是他的经纪人运用离奇的手法安排了这个悲伤景象，如果不是殡葬所的新闻广告员哈里·C. 克莱姆弗斯（Harry C. Klemfuss）为报纸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例如提前分发的照片，照片上不仅有即将摆放死者尸体的房间，还有送葬的行列（按照赛拉斯·本特的说法，在葬礼开始之前，街面的报纸上就出现了一张表现送葬行列的照片）——这种悲伤的场面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由于这么多有效的帮助，媒体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全心全意的报道，甚至有大批人群在殡葬所发生了骚乱，并因此导致数十人受伤。对宣传手法的这种使用相当令人满意：瓦伦蒂诺去世之前债台高筑，但根据经纪人后来给出的证词，他去世之后的电影不仅消除了债务，还为他带来了600 000美元的财产。很多高尚的人们为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感到遗憾，虽然他与瓦伦蒂诺几乎同时去世，却根本没有引起这么壮观的悲悼。因为哈佛大学的荣誉校长，即埃利奥特，是缺乏为自己组织规模如此宏大的葬礼的职业化才能的。

滕尼击败了登普西，一场飓风给佛罗里达的繁荣带来了致命一击，罗马尼亚的玛丽女王在千里之外也发现了大肆宣传的好处，于是对美国进行了一次皇家访问；而在1926～1927年冬天的连续好几个月里，美国人都深

陷于丑闻与犯罪之中。

四年之前的 1922 年，爱德华 · W. 霍尔牧师与埃莉诺 · R. 米尔斯(Eleanor R. Mills)夫人在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附近的德拉西小径上的山楂树旁被杀，不过当年的大陪审团并没有收到任何控告。但是在 1926 年，一家小报为了获得更大的发行量，挖掘出了据称是非常重要的新证据，使这起案件又受到了重新审理。于是，霍尔夫人被捕了——逮捕的时间非常不合常理，所以只有这家小报的记者和摄影师抢到了独家新闻——霍尔夫人和两个兄弟受到了审判，因此为全美所有的报纸读者提供了紧张刺激的感受。

这个十年最为轰动的审判中最为轰动的一幕场景发生在“肥女人”简 · 吉布森(Jane Gibson)出庭作证的时候。据说这位简 · 吉布森即将离世，所以她是被担架从医院抬到法庭，躺在陪审团对面的一张床上作证的。吉布森夫人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当时，她的玉米似乎经常受到坏人的抢劫，所以她深受此事困扰。谋杀案发生的那个晚上，她听到了马车的咔嗒咔嗒声，还以为里面坐着的是抢劫玉米的罪犯，于是她起来给骡子詹尼套上缰绳，沿着德拉西小径一直跟随着马车，不停地“偷看、偷看、偷看”。在那条路上，她看到一辆汽车里坐着两个人，她认出来这两个人就是霍尔夫人和威利 · 史蒂文斯。她把詹尼拴到一棵雪松树上，然后听到了有人争吵的声音，其中一个声音说道，“把这些信解释一下”；借着手电筒的光，她看到了亨利和威利 · 史蒂文斯，听到了枪击声，她害怕得立刻一路往回跑到家——可是回家后却发现她落下了一只拖鞋。虽然她很害怕，可是她还是沿原路返回去找自己的拖鞋，却听到了一种叫声，她原以为是猫头鹰的叫声，可是却发现是一个女人在哭——“一个大块头的白发女人手里在做着什么事情，嘴里也在哭喊着”。她说这个女人就是霍尔夫人。所有这些供词都是这个“肥女人”躺在床上哭号着给出的，而与此同时，训练有素的护士就站在她的床边并且按着她的脉搏。随后，吉布森夫人对被告大声呼喊道：“我说的都是事实！上帝帮助我吧！您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接着她就被抬出了房间。

“肥女人”的证词并没有因为她这个充满波折的经历而增加说服力；而陪审团如果知道这位法庭表现如此精彩的“将死的证人”还将生活四年之久，他们对她证词的印象就更加模糊了。霍尔夫人和两个兄弟高贵地经受住了对他们的考验，而头脑迟钝的威利 · 史蒂文斯尤其让数百万对谋杀审

判案有兴趣的人们感到高兴，因为虽然辛普森(Simpson)参议员企图通过恐吓使他陷入混乱，但他坚决地抵制住了这种企图。那家小报挖掘出来的新证据——主要是一张名片，据说上面有威利·史蒂文斯的指纹——也没有给陪审团留下什么印象。

可是，虽然这次起诉就此瓦解，但史蒂文斯家族的声望却遭到了破坏，而报纸读者对此感到极度的幸灾乐祸。在这场审判的前 11 天，从新泽西州的萨默维尔每天都发出 500 万字的新闻报道。在这里的新闻工作人员的数量是当年德顿小镇规模的两倍。记者中包括小说家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宗教复兴运动领导者比利·桑德(Billy Sunday)，被杀的米尔斯夫人的丈夫詹姆斯·米尔斯；还有牧师约翰·罗奇·斯特拉顿(John Roach Straton)，他曾经宣称布赖恩的斗篷是原教旨主义的领导者，并且每天都写一篇社论，利用这起案件对读者进行说教。在世界上最大的电报配电板上安插着数目众多的电线，通过电报的形式将充满着欲望与犯罪的新闻消息传递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公众们则贪婪地吞噬着这一切并且渴求着希望出现更多类似的消息。

公众渴求的声音是如此坚持，以致当仅仅几个月之后又出现一桩谋杀案时，大肆宣传的力量又一次开始了行动。这次的受害人是一位名叫艾伯特·斯奈德(Albert Snyder)的艺术编辑，两位谋杀者一个是死者的妻子，一个是妻子的情人—— 一位名叫朱迪·格雷(Judd Gray)的女性胸衣推销员，而谋杀工具则是吊锤。这起案件既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被害者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而它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报纸头版，只是因为此案涉及的是三角性关系，而涉案人员也都是生活在纽约郊区的普通人——而这样的普通人很容易让普通读者产生共鸣。由于对各种各样的恐怖故事的需求非常之大，伟大的西联汇款配电板又一次开始了繁忙的工作，并且吸引了一大群更引人注目的特殊记者对这起肮脏的戏剧事件进行诠释[这些记者包括大卫·华克·格力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佩姬·乔伊斯(Peggy Joyce)、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莱恩哈特(Rinehart)夫人、比利·桑德，以及斯特拉顿博士]，而美国人民又一次贪婪地舔舐着鲜血的味道。

在霍尔—米尔斯案件和斯奈德—格雷案件发生的间隙中间，公众们还有机会谈论另外一起更粗俗的丑闻。被人们称为“桃子夫人”的弗郎西丝·汉南·布朗宁(Frances Heenan Browning)，提出诉讼要和丈夫爱德华·W. 布朗宁(Edward W. Browning)分手，因为她身为纽约房地产商人

的丈夫，非常热衷于和年幼少女玩“王子与灰姑娘”的游戏。在人们的推测中应该态度冷静的各大著名报纸公布了布朗宁爸爸冒险经历中很多令人厌恶的细节；小报《纽约画报》则刊登了一张“合成”照片，照片中的布朗宁穿着睡衣，对半裸的妻子大喊道：“哦！哦！别做傻瓜！”而原因则是——根据照片下方的说明可以得知——她“拒绝全裸游行”。甚至在过去从来没有拒绝过丑闻的《每日新闻》，都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公众将会“被淹没在淫秽世界之中”。

很多人都怀有和《每日新闻》一样的感觉，认为公众的品味已经如此堕落，这真是令人沮丧。的确，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他们都这么认为。对商业化堕落的这种狂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于是，变化来临了——突然就来临了。

## 七







1919年，纽约布雷维沃特与拉法叶旅店的老板雷蒙德·奥泰格（Raymond Orteig）出价25 000美元，作为奖金准备提供给第一个驾驶飞机不停顿地从纽约飞到巴黎的人。为了赢取这笔奖金，在斯奈德—格雷审判案结束之后没有几天，就有三架飞机在等待合适的天气准备从纽约郊外的罗斯福机场起飞，它们分别是：哥伦比亚号，驾驶员是克拉伦斯·钱伯林（Clarence Chamberlin）和劳埃德·贝特奥德（Lloyd Bertaud）；美洲号，驾驶员是曾经飞越北极的拜德少校；还有一架是圣路易斯精神号，它是突然从太平洋海岸来到这里的，而驾驶员则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名叫查尔斯·A. 林德伯格。虽然不知道这三架飞机谁将首先起飞，但很明显，公众偏向的是那位来自西部的小伙子林德伯格。他很谦虚，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而他决定孤身一人进行这次危险的旅行，更让人觉得他很勇敢。同时，他也是摄影记者眼中相貌最具魅力的年轻人，并被称作“幸运的林迪”和“飞行迷”，而这一点让他烦恼。聚光灯全都打在他的身上。不过，这时候的他还没有被神化。

1927年5月19日晚上，林德伯格觉得，虽然长岛下着小雨，但是天气预报却说有可能天气会转好适于他的飞行，因此他决定最好做好准备。第

二天早晨，他花了几个小时进行准备工作，先是前往寇蒂斯机场，收听最新的天气预报，然后把飞机推到罗斯福机场并且加足燃料，最后在快到8点的时候——这是5月20日的早晨——他爬进了飞机，起飞，向巴黎出发。

随后，奇迹发生了。

林德伯格起飞的消息刚刚通过电波公之于众，整个美国一下子变得极度兴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农民还是股票经纪人，无论是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怀疑论者，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大老粗，所有的人都同心一致，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位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的年轻人身上。为了了解人们这种情绪的紧张程度，我们来看个例子吧：20日晚上，马罗尼（Maloney）和夏基（Sharkey）正在纽约的扬基体育场举行拳击比赛。当主持人要求大家为林德伯格祈祷的时候，全场4万名冷淡的拳击迷们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脱下帽子，在一片感人的寂静中为他祈祷。第二天，传来了林德伯格一步步迈向成功的后续消息——他抵达了爱尔兰海岸，他正在穿越英国，他飞越了英吉利海峡，他降落在布尔热机场，并且被众多热情的法国人团团围住——于是美国人民感到了发疯般的喜悦和宽慰。当人们从报道中得知，林德伯格在巴黎停留的前几天里表现得非常谦虚有礼，魅力十足，他在数百万美国同胞们的心里立刻占据了最崇高的位置。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大众表现出了无比的狂热与激情，其热烈程度创下了喧嚣时代的历史新记录。无论对报纸还是对报纸的读者，除了林德伯格和他的故事，其他任何内容都无关紧要。在林德伯格完成飞行的那一天，《华盛顿明星报》比平时多卖出了16 000份，《圣路易斯快邮报》多卖出了40 000份，而《纽约晚世界报》则多卖出了114 000份。一天又一天，报纸的大标题都在描述着林德伯格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的胜利旅程，这一切都说明，对《纽约晚世界报》称林德伯格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单独一人所创造的最为伟大的壮举"的说法，公众完全赞同，虽然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太过夸张。在报道他返回美国消息的时候，一家报纸整个周日版全部都是关于林德伯格的文章和图片，足足有100栏之多。当柯立芝总统派出一艘美国海军巡洋舰专程前往法国迎接这位年轻公民和他的飞机的时候，没有人问一声这种做法是否合适。为了欢迎他的归来，华盛顿举行了一场户外集会，而总统在欢迎会上所作的发言——按照查尔斯·梅尔兹的说法——是"自从对国会的年度报告以来他所作的最长、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西联汇款提供

了很多固定格式的信息，供人们打电报给林德伯格庆贺他的归来。共有55 000条电报信息发给了他——这些电报都被装在一辆大卡车上，在他身后一起在华盛顿游行而过。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份电报上面有 17 500 个签名，共有 520 英尺长，要靠 10 个送信人在下面抬着蹒跚而行。在纽约举行公开的欢迎会之后，街道清洁部在打扫时发现，那些为了表示欢迎而从办公大楼窗户扔出来的碎纸共有 1 800 吨重——而 1918 年 11 月 7 日那场提前庆祝停战的狂欢活动结束之后，所打扫起来的纸张仅仅只有 150 吨重！

林德伯格被授予了上校军衔，被授予了十字飞行荣誉勋章，国会荣誉勋章，以及数量众多的外国勋章和名誉会员身份，由于数量如此之多，光把这一长串的名单重复出来也将是一件令人疲劳的工作。有人向他提供了250 万美元供他驾驶飞机环游世界，也有人出价 700 000 美元请他在电影里露面；他的签名卖到了 1 600 美元一个；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以他的名字命名，更有人建议在芝加哥建造一座高 1 300 英尺的林德伯格塔，"现代历史上给予个人的最丰盛的晚宴"以纪念林德伯格的名义被消费；而数量多得惊人的街道、学校、饭店和公司都想方设法希望能够分享他的名字所带来的荣誉。

在所有这些喧嚣的大肆宣传活动中，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反对者。人们也许会因为其他任何事情而意见分歧，但是在给予林德伯格的高度赞扬上，公众的表现却是惊人的一致。

在欣赏这种非比寻常的对林德伯格普遍的赞美和爱戴的同时——爱戴这个词表达的情绪还是不够强烈——人们必须提醒自己要注意两三个事实。

林德伯格的飞行并不是驾驶飞机跨越大西洋的第一次飞行。早在1919 年，阿尔科克和布朗就已经驾驶飞机从纽芬兰直接飞到了爱尔兰。同一年，NC－4 号载着 5 名乘客取道亚述尔群岛飞越了大西洋，而载有 31 名乘客的英国飞艇 R－34 号则先从苏格兰飞到长岛，然后转身又飞回了英国。1924 年，德国的飞艇 ZR－3 号(后来被人们称为洛杉矶号)则载有 32 名乘客从弗里德里希港起飞，抵达了新泽西州的雷克赫斯特。同样在1924 年，美国两架环游世界的军用飞机取道冰岛、格陵兰岛和纽芬兰岛飞越了北大西洋。而林德伯格飞行的新奇之处则在于，他不是从纽芬兰岛起飞，而是直接从纽约飞到了巴黎，并且他是一个人完成了这番壮举。

不仅如此，他的这番英勇行为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飞行事业固然

因此而变得更加繁荣，但是总体来说，发展得却并不健康，因为很多飞行者企图效法林德伯格的行为，盲目地飞向国外的海岸，却因此而命丧大西洋。事情过去几年之后再回头看看，在剥掉感情内涵的装饰之后，这只不过是一次大胆的飞行壮举罢了——是到那个时候为止最长的旅行——而完成这番壮举的人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只是简单地将自己称为一个特技飞行员。那么，对林德伯格的盲目崇拜又是为了什么呢？

解释很简单。一个幻想破灭的国家已经厌烦了廉价而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以及丑闻和犯罪，她对自己曾经那么沉迷于此而感到非常厌恶，并且深感人性的堕落。很多年来，美国人民的精神都处于饥饿状态。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初的理想和希望一个一个被各种事件和观念所带来的腐蚀性的影响而摧毁破灭——战争的后果令人失望，各种科学学说和心理学理论破坏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且嘲笑了他们的情感理念，政治领域出现了重大贪污受贿行为，城市的街道上犯罪不断，而最近的报纸总是对那些淫秽事件和谋杀事件宠爱有加。他们的浪漫精神、骑士精神和自我奉献精神都被揭穿；历史上的英雄被发现也不是那么可靠，历史上的圣人们则被发现只不过是怀有奇怪情结的普通人。虽然商业这个上帝可以崇拜——但是一种怀疑态度却始终在人们脑海里盘旋不去：这个上帝也是金钱制造的吗？喧嚣的大肆宣传让当代的公众英雄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可是这些英雄却并不能让所有人都全心信服，而他们则通过电影合同和枪手代劳的辛迪加文章获得丰厚的利益。如果人们希望既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又能与外面的大千世界和平共处的话，他们需要某些东西，但这种东西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缺失了。而突然之间，林德伯格为人们带来了这种东西。浪漫精神、骑士精神，以及自我奉献——这些全部在林德伯格这个现代格拉海德(Galahad)的身上得到了体现，而整整一代人则早已放弃了格拉海德们。林德伯格没有接受拍摄电影的邀请，没有出售各种各样的鉴定书，没有自我夸耀，也没有让自己陷入丑闻，而他的行事是那么正确而有品位——另外，他还那么英俊而勇敢。大肆宣传的机器已经准备好要将他举到一个人人都能看到的高度。那么，当公众接受他的态度中充满了巨大的宗教复兴色彩的时候，人们还会感到奇怪吗？

林德伯格没有背弃他的崇拜者们。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表演性飞行和亲善性飞行——非常成功并且平静而高贵。他娶了驻墨西哥大使的女儿为妻，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变了大肆宣传的局势，因此而取悦了整个国

家——他带着新娘乘坐摩托艇悄悄地离开了，并且数天没有露面，尽管几百位报纸记者正在费尽心思地想要窥探他们的蜜月情形。不管他前往哪里，都有大批的人群拥挤着想要接近他的身边，各种各样的奖牌都被授予了他，各种各样的颂词都送与了他，他的来去都是新闻。他积攒的大笔财富主要是通过为飞行公司担任顾问，但是并没有多少人为此而对他忌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始终保持头脑冷静并且始终表现杰出。

因此，他一直是美国人的民族偶像。

甚至在他那次飞行壮举发生的三四年之后，每到周末，林德伯格在新泽西州的农场的周围马路上，仍然挤满了崇拜者开来的汽车，他们等在那里只是想看他一眼。据说，他甚至都无法把衬衣送到洗衣店，因为这些衣服根本就收不回来——都被人当成非常珍贵的纪念品拿走了。数百所学校的教室里和数千户人家的屋子里都挂着他的图片。没有一位活着的美国人——也许有人会说，也许除了亚伯拉罕·林肯之外，也没有一位死去的美国人——能够得到人们如此忠贞不渝的爱戴之情。你可能会批评柯立芝、胡佛、福特、爱迪生、鲍比·琼斯，或者其他任何曾经出现在报纸大标题上的英雄们；但是如果你竟然谴责任何林德伯格所做的事情，你就会知道你是在伤害听你说话的人。因为林德伯格是一个神。

人们也许会想，对一个特技飞行员来说，很不错。但是必须要加上一句，对美国人民来说也相当不错。因为在 1927 年 5 月 20 日以前，没有人敢预言说，美国人在对英雄的品味方面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

## 八

林德伯格的飞行让人们看到，一次英勇行为就可以获得这么明显的利益，因此为了追求金钱和荣誉，大批的跟风者开始纷纷仿效。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林德伯格之所以受到崇拜者的钟爱，原因之一就是他并不热衷于轻而易举得来的金钱和掌声。规则很简单。你有一架飞机，某些金钱的资助，一个新闻广告员，然后就可以进行你的从这处到那处的首次不停顿的飞行（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人飞过，你可以随便挑选两个作为起点和终点）。在飞行之前你可以提前安排好，如果你成功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私人故事卖给一家辛迪加报社。如果必要的话，你甚至不用花钱

就可以得到很多装备，只要向为你筹备燃油、飞行服或者是五英尺隔板的人说明，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多么有用。当你抵达目的地后——同时你也登上了头版——你就立刻出售你的著作，你的鉴定书，你出现在歌舞杂耍节目里，你出现在电影里，或者是任何需要你的地方。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驾驶飞机，你还可以成为一名乘客；事实上，一名女乘客要比一名男飞行员还能够提供更多的新闻。如果驾机飞行不合你的个人品味，对你来说有点危险，你还可以通过提供奖金给其他人来飞行博取宣传效应。

当钱伯林追随着林德伯格的脚步进行跨越大西洋的飞行时，这架飞机的主人查尔斯·A. 利文(Charles A. Levine)是一位对此非常感兴趣的乘客。他在纽约受到了官方的欢迎。每个人在纽约都能够受到官方的欢迎。穿着入时的格罗佛·威伦警长不停地利用着被阿尔瓦·约翰斯顿(Alva Johnston)称之为大发现的规则，那就是说，任何人只要在中午坐车出现在百老汇大街，而身旁有一辆摩托车护卫，那么他就会发现有数千人为了吃一顿免费的午餐而在那里集中。英国高尔夫公开赛的冠军、横穿英吉利海峡的泳者，以及意大利的足球队，都受到了威伦先生热烈而谦恭的欢迎，就好像是在欢迎波斯的财政部长和莱比锡市长一样，而市民们也非常高兴能有借口将自动收报机纸条和布朗克斯的电话号码簿碎片扔出窗外。

在钱伯林和利文飞行之后的几个星期，拜德与同伴也从罗斯福机场起飞，但是却落到了海里——不过落下来的地点距离法国海岸非常近，所以他们就跋涉着走上了海岸。布罗克(Brock)和施利(Schlee)不仅穿越了大西洋，而且继续进行一系列的飞行，最后甚至抵达了日本。此后，还有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湖地市、名叫鲁斯·埃尔德(Ruth Elder)的女子，也尝试了她的飞行经历。她长相漂亮，是一名牙医的助手，她向乔治·哈德曼(George Haldeman)学习了飞行课程，又得到了一位柑橘种植者和一位房地产商人的资助，于是乘坐着哈德曼驾驶的飞机，她出发了，并且成为了第一位飞越大西洋的女乘客。不过她也跌进了海里，而且离海边很远，甚至都无法跋涉上岸；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老天保佑，她和哈德曼都被一艘油轮救了起来；她的经纪人已经为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于是她也受到了欢迎和接待——虽然纽约在接待她时总共只花费了 333.90 美元。而此前的多次接待花费都要比这多得多：接待利文的花费超过 1 000 美元，接待爱尔兰自由邦总统花费了 12 000 美元，接待拜德花费了 26 000 美元，而接待林德伯格时的花费则是 71 000 美元。

在鲁斯·埃尔德之后，还有很多次成功或者失败的飞行，次数多得都让人没法记下来。他们都成为了头版新闻，但是与福特推出新款车（时间是 1927 年 12 月）以及维斯特里斯号轮船的沉没相比，这些飞行新闻都没有那么令人激动。而报纸对维斯特里斯号的沉没事件进行了发疯般的报道，几乎让人以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海难事件。不过，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林德伯格。

而体育领域内的英雄却层出不穷。鲍比·琼斯仍然在一次接一次地夺取胜利，直到无人怀疑他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高尔夫球员。贝比·卢斯仍然保持着本垒打的记录。卡格尔和布斯让美式足球记者们有机会成为他们想要的浪漫英雄。梯尔登的水平有些下滑，但是除了一个法国人，他仍然能够击败所有对手。然而，职业拳击赛却开始衰退，并且有迹象显示，公众对体育表演已经开始变得有些厌倦。如今习以为常的做法是，人们努力着想要发现某些足够新奇的东西以便唤醒深谙大肆宣传手法的大师。例如，马拉松舞者互相依靠着坚持数小时、数天以至数周，在痛苦和疲倦中拖着脚在地板上继续跳舞，那些参加 C. C. 派尔（C. C. Pyle）先生“赛马会”活动的可怜的选手奔跑着穿过整个大陆，只不过既让他们的脚痛苦，又让身为发起人的派尔先生痛苦。当阿尔文·希普雷克·凯利（Alvin Shipwreck Kelly）坐在旗杆上的时候，数千人都站在那里打着哈欠。只要打破记录，还是能够赚到钱的，哪怕你的成就只是坐在巴尔的摩的某根旗杆上一直待上 23 天零 7 个小时。你坐在旗杆上，食物和饮料放在小桶里升上来给你，雇人在你一次打盹时间超过 20 分钟的时候专门叫醒你。但是似乎没有人相信凯利先生的这种行为具有任何伟大意义。坐旗杆和舞蹈马拉松只是无聊时权且观看的怪诞节目罢了。

也许，大肆宣传那生机勃勃的青春年华即将离它而去了：宣传的技术变得有些太明显了。也许林德伯格事件让公众无法接受不那么伟大的英雄。也许 1927 年萨科和万泽蒂的被残酷执行死刑和 1928 年的总统大选让从不缺乏新闻养分的美国人民意识到，毕竟，还有被称为公共事件的某些事情。不过，也许当 1928 年 3 月来临时——也就是新款福特车露面几个月之后，林德伯格飞行壮举不到一年之后——大牛市进入了它最轰动人心的阶段，这个事实也具有很大的意义。在一天之内，美国无线电公司普通股就上升了 10 点，而它所能带来的直接利益，可要比那些不停顿飞行者和世界重量级拳王的收入多多了。

# 第九章　知识分子的反抗

"这是全新的一代……当他们成人后，却发现所有的神都已经不在，所有的战争都已经结束，而对人类的所有信仰也不再牢固。"

——F. 斯科特·菲兹杰拉德，《人间天堂》

## 一

当美德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强迫性冲动已经成为了美国全民性的习惯。旧日环境下长大的典型美国人对少数民族的权利从来就没有投入过多少热情的关注；由于在开拓传统中长大，他已经习惯于通过最方便的方式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规范的法律、保安委员会，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使用机关枪。《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在历史书里看上去都相当不错，可是当他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他通常愿意认为：自由只不过是放纵的代名词，而《权利法案》则是无赖恶棍最后采用的手段。他在战争期间发现，通过立法、进行宣传和恐吓威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邻人接受在他看来容易接受的行为，因此在和平年代来临之后，他继续采用同样的方法，希望邻人们能够依然和以前一样顺从。

他把精力从自由债券运动——每人都必须完成一定的份额，而行动稍慢就经常会受到威胁——转移到各种公共运动，例如社区福利基金计划、

大学捐款行动、教籍计划、城镇推进计划，以及很多其他行动计划；组织了各种委员会和分会，新闻广告员将发行物一稿数用，演说家们低声吼叫，而如果某人依旧紧紧地按住自己的钱包，他就会感觉到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对外国敌人和假想的亲德国主义者的高压政治距离少数民族和亲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高压政治只有一步之遥；战争时代的审查政策距离和平时代对报纸、书籍和公开演讲的审查政策也只有一步之遥；而战时的限制立法距离将禁酒法令永久性地写进宪法、距离将多数民族的道德准则写进《法令全书》的企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然，商业已经从这些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虽然它曾经在1917年和1918年的时候受到过束缚，因为如今的普通美国人都把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商业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但是在商业世界之外，他认为自己知道人们应该怎样行事，所以他对任何废话都表示反对。

当巨大的红色恐惧时代走过了初期阶段，美国中产阶级多数派虽然对激进主义采取了严厉措施，对商业发展坚持实行自由主义，但是他们的这些举措并没有遭遇多少反对力量。工人们要么被警察的威力所吓坏，要么被拥有股票变成富翁的希望所诱惑；几年以前，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如果在争取最低工资法律、争取平等选举权以及争取劳资双方谈判权利时遇到阻碍，他们肯定愿意为此献身；可如今的他们却陷入了无望的沮丧。他们认为，政治只不过是一种庸俗混乱的东西；笨人的数量永远大于文明人的数量，而这些笨人则被那些喷着烟圈的选区领导人牢牢地控制着，因此选举权只不过是玩笑话罢了。社会福利事业同样也是空话一句：它乏味、感伤而专横。在1915年，那些聪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为了去参加社会主义者的游行甚至不惜断绝父子关系；可是到了1925年，他们却对社会主义这种“太普通的事物”哈欠连天，而美国钢铁公司的雇员们无论报酬过高还是报酬过低，他们都毫不关心。风尚已经改变了：如今充满反叛精神的年轻人也会激怒他们的父亲，可那是因为他不仅反对一夫一妻制，也反对上帝。







然而，当大多数中产阶级不再迫害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分子，转而开始调节自身行为的时候，他们却遇到了激烈的反对，而这些反对意见不仅来自那些聪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还来自于一个全新的富有阶级意识的团体。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而《美国信使》更喜欢称他们为“文明的少数民族”——大声地开始了他们激烈的反抗。

进行反抗斗争的这些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组织有序的团体。即使他们同意组织起来，对应该如何组织起来肯定也是意见相左的，因为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生活的地点很分散；纽约是他们的主要据点，但其他很多城市的中心也能发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组成人员主要包括艺术家、作家、职业人士，大学城里某些头脑不安分的人，商业阶层里那些接受过大学教育并且能够理解比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和《麦考氏》杂志上的文章更复杂一些文学作品的人；而尾随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不少追求时尚的人，虽然这些人与这个圈子并不太相称，可是他们却愿意吸收最新的观念和想法。因此，可以把知识分子大概地定义成这样一群人：无论男女，他们都听说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普鲁斯特(Proust)、塞尚(Cezanne)、荣格、伯特，兰·罗素、约翰·杜威、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以及艾廷顿；他们对电影不屑一顾，却将查理·卓别林尊崇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们都能够谈论相对论，即使自己对此并不理解；他们都知道某些主要情结的名字；他们收集早期的美国家具；他们对进步教育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对亨利·福特和卡尔文·柯立芝的尽善尽美的神性表示怀疑。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极其畅所欲言；他们不仅统治了美国文学，还在逐步渗透中影响了整个美国的思维。

当从哈米吉多顿归来的英雄们还在阅兵台前游行经过时，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摆脱了对《凡尔赛条约》的幻想。在他们充满愤恨的眼睛面前，有很多作品都对充满破坏性的残酷战争和惟利是图的战争解决方案进行了描写，例如：菲利浦·吉比斯(Philip Gibbs)的《现在可以说了》、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三个士兵》、E. E. 卡明斯(E. E. Cummings)的《巨大的房间》，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他们是毁灭性的新派心理学的早期信徒；事实上，他们中的年轻成员正依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在互相爱抚，而与他们同时代的人虽然接受教育不多却也在互相爱抚，可原因只是他们喜欢这么做并且能够轻易脱身。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到确定性已经丢失，而来自于新科学知识的这种确定性，早在“原教旨主义”这个词出现以前，早在爱因斯坦理论进入研究工作实验室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对美国文学里那种身穿礼服大衣的彬彬有礼和令人尊敬的正式礼节，他们的反抗已经进行好几年了；早在战争开始以前，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埃德加·李·马斯特斯

(Edgar Lee Masters)、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意象派诗人以及素体诗的代表者人物们,就已经开辟了文学的新天地。在 20 名知识分子共同撰写的《美国文明》[1922 年由哈罗德·斯特恩斯(Harold Stearns)编辑出版]中,他们对所在阶级数千人的意见进行了总结:"在今天,美国社会生活中最为可笑而可悲的事实是缺乏感情和美感。"但是,如果没有辛克莱·刘易斯 1920 年 10 月推出的《大街》与两年之后推出的《巴比特》这两本著作,知识分子对这种"缺乏感情和美感"的反抗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对琐碎规章的狂热"的反抗,是不太可能立刻产生如此影响巨大的力量的。

这两本著作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巨大影响。刘易斯通过运用无情的文学表现和辛辣的讽刺手法,将美国小镇的丑陋面目揭露无余:小镇的生活缺乏文化气息,大众的偏见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而那些热心的拥护者则俗气而偏执。不过,也有一些东西没有在书中得到表现——例如美国的戈弗·普瑞们和泽尼斯(Zenith)们的友好和慷慨——但就是因为这种片面之词,两书反而受到了热烈而广泛的欢迎。到 1922 年底,《大街》的销量已经达到了 390 000 册。知识分子们只有在读过刘易斯的著作之后才意识到,美国生活中那些最受他们轻视最让他们害怕的特性,在刘易斯的显微镜下已经受到了无情的检查和分析。乔治·F. 巴比特(George F. Babbitt)才是文明人的主要敌人,而正是"大街"式的思想状态阻碍了美国文明的发展。

在《巴比特》之后,还有很多著作表现了知识分子对受到商人控制的美国规则的不满以及他们日益强烈的幻想破灭。而 H. L. 门肯(H. L. Mencken),不仅是反抗行动的发言人,也是擂响反抗行动战鼓的主要人物。







## 二

门肯来自巴尔的摩,他在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的过程中接受了报业训练,随后在《聪明组》担任编辑工作多年,与乔治·简·纳森(George Jean Nathan)一起共事。《聪明组》的境况并不算好,因为它的名字和过去那有些可疑的名声阻碍了它的发展。正在它走下坡路的时候,出版商阿尔

弗雷德·A.克瑞夫(Alfred A. Knopf)让门肯和纳森负责出版一份新月刊,服务对象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左翼分子,于是第一期《美国信使》于1923年末出现在了读者面前。这个时间——如果你对日期不太确定的话——距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去世还有几个星期;当时,沃尔什参议员正在设法找出究竟是谁将钱给了福尔部长,理查德·西蒙即将产生编写填字游戏书的想法,而查尔斯·H.利维莫(Charles H. Levermore)即将获得博克和平奖。

《美国信使》的绿色封面和布局就像门肯位于巴尔的摩的住宅那大理石镶边的正面一样稳重,但它的内容却极具爆炸性。这份杂志沿袭了《聪明组》的一些常规特色,例如门肯的文学评论、纳森的戏剧批评,以及一系列以前被称为"重复概要"而如今被称为"临床笔记"的编辑笔记,还有一个名为"美国史料"的部分,里面装满了美国式的荒唐事。每个月的杂志上,门肯都会用好几页纸的篇幅对那些教养浅薄的大多数人及其作品进行驳斥。《美国信使》对德莱塞、卡贝尔(Cabell)、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薇拉·凯瑟以及辛克莱·刘易斯这样的作家表示了热烈拥护,因为他们公然反抗美国艺术文学院所代表的礼貌传统;也对书本和生活中的多愁善感情绪、逃避行为和学术上的浮夸表现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和讽刺;《美国信使》对巴比特(即典型的资产阶级市侩)、扶轮社会员、卫理公会派教徒和改革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也对柯立芝繁荣时代的虔诚信仰和被他称为"理想主义的胡说八道"进行了嘲笑;而总体来说,《美国信使》是用一种嘈杂粗俗的大笑态度看待美国的社会万象的。

《美国信使》立刻获得了成功。它既新鲜又令人吃惊,同时还具有一种令人愉快的破坏性。它让数千人的疑虑都变得具体化。而在很多提倡打破旧习的年轻大学生们中间,它的绿色封面立刻就获到了拥抱。普通小镇的普通工作人员在碰巧发现这份杂志时,既感到震惊又不知所措;他们认为,这个名叫门肯的男人即使不是魔鬼在这个时代派来的使者,也肯定是一个堕落放荡、不知羞耻的妖怪。当门肯前往德顿对斯科普斯案件进行采访报道时,他将小镇人称为庄稼汉、山地人或是农夫,而A.C.斯特里布林(A. C. Stribling)牧师则回称门肯是"一个摆弄笔墨、废话连篇的可鄙之人";而对这样的还击,大批愤怒不已的普通公众都准备大喊"阿门"。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门肯遭到的各种辱骂数不胜数,甚至有可能为他的崇拜者出版一本《粗话大全》——而此书全部由贬低毁谤门肯的各种内容组成。

而与此同时，门肯的杂志发行量一路攀升，到1927年已经超过了77 000本；就在同一年，沃尔特·里普曼将他称为"对整整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人群产生最大影响力的个人"，而这种形容毫不夸张。

在很多读者眼里，门肯似乎对所有的事情都持反对态度。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但有一点非常确定，那就是，反叛精神就是他的呼吸。他"反对所有的空头理论家、教授、社论作者、权利思想家，以及改革者"（这是他自己的原话）。他"反对爱国主义是因为这种精神要求人们接受那些显然非常愚蠢的主张——例如，一个美国长老教会员能够和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勃拉姆斯（Brahms）或者是鲁登道夫（Ludendorff）平起平坐"。他不认为"文明的生活可能存在于民主政治之下"。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傻瓜。他反对禁酒法令、审查制度以及其他所有干涉个人自由的法令。他对道德规范和基督教婚姻也嗤之以鼻。很明显，在他这些令人可怕的偏见之中存在着很多矛盾：一些批评家质问道，人们怎么能够认为，他所推崇的精英统治可以允许他所坚持的自由精神存在？除非碰巧这种统治环境里的人全部和他想法一样——而这种可能性却非常之小。然而，这种矛盾性却对门肯没有造成任何困扰，并且最初对他的信徒也没有造成任何困扰。因为在面对门肯那洋洋洒洒散文般的风格时，人们很难冷静地进行分析。

在攻击那些教养浅薄之人时，他使用了空前丰富的词汇对这些敌人恶言谩骂，例如江湖郎中、骗子、吹牛大王、笨蛋、猪、巫婆和低能儿；讲到感伤主义者的时候，他说他们在到处喷射玫瑰味道的香水；讲到布莱恩的时候，他说"他生来就带着一副咆哮的大嗓门，并且总是玩弄着激怒笨蛋的鬼把戏"；讲到他不喜欢的书籍的时候，他说那些都是垃圾；而对田纳西州那些坦率纯朴的农民，他则称他们为"打着哈欠的类人猿"或"一群类人猿的乌合之众"。偶尔的时候——就像在他的学术著作《美国语言》里表现出来的那样——门肯也能使用标准精确的英语，但是一旦血液膨胀，他的文字里就充满了公然的夸张和隐喻。只要他一出现，整个空气里立刻满是飞舞的碎砖片；当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文章，如果你不是感到盲目的愤怒，就会觉得好像正在游乐园里将棒球扔向陶瓷器具，体会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愉悦情绪。

门肯一直致力于打碎人们心中的偶像，而这种行动最初赢得广泛关注的那些年月，正是柯立芝繁荣时代最为鼎盛的时期。当时，布鲁斯·巴顿为了向更高层次的推销术献上赞颂之词正在修订基督教的学说；原教旨主

义者正在激烈地反对着进化论；卫理公会戒酒委员会、禁酒法令以及公共道德正在设法将这个国家按照一个模子铸造成冷静的整体。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们通常还处于防御状态。可是如今，门肯慷慨激昂的发言给了他们信心，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论调。虽然声音没有《美国信使》那样响亮尖锐，但其他杂志也开始加入了表达知识分子不满之情的行列：《哈珀斯》杂志于 1925 年换上了橙色封面，以一种全新的态度大胆批评、审视美国人的生活，并使自己的发行量翻了一番；《论坛》对很多《大街》认为无可争辩的话题进行了辩论；《亚特兰大月刊》发表了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的严厉责难；而到了战后十年末期，甚至连《斯克里布纳》都被禁止出现在波士顿的书摊上，只因为上面刊登了海明威的连载小说。各种媒体出现了大量反映知识分子少数人对美国及美国生活看法的著作。持抗议态度的书籍慢慢地越来越多，而到了 1926 年或 1927 年，如果某户人家的墙上挂有毕加索(Picasso)或玛丽·洛朗森(Marie Laurencin)的作品复制品，书架上摆放着《太阳照常升起》或《民主笔记》，而在这样的人家里竟然还有人为扶轮社或布莱恩说好话，他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治愈的低能儿。

## 三

那么，在他们进行反抗的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们秉承着什么样的信条呢？以下是对他们主张的大致总结，这些条款虽然没有太多人能够全部接受，可是也许能对他们集体意见的总体趋势作一番说明：

1. 他们认为，在性方面应该拥有比严厉的美国准则所允许的幅度更加开放的自由；他们不仅认为关于性的讨论可以自由进行，其中有些人似乎还觉得这种讨论应该是持续不断的。本书第五章讨论了习惯和道德的革命，而他们就是这场革命的先头部队。从战后十年初期开始，他们就沉醉于 F. 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小说中那些年轻的思想家们所热衷的无精打采的亲密爱抚，也沉醉于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大胆，因为她宣布说，自己的精力遭到了过分的浪费以致无法坚持整个晚上；而到了最近，他们则对同性恋题材的文学作品兴奋不已，甚至数千人同时前去聆听尤金·奥尼尔讲授的长达 5 小时之久、名为“奇妙的插

曲"的精神病理学课程。在整个反抗的岁月里,他们阅读性,谈论性,考虑性,并且蔑视任何说"不"的人。

2. 他们尤其蔑视通过立法对各种礼节进行强制执行,并且对所有他们认为因此而来的影响充满了厌恶。他们对卫理公会教派的游说议员者约翰·S. 萨姆纳(John S. Sumner)和其他所有支持审查制度的人都怀有憎恨之情;他们将清教徒们,甚至是殖民地时代的清教徒们,都描绘成青鼻子哑嗓子的伪君子;而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在他们眼里则半是下流半是好笑。萨克雷(Thackeray)、丁尼生(Tennyson)、朗费罗(Longfellow)以及19世纪的波士顿文人学士们,这些人的文学声誉在他们这里跌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们非常相信,短裙和调情的时代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启迪,于是他们不仅对《生活》杂志里描述的"同性恋的90年代"大加嘲笑,还和托马斯·毕尔(Thomas Beer)一起,对"紫红色十年"中的丰满打扮和虚构的欺骗故意屈尊进行仔细观察。事实上,他们中有些人似乎愿意相信,除了古文明时期的希腊、卡萨诺瓦时期的意大利、交际花盛行时期的法国和18世纪的英国,所有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都是荒谬可笑的。

3.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禁酒法令表示激烈反对,同时他们也憎恨审查制度,并且对政治重生和社会重生都充满了怀疑,而所有这些事实,都让他们不仅怀疑所有的改革运动,也不信任任何改革者。他们尤其不认为自己是他们兄弟的监护人;如果有人认为忍耐不是一种最高的美德,这个人就会令他们无法忍受。如果有人在一个由高级思想家组成的晚宴上听到有人说"法律太多了",应该让人民自己放手做主,那么这种话在100个晚宴上都能听到。1915年的时候,"改革家"这个词总体来说还表示赞扬,可是到了1925年,这个词已经——起码在知识分子中间——变成了一个充满轻视意味的词。

4.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宗教怀疑论者。如果20世纪20年代那些大喊大叫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要少于19世纪90年代的话,那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再认为持怀疑态度会耸人听闻,也因为那些不相信宗教的知识分子们,由于感觉不到有任何狂热的需求迫使他们去按照自己的形象去改造他人,所以很满足于平静地走出教堂。20世纪20年代在讨论强制性大学小礼拜时,很多大学生平静地说出了"不会再有聪明人相信上帝了";可是人们怀疑,19世纪90年代及此前时期的美国大学生们是否也能态度温和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在假定读者已经

抛弃了古老神学的基础上，为理性的公众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各种书籍。

5. 他们意见统一地嘲笑中产阶级多数派，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应该为禁酒法令、审查制度、原教旨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对人性的压制负责。他们仿效门肯，对巴比特、扶轮社会员、三K党成员、微笑服务、足球运动员以及超级推销员都表示出憎恶之情。居住在城市中心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比那些生活在愚昧偏僻的城镇上的居民要更加优越，并因此而感到自豪，因为那些城镇正是盛产巴比特们的地方；举个例子，当《纽约客》在战后十年中期成立的时候，它的格言就是："不是为迪比克的老年妇女们准备的"。他们尤其看不起那些大批涌进欧洲的美国游客；如果某人坐在汽船的椅子上，而身旁的人膝盖上则放着一本阿道斯·赫胥黎最新出版的小说，那么坐在椅子上的这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被身边人告知，法国某个地方的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小饭店还没有"被美国人糟蹋"。

6. 他们尤其喜欢颠覆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偶像，因此W. E. 伍德沃德(W. E. Woodward)在1923年出版的小说中发明的"揭穿真面目"一词，就成为了对他们时尚行为的准确描述。李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王》成为1922年的畅销作品，随后则出现了一大批揭穿真面目的名人传记。鲁伯特·休斯(Rupert Hughes)剥去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伟人外衣，在演讲中宣称"华盛顿是玩牌高手、蒸馏威士忌的专家、骂人的冠军，并且和大将军的夫人接连跳舞三个小时都没有停歇"，而他的这番发言差点引发一场骚乱。其他传记也揭露了很多美国名人的不完美人性，而历史上那些臭名昭著的流氓无赖们则被重新发现，被描写成为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人物；直到有一段时间，人们几乎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传记作者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将传统认为的白色说成是黑色，而将传统认为的黑色说成是白色。

7. 他们害怕规模生产和生产机器对他们自身以及对美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一个正在被福特主义和连锁店般的思想拉平成千篇一律的文明国家中，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着争取成为独立个体权利的最后的战斗。他们对受到管制充满了憎恨，而这种憎恨情绪不仅为进步的学校运动提供了推动力，还催生了一系列高等教育的创新运动，例如安提奥克(Antioch)和罗林斯(Rollins)的创新，米克尔约翰(Meiklejohn)在威斯康星进行的实验学院试验，以及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其他地方进行的荣誉计划。同时，它也为小剧院运动提供了推动力，并且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取得了进展，尤其

是在学校。当代小说里的主人公都被描写成这样的形象：他们在家乡的空气中感到极度窒息，于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文化生活，他们要么逃往曼哈顿，或者更好一点，逃往蒙彼利埃或者是里维埃拉。在巴黎的任何一家小餐馆，都能发现一个从国内逃出来的美国人正在感谢上帝，让他终于从标准化的生活中解放了出来，但他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法国人行道边的小餐馆生活甚至比汽车城和收音机城的生活更加标准化。知识分子们热切地接受着空前数量的国外媒体对美国文化的批评，但是当"我们美国的愚蠢性"和"幼稚的美国人"这样的标语出现在最优秀的杂志上并且月复一月在他们眼前晃荡时，他们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愤怒。他们很希望被人告知，美国正在堕落成一个充满野蛮气息的国家，任何一个文明人都不可能在这个地方生活——就像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亚特兰大月刊》里悲悼的那样："我在考虑这样一个虽然私人但却实际的问题，一个享受简单生活、喜欢简单乐趣、崇尚思考且收入一般的普通人，在本国怎样才能找到适于自己生活的地方，并且应该怎样生活。"

我们再重复一次，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接受所有的这些条款；但是如果他或者她对这些条款一条也不接受，那么就得怀疑他的文明人身份了，他就不是真正的文明人，他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繁荣号客车继续前进，但是那些知识分子们却站在路边，提高嗓音表示着他们的嘲笑和沮丧。









## 四

门肯虽然愤世嫉俗，却非常享受自己的战斗。他继续和全副武装的敌人交锋，并在不断的自吹自夸中偶尔冒出两声"哈哈"。美国文明的任何方面都有可能出现不妥，但最起码这些不妥之处为他的喇叭枪提供了射击的目标。"如果你在美国发现那么多不值得尊敬的东西，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生活在这里呢?"他在《偏见》的系列之五中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然后回答说："人们为什么要去动物园呢?"没有人能够像门肯那样，从美国的人类动物园里享受到如此开心的感觉；他甚至从田纳西的类人猿身上都能获得欢乐的笑声。

然而，门肯在知识分子阵营中的大多数同事们却并没有这么享受。在

这段历史中经常会用到“幻想破灭”这个词语，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幻想破灭(除了商业，以及商业带来的物质奢华和物质改善)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总基调。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种基调的运行也许并没有被他们察觉到；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感到一种奇怪的失望，他们感到生活并没有提供给他们曾经希望的东西，他们知道有些价值观念虽然曾经对他们意味很多，但是现在却已经消失无踪；但是他们却仍然保持一种兴致勃勃的情绪，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正在他们的头脑底层发生。然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都太清楚他们自己的梦想已经破灭了。不幸的是，几乎无人能够像门肯一样，不对人性抱有太高的期望。如果你认为动物园里生活着的是一群文明人，那么你就无法尽情享受这个动物园给你带来的乐趣。

知识分子们认为对性自由的尺度应该更加宽松——可是当他们真的得到了这种宽松，许多人却又觉得非常失望，或者是通过私人的体验，或者是通过书本和戏剧的描写。他们发现，由于爱转变成了克鲁奇口中“仔细编辑了目录后的精神”，生命中最为活跃阶段的诗情和意义因此遭到了剥夺。正如克鲁奇说的那样，“情感，除非首先得到了尊重，才能够高贵起来”，而爱由于变得太容易并且太具有生物性，因此不再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事物。埃尔默·戴维斯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了一篇战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这位女性“沉湎于 259 段男女感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是无论是这些男人中的哪一个，或者是所有的这些男人，都没有能够给她带来任何感情上的喜悦。而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位淑女，只从一个够格的诱惑行为中就能够得到这种愉悦”。这位繁忙的女主人公在许多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同类；对他们来说，有一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浪漫是无法通过规模生产制造的，一旦爱情变得随意，它也就归于平凡。即使那些男女关系没有文学作品中描写得那么随便的当代人，当浪漫的爱情开始减价的时候，他们也感觉到了某种程度的无聊。

知识分子们反对标准化，反对受到压制，对自由则充满了信仰——但他们信仰的是争取什么自由呢？受到禁酒法令代理商的折磨固然令人不快，受到商会指使也令人不快，但是从长远来看，虽然拥有自由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自由岂不是同样令人不快？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再也没有比瑞奇蒙德·巴雷特(Richmond Barrett)刊登在《哈珀斯》上的一篇名为《波伊斯的孩子们》的文章里所描述的情景更加令人沮丧了——年轻的美国人冲到巴黎去享受宝贵的自由，尽情去做一些在布法罗或者是爱荷华市

所不允许的事情:他们对遇到的所有人都极度粗鲁,品尝了几段短暂并且索然无味的风流韵事,畅饮了杜松子酒,可是最后却光着身子昏倒在了小餐馆的桌子底下。固然,巴雷特先生只是描述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的极端主义者的形象;可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有谁辨认不出他们正是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短篇小说集《所有悲伤的年轻人》中所描述的那类人呢?沃尔特·里普曼写道:"自从战争末期理想主义崩溃以后,最能够表明走向成熟阶段的这一代人特点的标志,不是他们对宗教的反抗,也不是他们对父母所持道德准则的反抗,而是他们对这种反抗行动的幻想已经破灭。年轻男女的叛逆行为非常普通,但是他们的叛逆却充满悲伤而缺乏信仰,而且他们对新自由和旧日的确定性都同样持怀疑态度——这才是新奇之处所在。"也许还可以加一句,某些更加年长并且更加睿智的人,虽然角度很不同,但是他们同样感觉到了一个问题的不可回答性:在自由之后,下一个追求又将是什么呢?

这些知识分子也相信科学真理和科学方法——同时也认为,科学不仅令上帝从他们身边彻底消失,将上帝降级成宇宙中的秩序原则,或者是降级成了某种为了满足心理需要而用魔咒召来的、头脑中虚构出来的东西;而且,如同克鲁奇在《现代趋势》中指出来的那样,科学将人类降级成这样一种生物,而这种生物的正确想法和错误想法都没有先验性的权威。再也不可能非常肯定地说,这是正确的,或者,这是错误的;在威斯康星州认为正确的行为很可能在婆罗洲被认为是错误的(根据人种学者的说法),甚至在威斯康星州,认为某种行为正确的观点似乎也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容易犯错误的人类意见。确定性离开了生活。更糟糕的是,确定性也离开了科学本身。在早些时候,那些否认神的秩序的人们仍然可以依靠自然的安全秩序,可是现在甚至连这种秩序也变得摇摆不定。爱因斯坦和量子论引进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新的怀疑。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可靠的;生活的目标是无法发现的,而生命的目标更难以发现;在一片迷雾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坚实可靠、人类所能够控制的。人们无法说,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是可以持续的。







## 五

然而,在所有的这些不确定性中,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出现了

一种新的希望。随着固有价值观念的崩溃，艺术领域那种古老而无懈可击的批评标准也随之崩溃，因此让一些新鲜独立的艺术作品可以获得人们的认可。更幸运的是，新的观念开始得到普及：这种新鲜独立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具有真实的本土色彩，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可以让自己的文化摆脱对欧洲社会的臣服地位，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要想说服专家让他们相信第一流的油画或者是音乐作品也可以出自于美国，这种做法仍然很困难。那些艺术品收藏家们带着蔑视的眼神对学会会员们的精美作品不屑一顾，而是全心全意地去追求法国的现代派艺术家及其模仿者的作品，以致美国几乎变成了——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法国的殖民地。美国的管弦乐队几乎毫无例外仍然由外国指挥家指挥，演奏的几乎也都是清一色的外国作品，而美国本土作曲家所能得到的机会少之又少。然而，即使在艺术和音乐领域，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艺术家们开始睁大了眼睛，考虑描画摩天大楼和机器的可能性，收藏家们则在等待着乔治·贝洛斯(George Bellows)的去世，以便抬高他那些表面粗糙的、描绘美国职业拳击运动的油画作品和石版画作品的价格。音乐爱好者最终也意识到了黑人音乐的壮观，他们也觉得，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有可能缩小流行爵士乐与活力音乐之间的差距，他们允许马里恩·泰利(Marion Talley)和劳伦斯·蒂贝特(Lawrence Tibbett)这样的歌手成为大都市的明星，虽然他们的名字根本没有一点欧洲特色。他们带着赞许的心情去欣赏迪姆斯·泰勒(Deems Taylor)作曲的美国歌剧(固然，这个歌剧并没有一个反映美国的主题)。

在建筑领域，对本土作品的欢迎更加迫切。虽然美国的普通乡村房屋仍然是佐治亚式的宅邸、法国式的农舍或者是西班牙式的别墅，只不过里面配备上了盥洗室和能存两辆车的车库，但是即使在森林湖，要想重新体验被房地产经纪人称作为"旧日世界的魅力"也很困难；虽然美国的银行仍然是一个经典的神殿，仍然有建筑师试图把现代美国大学的生活放置于一个中世纪歌特式的建筑之内；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说法：新的材料和新的用途要求建筑师们采用新的建筑方式而不再考虑艺术的利益。在战后十年早期《芝加哥论坛报》所举办的比赛，尤其是亚军获得者萨里宁(Saarinen)那令人吃惊的设计，都说明摩天大楼的建筑可以有新的可能性——而在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弗兰克·劳埃德(Frank Lloyd)和赖特·卡斯·吉尔伯特

(Wright Cass Gilbert)联合设计的伍尔沃斯大厦中，已经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暗示。摩天大楼尤其具有美国特色——那么为什么不通过一种新颖而美国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钢铁建筑的问题呢？逐渐地，美国的建筑业开始发展。古德西(Goodhue)建于洛杉矶的公共图书馆和建于内布拉斯加的州议会大厦，阿瑟·路米斯·哈蒙(Arthur Loomis Harmon)建于纽约的希尔顿酒店和巴克利—维西(Berclay-Vesey)电话大楼[由麦肯基(McKenzie)、夫尔希斯和盖墨林(Voorhees & Gmelin)与拉尔夫·托马斯·洛马斯(Ralph Thomas Loamas)共同设计]，以及其他精美的建筑作品，所有这些起码为日后以一种精美而符合逻辑的方式表达美国的需要而铺平了道路。

最后来看一下文学领域，这里也几乎全部摆脱了来自国外的束缚。虽然知识分子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购买更多的外国书籍，并且数以千计地搬往蒙彼利埃和昂蒂布，但是他们却希望能够写出并且欣赏美国自己的文学作品。他们的写作和对作品的欣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激励：门肯对坚决不妥协的本土作品极力赞扬；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评论性期刊（例如《星期六文学评论》）；对美国背景展开了很多研究，并且因此挖掘出了很多本土的文学素材和潜在的文学素材，前者如保罗·班扬(Paul Bunyan)的传说和牛仔歌谣，后者如边疆的暴徒故事和河上的演戏船故事。一种新的骚乱在发生作用，而读者终于发现，他们对美国文学必须永远保持模仿的劣质这种说法非常不确定。当然，一个出产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德莱塞的《美国悲剧》、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薇拉·凯瑟的小说、班奈特(Benet)的《约翰·布朗的尸体》、尤金·奥尼尔的某些戏剧以及以林·拉德纳(Ring Lardner)的《金色蜜月》为代表的很多短篇小说——仅仅举出这么少的例子都能让人嫉妒——的十年，所能够要求的肯定不止对未来的那么一点儿单纯的希望。



## 六

对巴比特们的攻击逐渐减少，也许是因为反叛的新奇性已经消失殆尽。《美国信使》的发行量（也许还有这份杂志主编的影响力）在1927年达到了最高峰，但在此后就逐渐下降。《纽约客》忘记了来自迪比克的老年淑

女，不再对任何人怀有故意的敌意，而开始采用一种随意而迷人的幽默笔调；城市知识分子阶层阅览的其他杂志也厌倦了用警惕的态度去看待美国发生的事情。描写性的小说似乎不再那么富有冒险色彩，而在传记中揭露名人隐私的风尚也走到了尽头。类似的是，到处都开始出现这样那样的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精神沮丧可能也看到了自己最糟糕的日子。

1929年——这一年正是克鲁奇出版《现代趋势》的时间，而此书对这个时代的哲学觉醒进行了令人沮丧但却非常全面的描述——沃尔特·里普曼试图为一种新的信仰和道德规范体系建立基础，而这种体系有可能甚至满足那些幻想破灭的人们的需要。《道德序论》的成功表明，很多人已经厌倦了急剧堕落成混乱局面的精神状态。就在同一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要求人道主义的响亮叫嚣声。这场人道主义的风尚并不是没有一点喜剧色彩的，因为那些如此勤勉地讨论这个话题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清楚地讲述在他们头脑里的那个人道主义是三种或四种中的哪一种，而像保罗·埃尔默·莫尔(Paul Elmer More)和欧文·巴比特(Irving Babbitt)这样的隐士们几乎是不可能领导和组织任何规模的大众运动的；但是这个风尚却在怀疑者中间提供了一种新的证据，供他们顺着一种新的防御路线去挖掘困惑并面对困惑。此外，还有一种工作也非常流行，那就是通过对怀特海德(Whitehead)、艾廷顿和吉恩斯(Jeans)的哲学讨论，期待发现生命为何值得度过的基本理由。也许，在战后十年中已经被消耗掉的那些价值观念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至少已经有人开始探索寻找新的替代品。

如果存在这种替代性的价值观的话，它的到来也绝不迅速。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在战争期间那些乐观主义者和宣传人员声音如此洪亮地表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甚至在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已经变成了黑暗世界，而在这种不确定的黑暗之中，他们却不知道自己要转往哪个方向。他们可以反抗愚蠢和平庸，他们也可以带着怜悯之情将自己看做是失落的一代并从中获得一些少得可怜的快乐，但是他们无法发现的却是和平。

# 第十章　酒和阿尔·卡彭

## 一







1919年,《凡尔赛条约》仍然悬而未决,伍德罗·威尔逊还在高唱国际联盟赞歌,红色恐惧昂首阔步横穿大陆,美国的父亲和母亲们在为年轻的一代担忧。如果你在这时候告诉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禁酒法令注定会成为20世纪20年代一个最激烈且最具爆炸性的公共问题,他可能会对你说:"你疯啦!"如果你还能为他描绘出一幅此后确实出现的画面——装满酒的船在限定的12英里之外的海面上飘摇,夜色中,船上的一箱箱威士忌被转移到走私快艇舱中;偷运啤酒的卡车在连接不同城市的道路上被手持汤姆逊机关枪的匪徒劫持;违法酿酒厂生产出的酒装满了一辆辆货车;时尚人士出席的晚餐聚会总是以禁运的鸡尾酒开始;女士和先生们到地下酒吧时,都得要接受来自拉着窗帘的网格窗后的仔细盘问;而阿尔·卡彭(Alphonse Capone),芝加哥私酒酿造人士中的一个千万富翁,乘着一辆配备着装甲钢板和防弹窗的汽车行驶在大街上——这个天真的普通美国公民可能惊愕得连下巴都掉了。这是因为,在当时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已经获准通过,并即将在1920年1月16日开始生效;每个普通公民都已经被担保、并且他们自己也坚定地相信,第十八修正案已经解决了禁酒法令问题。不

管你是否喜欢，国家即将颁布禁酒法令。

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回首过去时，我们会发现在那一段美国历史中，最特别的当属人们的心理舒适感——经过几代禁酒论者艰难的斗争——禁酒法令最终被写进了《法令全书》。整个国家欣然地接受了，不过这堪称一种盲目的接受。1917 年，当第十八修正案被送到参议院时，只经过了 13 个小时的讨论便获得了一致通过，修正案的部分内容被要求在“十分钟原则”之下被讨论通过。几个月后，当众议院接到修正案时，围绕整个法案的争论也只持续了一天。随后，国家立法部门在很短时间内就批准了这一修正案；到了 1919 年 1 月，也就是停战后大约两个月的时候，立法所必需的 3 /4 的州都通过了，修正案成为了宪法的一部分（除了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两个州坚持不接受禁酒法令外，其余所有的州都批准了这一法令）。为了执行修正案，根据“反沙龙联盟”制定的规范而起草的《沃尔斯特法案》，轻而易举地在随后迅速获得了通过。伍德罗・威尔逊动用了否决权，一时间令国人很是吃惊，但很快法案便再次获得了通过。虽然此后各地也出现了零零散散的抗议声——纽约有一个大规模聚会，巴尔的摩有一个游行，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修改法案，以便工人不会被剥夺饮用啤酒的权利，华盛顿国会大厦前发生了喧闹的示威游行——但是，反对者是如此三心二意，反对行动是如此效率低下，而全体民众对禁酒政权的必然出现又是如此深信无疑，以致无论是新闻界的高谈阔论，还是餐桌上的闲言碎语，都很少涉及法案是否可以实施这个问题。然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禁酒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强制的全民清醒又会对工业、社会秩序以及下一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个压倒性的、几乎是在不经意中通过的法案为什么能够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查尔斯・梅尔兹对禁酒法令实施的前十年曾经给予了非常好的记录，在书中他明确地表明，修正案背后的力量是经过了严密组织的，而反对者根本就谈不上有组织。直到美国参战前，全民禁酒的前景一直都非常渺茫，而将那些对未来毫无想像力的公众动员起来去反对一个不确知的潜在威胁，也是不现实的做法。除此以外，反对禁酒的领导层逐渐丧失了人们的信任，因为这个阶层是由销售私酒人员组成的，而这些人早就因为在愈演愈烈的禁酒呼声中依然顽固地拒绝关闭酒馆而变得声名狼藉。

然而，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禁酒领导人带来了极好的机遇。战

争转移了原本反对绝对禁酒的那部分人的注意力：当国家的存亡都危在旦夕时，酒的未来地位似乎成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战争使民众习惯了严厉的立法，以便联邦政府可以被赋予新的、更大范围的权力。战争使节约粮食成为必要，作为一项节省粮食的措施，禁酒法令因此被推荐给了广大爱国人士。战争使民众反对与德国有关的任何事物——许多大的啤酒酿造商和蒸馏酒商都来自德国。战争还给民众带来了一种斯巴达式的理想主义情绪，第十八修正案正好是这种情绪的自然体现。为了效率、生产和健康，可以牺牲一切。如果一个清醒的战士就是好战士，一个清醒的工人就是能干好活的工人，那么有关禁酒法令实施的必要性在当前则是无可辩驳的。同时，呈现在美国民众面前的是一片乌托邦式的幻影：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参战将能结束所有战争，这场胜利将会带来一个崭新的、辉煌的世界新秩序，美国也会因此而进入一个高效的、清醒的、无穷无尽的新纪元，这一切并不难想像！最终，战争使民众迫不及待地要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 1917 年和 1918 年这两年，所有值得去做的事情都值得立即去做，不管是官方文件、反对的理由，还是舒适用品或者便利设施。这种种力量的合力是无法抵抗的。于是，国民们热忱地却又是轻率地选择了一条通往禁酒的乌托邦之乡的捷径。

几乎没有人，甚至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会想到这个修正案事实上是很难实施的。显然，第一任禁酒专员约翰 • F. 克莱默(John F. Kramer)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怀疑。“这项法令，”他以一种极具权威却又很夸张的口吻说道，“将会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全国各处的村庄全面实施，不愿实施的地方将会被强制执行……根据立法，作为一种饮品的酒将不再获准生产，我们将确保它不会被生产出来，不会被出售，不会被分销，更不会被托运，不管是地上的、地下的还是空中的任何一种方式。”据反酒吧联盟估计，国会每年只需拨款5 000 000美元便可以确保这项法令的顺利实施(包括要预防“地下的”偷运私酒)。国会投票表决的内容仅仅到此为止，议员们为终于处理了这件烦心的、让人伤脑筋的事而长舒了一口气，他们可以转而去考虑那些更加紧迫的重要事情了。随着 1920 年 1 月 16 日早晨的到来，一个许诺的、清醒的时代开始了。只是在以后的岁月里，禁酒的领导人、国会，以及置身事外的公众才逐渐地开始觉察，他们曾经是多么漫不经心地处理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 二

显而易见，执行法案必须要从源头上切断酒的供应。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困难。

美国的海岸线和陆上边界线为走私者敞开了一个 18 700 英里的广袤通道。成千上万的药剂师获准可以根据医生的处方卖酒，而这项措施一旦缺乏严密的跟踪检查将很难被严格执行。淡啤酒是法案所允许的，而制造淡啤酒的惟一方法就是酿造纯啤酒，再将其中的酒精去除——而无法去除所有酒精的情况太容易发生。没有严格而有效的监督，工业酒精的制造也可能会滋生出问题——在酒精离开生产它的工厂之后，是无法跟踪追查它是如何从一个供货商流向了另一个供货商的；也无从确保，按照政府不可饮用标准而小心添加在酒精里的配料，是否会被那些聪明的药剂师巧妙地提炼出来。违法蒸馏几乎随处都能操作，甚至是在住户的地窖里；一个营业用的蒸馏室只需 500 美元便可以建成，它的日生产能力为 50 或 100 加仑酒，利润是丰厚的；一个可以加工 1 加仑酒的便携式蒸馏器只要六七美元便可以买到。

为了应对这些对《沃尔斯特法案》不利的潜在威胁，在 1920 年由政府拨款筹建的 1 520 人组成的禁酒事务专员，到了 1930 年被增加到了 2 836 人；有时甚至还要寻求那些对禁酒并不热心的海岸警卫队、海关和移民局的帮助，然而，即便如此，禁酒的力量也还是微乎其微的。梅尔兹先生为大家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 1920 年，如果将所有禁酒事务专员召集在海岸线和边界线上——权且不去管医用酒、大大小小的啤酒厂、工业用酒或者非法蒸馏酒，每一个专员就得要巡查 12 英里的海岸线、码头、海岬、森林以及河岸。这些专员在 1920 年的收入大多在 1 200～2 000 美元之间；到了 1930 年，他们的收入被慷慨地升到了 2 300～2 800 美元。不难理解，每周支付 35 美元、40 美元或者 50 美元薪水雇佣到的人，一定是掌握了专门的技术知识、勤于去有效地监督工业用酒制造厂复杂的化工流程，或者能识破哪怕是最狡猾的私自酿酒人和走私贩的设备；并且他们也一定能拥有一种人格力量，能抵抗口袋里鼓鼓囊囊塞满钱的人士的贿赂腐化，且愿意去信仰圣诞老人并听从良心的调遣。

然而，这个禁酒组织，相比较于他们所面临的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显得是那么渺小；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他们的报酬显得那么微薄。如果能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支持，或许他们也可以令人满意地控制酒的供应。但是公众对禁酒的信念已经开始动摇。战争结束后，到了 1920 年，一切都在回复常态，正如人们曾经因为产生抵触情绪而导致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失败以及习惯与道德革命的发生那样，公众对禁酒的理由也产生了类似的抵触情绪。斯巴达式的理想主义崩溃了。人们厌倦了为了崇高的事业而束紧自己的腰带，厌倦了将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一片只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土。他们需要放松，需要做回他们自己。对禁酒法令的情绪变化发生得非常迅速，简直令人不知所措，短短几个月内，《沃尔斯特法案》就遭到全方位的攻击，而先前的那个微不足道的赞成制酒群体的观点则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禁酒法令已被写入《法令全书》，禁酒领导人正忙着抵御来势汹汹的允许制酒的大潮，街角的小酒馆虽然早已被封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毫无疑问，无酒的太平盛世已经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 三

随后几年发生了一系列前后自相矛盾的事件，可能会令一个民主国家的有识之士大为困惑。显而易见，美国的大多数州当时仍然在推行禁酒法令。一个有识之士可能会推测，一个明显的摆脱困境的方法就是，要么使执法人员在数量上翻一倍、两倍或者三倍，要么修改法令。但是，类似的措施一个也没有被采取。那些禁酒的领导人们，不愿承认在美国彻底肃清酒的任务要远比他们预料的艰巨，也没有大声疾呼国会加大用于执法的拨款。毕竟对于他们这些禁酒领导人而言，更为容易的做法就是将那些法令的反对者诋毁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者是文明的破坏者，并因此导致公众对他们的反对。国会也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尽管参众两院中支持禁酒的议员都占了大多数，可是支持禁酒是一回事，而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无论会给自己有影响力的委托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也要执行禁酒法令，则又是另一回事了。行政官员对禁酒问题的谨慎态度无异于把它当成一个火药桶。除了通过协商将法令条文中 3 英里的限制扩大到 12 英里，呼吁在无需动用国会太多拨款的前提下尽力提高执法效率之外，哈定总统和柯立芝总统





对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贡献也只限于发表一些类似“遵守法律是一种美德”等十足的陈词滥调。各个州政府本应协助联邦禁酒局，但是到了 1927 年，他们对禁酒事务的财政拨款只占各州用于执行自己的鱼类和游戏类法令总额的 1 /8。有些州的立法机构则彻底终结了他们的援助，即便是最支持禁酒的那些州也倾向于让“山姆大叔”（联邦政府）独自在前冲锋陷阵。地方政府本应该打击地下酒吧，但是如果当地民众不坚持，政府的打击也只是个形式。那些原本就反对禁酒的州更不会打击地下酒吧，对于他们而言，任何符合实际的计划都是值得提倡的，但是，设法废除或者修改修正案似乎又是毫无指望的，于是，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似乎只要能公开地表达他们抗议的呼声便心满意足了。禁酒法令并没能朝着原先设定的方向发展，然而，似乎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能够设法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

伪装得很好的、装满酒的船会定期地从比密尼、伯利兹或圣皮埃尔进入美国港口，将货物迅速地转移到等候的摩托艇上，再由这些快艇运到任何一个受保护的小码头。装满优质加拿大威士忌的船只遍布于底特律周边的湖岸线上，等候上岸。货船运来了一箱箱走私的杜松子酒，再混装于其他的、完全合法的、贴明标签的商品之中。也有的酒是被藏在货车里，从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偷运过来的；数量达一车之多的威士忌有时甚至是被一些被人调教过的聪明海豹私运到美国的。这些形形色色的走私是如此成功，以致在 1925 年，负责执行禁酒法令的财政部副部长林肯・C. 安德鲁斯（Lincoln C. Andrews）将军，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他的人员只截获到了 5%的走私到美国的各种酒；而仅在 1924 年这一年，流入国内的酒的价值，据商务部估计，就高达 4 000 万美元！啤酒被源源不断地从酿酒厂偷运走，禁酒专员无从查起的小酿酒厂生意异常兴隆。据多方估计，在这十年期间，被非法转移掉的工业用酒精数量每年应在 1 300 万～1 500 万加仑。即便是在 1930 年，政府已经提高了检测供应来源的技术（通过严格控制准许制度和其他措施），禁酒专员们承认，当年被转移掉的酒精仍然高达 900 万加仑；也有数据估计其实远远不止这么多，应该高达 1 500 万加仑（要知道，每转移的 1 加仑酒精在兑水调味后，足以被调制成 3 加仑的假酒，再装进贴有可爱的苏格兰语标签的酒瓶，就被站在上等公民门前的走私贩们鼓吹成是“刚下船”的新鲜货）。

随着时间的推移，违法蒸馏被证明是一切酒的来源中最丰富的一种。到了这个十年的末期，根据禁酒专员多兰（Doran）博士的陈述，蒸馏提供的

酒的数量大概是被从工厂转移掉的工业用酒精总量的七八倍。如果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当时违法蒸馏在美国有多普遍，看看玉米糖的生产数量便可以明白一切。从1919年到1929年，这种糖的产量增加了六倍，尽管如维克山姆(Wickersham)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玉米糖的合法用途“几乎没有”，也“无从确定”。毫无疑问，玉米制的威士忌是这些数量剧增的玉米糖的主要去处。

这些无法抗拒的、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的酒见证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却又是有伤风化的场景：在大型的橄榄球赛事上，扁平小酒瓶在观众席中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脸颊上方倾斜；配有常见的、老式吧台的地下酒吧里，也许是出自一帮西西里岛的酒精伪造者之手的、由杜松子酒调制而成的鸡尾酒被出售给客人(顾客收75美分，警察免费)；出身名门的年轻女性一只脚搭在黄铜栏杆上，将手中的马提尼一饮而尽；由于“服务站”派出的年轻人会定期检查，桶装的葡萄酒汁只能在年轻夫妇卧室的壁橱内慢慢沸腾；启程去出席贸易会谈的业务经理总会在包里装上两瓶杜松子酒；销售部经理非常慷慨地给来访的客户端上酒杯，就像在以前那么大方地散出一包包香烟；宾馆服务员匆匆跑到417房间，出于对“不要和含酒精的酒混淆”规定的极具讽刺意味的理解，会送上客人一份加冰的姜汁无酒精饮料；联邦政府检察官奉命关闭了夜总会和地下酒吧，却又很快在其他地方发现它们换了名字重新开业；特派的禁酒专员伊兹·爱因斯坦(Izzy Einstein)和摩尔·史密斯(Moe Smith)，凭着颇具喜剧风格的伪装，出其不意地逮捕走私贩；海军部的斯梅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将军在打击宾夕法尼亚州的酒贩子运动中获得了提升，在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后坦言：政治使得这个地方不可能彻底禁酒，他最终在一片混乱中隐退了；政府下令，为了防止工业用酒精的流失，在其中添加了甲醇和其他的有毒成分，却因此而被反对禁酒的人士指控为谋杀；政府机构人士对于他们无法通过文明的方式禁酒而大为恼火，于是，他们最终动用了武力——有时，这难免会伤及无辜；那艘在加拿大注册的合法的“独自号”轮船，被一艘美国的缉私船追了两天半，最终沉入距离美国海岸215英里处的海里，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一片恐慌；联邦法庭里堆满了与禁酒有关的诉讼案；来自反对禁酒地区的陪审员坚决拒绝裁定私自酿酒人有罪；各类捏造的贪污受贿案遭到各种公务员的详细审查。

不管禁酒政府的禁酒措施是多么有效，至少它制定了饮酒过度的宣传和反宣传。几乎任何一个支持禁酒的人都会告诉你，禁酒为美国的繁荣奠

定了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节节攀升的银行储蓄和一些大厂商提到工人们在星期一上午回厂上班时眼底清澈、手法稳当而得到证明。或者可以说，禁酒使因酗酒而死亡的人数减少，监狱里少了因饮酒而造成的罪犯，工人们的工资可以转而去购买汽车、无线电通讯设备和住宅。然而，几乎任何一个反对禁酒的人都会告诉你，禁酒与国家的繁荣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导致了犯罪的高涨、伤风败俗和离婚率的上升，以及对一切法律的不屑，也正是这些行为危及到了一个自由政府的根基。禁酒反对者说，那些禁酒支持者因为对必然会遭到反对的禁酒法令抱有狂热的盲从，实际上是在鼓动布尔什维克主义；而禁酒支持者则说，那些禁酒反对者由于愤世嫉俗而故意违反法律，实际上也鼓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即便是对于一些推测的事实，只要你去读报纸或者听广播，你都能发觉其中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在街上再也看不到醉汉，人们在街上看到的醉汉更多于以往；大学校园里几乎不存在饮酒问题，大学校园里的饮酒问题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每两户就有一个蒸馏器，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饮酒习惯已成为历史；由于酗酒而导致贫困的例子已经大大减少了，贫民窟地区饮酒的几率是法案实施前的 3 倍；A 主教、B 医生和 C 长官因当前的形势深受鼓舞，X 主教、Y 医生和 Z 长官对眼下的局面忧心忡忡。口水战役就这样不断升级，无休无止，热闹非凡，你来我往。

在此，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支持禁酒和反对禁酒的专业人士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大量统计数据所迷惑。许多数据都是很不可靠的，对它们的采用简直可以为一位逻辑学教师讲解此后种种谬论提供完美的范例。也许我们从中足以指出一个简单的反常现象，那就是，随着第十八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案》的实施，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对美国饮酒的总人数是否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问题，确实应该一直轰轰烈烈地讨论下去。据推测，除了富人群体，其他群体中的饮酒者数量大大减少了，但是这种减少并不明显，而这已经足以表明一个众人皆知的失败，那就是，禁酒法令并没能实现在 1919 年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预料到的目标。

## 四

到了 1928 年，有关禁酒的争论已经达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总统

竞选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纽约州州长史密斯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尽管对禁酒并不是十足的反对，他在竞选中也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两条修正意见：第一，对《沃尔斯特法案》作补充，给"致醉酒类饮料的酒精含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在不超过国会统一标准的前提下，每个州可以自行制定自己的标准；第二，对第十八修正案作修订，在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同意之后，每个州可以在本州内自行进口、加工或强行加工以及出售酒精饮料，但销售只得在州内进行，并且不能在任何全国性活动场合公开销售。而共和党候选人对民主党的回应则是，他们几乎是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支持禁酒的一边。确切地说，赫伯特·胡佛的禁酒宣言对很多细节都搁置不提了，他把禁酒称作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实验和经济实验，动机高尚，意义深远"，但他并没有宣称禁酒的结果也很高尚。然而，那些选民们把对动机的认可等同于对成绩的认可，也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省略的内容。

共和党候选人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禁酒支持者举杯欢庆。尽管各个州选民投票和舆论调查的投票结果都有些模棱两可，但是禁酒支持者一直都声称他们占据了全国民众和国会两院议员中的大多数，现在他们对此更加确信无疑。然而，选举的结果并未能解决那些一直悬而未决的疑惑。谁又能说纽约东部贫民区的那个快乐的勇士已经被击败了，就因为他反对禁酒？或者就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抑或是因为他被视为是对柯立芝繁荣继续延续的一个潜在威胁？还是因为他是一名民主党人？

但是赫伯特·胡佛所做的远远不止对禁酒支持方动机的认可，他还承诺成立一个政府调查团对法案实施的情况进行调查。他抵达白宫的两个半月以后，任命了一个以纽约州乔治·W. 维克山姆（George W. Wickersham）为主席的、由 11 名成员组成的调查团，埋头开始了这一庞大而艰巨的任务。

直到 1931 年 1 月，也就是在维克山姆主席被任命 19 个月后，他和他的调查团才从他们面前那堆积如山的一大堆事实、理论和论点中抬起头来。当维克山姆主席把 11 个调查员的厚厚一摞结果放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时，战后十年早已过去。然而，由于给出这份调查报告的调查员不仅拥有高智商，并且被认为应该是公正的，所以他们对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重大事件所给出的调查报告，在此确实值得特别一提。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报告。首先，报告通篇非常明确地表示，禁酒执




法人员对于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禁酒而深感歉意。其次,11 个调查员每人递交了一份表达个人观点的报告,11 人中只有占少数派的 5 个人赞成可以继续执行禁酒而无需做出重大调整;有 4 人赞成对修正案进行修改;有 2 人赞成彻底废除禁酒法令。但是"全体"调查团投票赞成继续执行禁酒法令;他们还提出,如果时间证明禁酒执行失败,也可以做出修改,他们为自己提出如此"合理"的建议而颇感骄傲。有关报告的令人困惑不解的结论,弗拉库斯(Flaccus)在《纽约世界》杂志的专栏中曾经给予过非常巧妙的讽刺:

禁酒令失败透顶

我们喜欢它;

它无法阻止本打算要去阻止的

我们喜欢它;

它留下了贪污和谄媚的足迹,

使堕落和罪恶遍布这片国土,

它所禁止的一文不值,

但是,我们赞成它。

如果说维克山姆调查团的报告令人困惑,这也十分正常,因为他们当时面临的局面也是如此。在一位公正的旁观者眼里,很显然,美国在1917~1920年期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立法时完全缺乏初级化学知识——因为它告诉人们,酒是可以如此容易地进行加工制造;也完全缺乏初级心理学知识——因为它告诉人们,常人的心理冲动是不容易被法令禁止的。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把国家从它当初那么轻率地跳入的"沼泽"中解救出来。对于已经喝惯了杜松子酒的人,怎样才能按照一些支持修改法令人士的建议,让他们满足于喝一些低度葡萄酒和淡味啤酒?既然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学会如何泰然地坐享违反法律的硕果,政府规章中不太严厉的体系,譬如官方售酒,又如何才能在执行过程中不会被违反、不滋生腐败?如果彻底废除禁酒法令会使那些酿私酒的"贵族们"不得不放弃他们早已习惯的谋生之道,那么,还有什么他们不敢去从事的险恶职业?关于酒到底应该被视作一个祸根,还是一个可以适度饮用的福音,是个人的私事还是公众的重要事件,即便是那些希望修改法令的人也仍在争论不休,在此情形下,一项针对酒的、新制定的国家政策如何才能有效地被贯彻执行?

即便美国民众中清醒的大多数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走出“沼泽”的最佳方案，可是，当13个坚持禁酒的州阻止对修正案做出任何形式的修改时，又能有什么机会实施这些最佳方案呢？总之，美国历史上从未面临过比这更难解决的难题。

## 五

1920年，当禁酒法令刚开始执行时，芝加哥的一个令人生畏的黑社会人物约翰尼·托里奥(Johnny Torrio)曾因此而心生灵感。他发现在刚刚宣布为违法的酒的销售业务中大有赚头，他产生了要控制整个芝加哥城酒的分配的念头。在当时，竞争太激烈了，但是也许一帮手脚灵活、枪法准确而又纪律严明的人能够控制局面，他们可以通过胁迫来打败与其竞争的私酒酿造人，还可以“劝说”地下酒吧所有人，如果不买托里奥的酒可能就没有安稳日子过。

作为纽约那个臭名昭著的“五角地黑帮”的一名“高材生”，约翰尼·托里奥与“左撇子”路易(Lefty Louie)和“血手”吉普(Gyp the Blood)[在1912年那个众人皆知的“贝克案件”中，他曾被怀疑与赫尔曼·罗森塔尔(Herman Rosenthal)的谋杀有牵连]这些“善良人士”一向往来密切。要发展大事业，约翰尼·托里奥自然会求助于他的“母校”来寻找得力干将。他为自己的蓬勃事业找到了“五角地黑帮”里的一个23岁的那不勒斯恶棍，他还许诺对方：如果愿意来芝加哥并处理各项竞争事宜，除了一笔数量不菲的年收入，还可以分到私酒贸易所得利润的一半。于是，年轻的恶棍来了，并很快在托里奥的投机冒险事业中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四魔头”公司在一个掩人耳目的、貌似合法的幌子之下开业了，他们的资产包括一本家庭用的大型《圣经》和一套业务名片，上面打印着：





阿尔·卡彭

二手家具经销商　　南万柏大街2220号

托里奥猜对了。实际上，他已经猜对三次了。在芝加哥酿私酒的利润已经被证明十分巨大，并且给他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来缓和法律制裁的力

量。竞争也已经被证明十分激烈：托里奥时不时地会发现他的对手已经接近了某个地下酒吧，并建议那里的所有客人都购买他们的啤酒而不是托里奥和卡彭的酒，如果哪个胆大之人竟敢拒绝，就会被打得人事不省、不得不从此关门走人。还有一点就是，作为托里奥帮的领袖，阿尔·卡彭确实是最佳人选，因为他已经在不断"学习"中掌握了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技巧。

据说，在三年之内，这个来自"五角地黑帮"的恶棍手下已经有了700名随从等候差遣，其中许多人擅长使用短把猎枪和汤姆逊冲锋枪。随着啤酒和"煮酒"（违法蒸馏酒）利润的滚滚而来，年轻的阿尔·卡彭学会了更多的手腕——尤其是在控制政客和影响政策制定方面。到了禁酒十年的中期，他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塞罗市的郊区，他安置自己的人手担任市长，在那些完全开放的赌博场所和161家酒吧安排了自己的代理人，并且在荷桑宾馆成立了自己的私人总部，而他手头的资金足有几百万美元。托里奥逐渐隐退到幕后，卡彭现在则成为了大亨。但是，伴随着他对权力的征服，出现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流血事件。当那些与他竞争的帮派——欧班宁帮、吉纳斯帮以及艾洛斯帮——试图阻止卡彭日益扩大的统治范围时，芝加哥饱受了先前没有哪座文明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大规模残杀，而各种残杀的新技巧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这些帮派之争中，除掉对手的一种通常做法是：用一辆载满打手、配备短把猎枪和冲锋枪的赃车追踪对手的车，追上后把他逼到路边，然后朝他疯狂射击——接着迅速从现场消失，混入来往的车辆中，最后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抛弃掉偷来的车。另一种他们偏爱的做法是带受害人"出来溜达溜达"，通俗地说，就是把他骗到一辆熟人的车上再从容地将之击毙；随后把车开到偏远的城市荒郊，把尸体抛到水里。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可以俯看到对手房子前门的地方租一套公寓或一间屋子，在窗口安排几个雇来的刺客，当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受害人从前门走出时，从紧紧拉着的窗帘后会射出几十梭机关枪子弹。当然，更具独创性且更为简练的杀人方式还有很多很多。

举例来说，欧班宁帮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为芝加哥地区对卡彭王国的最大威胁，而策划对该帮头目迪翁·欧班宁（Dion O'Banion）的谋杀过程，简直可以和当初耶稣的门徒计划杀死犹大相媲美。欧班宁是一个在夜晚贩卖私酒、为非作歹，而白天则闭门种花的人，他性格古怪、狡猾多变，既是一个鉴赏兰花的里手，也是一个杀人的行家。一天上午，一辆私家车停在他

的花店门口，从车上走下来三个人，第四个人留在车内的方向盘前。三个人显然已经设法赢得了欧班宁的信任，那一刻，当他从花丛中走出来迎接他们时，可以看出他是放松警戒的，虽然平时他身上总带着三把枪。三位客人中走在中间的那位和欧班宁热切地握手，然而就在他紧握住欧班宁一只手的时候，他的两个同伙将六发子弹射进这个双手沾满别人鲜血的花匠的胸膛。随后，三个刽子手走出花店，上了私家车扬长而去。他们从未遭到审判，也没有关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因自责而自杀的报道。欧班宁的葬礼可以称得上是匪徒中的头等级别：一个价值 10 000 美元的棺材，满满 26 卡车鲜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个花篮上题着感人的话语——“阿尔·卡彭敬献”。

到了 1926 年，尽管已经是群龙无首，欧班宁帮却仍不知悔改，还给帮派斗争又增添了“新花样”。光天化日之下，西塞罗市的大街上车水马龙，欧班宁帮的人在八辆巡逻车上用机关枪扫荡了阿尔·卡彭的总部。这些车沿着荷桑宾馆外熙熙攘攘的街道“庄严”而缓慢地行进，第一辆车打了几发空弹，驱散了无辜的路人，并将卡彭的人吸引到了临街的门窗前。随后，从依次排开的一排车里，喷出连绵的子弹，扫射在桑宾宾馆和相邻的建筑物以及周围的一片地面上。一个枪手甚至下了车，在荷桑宾馆门外的人行道上仔细找了个位置，单腿跪下瞄准宾馆大厅，打出了一百发子弹——扫射的目标一处接一处，就好像一个人在花园里拿着塑料水管冲着一簇簇花依次洒水。然而，这次报复行动的伤亡却小得令人不可思议，阿尔·卡彭因为一直趴在荷桑宾馆的地面而毫发未伤。然而，如此公开的大规模射击自然逃不过公众的目光。即便是在一个可以用配备装甲的车辆来运输金条的时代，把一条市郊的街道变成一个射击场似乎也有一点过火了。

斗争还在继续，在枪林弹雨中，一个又一个帮派被打垮了，直到 1929 年情人节，帮派之争在一次公开屠杀中达到了高潮。无论就独创性还是残忍程度，这次屠杀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1929 年 2 月 14 日上午 10 点半，在北克拉克大街上的名为 S. M. C. 的货运公司里，欧班宁帮的七个人正坐在车库里，等候一批约定好的抢劫来的酒。一辆凯迪拉克巡逻车停在路边，三个身穿警察制服的、警察模样的人走出了车，紧随之后的是两个穿便衣的人。三个警察解除了欧班宁帮七个人的武器，并且让他们面向墙壁站成一排。七个人很顺从，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警察的突然袭击，想当然地认为这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应该会像以往一样，很快就能轻

而易举地脱身，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是，就在七个人举起手、面向墙壁站着的时候，那两个穿便衣的人突然从门外的走廊闯了进来，从容不迫地用机关枪把他们扫射倒。这小小的一幕戏剧是这样谢幕的：三个警察模样的人庄重地押着两个穿便衣的杀手穿过人行道，走近等候的巡逻车，五人进车后，车开走了——留给那些冬日街上的路人一幅以法律的力量逮捕罪犯的完美而生动的场面。

这些杀戮和那个杰克·林格(Jake Lingle)枪杀事件一起，成为实施禁酒十年期间最轰动的事件。杰克·林格是个有着“《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和“土匪同伙”双重身份的人物，在1930年的一辆开往伊利诺伊州郊区火车站总站的拥挤的地铁中，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杀了。整个十年期间总共发生了500多起帮派谋杀案，却很少有杀人犯被绳之以法。精心的策划、金钱的诱惑、施加影响力、对证人的恐吓，还有任何牵涉的匪徒都不愿作证(因为这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因此，无论谋杀是多么大逆不道，都有可能在这种种影响之下，无法得到公正的裁判。芝加哥城正在给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全世界人进行一次有关暴力和不惩治犯罪的生动教学。这种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呢？

如果我们说是禁酒法令，或者如果你愿意说成是“公众拒绝遵守禁酒法令”而导致了违法势力帮派数目的上升，这个解释可能又过于简单。还有其他各种原因：正如被抢劫的银行工作人员所观察到的那样，汽车使得逃离现场变得轻而易举；和平时期被改造后的新兵工厂生产出了轻便却致命的武器；由西西里岛匪徒引入的黑手党杀人传统；赞成制酒的团体倾向于纵容为他们提供啤酒和杜松子酒贸易的“副产品”——枪支、杀人等；现代大都市社团的派头十足和笨拙不堪，这使公众关注的焦点无法对准和普通公民眼前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任何掠夺；当然，还有那个时代对政治的漫不经心和冷漠。但是，帮派激增的直接诱因毫无疑问应该是禁酒法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啤酒的走私或偷运？(啤酒在体积上比威士忌大，要想在啤酒贸易中获利，必须要用卡车运输，而卡车又很难掩饰，偷运时必须要贿赂禁酒工作人员、警察，并且为防止土匪抢劫而携带武器)啤酒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都有巨大的利润。按照阿尔·卡彭的传记作者弗雷德·D.帕斯利(Fred D. Pasley)的记录，在1927年，联邦事务官估计，卡彭帮每年控制了酒类收入来源中的6 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也许是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啤酒。在一个人的口袋里塞满钱，提供他一个获得巨

额收入的机会，使他卷入非法生意中，这样，他在遭到攻击时也就断了求助于法律的念头，何况你还给他自如地行贿和杀人的机会。美国人生活中从来就不缺帮派和匪徒，毫无疑问，这种情形将继续存在；市政官员中从来就不乏贪污腐败，毫无疑问，这种情形也将继续存在。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20 世纪 20 年代芝加哥频频出现的腐败和犯罪，立即引起了将酒的诱惑驱逐出美国家园的各种努力尝试。

这个来自纽约"五角地黑帮"的年轻暴徒自 1920 年以来便开始平步青云了。到了禁酒十年的末期，他已经是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或者基因·滕尼一样声名远扬了。他简直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奇迹。他不仅控制了芝加哥 10 000 个地下酒吧的大部分酒类供给，而且控制了据说甚至远到加拿大和佛罗里达海岸的供货来源。他集聚并且潜藏了一大笔财富，确切数字无人知晓，按照联邦事务官的说法，总数应该有2 000万美元。只有一次在费城，他因为持枪而遭到逮捕入狱，但其他方面他似乎都是遵纪守法的。他乘坐的那辆配备装甲的汽车在芝加哥街头开过时，有一辆车在前面为他巡逻开路，另一辆车装满携带武器的随从紧跟其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流动的防线。他去戏院看戏时，有 18 个身穿正装的保镖陪同，当然，枪是按照匪徒们认可的方式挂在左腋下的。他姐姐结婚时，教堂外的雪地里几千人转来转去，他送给新郎一个 9 英尺的婚礼蛋糕和一辆特制的蜜月轿车。他在迈阿密有一处房产，有时他在那里一次设宴可以招待 75 位客人。据说，有高官——甚至是法官——都要通过电话接受他从芝加哥一家商业中心的宾馆中发出的指令。而他才只有 32 岁，拿破仑 32 岁时又在做些什么呢？

与此同时，帮派控制和帮派暴力正迅速地渗透到美国的其他许多城市，托莱多已经感受到了，还有底特律、纽约……芝加哥并不特立独行，芝加哥只不过是领先了一步。



## 六

到了战后十年的中期，很显然帮派经营的业务范围在不断扩大。根据帕斯利先生的记录，卡彭帮仅在 1927 年的总收益中，按照联邦事务官的评估，就有6 000万美元来自于啤酒、各种酒精饮料和蒸馏酒；有2 500万美元

来自于赌博场所和赛狗场；有1 000万美元来自于组织卖淫嫖娼、经营酒店和其他途径；还有勒索诈骗所得收入1 000万美元。卡彭帮正在逐渐闯入一些新兴领域和一片广袤的新天地。

"勒索"(racket)这个词，广义上来说，是指一种很容易搞到钱的职业，其历史由来已久，曾经被 50 多年前纽约的坦慕尼派广为使用。但是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叶，它才以目前的形式被广泛使用，而衍生出的术语"敲诈勒索"(racketeering)是直到 1927 年，当萨科和万泽蒂被处死，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而卡尔文·柯立芝决定不再隐退的那年，才进入美国词汇的。这个词汇是战后十年的一个产物，自然它所指称的行为也是如此。

与酿私酒帮派的谋杀活动一样，敲诈勒索的出现有着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极端的劳工联邦主义。自莫莉·马贵(Molly Maguires)事件发生之日起，有组织的劳工活动就不时地在保护自己的权益中动用了铜制的钩爪和炸弹。在巨大的红色恐惧事件过后，劳工联盟失去了公众的支持，而柯立芝繁荣又使得数千的联盟成员意识到，一张联盟成员证并不是通向财富的惟一签证，这使得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不止一个联盟领袖在为保住他的饭碗和权利的斗争中一再用到了炸弹。1919 年那种热情四射的激进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秩序的希冀成为泡影。劳工领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在别人都拼命捞一把的时候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为此他被怂恿去打破工贼的脸或者去掀翻反联盟工厂的屋顶，以表明自己是当真的，是言出必行的。许多情形之下，他会求助于雇用暴徒、杀手，他通过行贿或者至少通过政治上的影响使自己免受法律的追究。他与那些经常采用和他相似方法以保全自己或者赚到更大利润的其他生意人暗中勾结，这些邪恶的联盟现在更容易达成，因为酒的违法贸易正在使黑社会之流变得日益富有，信心日增，并且动辄开枪杀人；与此同时，它也使得许多政客和生意人习惯了大规模的受贿行贿和同流合污。匪徒们和其他一些狡猾的家伙在识别了劳工领袖的诡计后，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开始组织诈骗起来。这样到了 1927 年，滋养了阿尔·卡彭的这个城市也在滋养着这些稀奇古怪行业的各色人等。

其中有一些人步入了犯罪的不归之途，他们曾经也是劳工联盟的成员；而另一些人仅仅是冒充联盟成员来进行敲诈活动；还有一些是这两种不同来源的结合。但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当一致的：敲诈这个行为是为保护那些生意人免受损失而向他们收取费用，而且这一行当日益兴隆，因

为受保护对象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他不付钱,他的店面就会被炸,或者他的卡车就会遭到严重破坏,或者他本人可能会被残忍地杀害——绝没有机会向当局求援,因为当局人士不是遭到恐吓,就是已经被拉拢。

例如针对洗衣业的敲诈。敲诈勒索者从零散洗衣店经营户和熟练洗衣工那里诈骗到了大量款项,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对芝加哥洗衣行业的控制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致普通公众洗一套衣服的价钱被他们从 1.25 美元涨到了 1.75 美元。如果哪个洗衣工胆敢违抗这种敲诈,他就可能会遭到店铺被炸的厄运,或者他的送货车会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火,或者他本人会被更恶毒的方式教训一顿:易爆炸的化学品可能会被缝进裤子的缝合线中,再送给他清洗。还有针对修车厂的敲诈。这是由大卫·艾布林(David Ablin)[化名"斜眼"莫里根(Cockeye Muligan)]的聪明脑袋想出来的:如果哪个修车厂的厂主决定不加入中西部修车协会,按照这个行业先前所授予的权力,他的修车厂将会被炸,或者他的修车人员会遭棍击,或者暴徒们会在深夜闯入他的店里,砸碎停在那里的私家车挡风玻璃,用大锤对车身进行一番"修理",或者非常巧妙地用一种碎冰锥扎破汽车轮胎。又比如对橱窗清洁工的敲诈。当一个曾经在克里夫兰干活的橱窗清洁承包人马克斯·威尔纳(Max Wilner)搬到芝加哥并打算在那里做生意时,有人告诉他,除非他出钱让别的承包商放弃已经上路的生意,否则他不可能做成生意。他拒绝了,结果他所遭遇的不仅仅是一通拳打脚踢或者收到一枚伪装的炸弹,而是被人直接开枪打死。有关各种敲诈勒索案和其他犯罪案的列举可以一直延续好几页纸。按照国家律师事务所的统计,1929 年仅在芝加哥就发生了 91 起敲诈案,其中有 75 起还在审判中。而根据雇主协会的统计,这些犯罪给全体公民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13 600万美元。

酿私酒帮派最喜欢用的武器是机关枪,而敲诈者最偏爱的是炸弹。雇用一个投弹手用一枚黑火药炸弹去完成一项常规性任务,只需花费 100 美元,但是用爆炸性极强的炸弹去完成一项危险任务可能要花费至少 1 000 美元。仅 1927 年 10 月 11 日至 1929 年 1 月 15 日的 15 个多月里,芝加哥地区设置或爆炸的炸弹至少有 157 枚。根据戈登·L. 贺斯泰德(Gordon L. Hostetter)和托马斯·安恩·比斯利(Thomas Auinn Beesley)在《这是敲诈》一书中对这些暴行进行的详细描述,无论是哪一次敲诈案,都没有任何一个凶手受到惩罚。

对于敲诈者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安全又令人快乐的行当。的确,

到了战后十年的末期，敲诈业在芝加哥已经取得如此大的发展，以致生意人都绝望地向阿尔·卡彭寻求保护；卡彭的随从经常秘密地参加联盟的各种聚会，以确保一切按照"大亨"的旨意顺利进行。据说，在隶属工会的工人组织中，还没有哪个人物的势力能够强于这个酿私酒行业的霸主。就像帮派械斗一样，敲诈勒索行当也已经迅速地渗入了美国许多其他城市。纽约不是曾经嘲笑芝加哥的违法无序状态吗？纽约自己也有大量的敲诈案——洗衣业敲诈、自动贩卖机敲诈、鱼行敲诈、面粉销售敲诈、菊芋出售敲诈，还有许多其他的无法一一列举的敲诈。在每一个大都市社区，敲诈者现在至少是潜在的威胁。仅在短短几年内，敲诈就已经"风靡"全国了。

## 七

禁酒法令问题、帮派问题、敲诈问题，等等，随着战后十年的日趋远去，所有这些问题都依然存在，并挑战着 20 世纪 30 年代当局者的政治才能。偷运朗姆酒的汽艇仍然在河面上偷偷行驶；隐藏着的蒸馏酒设备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流出酒来；走私酒行业的"企业家"对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当机立断"，机关枪发出"打字机"一般咔嗒咔嗒的声音在芝加哥街头响起过后，汽车上铺满的玫瑰花则随着它的匪徒主人一同进入了墓地；职业打手冲着没有加入联盟的工人挥动着拳头；脖子粗壮如公牛却目光躲闪的绅士们召来了小零售商，并建议对方最好与他们合作，否则便无法为可能发生的事件负责；炸弹使一些小商店变为支离破碎的废墟；而小报的读者们，目光注视着这些匪徒残杀的报道，从中寻找着冒险的刺激、壮观的场面和传奇故事的乐趣。

# 第十一章　佛罗里达，温馨的家

“……去佛罗里达——

那里有企业家的金銮——

黄昏里坐看棕榈叶婆娑，

在被太阳吻红的天边留下斑斑点点——

暮日下太阳、月亮和星星同辉，

共筑茫茫宇宙这苍穹的一刻斑斓——

来自加勒比海的微风轻拂呢喃，

妈妈的摇篮曲般细语轻言——

银色的月亮是天空的耳环，

月光笼罩下的是直入大地的珠帘”







这首感情炽热、豪迈奔放的小诗写于1925年秋。此时，人们对斯科普斯审判案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圣巴巴拉地震后的人心恐惧也渐趋稳定，戏院里《红色农庄》正在上演，而大主教曼宁为所有人祈祷而筹建的教堂也即将铺设奠基石，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在祈求自己从未承担起打击费城私酒贩运势力的任务，《无人知晓之人》已经售出了10 000多册。就在这样的时刻，佛罗里达的繁荣达到了鼎盛时期。你可能会以为，引用的这首小诗是出自于一位对诗歌着迷的文学女青年之手。然而，这却是一位银行

副总裁为《迈阿密人》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它多少揭示了那些被认为是意志坚定的、置身于那阵最狂热的房地产投机热潮中的男男女女在当时的心情，而这种投机热在美国其实已经延续了 90 年之久。



一

在 1925 年那个值得回忆的夏天和秋天，迈阿密这个热带城市的空气中并没有丝毫的郁闷与倦怠，整座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房地产交易中心。据说，有 2 000 多家房地产公司和 2 500 多个房地产代理机构在从事住房划地的市场运作。广为宣传的佛罗里达炎炎烈日下，人们卷着袖子步履匆匆往返奔波：讨论购房契约、履行合同的特权、房子要临水而建、盈利则达到了成百上千美元，等等；市政府官员们被迫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出售临街的房产；为了防止因居民投资房地产而导致紊乱的交通拥堵，他们甚至特地制作了一幅更加详细的交通地图。温暖的海风中，建房打桩机的声音此起彼伏，摩天大厦的钢铁脚手架直入云霄，一切无不昭示着迈阿密城注定会成为现代大都市的前景。公共汽车轰鸣着驶过弗拉格勒街头，车上免费承载着"未来的业主"，他们要去参观挖掘机和蒸汽铲是如何为美国的家庭主妇和未来的享乐主义者将偏远的红树湿地和比斯坎海湾的沙洲变成豪华的威尼斯城的。通往迈阿密城的迪克西公路上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一位因为交通拥堵而受阻的行人在排队等候的昂贵和廉价的轿车中数到有来自 18 个州的车牌。大小宾馆里都住满了人。人们在任何一个可以找到的落脚之处便能倒头就睡，不管是火车站的候车室，还是颠簸的汽车。火车站被迫对耐用货物实施了停运，全力以赴运输生活必需品，以防出现饥荒；建筑材料是通过河岸和海运码头林立的船舶进口的；新鲜的蔬菜已经成为稀有品；城市的公共设施正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满足这突然剧增的对电、煤气和通讯设施的需求；冰块供应不足频频发生。

迈阿密发展的速度是多么惊人啊！1920 年时，这个城市的人口只有 30 000。依据该州的人口普查，到了 1925 年，其人口已经上升到 75 000。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从北方迁移至佛罗里达州的人潮，其中不乏很多前往迈阿密的人群，如果我们将这部分人也计算在内，再加上接下来几个月中新来的人口，这一数字可能要接近 150 000。而这还仅仅

是开始。难道海陆空运输部长 S. 戴维斯·沃费德( S. Davies Warfield)不是曾预测:迈阿密的人口在未来的十年内将达到 1 000 000 吗? 难道可敬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约翰·W. 马丁(John W. Martin)不是曾断言"佛罗里达州最近几年奇迹般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简直不可思议,而这些还只不过是黎明前的一丝曙光"吗?

每个人都在挣着土地的钱,地价攀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就连原本打算来泼冷水的那些人也不由自主地投身于这股狂热的投机热潮中。

繁荣的不仅仅只有迈阿密这一座城市。自棕榈海滩往南的整个沿海城市都在朝着美国的"利维埃拉"(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度假旅游胜地。——译者注)模式发展;60 多英里的海岸地区被划分成一个个 50 英尺左右的度假区。这股热潮也很快传播到了坦帕、萨拉索塔、圣彼得斯堡和其他一些美国西海岸的城镇。人们争着抢夺奥基乔比湖周围的划地、桑福德的划地,乃至整个美国的建房划地;甚至在与佛罗里达北部边界相临的港口城市——杰克逊维尔市——那些"对杰克逊维尔信心百倍的人士"也在策划一场会给这个城市带来可以预见到的繁荣与财富的战役。

## 二

这种繁荣局面是经过几年的力量积蓄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兴起、壮大,并且在 1924 年后开始愈演愈烈。让我们在此分析列举导致这一局面的种种原因。

1. 首先,当然要数这里的气候——这是佛罗里达州无可辩驳的优势。

2. 该州通往美国东北部人口稠密各大城市的便捷交通——这是南加利福尼亚州无法否认的一个优势。

3. 汽车正在迅速将美国变成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它怂恿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们出门探险,它也能让默默无闻的农民、夏日寄宿屋的管理员或者是汽车修理员都能将全部家当塞进一辆廉价车,经过一程又一程的汽车野营,一路南下,只为获得一个冬季阳光下的闲暇。

4. 柯立芝繁荣所引起的自信膨胀。它使得那些年收入哪怕只有4 000 美元的销售人员也敢梦想,凭借某种魔法力量,有一天他也能买得起一套

漂亮的房子和世上所有的好东西。

5. 一种反常的、早已遍布各地却只是被部分人承认的厌恶情绪。人们反对将国家都市化、工业化，反对过于投入工作，反对每天步履匆匆、照章行事，反对吸烟，反对交通拥堵，反对 20 世纪标准的生活模式，而这些恰恰也是柯立芝繁荣的基础。这种方式可能会帮助美国的生意人挣钱，但是当他需要花掉这些钱时，他便渴望能逃离这一切——去记忆中可以免费沐浴阳光的乡村，去可以惬意地生活并领略欧洲传统之美的地方，去那些将美国的运动、舒适与古罗马的魅力完美结合起来的理想王国——而配置有温泉浴场和电冰箱的威尼斯，以及拥有三个 18 洞高尔夫球场的赛维利亚，就是这种理想王国的体现。

6. 南加利福尼亚的现成榜样。这个州曾经大张旗鼓地对外宣传它的宜人气候，并因此而财源滚滚。佛罗里达州人说了：为什么佛罗里达不能也这么做？

7. 最后，柯立芝繁荣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约翰・琼斯(John Jones)不仅满心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买得起位于博卡拉顿的房子，能够有能力享受钓大海鲢鱼或打水球的假日休闲乐趣，而且，由于他已经听了太多的企业家大胆冒险、一夜暴富的故事，他自己也开始相信，最疯狂的房地产开发也无非就是把地皮当作金矿去经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他创造暴富的奇迹。

疯狂的房地产开发业？但是他们都疯了吗？到了 1925 年，再也没有哪个开发商在众人的眼里是缺乏理智的。开发商们那些在 1923 年看起来是有些狂妄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已经为他们挣得了几百万美元，现实证明他们不是疯了，而是如广告词上所写的：他们是“一些得到灵感的梦想家”。珊瑚阁、海边的好莱坞、迈阿密沙滩、戴维斯群岛——它们就在那里，它们不再只是画在纸上的蓝图，而是实实在在的青砖、水泥和砂浆组合的建筑物。你可能会说它们还没建成，确实如此，但是你不能否认工程速度是惊人的。那些未来的业主们排着长队来买房，而他们能买到的每一平方英尺土地的价格都还在急剧上涨。

很多年前，一个公理会的退休牧师梅瑞克在迈阿密城外买了一块廉价的地，在这片珊瑚石上建了一座有许多山墙的房子，并给它取名为“珊瑚阁”。现在，他的儿子，乔治・埃德加・梅瑞克(George Edgar Merrick)，又购买了周围的土地，他在广告中宣称，自己正在建造“美国最美丽的郊区”。

项目是令人心动的，因为梅瑞克拥有足够的先见之明，坚持统一的建筑风格——他所谓的“改进了的地中海风格”。到了1926年，他的建设计划已经自成体系，形成了一个珊瑚阁中心，包括2 000多所已经建成的和正在建设的房屋。这是个“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学校、银行、宾馆、公寓和各种俱乐部”一应具有；绿叶成阴的街道，环礁湖水，还有停泊的码头。梅瑞克大胆又新奇地刊登了这样的广告内容：他花重金聘请来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让他坐在环礁湖上一只橡皮船里的太阳伞下，对着岸边的人群发表演讲——不是宣扬耶稣，也不是关于淘金，而是关于佛罗里达的宜人气候。布莱恩对佛罗里达阳光的歌颂结束以后，又安排了吉尔达·格雷(Gilda Gray)的舞蹈。梅瑞克还知道如何对现有条件加以最佳的发挥利用：他让人排干了地势低洼处的水，对那里进行重新改造，开出小运河，又从威尼斯进口真正的刚朵拉，还请来了威尼斯的划船人。珊瑚阁的迈阿密—巴尔的摩宾馆有26层房屋那么高，城里的俱乐部有两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梅瑞克正在设想的计划比这还要大胆：他要建一座大型娱乐城，一个游艇俱乐部，还有一所迈阿密大学。“十年的辛劳换来了1亿美元的硬性货币，这是乔治·梅瑞克在闭眼前计划要花掉的钱，”雷克斯·比彻(Rex Beach)在一本关于珊瑚阁的宣传册子中这样写道，“谁能设想到十年时间竟能给这个奇妙之地带来如此巨大的变迁？你不能，我也不能。梅瑞克先生自己也想像不到，尽管他很有远见。”(唉！这非同寻常的远见！这十年带来的影响之一便是后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则公告，提醒珊瑚阁九个系列债券的持有人，这座城已经“自1930年7月1日起，拖欠支付以上系列大部分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除了梅瑞克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奇迹创造者。迈阿密沙滩原本是一片红树湿地，直到卡尔·G. 费希尔(Carl G. Fisher)砍倒了这里的树，将树桩埋在五英尺深的沙子之下，改造修筑了环礁湖和小岛，建造了别墅和宾馆。据说，后来这里变成了价值约为4 000万美元的供出售的建房用地。约瑟夫·W. 杨(Joseph W. Young)以同样盛大的规模建造了海边的好莱坞，当货物禁运切断了他的建筑材料供应时，他购买了适合自己远航的船队，将他的建筑材料运送到他那日益壮大的“城堡”。在佛罗里达西海岸，D. P. 戴维斯(D. P. Davis)在坦帕的海湾购买了两个小岛——“两个小小的红树沼泽地，涨潮时几乎全被淹没”。通过挖泥堆沙抬高了这个小岛，又在这里铺设了街道，建造了宾馆和私人住房。仅在戴维斯公开出售这片地





产的第一天，他就卖出了价值 300 万美元的规划地。尽管当时，据说还没有一架挖掘机开始挖泥。

没错，大家都在买地。到了 1925 年，什么样的地皮都能卖出去，不管地方有多么偏僻，只要是在佛罗里达州就行。一个开发商只需要宣布他有一个新的开发计划，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是在大西洋沿岸还是在内陆的荒原，都足以使得人们争相去抢夺建房划地。“曼哈顿庄园”被广告鼓吹成“距离那个繁荣的、日新月异的内蒂城不足 0.75 英里”；实际情况却是，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内蒂城，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废弃的松脂采集营地。然而，买地的人已经顾不了这些了。当“墨尔本花园”投诉案的调查人员设法找到这个地方时，他们驱车沿着一条小径，“穿过林间堆满垃圾的小路，路过几棵树和几小簇蒲葵，最终在距离目的地 3 英里的地方，绝望地陷入泥潭中”。但是，人们还是争相去买。在这里，或者是在别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是很盲目的。买地人中既有佛罗里达州当地人，有佛罗里达的游客，也有俄亥俄州、马萨诸塞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守法公民，他们虽然从未去过佛罗里达，但也会掏钱去买那些被说成是“另一个珊瑚阁”或者“毗邻新火车站右侧”，或者一个“价值2 000美元的城市”里的那些建房划地。这是因为，在佛罗里达州买地能赚取巨额利润的那些传奇故事足以成为吸引他们的诱饵。迈阿密海滩的一个商业中心有一片划地，在开发的初期只卖了 800 美元，到了 1924 年转手时，价格已经涨到了 15 万美元。佛罗里达出现这片繁荣景象的八九年之前，一个纽约的律师花了 24 万美元在棕榈海滩买了一片狭长的海岸地；到了 1923 年，他最终接受了别人开出的 80 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这块地。第二年，这片地被规划成好几个建筑用地，总转让价值达到了 150 万美元；而到了 1925 年，有人宣称这片地的价值已经升到了 400 万美元。1896 年时，一个贫穷的妇女在迈阿密附近花 25 美元买了一块地，到了 1925 年出让这块地的价格已经达到了 15 万美元。这样的传说数不胜数，每一个去“黄金海岸”的游客都能听到一二十个。如果说不是大多数，至少其中有许多传说都是相当真实的，尽管这些利润大部分都是理论上的。难怪有关到佛罗里达买地的一则逸闻，众人都耳熟能详——一个佛罗里达当地人问一名游客：“你想买地吗？”游客立即回答：“早就卖了。”

投机是很容易——但是速度一定要快。资格审查或者签订契约不要耽搁太久，这些烦琐的程序都被推迟了。什么是比较盛行的做法呢？亚特

兰大零售信用公司的沃尔特·C.希尔(Walter C. Hill)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这样描述道:"划地还仅仅是图纸时就已经被出售。这样看起来更好一些……迈阿密周围,规划出的一块块供出售的建房用地,除了那些特别大块的地,其余的都是在公开销售的第一天就全部售完。售地广告中描述了地皮的位置、范围、特色以及每块地的大约价格。预约购买是可以接受的,只需要签一张买地人打算购买那块地总价值10%的支票。公开销售的第一天,设在城里开发商的办公室里,买地人会被按照预约的顺序一一请进,在一张规划得非常漂亮的设计图纸上,划地以及具体的尺寸和价格都已经明确标出,买地人可以挑选一处或几处地皮,得到一张以'地契'形式表明产权的收据,然后便可以满心欢喜地看到一个'售出'的印章盖在蓝色图纸上他那块'地'上;这块地一般是50英尺长100英尺宽的佛罗里达州土地或者沼泽地。这些地皮价格惊人,然而,很多第一天卖出的地很快便升值到了好几百万美元…… 内地地价在8 000美元至20 000美元之间;临水的地皮价格在15 000美元至25 000美元之间。海边的地价则是在20 000美元至75 000美元之间。这些地还都不在迈阿密城,而是离城好几英里,10英里,15英里,有的甚至在30英里之外。"

地产契约?当然不可能全部办完。但是很少有人会担心那些即将到期的更多欠款。买地人十有八九在买地时只有一个想法:再倒卖出去。他们希望能将地契过户给别人,自己赚得净利润,哪怕30天的首付期限还没到。在这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契约买卖——数量惊人,利润却很可观。

在1925年那个令人狂热的夏天和秋天,大规模开发的新方案正在酝酿中。其中有许多划地似乎是打算出售给这样一些潜在的顾客,迈阿密海滩广告商将他们称为"美国最富裕的运动家、游艇爱好者,以及其他一些昂贵运动项目的热衷人士",而博卡拉顿的广告商则称他们是"控制了国际金融和企业财富、控制了时尚界、控制了大事件、置身于上流社会,并且可以悠闲惬意地享受生活的那些人"。在这股抢夺划地的热潮中,似乎很少有人会质疑:是否真的有那么多的游艇爱好者,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悠闲惬意、四处闲逛的男男女女呢?

到处是刚建好的高耸入云的豪华宾馆、公寓房屋和娱乐城。就在这一阵建房热的鼎盛期,一名到西棕榈海滩旅游的游客注意到了一大片空地上放满了浴缸。这些浴缸显然搁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包装它们的板条箱已经风化了。这位游客得知,这块地将会被建成"南部最壮观的公寓住





宅之一”。但是，货物禁运拦截了承包人的建筑材料，只有这些浴缸被运到了！在那一段时间里，整个佛罗里达州回响的都是洋溢着无限自信的各种口号和夸张措辞，各家报纸的广告栏里应有尽有。其中，声势最浩大的一次出现在1925年夏天的一天，《迈阿密每日新闻报》发行了一期共有504页各种房地产广告的报纸，比任何地方任何一家报纸一年里刊登的广告数量都要多，创下了报刊史上版面最多一期的记录。迈阿密不仅仅是一片“奇妙之地”，还是“城市中的曼妙白人女神”，是“世界运动场”和“无敌城市”。劳特德尔堡变成了“热带仙境”，奥兰多是“美丽之都”，而桑福德则是“坚固之城”。

这股浮夸的风气每天都在佛罗里达州上演。当迈阿密市市长联合迈阿密海滩开创人、海厄利亚开创人以及珊瑚阁开创人发表共同宣言时，这股浮夸风气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些开创人曾谦虚地把他们的“王国”称作是“世界上最有进取心的人所生活的那个物产富饶国家里的最富裕、最受恩宠的社区”。）他们联合提出，要将1925年的最后一天和1926年的头两天定为“美国热带地区节日”。“在我们的节日里，爱、友谊、尽情享乐和各种有益健康的运动将会遍及整个地区，”这些领导人还承诺，“处处将会是歌舞翩翩，我们宽敞的马路、美丽的广场和舞池、室外就餐处、俱乐部和旅馆，到处都将会是舞者的身影，精神焕发的特耳西科瑞（希腊歌舞女神。——译者注）和她的狂热追随者将会以优美的步态展示他们轻盈曼妙的舞姿。”他们所承诺的远远不止这些，如果逐条地列出，简直有满满一页纸。他们还特别强调：“我们的大街小巷将会是一派恢弘盛大、花团锦簇的壮丽景象；和暖的阳光，细细的雨丝，还有温柔的热带海风都将会赐福我们。”

节日庆典大概是很成功的，毕竟有那么多狂热的追随者和盛大的场面。但是，1926年的新年一过，怀疑的种子便开始在那些刚刚还尽情欢乐的人们心里慢慢滋生：买地人已经不再像9月和10月时那么多了；许多手里拿着地契的人仿佛急于转让他们在“最富裕、最受恩宠的社区”的买地；和暖的阳光和细细的雨丝不可能、也无力帮助付清购地的余款。冬季来到佛罗里达的游客们普遍感觉，现实并没有能达到他们的期望值。或许地产界的繁荣也到了“有益健康的喘气时间”了。

# 三

事实上，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应该到来的绝不仅仅是“喘气的时间”。到了1926年的春天和夏天，地产市场显然已经开始崩溃了。手里拥有地契而又没能很快转手的人开始设法拖欠付款了。一名男子在1925年初以每英亩12美元的价格卖出了他的地皮，当听说就在同一年之内，这块地再次售出时每英亩升到了17美元时，他连连骂自己糊涂。后来，这块地又涨到了每英亩30美元，最终甚至攀升到了每英亩60美元。然而，一两年过后，这名男子惊讶地发现，在他卖出这块地之后的一系列买卖行为都只是空头支票，他也一直没能要回应该付给他的钱，惟一的补偿措施就是他可以再收回自己的那块地。在其他的一些土地买卖实例中，地皮不仅回到了原来主人手中，而且还要使主人负担各种税收和评估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远远超过了他当初卖地所获得的实际收入。还有更坏的情况，一块地在经过了一系列转手之后回到原主人手上时，可能已经被那些只进行了一半的开发项目毁坏得面目全非了。

正当人们逐渐看清了地价大幅度下跌是不可避免的时候，袭击佛罗里达州的两次飓风又让人们领略到了，以惊人的速度来自西印度洋的“温柔的热带海风”那令人震惊的破坏力。

其中的第二次也是佛罗里达州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一次飓风，它袭击的中心恰恰是房地产最繁荣、最令人狂热的地区——迈阿密地区。再没有比这次更恶毒的、更准确的、教训众人要谦虚点儿的“天意的垂怜”了。飓风在1926年9月18日清晨袭击了黄金海岸，将比斯坎海湾的海水一股脑儿卷进了那个可爱的威尼斯开发区；飓风卷起了一艘有5个桅杆的铁帆船、将它扔在了珊瑚阁街头之后，又将一艘艘大蒸汽游艇抛在了迈阿密的大街上；它拔起了大树，掳走了木料、水管、瓦片、碎石，甚至小汽车，又将他们揉在了一起去撞击房屋，撕裂了成千上万个偷工减料建成的大小别墅的房顶；飓风几乎夷平了奥基乔比湖边的摩尔港镇，留下了这样一幅悲惨的局面：400多人死亡，6 300多人受伤，50 000多人无家可归。然而，英勇的佛罗里达人却始终坚信，损失一定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的。他们的意志是如此坚定，以致美国红十字协会会长约翰・巴顿・佩恩（John Bar-





ton Payne)指控佛罗里达州政府官员“实际上阻碍了”红十字协会对无家可归者的救助。迈阿密市市长罗姆夫(Romfh)宣称,他看不出“为什么这座城市今后就不可以再像过去那样在冬日里接待前来的游客”? 但是,这“温柔的热带海风”已经报复过了,它摧毁了佛罗里达繁荣的一切痕迹。

到了 1927 年,按照霍默 · B. 范德布鲁(Homer B. Vanderblue)的说法,位于迈阿密弗拉格勒大街的大多数精心装饰的房地产办公室要么早已关门,要么实际上已经空无一人;戴维斯岛项目“尚未完工便已宣告破产”,已经被一个由斯通(Stone)和韦伯斯特(Webster)组建的财团接手;包括迈阿密市在内的许多佛罗里达州城市,连税收都征不齐。1928 年时,亨利 · S. 维拉德(Henry S. Villard)在《国家》一书中这样描述他驱车前往迈阿密时看到的景象:“道路两旁是一块块荒芜的建房划地,用水泥刷在简易大门上的该片地所有人的名字已经字迹模糊,不难看出其实早已人去‘地’空;一连几英里的水泥人行道两旁,一个个路灯柱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杂草和蒲葵占据了那些原本应住人的房屋 …… 偏僻一些的地方更是整个布满了无人居住的房屋,只剩下空无一人的道路;车子经过这些地方时,你不由得会加快车速,仿佛正竭力穿过一座被死神掌控的城市。”1928 年这一年,佛罗里达州有 31 家银行倒闭;到了 1929 年,倒闭的银行增加到了 57 家;这两年期间倒闭银行的负债总资产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州有记录的负债总数都要大。1929 年,地中海果蝇大面积袭击了佛罗里达州的柑橘林,这更加重了当地的经济负担。对迈阿密市的银行资产清算结果显示,早在 1925 年,银行资产就已经耸人听闻地攀升到了 10 亿多美元,而这个数字现在正令人扼腕叹息地一路狂跌,具体数字如下:

1925 年:1 066 528 000 美元

1926 年:632 867 000 美元

1927 年:260 039 000 美元

1928 年:143 364 000 美元

1929 年:142 316 000 美元

然而,也正是在这几年,“繁荣压倒一切”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是真理。到了 1930 年六七月份时,全面的商业萧条开始出现,佛罗里达州有二十六七座城市开始拖欠发行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其中最严重的有西棕榈海滩、迈阿密、桑福德和沃斯湖;迈阿密市有一笔数额很小的债券在 1930 年 8 月到期,就连这样少的一笔钱,迈阿密市也不得不公开承认无力按时

兑付，请求债券持有人宽限时日。

在那些年里，房地产开发项目通常是以一个个独立“城邦”的形式来进行，而政府又以“免税市政债券”的方式来资助各种市政设施改进计划，开发商们往往通过用繁华地段的新建筑作担保来发行房地产债券，等等，这一切做法都在逐渐暴露出它们的缺陷，而这些问题是那些在1925年房地产狂热时“得到灵感的梦想家”们没有预料到的。总数高达几百万美元的账面利润大多已经成为泡影；投入项目开发的好几百万资金也已经永远地石沉大海；那个倒置的巨大债务金字塔已经摇摇欲坠。在独自体味地价低廉的漫长痛苦中，人们渐渐悟出了这样一个教训：建立在恢弘的计划、过高的期望以及吹嘘浮夸基础之上的土地增值策划，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欺诈。

令人慰藉的是，还有一些值得人们信赖的东西保留了下来。佛罗里达州还有她宜人的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佛罗里达人依然精力充沛、意志坚强。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从希望破灭的伤痛中恢复了过来，从这些事件的无情惩罚中获得了教训。不仅如此，并不是所有在佛罗里达州繁荣时期迁入的北方人在这个州陷入困境时都离开了她。1930年的人口统计表明，自1920年以来，佛罗里达州的人口实际上增长了50%以上，增幅在全美国范围内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统计还显示，迈阿密市的人口在这十年期间增长了400%。佛罗里达州还有未来，这一点非但毋庸置疑，简直就像强制的债券延期支付所带给人们的痛苦那么清楚。佛罗里达人也不应该为1925年的疯狂举措而承担所有的责任。他们确实曾经大张旗鼓地为土地销售摇旗呐喊，但是，发生在这里的歇斯底里状态，只不过是一种全体美国人歇斯底里的集中体现；而后，在怀揣着轻轻松松赚大钱梦想的外地人大量涌入的推波助澜下，这种头脑发热的局面愈演愈烈罢了。

## 四

战后十年出现了一系列土地买卖和房屋建造热潮，每一次都对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繁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当然，毫无疑问地，它也是其中最惊人、最具影响力的一次。

在战后十年的初期，由于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时小麦和其他农作物价格上涨，农业用地市场一度异常火爆。农产品的价格直线上升，成千

上万的抵押和贷款都是建立在这些被夸大了的价值之上的；而当农产品市场在 1920～1921 年期间下滑至低谷时，农民们纷纷陷入了困境；绝大多数情形下，农民们卖出农作物获得的钱都不够支付银行即将到期的贷款利息，更无法支付对那些被评估价值上涨的农作物所征的税。由于无法履行的各种抵押和贷款，成千上万的农村银行最终不得不宣告破产。在一个农业大州，所有的国家和地方银行在 1924～1929 年期间的平均收入也不到 1.5%（全国普遍在这五年期间都处于经济繁荣期）；全国有七个州在 1920 年之前成立的各家银行中 40%～50%的银行在 1929 年前都倒闭了。这其中到底有多少家银行倒闭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无序上涨以及紧随其后的直线下跌，我们自然是无法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因为农业用地的盲目发展，许多惨遭重创的农村小银行是不可能倒闭的。

在整个十年期间，尤其是在佛罗里达房地产繁荣期间，雄心勃勃的地产业开创人和追随者们曾策划出一系列方案，他们想要将这种繁荣局面传播到美国其他的城市、乡镇和旅游胜地。他们斥巨资刊登广告、印发传单，将这些地方描绘成“日益兴起的工业帝国中心”，或者是“美国财富的新平台”，随后将这些广告传单硬塞给各家商会的各种出版物随同发行。其中也有一些大胆策划成功了。举例来说，加利福尼亚州在经过几年的宣传之后，已经“变”成了有如诗人画家笔下描述的那么完美，吸引了工厂投资人、冬夏两季的游客，还有怀揣发财梦的生意人和旅店老板。据估计，每年有 1 000 000 人到加利福尼亚“纯粹是四处看看、到处玩玩”，当然，他们来了是要花钱的。然而，工厂投资人和有钱游客的数量毕竟还是很有限的，也并不是所有这样的策划都能成功。一座又一座城市，都希望能将投资人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来开工厂；他们滔滔不绝地指出自己的一系列“优势”，设法“使自己的特色众人皆知”，并且“使这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信息广为传播”。但是，这些策划人逐渐开始明白，吸引工厂投资人的策略多少有点儿像是拆东墙补西墙；而如果这些工厂都能发展起来，它们又可能在另一轮的策划攻略中成为策划人眼中新的“东墙”或者“西墙”。这就像佛罗里达热带地区的开发商们所发现的一个现状：在围绕能打得起水球的富人阶层而展开的开发竞争中，有能力、也愿意去角逐的开发商要远远多于那个富人阶层里的成员。因此，在北卡罗来纳州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专为富人而修建的各种运动场所投资人，最终不得不沮丧地接受这样的事实：富人们不可能一次去遍每一个运动场所。不仅如此，他们那些辉煌希望的破灭

又会引起金融业的连锁反应，他们的破产最终导致了一家又一家银行的倒闭。

在整个十年期间，尤其是在中期的几年，每一座美国城市周边的郊区用地也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当 4 000 000 名饱受挫折的美国农民离开他们的农场时，美国城市居民的比例由 51.4%上升到 57.6%；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交通变得越来越拥挤喧闹，新的高层建筑挡住了城市居民的视线，新鲜的空气越来越稀罕。于是，一些家庭开始从城市迁往临近乡村的城乡结合部，而且做出这种选择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回，汽车再一次在改变美国人的生活状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使连绵的林地和原野与郊区火车站、大城市连接了起来，而这在几年前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景宜人的郊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处处是全新的美国殖民时代风格的农庄(带有车库)、都铎式小别墅(带有古老的松垂屋顶——将楔形的木块插在屋脊大梁的两端建造而成)，以及西班牙式的灰泥庄园(带有内置无线电)。房地产开发商再一次遇到了黄金般的机遇。老式的带有果园和雏菊地的杰克逊农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们在蒸汽铲的力量之下变成了詹姆士一世风格的高地、具有殖民时代风格的阳台，或者阿尔汉布拉宫式的花园。到处是铺砌一新的整齐马路，在这里你既可以享受 20 世纪的便利设施，又能领略到保留下来的古老传统的古典魅力，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土地都是可以分期付款购买的。

像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底特律这些大城市的郊区，大片土地的开发还算不上是规模最大的。即便如此，从纽约曼哈顿横跨东河的皇后街区，大面积开发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它的人口在十年期间翻了一倍多，总人口达到了 1 000 000 多人。底特律周围的大片区域被再次划分，大量的小块划地被人们纷纷买下，这些人穷得只能在那些划地上建造"棚户"，而他们往往在这些临时搭建的一间小屋里住上好几年都不会建造真正的房屋。开发商之间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致仅仅在一年之内，芝加哥郊区被再次划分出的土地就足以容纳这座城市未来 20 年发展所带来的人口，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城市此前也是以这个速度发展起来的。到了战后十年的末期，帕楚格、长岛和纽约市周围的划地已经足以为一个人口 6 000 000 的大都市提供住房。

佛罗里达州的繁荣也一度对各个城市郊区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很多城市郊区都朝着威尼斯式的方向发展。举例来说，从纽约沿长岛 34





英里处，就有一个“美国的威尼斯”，这里即将要建造的第一座桥是“仿造的威尼斯著名的麦秆桥”。整个区域的风景，按照开发商的说法，“让人想起那个拥有总督宫的著名城市(指意大利威尼斯。——译者注)，而且比她还要迷人，还要亲切”。“住在‘美国的威尼斯’，”一则承诺可以免受股票经纪人和保险承揽人骚扰的广告中写道，“你可以痛饮生活的琼浆 …… 湛蓝天空下的绿宝石礁湖！悠闲的刚多拉！美丽的意大利花园！…… 而且，就在此刻，南方海湾的海水终日轻轻拍打着海岸，如此轻盈美妙，犹如调皮的幼儿。”沿长岛开发的还有毕尔特摩海岸，它是由电影业的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和服装行业的雅各布・弗兰克尔(Jacob Frankel)联合开发的。1926 年时，这个“运河和河道形成的艺术体系”在广告中被描绘成正处于“不断完善中”。

威尼斯式发展的郊区繁荣景象持续的时间很短：1926 年过后，一提到礁湖，就会在那些未来的业主们心里激起痛苦的回忆。但是，郊区繁荣在绝大多数地区的衰退是直到 1928 年或者 1929 年才开始的。那两年，许多郊区都是一派开发过度的景象：当你沿公路驱车前行时，可以看到两旁的房屋久已无人居住，透过商店的橱窗能看到里面空无一物，到处是已经过半或者“正在改进中”却被迫终止的工程；因为抵押品赎回权可能被取消，郊区公寓不得不一次次被转手；土地所有人对那些完全没预料到的税收和评估费用抱怨不已。然而，即便如此，就像遭受重创后的佛罗里达州一样，郊区的发展也是依然有未来可言的。人们需要空间和自由，需要前往人口集中地的便利通道，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19～20 世纪房地产业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城市自身的发展。要说清这些年美国的地平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只需要比较两张分别在 1920 年和 1930 年拍摄的在飞机上俯瞰到的任何一座美国大城市的图片。1930 年时，几乎没有哪座城市的中心没有成群的摩天大厦。这股高楼建造热在纽约市达到了顶点。因为大都市的高楼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广告，尤其是在纽约的曼哈顿中央地区。这个区域的高楼群占据了巨大的比例，并且在 1928 年达到了顶点。一个个“尖塔”直冲云霄，有的是 40 层，有的是 50 层，有的甚至更高；从 1918 年到 1930 年，这个区域兴建的现代建筑中，可用于办公的空间几乎翻了十倍。在一张 1931 年初从临近东河角度拍摄的纽约非商业区住宅的相片中，20 个最显著的建筑物都是在战后十年期间建造的。其中最高的两座，确切地说，是直到 1929 年的恐慌过后才完工的。当

去掉脚手架的帝国大厦壮丽而辉煌地屹立在那里时，楼下路旁的卖苹果小贩吓得直哆嗦。然而，这座大厦至少可以作为它被孕育的那个自信心空前高涨时代的一座纪念碑。

这种自信确实过头了。摩天大厦的建造确实过度了。在1931年的春天，曼哈顿中央地区的大型办公建筑物中有17%的办公室、离商业区稍远一些的广场地区约有40%的办公室，都没能收回投入的成本。这些新建摩天大厦的拥有者们通过免除一段时间的租金或者将其他地段楼盘一并出租的方式，设法吸引一些公司去租赁那些空着的楼层。金融家们对纽约房地产投资的不稳定状态忧心忡忡。这些大城市也有未来可言，但是，热衷于投机的人们已经使它们的发展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 五

佛罗里达遭受飓风袭击过后，大多数普通百姓已经对房地产投资失去了信心。实际上，除了那些在郊区开发的项目中或者是在现代派开发的40层实验建筑中拥有自己房产的业主，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关注房地产了。然而，1925年将众人眼球和现金吸引到佛罗里达"黄金海岸"的那股全民投机热并没有变凉，只不过是被转移了地方。佛罗里达房地产投资押错了宝？是的。"那么，"依然对柯立芝繁荣所带来的无限机遇而满心期待的公众们问道，"我们还能把宝押在哪里呢？"不久之后，一轮新的大众投机热开始积蓄力量了。这一次，不是在房地产业，而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投机热的中心从迈阿密城的弗拉格勒大街转移到了纽约的百老汇街和华尔街。大牛市开始上演了。







# 第十二章　大牛市

## 一

1928年2月的一天，一名股票投资人询问一位精明的银行家有关购买普通股的窍门。银行家摇摇头，说道："在我看来，股票价格高得太危险了。"他还说："尽管最近股市价格稍有下跌，但是这个牛市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它们极有可能很快便继续大幅下跌。股票市场很难把握。当然，如果你买对了股，有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受这股下跌趋势的影响，甚至会有所盈利。但是，如果我是你，我宁可静观其变。"

从保守的原则来看，银行家是对的。柯立芝繁荣所引起的自信膨胀使得美国人对即将到来的优越生活信心百倍，那些曾经将自已的积蓄投入到佛罗里达房地产业中的人们，自1924年起又开始在纽约的股市中频频投资了。于是，即便是普通股的价格也在节节抬升，直到股票价格达到了许多保守的金融家们公认的警戒线。在整个1927年期间，股市投资一直在升温。证券经纪人所放出的用于资助投资的贷款——贷给经销商支付给股票经纪人的客户保证金数量从2 818 561 000美元上升到3 558 355 000美元——增幅惊人。在1927年12月3日所在的那个星期，股票交易量比整个纽约股票交易市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星期都要多。不管是在纽约、旧

金山，还是在海拔不高的那些平原地区的村庄，你不需要听很长时间晚餐后的那些对话，就可以了解到目前手上正持有100股斯徒贝克尔公司或者休斯顿石油股票的人已经有很多了。这些人会设法学习像GL、X和ITT这些符号的深奥含义，或者会匆匆翻开下午刚到的报纸，查询来自华尔街下午一点半的股市行情。而在这之前不久，对于他们来说，用于证券报价的机器还只是一个外来的神秘玩意儿。

1927年8月，美联储(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再贴现率从4%降到3.5%，并且允许政府债券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些措施使投资热继续升温。虽然采取这些措施的动机是值得肯定的：好几个欧洲国家正设法使自己国家的货币不贬值，欧洲的股票交易市场一片萧条，在美联储的官员们看来，美元再贴现率的下降可能会阻止黄金在美国的进一步集聚，从而有助于欧洲货币的币值恢复，促进美国的外贸交易；除此以外，美国的商业正处于停步不前的状态，再贴现率下降或许可以激活贸易市场。然而，再贴现率下降也刺激了股票市场。与此同时，柯立芝总统和梅隆部长的殷切关怀也使华尔街的牛市愈演愈烈，无论股市何时出现亏损的迹象，他们总会站出来发表使国人放心的言论，这会使得股票价格立刻继续上升。1928年1月，总统竟然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措，他公开声明他不认为证券经纪人放出的贷款数额太高，这就非常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白宫是支持眼下正令一些金融界有识之士焦虑的所谓通货膨胀的。

当股票价格节节攀升之际，商业活动却难以挽回地在一路衰退。1927年下半年的市场衰退是如此严重，以致到了1928年2月，纽约慈善组织协会会长报告说，失业率达到了战争结束以来的最高点。在1月和2月这两个月中，股票市场变得非常混乱、变化多端。这也难怪——因为股票价格已经接近于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市场的前景却尚未明朗化，综合起来不难看出，未来仍会是一个充满博弈的阶段。

股市分析家和预测人士的语气绝不是华而不实的——这个群体的人数在近年来已有了急剧增长，他们那些轻描淡写的话语中似乎总含有相当的分量。1928年1月5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放出这样的言论：股票价格上涨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的范围”，不知道“需要多大的调整力度才能使股市重新回归理性的状态”。3月1日，这个机构依然忧心忡忡，他们宣称：“公众不可能改变熊市的心理状态，除非当货币变得如此过剩，以致银行会鼓励信用扩张。”两天后，哈佛经济协会从他们的统计数据中得出这样





残酷的结论:"2 月份的股市发展状况表明,股市正进入一个暂时的重新调整阶段。"这些哈佛的预言家所能给出的最好的预言是:"股市中期的下跌不会演变成类似股市大萧条的大幅跌落。"美国花旗银行正在积极寻求逐渐改善业务状况的有效措施。标准统计公司暗示股市形势已经在开始好转,但他们同时也慎重地预测,股市未来几个月的发展将会"完全取决于货币市场状况"。《纽约时报》金融版的编辑将商业征信所控制的货币流通状况描绘成"优柔寡断"。一些投资机构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则以"你还'逗留'在这个大牛市舍不得走?"和"通货紧缩是不是已经开始了?"等等类似的标语附和着华尔街的不稳定情绪。一时间,空气中弥漫着种种令人不安的迷雾。

如果有谁在这个时候还敢预测,股市的大牛市行情正面临大跃进,先前显露出的种种"危险"征兆都是不足挂齿的,那么他一定是疯了,或者是他受到了群众心理鼓噪的深深影响而晕头转向。毋庸置疑,那位建议在股票投资中要谨慎的银行家是对的,那些股市预测人士也是对的。但是,他们并没能考虑到美国人民由于多年柯立芝繁荣而燃起的无穷投资热情。1928 年 3 月 3 日——也正是这一天,当哈佛预言家们在谈论股市发展的中期下跌,而《纽约时报》的编辑评论"优柔寡断"的货币控制状况时,股市已经进入了激动人心的发展阶段。

## 二

让我们先来浏览一眼第二天早晨的报纸吧。1928 年 3 月 4 日,那天的报纸上满是用来打发这个星期天的各项内容,拿起来重得都能累弯你的胳膊。这个时候距离柯立芝总统公开声称他"不会选择在 1928 年参加总统竞选"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他那典型的简洁言论甚至令公众怀疑他可能有点儿言不符实;他的商务部长胡佛先生,八年来一直为自己被人称作是业余政治家而深感恼火,正召集由各个行业精英组成的代表团来筹备即将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虽然亨利·福特公开推出 A 型福特轿车已经有三个月,但是,当一辆崭新的福特轿车从人们身旁开过时,注视它的目光仍然久久不会离去;那些曾轻率地预订了一辆能在阿拉伯沙漠里被看做是"豪华车"的人士开始犹豫,是否有必要再继续等到 9 月份这款车下线,

还是干脆取消当初的订单。陆军上校林德伯格在过去的九个月中一直被人们看做是民族英雄，但他还是单身一人；在 1928 年 3 月 4 日那期星期天报纸的第 21 页上，刊登了他不同意国会的一项将明尼苏达州小瀑布城的林德伯格家园变成博物馆的提议；拜德中校即将宣布他的一个直抵南极的飞行计划。妇女们的裙子，正如商店广告中所展示的，已经短得不能再短，仅仅盖住了膝盖。体育版面登的尽是有关 C. C. 派尔患上了糟糕的姆囊炎的消息；而赛马会即将组织率领它的 274 名参赛者从洛杉矶出发，等等。在这一天报纸的另一页上，威廉·杰伊(William Jay)夫人、罗伯特·洛·培根(Robert Low Bacon)夫人和查尔斯·卡里·拉姆塞(Charles Cary Rumsey)夫人在为西蒙斯床单代言的活动中尽显她们的贵族气质。《圣路易斯雷的大桥》在广告中宣称已经在过去的 90 天内销售了 100 000 册；报纸的读书版面还刊登了 S. S. 范达因(S. S. Van Dine)[在当时还未被人们发现他的真名是威拉德·亨廷顿·莱特(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的《格林老宅谋杀案》，威拉·凯塞(Willa Cather)的《大主教之死》和路德维格·刘易森(Ludwig Lewisohn)的《内岛》内容介绍；戏剧版面刊登了《玛丽·杜根审判案》已经在纽约上演了七个月、盖茨沃斯(Gaslworth)的《大逃亡》已经上演了五个月的通告；纽约的戏剧票友还可以在《奇妙的插曲》、《戏船》、《挺进巴黎》、《波吉》和《甜姐儿》之间进行选择；有声电影正开始挑战无声电影；据说阿尔·乔森(Al Jolson)即将出演配有"维他风"(早期有声电影设备。——译者注)设备的《爵士歌手》；福克斯公司两次"交响乐伴奏般的有声电影"尝试的成功也在报上详尽刊登。股票市场行情？根本不需要翻到金融版就可以知道，因为在第一页就有消息预览。

通用汽车股票头一天早晨的开盘价为 139.75，短短两小时就飙升到 144.25，自星期五收盘以来已有 5 点以上的收益。当天的股票交易额总数不超过 1 200 000 股，但是几乎 1 /3 的交易量都是通用汽车的股票。1928 年春季的那场投资热潮开始了。

也许一些读者会有兴趣了解 3 月 3 日正处于上升空间的那些股票在当天以及随后几天的价格表现。下面是他们的股价，括号里注释的是每一只股票的股息：

美国制罐公司 (2 )，77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9)，179.5

亚纳康达铜业公司 (3)，54.5





通用电气公司（5,包括附加费用在内），128.75

通用汽车公司（5），139.75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5,包括附加费用在内），132.75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8），160.5

美国无线电公司(没有股息)，94.5

联合碳化物公司（6），145

美国钢铁公司（7），138.125

西屋电器公司（4），91.625

沃尔沃思公司（5），180.75

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1），89.75

到了星期一，通用汽车的股票又上涨了2.25点；到了星期二，它已经上涨了3.5点。当股票"突破150"时，股市一片骚动。随着股市股价的一天天被"刷新"，其他股票也开始受到影响：美国钢铁、美国收音机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也都在上涨。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两天的一个短暂涨停之后，通用汽车在星期五上涨9.25点的增幅令人惊骇，通用公司宣布，它的经理人证券公司已经在股票价格为150左右时，在股市上为它的主管人员购买了20万股。到了星期六，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普通股又以一个净涨12.75点的增幅将通用汽车远远甩在了后面，收盘价格达到了120.5。

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这不是贸易低迷、信用膨胀、危险的超高股价吗？市场难道是疯了吗？如果所有那些坚持以超高价格买进了股票的疯子们在同一时间里抛售该怎么办？在报上看到"无线电公司股票疯涨"的谨慎投资人和几天前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预测人士有着一样的担心，他们都在考虑的现实问题是"能以最高价格售出股票的时间会持续多久"。

然而，那些将资本投入到汽车产业、农作物市场和股市早期大牛市中的强势投机商——像W. C. 杜兰特(W. C. Durant)、阿瑟·卡顿(Arthur Cutten)、费雪(Fisher)兄弟和约翰·J. 拉斯科布这些人——正在以空前的数量购买股票。他们认为国民生产即将会走出停滞不前的状况；他们认为随着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延误，通用汽车公司有可能会有一个大丰收年；他们还知道，无线电公司已经巩固了它的地位并且开始赚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利润；科学上的发现一个接一个，而美国无线电公司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全球最大无线电公司的想法是令人振奋的。汽车和收音机——

那十年期间大规模生产中最典型的两种产品，柯立芝繁荣时期最鲜艳的两朵奇葩，也是投机者们在对未来的憧憬中最具魅力的、最常浮现的两样东西。大牛市的操纵者也知道，当预计股市会崩盘时，成千上万设法将手中股票脱手的投机者会拼命卖出，而当价格被抬升后，他们又会重新买进；总而言之，他们对广大美国公众的心理了如指掌。大多数美国公众都无法抵御汹涌股市的魅力，因为他们都是常人，都有一种迅速致富的正常欲望，他们愿意相信与美国黄金未来相关的任何事物。如果股市上涨，公众们就会买进股票，不管预测人士说什么，也不管股市的前景有多么叵测。

他们猜对了。公众们都在买股票。

3 月 12 日，星期一，股市又一次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美国无线电公司开盘价是 120.5，收盘价是 138.5。其他个股也收益颇丰，已知的交易总量达到 3 875 910 股。行情显示器比市场交易慢了 6 分钟，据前往股票交易大厅的股民们说，那个红头发的、无线电公司股票的行家迈克尔·米汉(Michael Meehan)一直是大厅里长达 5 个小时股票买卖混战的中心。“看起来就像是街头打架。”一位旁观者如是说。

3 月 13 日，星期二，这一天足以让股民们频繁体验“水火两重天”的滋味。无线电公司开盘价 160，比头一天晚上收盘的价格净涨 21.5 点——涨幅令人惊讶。但接下来发布的一个有关股票交易所官员们开始调查股市中是否存在着技术垄断的声明，又使得无线电股票的价格跌回到了 140。就在同一天，随着一个大户经纪人被清户谣言的传播，又使得无线电股票的价格在一路上升至 155 之后，最终以 146 收盘，比星期一收盘价高出 7.5 点。这时，行情显示器已经慢了 12 分钟。

股市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变化着。到了 3 月 16 日，行情显示器已经慢了 33 分钟。这时，开始有人传出了可能会有交易量达到 500 万股的那一天——这似乎也太不可思议了。到了 20 日，无线电股票上升了 18 点，而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上升了 5 点。3 月 26 日，股市总交易量再次被刷新。但是，这个新记录只保持了 24 小时，因为到了 27 日——在这个可怕的一天，一股无法解释原因的出售股票的狂潮袭击了整个股市，通用汽车的价格急剧下跌，只有通过大量买进才可能恢复股市常态。那一天的总交易量达到了 479 万股。

现在，这股股市投机热潮正迅速传遍全国，一夜致富的神话就挂在每个人的嘴边。一位金融评论员说：他的医生发现病人们成天谈论的都是股

市，他的理发师哪怕是手里正拿着热毛巾，却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手头的活儿，去分析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票的前景。妻子们在责问她们的丈夫为什么行动缓慢，为什么不买那些热门公司股票的时候，却听到她们的丈夫说，他们那天早晨刚买了100股美国亚麻籽公司的股票。股票经纪人分公司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男男女女，都在看着不停闪烁的屏幕上显示的行情显示器读出的个股价格。3月27日那天，当看到屏幕上突然停顿之后又恢复显示的通用汽车股价一长串读数时，不管手上持有的股票是多还是少，所有的人都不由得惊骇不已：

通用汽车：50.85，20.80，50.82，14.83，30.85，20.86，25.87，40.88，30.87……

几星期过后，另一些股票渐渐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票价格在一路攀升，航空公司股票也在飞跃。仅仅在5月份的一个星期之内，莱特航空公司的股票就上升了34.75点，达到了190；柯蒂斯公司上升了35.5点，达到了142。1928年春天，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得不好几次在周六停止开盘，好让股票经纪人的办事员们能及时处理这空前的交易量所带来的成堆的日常文书工作。当然，经纪人贷款数额还在与日俱增，美国的信用膨胀也愈演愈烈。

美联储官员们也不知所措了。他们在2月份将再贴现率从3.5%调到了4%，如果说1927年的再贴现率下调是鼓励投资，他们希望这次的相应上浮能使眼下的投资热有所降温。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与任何逻辑学或者经济学原理都相违背的结果——普通个股继续狂热上涨。到了5月份，他们再次将再贴现率调到了4.5%，但是股市在一个短暂的"震颤"之后又继续"沸腾"。美联储官员们又将1927全年集聚的政府公债全部售出，然而这一举措的主要影响却是使得政府公债市场变得一蹶不振。谁又曾想到形势变得如此失控呢?

1928年5月下旬，大牛市的步伐似乎有所缓慢。股市价格下跌，上升，又下跌。在当时看来，最终结算的时刻似乎到了。

到了6月，又出现了连续几天的价格下跌。贾尼尼银行股票——太平洋沿岸投机者最偏爱的股票——突然崩盘，导致了巨大的损失。6月11日这一天，在旧金山证券交易所，意大利银行的股票跌了100点，班茨塔利银行跌了86点，美国银行跌了120点，联邦证券跌了80点。还是在这一天，在纽约的场外交易市场，班茨塔利银行的股票从200直线下降至110，

一大群小投资人被直接拖垮。尽管 A. P. 贾尼尼(A. P. Giannini)本人曾对股票价格过高做出过紧急警告,但是很多人依然天真地相信股价会“冲击 1 000”。

第二天,也就是 6 月 12 日,这股来自西部的“龙卷风”全力袭击了整个华尔街。随着出售股票的委托大量涌入,证券交易所终有一天“交易量将达到 500 万股”的预言顷刻之间变成现实。行情显示器报价已经比实际交易价格慢了近 2 小时。在 5 月曾突破 200 记录的美国无线电公司股价,下跌了 23.5 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按照后来的标准,当天有价证券的经营损失并不是很大;《纽约时报》计算出了 50 只处于领先地位的股票平均跌幅只在 3 个点多。但是,结合前几天股市下跌,在许多股市观察家看来,最终结算的日子已经到了,一家最保守的纽约报纸甚至在头版登出这样绝对的评论:“华尔街牛市昨日崩盘,倒塌声响彻全球。”

如果商务部部长迷信的话,他一定会认为那天的近似恐慌状态也许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层层阴霾,因为就在当天报纸同样的头版,彩色标题上这样写着:“胡佛大选第一轮必胜。”

但是,大牛市真的是崩盘了吗? 到了 6 月 13 日,它似乎又恢复了元气。6 月 14 日,也就是胡佛被提名竞选的那一天,牛市还在继续恢复,看来预料的结算只是部分地进行。大多数股票价格依然高于它们在 2 月份的水平。虽然已经有好几千经纪人被迫退出股市,几宗大交易已经失去了市场,许多仅仅能在纸上算出的利润也已经化为乌有,但是,大牛市还正值“壮年”呢。

## 三

在共和党并不太热心地提名赫伯特·胡佛为候选人之后的几个星期,内部矛盾重重的民主党最终推出了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E. 史密斯(Alfred E. Smith)——纽约东部贫民区一户人家的孝顺儿子,有政府管理的天赋,偏爱棕色圆顶窄边礼帽——为参选的绝佳人选。但是,史密斯的坦慕尼协会会员身份,他的反对禁酒主张,更重要的是,他的罗马天主教教徒身份使他得不到南部各个州和美国西部大部分选民的支持。尽管三 K 党最近宣布要摘掉他们的面具,改名为“大森林骑士”,然而反天主教情绪

依然可以通过其他丑陋的形式宣泄。民主党在第一轮选举中冒险推出史密斯，足以证明此人的人格魅力非同一般，他的能力一定也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可。当时在民主党内有这样一种信念：民主党一定能赢得稳固的南部各个州选票，一个反对禁酒的移民后代一定能从共和党手里赢得北方工业区和其他大部分城市的选票，当然，是在没有其他候选人的情况下。

1928年大选开始了。

这是一次奇怪的竞选。一起大事件立即使得候选人之间"泾渭分明"，正如在第十章中所记录的，史密斯对禁酒的厌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胡佛却恰恰相反，他把禁酒法令称作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实验和经济实验，动机高尚，意义深远"，必须"富有建设性地予以执行"。在美国东部的各座城市，共和党演说家们似乎设法给选民们作出这样的解释，胡佛真正的意思是"富有建设性地摆脱困境"；而民主党在南部和偏远西部的演说家们是这样解释的，史密斯反对禁酒纯粹是个人的一个偶然性决定，他个人无力将此强加给他的政党。两个候选人的分歧依然存在，禁酒问题将会成为总统竞选战役中的一个重要砝码。表面上看来，还有对农场和农业的救济问题，但是，两个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真正的分歧。双方竞争最终落在了到底哪位候选人能更令人信服地为不幸的西北部带来福音这个问题。史密斯打出他偏爱的修建水电站战略，但是在选区并未能引起积极反响，也许是因为，有太多影响力很大的选民依然对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和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满怀憧憬。选民们的偏好，当然还有许多不便公开刊出的理由：好几百万男男女女们投了胡佛的票，因为他们担心史密斯会把白宫变成梵蒂冈的一个分部；投史密斯一票，是因为他们希望他能打击宗教信仰上的偏袒；或者反对胡佛，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会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反对史密斯纯粹是因为不喜欢史密斯的帽子或者史密斯夫人的首饰。然而，这场竞选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与人们对股票牛市行情的期待相关。

首先，1928年大选并不像1924年时有一个强大的第三党派竞选人。总爱拨弄是非的激进党早已被新经济时代的种种预言迷惑得晕头转向。社会党提名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但是他在竞选一开始就出局了。行情显示器已经将所有美国人的眼球吸引到了华尔街，事实上，民主党也发觉他们正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们在以前一直是对金融界和工商领域管理者冷眼观望的，但是现在却不能再这样了。他们去批评坐在乐

队前排豪华座位的绅士们，或者现在就去向这些人指出，这支乐队的最终目的地未必就是福地，这简直无异于自杀。他们也不能否认共和党执政下的繁荣时期已经到来，这似乎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事实。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语言和行动向众人表明：他们也能保证让每一个美国人分到股息，保证股市价格持续上涨。

为此，民主党正在痛苦而又认真地准备着各项工作。对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一席位，史密斯从大量候选人中选中了一位举止谨慎的国会议员约翰·J. 拉斯科布，他是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兼财务委员会主席，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副总裁，杜邦公司副总裁兼财务委员会委员，美国信孚银行、美国信用担保公司和纽约城镇信托公司主管，还是通用汽车的资深幕后决策人。拉斯科布先生是政界新秀，在《美国名人志》中，他的职业一栏填的是“资本家”，但是他被列为共和党党员。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许多民主党人士都认为，这样人们对史密斯就更有信心了，他现在在竞选大战中已经进入了最关键时刻。随着约翰·J. 拉斯科布加入民主党，谁还会说民主党获胜会妨碍普通个股以 20 倍收益的价格卖出？

拉斯科布先生将民主党总部迁到了纽约的通用汽车公司，再没有比这更“牛”的地址了。他满怀自豪地宣布了这样的事实：“标准石油公司金融家”哈克尼斯（Harkness）先生、“银行家兼炼糖专家”斯普雷克尔斯（Spreckels）先生，以及“投资兴趣涵盖了铁路、证券公司、房地产和商业等领域的纽约金融家”詹姆斯（James）先生，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利益“不会因为史密斯当选总统而产生丝毫不利影响”。（以此来掩饰 1 000 多名民主党演说家先前曾力荐“新自由”政策，并且严厉谴责标准石油公司大亨和纽约金融家们的“不当举措”！）拉斯科布先生和史密斯州长双双决定沿用民主党一直提倡的低关税策略，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两年过后，许多在此刻反对他们的人士都希望共和党的高关税政纲能彻底失去平台，最好能被强行废止。

至于共和党，他们自然是鼓吹繁荣，有如共和党那些一如既往的特有口号，这次所打出的口号并不太完美，但已经足以应付这最后的一击。赫伯特·胡佛本人在他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中定下了这个基调：“人类愿望中最古老的、也是最神圣的一个，”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说道，“就是消除贫穷……我们今天的美国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接近这个最终战胜贫穷的目标。贫民窟正从我们的眼前消失。我们还没能达到这最终胜利





的目标，但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继续执行过去八年以来一直延续的政策，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大家都将很快就能看到贫穷被从这个国家彻底消除的那一天……根除贫穷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工作。这是我们一直提倡的主要政策。”

胡佛先生为他在提名演讲中过于自信而后悔的时刻可能很快就要到了。他只为自己后来的逃脱留了一条退路：他提到了上帝必须得支持共和党执政。

然而，胡佛先生的乐观情绪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难道 1928 年的国民生产状况不是要比头一年冬天好得多吗？难道大牛市在 6 月份的“晕厥”过后不是又恢复正常了吗？当时的气氛无法不让人产生一个又一个乐观猜想。毕竟，候选人的第一要务是设法让自己当选。无论根除贫穷在坐在一系列相关图表前的工程师兼经济学家胡佛眼里看来是多么渺茫，一旦作为政治家的胡佛站在麦克风前时，一切又会变得截然不同。1928 年时，在共和党眼中，繁荣是一个确信无疑的事实！

史密斯奋勇还击，“棕色圆顶窄边礼帽”不辞辛劳地在一座座城市间奔走：谴责禁酒法令、谴责偏执、承诺受挫农场主可以重新使用奴隶。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丝毫用处，形势的发展对他太不利了。到了大选那一天，胡佛席卷了全国大部分选票，他的普选票数达到了 215 000 000 票，而史密斯只有 15 000 000 票；胡佛的选举团投票有 444 票，而史密斯只有 87 票；胡佛不仅卷走了史密斯的大本营纽约州的选票，一直摇摆不定的俄克拉何马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选票，而且打破了民主党巩固的南方阵营，赢得了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甚至弗吉尼亚州的选票。

这是一次著名的胜利，在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时，股市——在整个竞选期间一直不断刷新新高——又进入到了新一轮的狂热。现在大牛市有了一个新口号，那就是“再繁荣四年”。

## 四

在 1928 年 11 月的“胡佛大牛市”期间，这一年早些时候的一些记录早已被冲击得落花流水。股票经纪人不是曾经满怀敬畏地说，股市可能会有日交易量达 500 万股的一天吗？日交易量 500 万股现在正以单调的规律

频频发生着，11 月 23 日那天，股市交易总量几乎达到了 700 万。股票经纪人不是曾经非常惊讶，证券交易所会员席位涨价了吗？ 11 月份里一个580 000美元的新记录被创下了。股票经纪人不是曾经困惑不安，无线电公司股票到底能不能在 150 这么高的价格卖出吗？ 11 月下旬，它曾以 400的价格被卖出过。现在 10 个点的收益和股价一个个新高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了。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票，在春天时价格升到了 200，到了 11 月30 日，已经攀升到了 439.875。铜业公司的股票也在不断上涨；帕卡德公司上升到了 145；莱特航空公司的股票涨到了 263。经纪人的贷款数额？当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但是，这个大可不必担心，它只不过是全面繁荣的一个信号——一个美国人民正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参与国家未来发展计划的信号。活期贷款利率在 8%～9%之间，也许有点高，但是大牛市行情已经表明，如果人们愿意支付，利率高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国民生产并没有因为高利率而受到影响，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欣欣向荣。新时代已经到来了，彻底消除贫穷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12 月份，股市价格再一次猛跌，比 6 月的跌幅更大。12 月 7 日，星期六，正是这个可怕的日子——疲惫的行情显示器（已经远远落后于实际的交易）报出了无线电公司股票跌 72 点的消息。那天在经纪人办公室看股价显示屏的人们惊恐地看到，这支股票的开盘价是 361，缓慢地升到 363，然后到达拐点，一点点地，一直下降到 296——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无线电公司的收益，在 1928 年前 9 个月里已经达到了每股 7.54 美元，按照历史悠久的“十倍收益”标准，可能意味着合理的价格应该不要超过 100 太多；但是，这个价格的十倍收益标准早已被人们抛至脑后。股票市场，正如马克斯・温科勒(Max Winkler)所说的：“不仅不管今生，也无视来世。”]在那个令人伤透脑筋的星期六早晨，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票下跌了 29 点，万国收割机公司从 368.5 下降到 307。但是，就像在6 月份发生的情况一样，当全面萧条似乎就要开始时，股市又恢复了平稳。几周紊乱的价格过后，股价再一次上扬。







美联储官员们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投机活动很显然正吸取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剩余资金。信用膨胀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这样一个当口，美联储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再贴现率，这样就使得用于投机目的的贷款利率被迫上升，导致投机活动失去吸引力，从而清算投机贷款，缩减未付贷款总额。但是，即便美联储已经将再贴现率在 7 月里升到了

5%，这一措施对投机活动的影响也只是暂时的。很显然，投机者愿意为贷款支付任何利率，只要股市价格一直攀升。美联储官员们也曾耐心地等待，希望这股投资热能自行消退，然而，等来的结果却是它变得更热了。事态正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如果他们将再贴现率再次上调，他们不仅会冒给股市带来巨大冲击的危险——这似乎显得他们是有意要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措施，而且这一措施会迫使企业为贷款支付更高的利率，进而会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除此以外，他们还担心黄金可能会在美国继续集聚，这会对世界贸易产生影响。财政部对于再贴现率是否应该上调还有最后一个特别的担心——它自己也需要筹集资金，梅隆部长自然不会热衷于迫使政府为它自己的贷款而支付高额利率。看来除了自然灾害，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通货紧缩了。

美联储最终想出了一个从未实施过的很有创意的政策，并且寄希望于这个措施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们希望能在不提高再贴现率的情况下，禁止各家银行将联邦储备银行资金再次贷给证券经纪人。

1929 年 2 月 2 日，他们发布了一项声明，声明指出："在美联储看来，联邦储备法案没有考虑将储备银行资金用于投机贷款或者扩大投机贷款范围。如果哪个美联储会员银行贷出款项是用于投机或者出于维持投机继续运行的目的，他就没有理由再向美联储要求再贴现的种种便利条件。"不到两星期之后，董事会又写信给它的各家会员银行，要求他们"尽可能阻止联邦储备银行资金以有价证券的方式被转移"。与此同时，美联储尽可能地减少他们所拥有的有价证券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出售。无论如何，再贴现率不允许被提高。从 2 月份开始，纽约储备银行行长一次又一次向华盛顿提请上调纽约的再贴现率，而他每一次的申请都遭到了否决。美联储更愿意信赖他们的新政策。

1929 年 2 月 2 日美联储声明的直接影响就是，股市价格在短暂的一夜过后全面遭受重创。随着美联储继续向它的会员银行施压、贷款只得用于被称作为合法国民生产活动，随后的影响自然是活期贷款利率进一步上浮。3 月下旬，当赫伯特·胡佛已经入主白宫，而美国繁荣的前一任"守护神"也已经隐退到北安普敦去寻求撰写自传的乐趣，资金短缺问题突然达到了警戒线的顶点。自新政策实施以来，活期贷款利率从 12%升到了 15%，然后是 17%，最终在 3 月 26 日那天，达到了 20%——这是自 1921 年萧条时期以来的最高利率；股市价格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下跌了，又一次

令人眩晕的股市下跌出现了。这一天，交易所的营业额打破了 11 月的记录，达到了 8 246 740 股。成千上万催缴保证金的信件再一次被塞进了投资者的邮筒，而成千上万曾投身于国家未来繁荣建设的参与者们，在股票脱手后已经倾家荡产了。与此同时，大牛市也似乎已经行将末路了。

3 月 26 日那天下午，好几家纽约银行都决定要出面解救。无论他们私下里是怎么评价美联储的新政策的，眼下他们看到的是一种恐慌正在酝酿之中。在他们看来，什么都要比恐慌强。第二天，美国花旗银行行长查尔斯·E. 米切尔(Charles E. Mitchell)宣布，他的银行已经准备好了 20 000 000美元供大家借贷，其中 5 000 000 美元的活期贷款利率为 15%，还有 5 000 000 美元的利率为 16%，其余的最高利率为 20%。米切尔先生的行动，被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议员称作是"煽了美联储一个耳光"，起到了将活期贷款利率稳定在 15%的作用，因而，一次先兆恐慌被及时阻止了。

随后股市价格不仅停止了急速下跌，而且又令人振奋地在一点点恢复！

道理很简单：除非是一次大灾难的出现，没有什么能动摇公众对股市的信心。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股市的价格依然是时涨时落。5 月份的一段时间里曾经一路下跌，经纪人贷款幅度也下降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出现什么总结算。尽管美联储设置了一些障碍，资金又开始逐渐大量流向投机用途。一个公司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许多种途径来将它的多余资金以 8%或者 9%的利率贷出，根本不需要通过美联储会员银行。随着"替别人"贷款数额的增加，各个公司都急于将自己的多余资金用在这样一些利润丰厚的投资上。而美联储各家会员银行发觉这些之后，也表露出了不愿再听从美联储新政策的迹象。到了 6 月份，股市价格再次上涨，就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美联储官员被彻底挫败了。







## 五

到了 1929 年夏天，股市价格已经涨到了远远超过头年冬天时的最高价了，简直高到了那个"湛蓝的、无云的九重天"了。所有原本可以预料到

的那些人们熟悉的普通个股股价变化的信号早就已经出现过了，如果一只价值为 100 的股票能涨到 300，又有什么能阻碍它继续再涨到 400 呢？为什么不等它再涨 50 点或者 100 点，直至抵达安乐富足的幸福彼岸呢？

无论按照逻辑学的哪条原则来看，当前股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如果说 1927 年时的通货膨胀情况非常严重，那么 1929 年的情况则要远比当时严重得多，因为经纪人的贷款总额已经攀升至 60 亿美元（而在 1927 年年底只有 35 亿美元）。如果说 1927 年时股市价格已经过高，那么 1929 年的股市价格简直就是荒谬不堪的。经济学也和物理学一样遵循着一个古老原则，那就是：升得越高，跌得越重。但是投机者们的记忆是短暂的。当人们在 1929 年回顾以往的先例时，他们很快便能释然，因为他们想起了过去几年内每次股价大跌总能很快便恢复，而每次恢复又会最终伴随着股价再上一个新高。升两个台阶，跌一个台阶，再升两个台阶——股市就是这么在前进着。如果你将手中股票卖出，就得要等到下一次大跌的时候（隔几个月就会出现一次）才能买进。事实上，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卖出：如果你手头股票是健康的，你就一定能成为最后的赢家。真正聪明的似乎是“买进后就一直不松手”的那些人。

一次又一次，经济学家和市场预言家们在喊：“狼来了！狼来了！”而狼只不过作了短暂的逗留。一次又一次，美联储表达了他们对通货膨胀的忧虑，而通货膨胀并没能导致市场的低迷。国民生产陷入危机？简直是一派胡言！工厂正全力以赴地生产，统计指数表明，工业正处于一级健康状况。有没有生产过剩的危险？又是胡说！生产不是刚刚勉强维持人们的需求吗？商品的价格不是一直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吗？商业分析家们普遍参照的经济风暴信号——过量生产的产品、积压的存货又在哪里？看看股市一直遥遥领先的那些股票的品质！当许多满怀抱负的股民在前几个月纷纷失利时，真正令人激动的价格上扬是来自这些可靠的、保守经营的大公司股票：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以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这些公司才是最谨慎的投资人考虑长远未来时的最佳选择。这些公司股票的上涨，似乎仅仅是一个信号，他们正在成为“抢手货”。正如戴尔—哈德逊公司的乔治 · R. 戴尔（George R. Dyer）上将在《波士顿新闻局》中所说的：“任何购买我们最高等级的铁路和工业股票的人，包括购买我们的钢铁、铜和公用事业公司股票的人，只要是一直拿在手上不卖出的，就会挣大钱，因为这些有价证券会很快在市场上脱销。”大牛市操纵者们一直所鼓吹的内

容也许是对的，这是一个新时代，繁荣正进入全盛期。

然而，还是有人心存疑虑。可反对他们的论据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致这个国家一向最冷静的金融界领袖中的大部分人最终也开始动摇了。他们依然认为通货膨胀可能迟早会对国民生产产生威胁，但是，头年冬天以来一直困扰他们的愁云已经彻底被驱散了。这一回，大牛市已经平安度过了好几次令人恐怖的震荡，也许命里注定它是"长寿"的。

无论在哪里，人们都能听到股市能人贤士的一些智言慧语："繁荣快要结束了？嗨，老兄，我们还才开始呢！""做美国股市的'一头公牛'吧！""绝不要卖空美国股票！""我告诉你，一两年后这些股票的价格会看起来低得出奇。""看看股市——都快要到 500 了。""那家公司前途无量。""千万不要放弃你在一只好股票中的有利位置。"……每个人都能听到有关如果一个人在 1919 年买了 100 股通用汽车股票一直不脱手，他现在该有好几百万收益的假设。每个人都被不时地提醒，乔治·F. 贝克(George F. Baker)就从来不卖手头股票。至于投机的危险，大可放心——正如新泽西州前任州长斯托克斯(Stokes)在一次演讲中令人信服地说道："哥伦布、华盛顿、富兰克林和爱迪生曾经都是投机者。"约翰·J. 拉斯科布给《妇女家庭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有着极其诱人的标语："人人都该致富"，"致富的途径就是投身于这个国家制造财富的运动中"，他还指出，如果一个人一个月只存下 15 美元，投资于好的普通股，让股息和股权不断积累，20 年后，他至少可以拥有 8 000 美元股金以及投资所得月股息 400 美元之上的总收入。一切就这么简单，通向财富的大门是敞开的。







与此同时，人们也听到了有关美国工业未来可以通过清晰明了的现代原则来加以保障的说法。正如瓦蒂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和威廉·T. 福斯特(William T. Foster)所指出的那样，日益剧增的消费是通向繁荣的必经道路。如果我们大家在消费时越来越自如，每个工厂的烟囱都会冒出滚滚浓烟，股票的股息也会不断增长。这一刻，旧经济秩序再一次为新经济秩序让步了。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一个非学科性质的企业管理专业教授查尔斯·阿摩司·戴斯(Charles Amos Dice)博士在他的一本《股市新高》论著中写道："工业、外贸和金融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股市只不过是记录下了正在进行的巨大变化。"

戴斯教授提到了金融业的变化，很显然他是对的。公众们不再需要像债券那样呆滞的、利润微薄的投资，他们需要的是能有高额利润回报的有

价证券。各家公司都在设法利用公众的这种新投资喜好，他们纷纷收回债券，发行新的普通股证券来取而代之。如果发行了新债券，通行的做法是承诺可以将债券转变成股票，或者担保在未来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它来购买股票，这种方式的债券发行也就有了迎合大众投资的味道。公众们似乎还喜欢在某只股票价格为 50 美元的时候买进 100 股，而不是在价格为 250 美元时买进 20 股——量大的买卖会让人感觉自己很富有！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不管股息在短期内是否会有增长，也要将他们的普通股票分成小股，使得它们对更大范围的股民具有吸引力。许多公司一直是通过向它的股东许诺在购买新股时让价来吸纳新资本，这种做法现在变得广泛流行。公司和银行合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它们的联合不仅仅是希望能减少各种间接费用、避免相互残杀的激烈竞争，很多时候纯粹是因为公司的狂妄自大。每一次拆股、合并或者增股都是股票价格受影响而上涨的一个自动信号——这一切变得太具有诱惑力了，以致各家公司的主管都想要设法再安排一次拆股、合并或者增股，只要以他们的精明眼光看起来不会危及他们自己的投机资本。

多年来，相互竞争的利益双方一直模仿西德尼·Z. 米切尔(Sidney Z. Mitchell)的精明做法：设法控制一个地方的电灯与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使他们联合成一个整体。随着公用设施的光明前景逐渐进入投资者的视线，不同势力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这些公用设施公司的资本扩张速度惊人。到了 1929 年夏天，竞争的体系变得如此精细，而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人们很难知道、哪怕是大概地知道这些公司股价上升股票的真正价值。即便是一位金融方面的资深分析师，当他发现 A 公司拥有了 B 公司的 20%股份，B 公司拥有了 C 公司的一定股份，而 C 公司，反过来，又向 A 公司参股，而 D 公司却拥有以上三家公司每一家的股份时，也一定会很迷惑不解。但是，似乎投资者很少会关心真正的股票价值。公用设施股票前景一片大好，股价节节攀升——这就够了。

就在股市牛气冲天的同时，投资信托公司的增长速度简直不亚于蝗虫繁殖那么快。据说现在大约已经有 500 多家信托公司了，总缴纳会费资本达 30 亿美元，而他们所持有的股份——其中许多是在目前高价位买进的——已经到了近 20 亿股。这些信托公司包罗万象，既有诚实经营、精心管理的公司，也有无知的、贪污的发起人筹建的疯狂投机的公司，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据说其中一些信托公司是如此善于转化资本，以致他们都

不会支付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所获得的优先股息，他们完全依赖利润。我们必须得承认，也有一些信托公司，时不时地在吸纳银行家们控制的、却很难在市场公开出售的有价证券方面提供了便利。“这些公司应该受到谴责。”你是这么说的吗？你当然是对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一切投机太容易得逞了！只要股价是在上升，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事任何性质不明的金融活动。大牛市掩盖了大量的罪恶。这是一个投机行为开创人的黄金时代，而这些开创人多得可以组成一个军团。

这个资本堆积起来的巨大金字塔的高度正在与日俱增。当汽车、收音机和100多种其他小机械的超级推销员们将崭新的、闪亮的商品装上货车，准备发给他们的最终客户时，有价证券的超级推销员也在向这些客户推销投资信托公司的股份；这些信托公司拥有一些控股公司的股票，而这些控股公司又拥有一些联合银行的股票，这些银行，反过来，又控制了控股公司——诸如此类，盘根错节。尽管工厂、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货架上都没有装满商品，但是各种商品的最终顾客和有价证券的发行对象们都已经不堪重负了。一场危机正处于酝酿中——尽管不同于这个国家在1921年时曾遭遇的那次危机——但它终将是一次危机。尽管如此，，出现在这个夏季天空的阴霾看起来也不过就是一个男人的手掌心那么点儿大。

我们似乎无从计算，在1929年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夏天，到底多少美国人手头的股票能够有所盈利，但是，我们暂时断定至少有100万以上股份是可以获利的，这个估计应该是很合理的。[乔治·布臣·罗宾逊(George Buchan Robinson)估计有300 000 000股份是可以有盈利的。]相对来说，那些完全持有普通股、每天全神贯注地参照股市报价、专注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专业经纪人的股民们数量更大。当你在下午5点27分走进正在营业的小酒店，或者在有轨电车中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时，你能看到的三份报纸中就会有两份是被翻到了股市报价的版面。一些华尔街大经纪人的办公室分部遍布于各个城市和数不清的市郊乡村。1919年时，全国有500个这样的办公室分部；到了1928年的10月，增加到了1 192个；而在整个1929年，这些办公室分部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长。经纪人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奇才，处处受人尊敬；普通老百姓认为自己不可能像那些经纪人一样精通华尔街的“致富神话”，因此，他们会对经纪人的每句话都言听计从。如果一位经纪人仅仅是无意中提到了通用工业协会有可能会拆股，那么第二天一早，他的邻居们就会急匆匆地跑去买进这

只股票。

富人的司机在开车时耳朵都会竖到后面，他想听听后排正讨论的伯利恒钢铁的最新动态，因为他手上正持有50股这家公司的股票，现在卖出还有20点盈利。经纪人办公室擦窗户的人在干活中间会不时地停下来看看行情显示器，因为他正在考虑要不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储蓄拿去购买一些西蒙斯的股票。埃德文·拉斐尔(Edwin Lefevre)说起过这样的故事：一个经纪人的男仆在股市中几乎赚了250 000美元；还有一个护理经验丰富的护士，因为听从了对她心存感激的病人们的提示而赚了30 000美元。一个怀俄明州的牧场主，家住在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30英里的地方，一天之内会买进或者卖出1 000股——他通过收音机了解市场行情，打电话到最近的一个大城镇来下达买卖指令，再用电报传到纽约。纽约一位息演的女演员，将她在帕克大街的公寓装修成了一个办公室，每天围绕她的是各种图表、数据和金融报告，而她则坐在家里打电话来做她的投机生意。人们在餐桌上经常听到的是这样一些奇异的一夜致富的故事：一个在银行上班的年轻人，将他的一笔微薄资产中的每一美元都花在了购买纳尔斯池贝机床公司股票上，他现在一辈子都不愁没钱花了；一个寡妇在她买的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股票中的收益多得都能买得起一所乡村大住宅。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在投机，都在赚钱，哪怕他根本就不了解那些寄托了自己致富梦的公司是什么性质的。这就像那些买了海岸航空公司股票的人还以为他们买的是航空公司的股票。杂货店店主、司机、水管工、女裁缝，还有那些非法卖酒酒吧的服务生都在炒股。甚至连那些一直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也在股市转悠：他们可能昨天还在为标准化和大量生产对美国人生活造成的可怕后果而大声疾呼，可是今天他们自己也已经准备好来“收割”标准化和大量生产的果实了。于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希望能再多买一点美国氰胺公司B股股票的文学编辑与对城市服务股票满怀信心的诗人们在一起吃午餐，当他们离开餐桌时，会在挤满了人的经纪人办公室里停留一会儿，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股市行情；曾经只了解高更(Gauguin)的艺术家们放下了手中的画笔，却对国立贝勒斯赫斯公司股票的潜在优势头头是道。毫无疑问，大牛市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投机狂热。

# 六

到了 9 月,大牛市达到了它最辉煌的顶点。

赫伯特·胡佛在雨中驱车前往白宫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一职到现在已经有六个月了。他任命了维克山姆委员会去调查法令尤其是禁酒法令的执行情况;在总统的建议之下,国会通过了农产品市场法案;亚历山大·雷格(Alexander Legge)曾认为,在他作为新联邦农业局主席的各项职责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阻止并控制任何农产品过剩”;《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已经宣告开始生效,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正准备乘船前往美国去讨论一项缩减海军军备的新议案;有关哈定丑闻的漫长辩论终于有了定论:斯图尔特上校被堆积成山的支持洛克菲勒的投票压得喘不过气来,已经辞去了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主席的职位,哈里·F. 辛克莱则被送进了监狱;林德伯格上校,无愧于他的国家超级英雄称号,娶了安·莫罗(Anne Morrow)小姐;拜德中校,一个英雄主义行为不断的人物,正停泊在南极黑暗中的“小美国号”上等待可以飞往南极点的时机。接连不断的飞机引擎声在美国各个乡村上空轰鸣,对空中英雄效法达到了荒诞顶点的一个事件是:一个 22 岁的男青年爬进了“黄鸟号”机舱,从缅因州的老兰花海岸偷渡到了西班牙海岸。成百上千的美国沙滩上,女人们拉下了她们的泳衣肩带,只为能晒出非常流行的古铜色后背;令她们犹豫不决的是:当她们开车到城里去时,不穿长袜是否合适;还有,时尚杂志上宣称晚礼服的长度很快就要拖到地上了,这是否可信。







这个赛季,梯尔登赢得了他个人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美国业余网球锦标赛桂冠;这是鲍比·琼斯作为业余高尔夫球霸主的倒数第二年——他已经连续七年囊括了业余高尔夫选手大赛和全国公开锦标赛的冠军;贝比·卢斯还苦心钻研他的本垒打,他还是和 1920 年时一样成功,但是他也老了,作为运动员的比赛生涯也渐进尾声了;登普西的冠军头衔输给了滕尼,滕尼将桂冠束之高阁,全力以赴应对新的比赛对手,每一次赛事简直都是一块吸引众人眼球的磁铁,受关注程度无人能及。

大家都在阅读《西线无战事》,哼唱着收音机里传出的鲁迪·瓦利(Rudy Vallee)的歌曲;文学期刊正展开一场人文主义大讨论。但是,与大牛市

相比，无论是晒成古铜色的后背，拉姆齐·麦克唐纳怀有美好愿望的航行，人文主义大讨论，还是《西线无战事》，围绕这些话题的讨论都是很乏味的。高盛公司不是曾经表示他们对目前的股市价格很有信心吗？他们赞助了蓝岭公司，这是一家投资信托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是把他们的股票以当前的价格换成那些处于领先地位的“蓝筹股”——以 324 的价格交换联合化学和染料公司，293 交换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股票，179 交换联合燃气公司的股票，395 交换通用电气公司股票，等等。

让我们暂停片刻来看一眼 1929 年 9 月 3 日这天一直在超负荷运转的行情显示器所报出的一些股票价格。就在这一天，“道—琼斯指数”达到了这一年的最高值。接着，让我们将这一天的数值与 1928 年 3 月 3 日的开盘价比较一下，你可能还记得，那一天的大牛市股价好像已经升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高度。这两组数值就在这里：从左到右，首先是 1928 年 3 月的数字，然后是 1929 年 9 月的数字，最后一组是将 1929 年的各项数值转换成 1928 年条件下的数字，或者换句话说，将 1929 年的数字中由于介入的拆股和发行新股而上升的股价予以扣除，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公正地判断在这 18 个月里大牛市的股价上涨幅度。

| | 1928 年 3 月开盘价 | 1929 年 9 月 3 日最高价 | 调整后的 1929 年 9 月 3 日最高价 |
|---|---|---|---|
| 美国制罐公司 | 77 | 181.875 | 181.875 |
|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 179.5 | 304 | 335.625 |
| 亚纳康达铜业公司 | 54.5 | 131.5 | 162 |
| 通用电气公司 | 128.75 | 396.25 | 396.25 |
| 通用汽车公司 | 139.75 | 72.75 | 181.875 |
|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 | 132.75 | 137.875 | 466.5 |
|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 160.5 | 256.375 | 256.375 |
| 美国无线电公司 | 94.5 | 101 | 505 |
| 联合碳化物公司 | 145 | 137.875 | 413.625 |
| 美国钢铁公司 | 138.125 | 261.75 | 279.125 |
| 西屋电器公司 | 91.625 | 289.875 | 313 |
| 沃尔沃思公司 | 180.75 | 100.375 | 251 |
| 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 | 89.75 | 186.75 | 203.625 |

（说明：通用电气、美国无线电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和沃尔沃思公司的价格调整都参考了 1928 年 3 月 3 日以后发生的拆股。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亚纳康达铜业公司、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西屋电器公司以及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的价格调整参考了其间发行的新股；它们代表了在 1928 年持有的每股到了 1929 年 9 月 3 日时的新价值，调整是建立在这期间发行的新股都被认购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还有一件事：当你参看1929年9月3日的最高记录时，还要记得就在那一天，很少有人会想像得到，这实际上已经是股价上升的最高点了。在当时，绝大多数人仍然对大牛市股价的继续上扬满怀期待。

先驱们的鲜血还在美国人的血脉里流淌，如果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那么展望未来的习惯依然保留了下来。即便是在1919年发生了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崩溃、政治上犬儒主义的传播、宗教确定性的缓慢腐蚀，以及仁爱被拆穿等等一系列令人失望、令人伤心欲绝的事件，美国人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依然不变。大牛市令他的憧憬得到了一些满足，每个美国人都可以编织这样的美妙梦想——在未来的某个浪漫的一天，他可以极高的价格卖掉手上西屋电器公司的普通股，换来一所大房子和能组成一个车队的闪亮汽车。当他懒洋洋地躺在棕榈海滩上展望自己祖国的未来时，他能"看到的"是一个自由的美国——没有贪污、没有犯罪、没有战争、没有对华尔街的控制、没有反宗教、没有欲望(因为前几年的乌托邦留给他的最大影响就是对一切心存疑虑、别太上心)，也没有贫穷和辛劳。他"看到的"是建立在新科技和新繁荣基础上的不可思议的新秩序：公路上行驶的是成千上万的汽车；天上往来的是一架架飞机；高压电线被从一个山头拉到了另一个山头，将电力输送到千家万户，让千千万万节省劳力的机器高速运转；摩天大厦高耸在往日低矮平房遍布的村庄；大城市里石头和混凝土建造的几何建筑物雨后春笋般涌现；大街上呼啸而过的是高度机械化的车辆；穿着漂亮的男男女女们在花钱、花钱、花钱，这钱是他们非凡的投资远见帮他们挣来的，因为他们就已经预见到了1929年——也就是这一刻所发生的一切。







# 第十三章　大崩盘

## 一

9 月初，股市再次开始下跌，但是，很快便出现了反弹。《纽约时报》汇编的资料显示，9 月 19 日的股市指数比 9 月 3 日的还要高。随后，又出现一次下跌，跌幅越来越大，直到 10 月 4 日，许多只股票的价格最终停在了刚上市的水平。举例来说，美国钢铁公司股票在几周前攀升到 261.75 的高度之后，现在跌到了 204 的低谷；截至 10 月 4 日收盘，美国制罐公司的股价比本年度出现的最高价低了 20 点；通用电气公司股票比它的最高价低了 50 点；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则从 114.75 一直跌到了 82.5。

这肯定是一次情况不妙的下跌，但是类似的下跌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而那些总能全身而退的投机人早在 1928 年的 6 月和 12 月、1929 年的 3 月和 5 月反复出现的股市下跌中得出了一个教训：股价下跌的时候便是可以买进的大好时机，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正当股市出现震荡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统计的数据表明，经纪人贷款在 10 月 2 日这一天又达到了一个新高：6 804 000 000 美元，这至少说明，股民们并没有抛弃股市，而是不停地在继续投资，数量丝毫不比以前少。当然，经纪人贷款数额上涨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股民们手中还没卖出的有价证券，因为投资信托公司

和各家公司发行的新股丝毫没有减少。看起来历史又要重演了，那些以109.75的价格买进了亚纳康达铜业公司股票和以281的价格买进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股票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很有远见的投资人。确实如此，股市价格又一次开始上涨了。10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当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赫伯特·胡佛坐在拉皮丹营的一根木料上讨论海军装备的缺陷与和平问题时，股市价格还在一路上涨。

但是，很快，问题又来了，股价再次下跌。华尔街传出这样的俏皮话：要找出这次下跌原因的话，首先要怪英国的霍曲金融集团的倒闭，它导致外国投资人和投机商被迫大量抛售股票，还要怪马萨诸塞州的公用事务部贸然拒绝了波士顿爱迪生公司的拆股计划。传言还提到了钢铁公司肯定会拆股，这样才能集聚市场"未消化的"有价证券。但是，在10月21日所在的那个星期之前，股市并没有出现什么真正的警报。在此期间，大家一致的观点是，9月的暴风雨尚未完全退去，股市正处于进入"更健康的证券市场"前的自行调整阶段。

## 二

鉴于即将要发生的事件，在此回顾一下那些金融预言家对当时形势的预测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启示。这些预言家们拥有神奇的力量，人们通常以为他们有能力去分析那些由统计师发现并统计后送呈给他们的各种图表，并且根据曲线的走向和指数变化得出股市行情有所好转还是日趋恶化的结论。当然，预言家们的预测也是不同的，事实上，从来就没有金融预言家们意见完全一致的时候。在回顾金融预言家们的各项预测以及那些知名银行家所作的各种公开声明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乐观的预测或者言论有时可能是言不由衷的：很少有人愿意承担一个可怕的预测会产生的责任；再者，当银行家们手里还持有大量尚未出售的有价证券时，也不太可能指望他们会说出一些能使这些证券无法脱手的言论，无论他在做出那番言论时内心曾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说到底，预言家是一种最需要靠运气的职业。然而，完全不同于1928年2月和3月时的紧张与不安，1929年10月金融界的普遍看法还是很乐观的，尽管此时股市的天空并不显得比彼时更加晴朗。




当然，也有一些预言家，他们不合潮流地做出了提醒大家谨慎的忠告。例如投资顾问罗杰·W. 巴布森(Roger W. Babson)早在9月份就预测股市指数会下跌60～80点，虽然在华尔街业内他一直并不太被看重，尤其是他一直忠告他的客户股市已经是危机四伏之后。10月7日，标准统计公司的标准贸易和证券服务部建议他们的客户要追求"超保守策略"，并且冒险做出这样的预测："我们保留这样的观点，在未来几个月里，普通股价格会走向更低的水平。"读者群主要是穷人的《每周业务和投资指南》提到了"普通股大错觉"，并预测"股市会出现大抛售"。在大银行家当中，保罗·M. 沃伯格(Paul M. Warburg)在几个月前就表明他已经感觉到了股市危机重重。这些评论员，还有其他一些像《商业和金融新闻》主编、《纽约时报》金融主编等人，完全可以因为他们的先见之明而荣获1929年的金质奖章。

如果我们要论功行赏，给功臣颁发金质奖章，那么我们也不要忘了哪些人应该领到一枚"皮质奖章"。哈佛经济协会不一定会得到这样一枚奖章，尽管在10月19日已经作出了国民经济正"面临新一阶段的调整"的分析，他们还是预测"如果股价暴跌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目前还没看出来)，毫无疑问，联邦储备体系会采取有效措施来减轻货币市场的压力，以阻止事态恶化"。哈佛预言家们的错误很快便得到了证实：10月26日，当股市出现第一次大崩盘时，他们竟然还做出了这样乐观的判断："尽管股市很严峻，但是我们相信股价骤降会被证明是一次股市发展期间的调整，而不是预示着会引起长期的、进一步股市大抛售的国民经济大萧条。"这个判断简直错得太离谱了，但是，另一方面，哈佛经济协会并不是真的很愚蠢。克里夫兰信托公司的里奥纳德·P. 艾尔斯(Leonard P. Ayres)上校也不一定会领到奖章，尽管他几乎可以获得一枚。10月15日，他个人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股价的下跌会有可能预示着国民生产的严重衰退。尽管钢铁生产、汽车制造业、建筑业发展的速度都减慢了，导致严重萧条的因素并没有出现。"但是在艾尔斯上校看来，股市的天空，至少是部分地出现了多云。"看起来，"他说，"股市不太可能会从坚挺一直下滑到疲软状态，就像一个口齿伶俐的人不会一下变成哑巴一样。"

然而，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教授却比艾尔斯上校更乐观。据10月17日报纸报道，费雪教授告诉采购代理商协会，股价正达到了"看起来

是永远不会变的高原区"。他预计，未来几个月里，股市价格会"远比今天的还要高"。就在10月24日大恐慌出现的当晚，他还做出了股价会很快恢复的预测。而在大恐慌出现的两天前，《波士顿新闻局》引述了麦克尼尔金融服务中心主管R. W. 麦克尼尔(R. W. McNeel)的言论："一些相当有远见的投资人正在买进股票"，"除非我们会面临股市大恐慌——这一点谁也不会相信，股票不可能会跌至低谷的"。至于纽约的美国花旗银行主席查尔斯·E. 米切尔，一直在散布股市晴空万里的言论。10月初，尽管股价已经出现了下跌，米切尔先生却依然非常肯定："美国工业发展势态绝对正常，我们的信用状况无可挑剔……公众付给经纪人贷款的利息总是被人夸大。"他还加了一句："总而言之，我们对股市的关注有点儿过头了。"几天后，米切尔先生又说道："尽管在美国的有些领域出现了投机过度，但是，市场总体上还是健康有序的。过去六周出现的股价下跌已经对市场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调整作用……股票的价值一直有我们国家的繁荣发展作保障。"到了10月22日，大恐慌出现的前两天，米切尔先生刚刚结束短暂的欧洲之旅回国，他再次发表了让众人放心的言论："我们的股市不存在什么根本性问题，我们的商业发展、信用结构也都没有问题……公众们患上了'经纪人贷款恐惧症'。"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绝不只有米切尔先生一人。客观地说，米切尔先生和其他金融界人士的主要不同只不过是他的嗓门更大一些而已。1929年初秋，一位著名的美国银行家在达成一项交易时私下里说，他没有看出股市有任何不祥之兆。而像阿瑟·卡顿那些一向对股市行情乐观的人，当然一直在坚持他们的"股市行情依然看涨"的看法。10月中旬，《波士顿新闻局》杂志上《百老汇闲谈》专栏指出，大部分股民可能还是赞成"最近出现的股价下跌为这一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大牛市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的论调。毫无疑问，许多曾经认为前几个月股价偏高的投机商们现在已经认定，银根紧缩已经实现了，他们可以再次买进股票了。可能绝大多数金融界人士也会赞同刊登在10月16日《百老汇闲谈》专栏中的如此言论："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如此壮大，经营又是如此多样化，我们的国家是如此繁荣，以致股市的波动不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发展。"10月19日，《波士顿新闻局》刊登了编辑的观点："凡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什么状况，总是会有一些人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股市总体情况是令人满意的，基本上也是健康的。"

即将降临的这场灾难注定是令人困惑而耸人听闻的，无论对于有钱





人、有权人、通常很有远见的人，还是那些手上不明智地持有50股保证金股票的蠢人。

## 三

众人期待的股市价格恢复并没有出现。股价低迷似乎是从10月22日星期二开始的，而这一天的收益在当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也大多失去了。10月23日星期三的股市简直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抛售，日交易总量超过了600万股，当下午15:00的铃声宣告当天交易结束时，行情显示器已经晚了104分钟。《纽约时报》统计，50家领先的铁路和工业公司的股票平均跌幅达18.24点——使得先前出现过的任何一次股价下跌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每个人都可以想到，数量上前所未有的追缴保证金通知单一定正被寄往保证金不足的股民们的信箱，股市确实变得很严峻了。但是，也许明天就会出现转机。这一次下跌已经使股价跌到了比过去两年出现的任何一次都要低的位置。它当然不可能会持续太久。

第二天是10月24日，星期四。

这一天值得大书特书。当日股市开盘价还是相当平稳的，只是交易量很大。行情显示器显示，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在一笔大宗交易中总量达到了20 000股，而通用汽车也在另一笔交易中达到了同样的数量。几乎在这同时，行情显示器又开始滞后于现场交易了。卖出股票的压力非常大，人们在填写委托单时内心充满了惶恐和不安。股价还在下跌……从目前来看，下跌的速度还是很快……第一个小时交易结束时，很明显能看出，股价下跌幅度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惊骇的。在全国各地的经纪人办公室里，一直在看行情显示器读数的人们面面相觑，困惑不解。这股抛售的洪流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我们可能永远也无从得知。但是，很有可能10月24日那天头一个小时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恐惧，也不是大量卖空，而是那些手中持有成百上千利润已被耗尽或者即将耗尽股票的可怜股民们的大倾销。这个由股票价格所构筑的大厦早已被各种投机信用侵蚀得千疮百孔，现在终于要不堪自身的重量而轰然倒塌了。

然而，恐惧并没有延缓它的脚步。随着价格体系的崩溃，受惊的人们

纷纷想要从重压下逃脱出来。到了 11:00,证券交易所挤满了前去"抛售股票"的股民,早在那个滞后的行情显示器能报出当时的价格之前,有关股价已经跌至最低的消息就已经通过电话和电报传到了全国各地,出售股票的委托单总量再次翻了一倍。领先的几只股票相临两笔的售出差价就有 2 点、3 点甚至 5 点。跌!跌!跌!……那些应该在这样的时刻出来救市的投机商哪儿去了?那些估计会在低价时重新买进、为股市提供软着陆的投资信托公司哪儿去了?那些一直宣称对大牛市很乐观的股市操纵大家哪儿去了?那些应该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力挺股价的强势银行家哪儿去了?似乎找不到任何依靠。跌!跌!跌!纽约证券交易所传出的抛售股票的喊叫声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恐慌。

美国钢铁开盘价 205.5,跌至 200 之后目前价格停在了 193.5;通用电气在几周前股价曾达到了 400,这个早晨开盘价是 315——现在已经下滑到 283;无线电股票的情况更糟:开盘价 68.75,随后一路跌破 60,50,40,直至到了 44.5 的深渊。至于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曾经承载了成千上万人将连锁店视为新经济时代先兆的希望,也从 83 一头跌到了 50。短短两小时内,许许多多只股票将在大牛市中许多个月的收益丧失殆尽。

如果人们能准确地随时了解发生的事情,仅仅股票价格的下跌或许还不足以令人害怕,正是那些无从得知的盲目导致了真正的恐慌。

假设一个人在 10 月 24 日中午 12:00 至 13:00 期间走进了一个经纪人的办公室了解股市行情,首先进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占据了屋子一整面墙的屏幕,上面记录的是当日领先的几只股票的价格。上面显示的最低和最新价格让他倒吸了一口气,但是他很快便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将写有记录行情显示器最新价格的卡片送过来的工作人员跑得气都喘不过来,也赶不上股价的变化——这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太突然了。他转而去看那个数字闪烁的行情显示器,一连串数字不停地出现。平常,这个对行情显示器读数很有经验的人只需要一眼便能看明白股市的行情,尽管交易所一直习惯于省略每只股的前几位数而只剩下最后一位。只需要看一眼,如果一个股民的记忆力没有什么问题,他便很快能想得出省略的那几位数。但是今天,当这个对炒股很有经验的人看到像"收音机:6,5.5,5,4……西屋电器公司:9,8.875,8.725,8.5,8.25,8,7.5,7……"这样的读数时,他不敢确定收音机的"6"是 66,56,还是 46?而西屋电器公司是从 189 下跌至 187,还是从 179 下跌至 177 呢?不仅如此,他已经听说行情显示器

读数实际上已经晚了一个半小时，现在是下午 13:00 了，它报的还是11:30的股价，而这些数值早已经是家喻户晓了。谁知道交易所的现场目前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每隔 10 分钟，位于交易所拐角处的行情显示器会读出从现场挑选出的几只股票的价格，这时候，经纪人的办事员会抓住那卷展开的纸条，用剪刀剪下一块，以一种毫无感情的语气向占据了每个座位的以及站在座位后面的那些面色发白的人们读出这些数字。他读出的数字要比之前记录的低 10 点、12 点，甚至更多点。那些未被选中股票的价格变化又是如何？我们无从得知。电话线里满是全国各地集中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问价和委托。每隔一会儿，从经纪人办公室的后部会传出一个办事员发狂的要求接通电话之后对着话筒的嚎叫声："钢铁，96！"然而，如果能知道钢铁公司此刻正在做什么，人们或许有可能会稍感安慰。令人们深陷其中的远不止钢铁公司一家，人们几乎是完全一无所知，他们的想像力也停留在空中了。即使他们发出一份买进或者卖出的委托，他们也无从得知这份委托单的命运会如何。交易所记录当前价格以及传送委托单的整个系统都令人绝望地无法应对这种突发情况，恐慌情绪的蔓延是无法避免的。

一个经纪人的办公室里，从太平洋沿岸到大西洋沿岸的任何一个经纪人的办公室里，人们的脸上写满了失败。一个人脚步沉重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机械地将一张纸撕成碎片、碎末；一个人羞愧地龇着牙，像一个在葬礼上傻笑的小男孩；一个人正哀求一名经纪人的办事员，想要了解最新的美国和国外股市行情；还有一个人正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好像是被吓傻了，眼睛死死地落在那些不断滚动的数字上，"GL:8,7,5,2,1,90,89,7,6……AWW:3,2.5,2 …… JMP:6,5,3,2.5……"这些看起来很无辜的数字意味着多年希望的彻底粉碎……

中午 12:00 过后的几分钟，一些警觉性更高的股民聚集在交易所门外的大街上，他们不知道，怕被人认出的查尔斯·E.米切尔，这位往日牛市的拥护人，正悄悄溜进街对面拐角处的摩根公司。摩根财团被华尔街大爆炸的流弹击中到现在也不过是 9 年，但它的现任总裁现在又将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一场新灾难。紧随米切尔先生之后的是大通银行总裁阿尔伯特·H.维金(Albert H. Wiggin)、摩根信托公司总裁威廉·波特(William Potter)，还有美国信孚银行行长苏沃德·普罗瑟(Seward Prosser)，他们是来和摩根财团的托马斯·W.拉蒙特(Thomas W. Lamont)商谈事务的。几

分钟后，这五位总裁和第一国民银行的小乔治·F. 贝克(George F. Baker, Jr.)一起，同意代表各自的公司每人注入 4 000 万美元来支持股市。这样，2.4 亿美元的备用资金就筹集了。拉蒙特先生随后解释道：这笔钱不是为了将股价控制在某个高度，而纯粹是为了在需要时买进股票以便让股市能有序地交易。他们决定，他们的第一次行动要试图稳定几只领先股票的价格，这将会在整个股市中起到标志性的"领头羊"作用。但这是个危险的计划，因为随着这股歇斯底里情绪的蔓延，谁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然而此刻，除了铤而走险，他们已经别无他计。

银行家们纷纷行动了。拉蒙特先生在他的摩根办公室里接见了一群记者。他的脸色很严肃，但是语调很镇定，而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堪称是描述当前势态发展的众多话语中最轻描淡写的一句："股市出现了小小的廉价出售，我们几个金融机构的总裁已经开了一个讨论会。我们发现没有哪个证券交易所陷入困境，而经纪人的报告也表明，客户保证金正令人满意地保留在那里。"他继续将刚刚发生的一切解释成仅仅是一个"市场的技术状况"，而不是任何根本性的问题。

随着银行家们正在碰头的消息在交易所传播，股价开始稳定，随后出现了一次小幅股价回升。钢铁公司股票又升到了当日开盘时价格，但是银行家们即将要提供给这个垂死大牛市的，仅有摩根总裁的一番安慰"病人"的话语。

下午 13:30，交易所副总裁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通常被认为总是代表摩根财团利益的场内经纪人)挤入"持有钢铁股票的人群"中，以 205 的竞标价——上一笔的最后售价——买进了 10 000 股钢铁的股票。但是他实际上只买了 200 股，其余的委托单都留给了那些专业会员商。惠特尼先生接着又挤入了场内的其他几个交易点，以上一笔的最后售价买进了 10 000 股其他 15 只甚至 20 只股票。当然每一次，他只是报出了买进的价格，而后将委托单上其余的股份留给了那些专业会员商。就在几分钟之内，惠特尼先生在股市已经买进了股价达2 000 万～3 000万美元的股票。很显然，这样数量巨大的购买行为并不是能由诸如汤姆、迪克或者哈里之流的个人所能办到的，惠特尼先生动用的是银行家们的备用资金。

孤注一掷的补救措施起效了，表面上的信心恢复了，股市稳定了几个小时。虽然许多只股票在当日最后一个小时再次出现了下跌，但是这最终的结果已经不是最坏的了。收盘时钢铁公司股票的价格实际上比星期二

还高了 2 点，大多数其他领先股在当日的交易之后每只股票的净亏损也不到 10 点。

尽管如此，这一天还是令人惊恐的。到了晚上 19:00，1 000 多个经纪人办公室的行情显示器还在读数；到了 19:08，他们读出的还是下午 15:00 交易所最后一笔的成交价格。交易量创造了一个新记录——12 894 650 股。（“我们看到日交易量达 5 000 000 股的那一天可能会到来。”华尔街的预言家们 20 个月前不是这样说得吗！）这一天下午的早些时候，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已经在疯传——什么 11 个投机商已经自杀，什么布法罗和芝加哥的交易所已经关闭，什么军队已经被派往纽约证券交易所驻守，以防止愤怒的人群发生暴动，等等。整个国家已经尝到了恐慌的苦涩滋味。尽管银行家的备用资金已经阻止了股市走向彻底的崩溃，不可否认，整个经济结构已经被撕裂得大门洞开了。

## 四

到了星期五、星期六，股市似乎有所好转，交易量仍然是大批量的，但是绝大多数股票的价格已经得到了控制。正当银行家们谨慎地、尽可能多地卖出他们在星期四动用储备资金买进的股票，以便为将来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做准备时，那些曾经以略高一些的价格卖出手中股票的人又重回股市准备再次买进了，他们心中满怀着这已经是底价的期待。（他们不是经常被告知“股市看起来最坏的时候也就是可以买进的最好时机”吗？）报纸上刊登着来自最高领导人的安慰人心的漂亮话语——赫伯特·胡佛本人在一次白宫会议中指出：“这个国家的基本行业，也就是商品的制造加工业和销售业，正健康发展，繁荣有序。”但是，到了星期六会议结束时，股价又开始下跌了。星期一，股价溃跌再次出现。

星期一登记的亏损是可怕的——钢铁损失了 17.5 点，通用电气跌 47.5点，联合化工跌 36 点，西屋电器公司跌 34.5 点，等等，亏损严重企业的名单有一长串。而整个星期六的下午、晚上和星期天，经纪人们一直在忙着记账，检查客户的账目，寄出追缴保证金通知单，而这又导致了新一轮被迫抛售股票狂潮的到来。惠特尼先生在星期四大量买进以促使领先股票价格稳定的举措，顷刻间便被攻破了，而银行家们也只能战略退出。事

实上，此时经纪人手中满是那些“充满气孔”的股票——换句话说，买进的股票是可以卖出的，但你却不知道何时会有人出价。即使进行了英明的尝试，却也已经是于事无补了。那六位“伟大的”银行家也很难再阻挡住来自整个美国的抛售大潮，此刻，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一点点引导，时不时地到处检查一下。

行情显示器再一次非常滑稽地滞后了，经纪人和银行家的办公室通宵达旦，电报公司发出了上千封催缴保证金的电报以及要求更多的担保来支撑银行贷款。银行家、经纪人、办事员、投递员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一直在迫使自己设法跟上这前所未有的数量惊人的业务，然而此刻，似乎他们也撑不了多久了。但是，最坏的情况——10 月 29 日，星期二，还没到来。

星期二上午 10:00，交易所大厅的铃声几乎还没响起，如同暴风雨般的股价下跌就出现了，数额巨大的股票被抛进市场，不管是能以什么价格卖出。5 000 股、10 000 股一次抛出的交易出现在行情显示器上，价格低得惊人。不仅数不清的散户在抛售，大股东——那些新经济时代的领导者们、几星期前还可以自称是百万富翁的人们，也在抛售。一位炒股专家发现自己被拼命要卖出股票的经纪人一次又一次地重重围住——根本就没有人想到要买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牛市期间怀特缝纫机械公司普通股的价格在 48，到了 10 月 28 日星期一收盘时，它的价格是 11.125。在那个“黑色的”星期二，据谣传，交易所的一个机灵的工作人员有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发出了以 1 美元的价格买进的委托——因为一直没有任何人出价，他实际上以 1 美元一股的价格买进了他的股票！交易所现场一片混乱。尽管交通系统出现拥堵，买卖的委托单——主要是卖出的——还是比人们所能想像的要快。就在那一天，一位筋疲力尽的经纪人在一天交易的最后，发现了一大纸篓需要执行的委托单，他原本仔细地放在那里是为了安全起见——然而他忙得彻底把它给忘了。开盘半小时之内，交易量已经超过了 3 000 000 股；到了中午 12:00，超过了 8 000 000 股；到下午 13:30 时已经突破了 12 000 000 股；而当收盘的铃声结束这一天的疯狂时，一个 16 410 030 股交易量的记录被创下了。虽然在收盘前出现了小幅价格回升，但是到了那时，据《纽约时报》统计的数据显示，50 只领先股已经几乎平均跌了 40 点。与此同时，在其他市场——如外汇交易市场、小型的美国交易所、谷物市场等——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恐慌。





股市的一蹶不振是如此彻底，经纪人和他们的职员以及证券交易所的员工是如此筋疲力尽，以致到了那天中午，当恐慌达到它的顶峰时，股市监管委员会悄悄聚会商议是否有必要关闭股市。理查德·惠特尼几个月后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为了不给令人恐慌的谣言任何机会，这次聚会并没有在监管委员会的会议室召开，而是在证券交易所楼下的股票结算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召开……40 名监管委员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三三两两走进来。他们聚会的办公室原本就不是按照能召开这种大型会议的规模来设计的，因此大多数前来开会的委员被迫站着，或者坐在桌上。会议进行中，楼上交易所传出的尖叫声不绝入耳……一系列习惯性地频频点着一根香烟，吸一两口，摁灭后又重新点一根等等动作，将这些在场的委员们当时的心情暴露无遗。很快，狭小的房间里轻烟缭绕……"两个摩根集团的股东也被邀请出席会议，当他们试图悄悄溜进大楼以免引起谣言时，他们被一个门卫拦在了外面，不得不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有一名委员出来解围。经过一番商议过后，监管委员会的委员们最终一致决定不能关闭股市。

10 月 29 日，星期二，这一天对于银行业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许多公司曾经满心欢喜地将钱通过银行贷给了经纪人以便能获得 8% 或者 9%的利息，现在他们都争相叫嚣着要收回贷款——银行被迫面临着要么自己接过贷款，要么冒险陷入可能最终走向毁灭的两难境地。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银行已经承担着几百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可能有一天这笔钱会跌到只有先前价值的一个尾数。然而，还是有几个银行家大胆涉水，充当起了临时代理人。于是，那天的贷款利息并没有超过 6%，与金钱有关的恐慌并没有加入到股市的恐慌之列，好几个华尔街机构也没有顷刻间破产。据说有一个银行家"不屈地"接过了一笔又一笔贷款，直到他的一个下属脸色苍白地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银行倒闭了。"大概是吧。"银行家心平气和地说道。他知道，如果他的银行不倒闭，许多公司都要倒闭。

第二天，10 月 30 日，星期三，老天保佑，股市突然转晴了。钢铁公司的总裁宣布增发额外红利；美国制罐公司不仅宣布增发额外红利，而且提高正常股息。紧接着又是一片让股民们安心的言论——尽管这时候股民们对金融家们语气轻松的话语也开始起疑心了。朱利叶斯·克莱因(Julius Klein)，这位胡佛总统的商务部长助理为大家描绘了一幅继续繁荣的"狂想曲"；约翰·J. 拉斯科布宣称股价此刻对股民们最有利，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在买进股票。约翰·D. 洛克菲勒将标准石油公司推出水面："我们

要相信我们国家的基本形势是很好的，上周股市出现的价格下跌并没有什么正当理由，我和我儿子就一直在买我们看好的普通股。"更让人欣慰的是，股价在上升——稳步地上升。现在人们因股市暴跌而绷紧了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预料不到的警报了。下午13:40，副总裁惠特尼宣布股市将休息一天，到第二天中午开盘，而星期五、星期六两天闭市——令他大松一口气的是，他的宣布受到的是欢迎，是欢呼，而不是新一轮的恐慌。

整个星期四只有半天的开盘时间，但股价还在恢复中。显示器上股价在不停地疯狂滚动——既然所有曾经建立的价值标准都已被打破，谁又能对一只股票的价值作出合理的判断呢？但是，这股暴风雨势力最强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了。金融委员会可以更自如地呼吸了，现在他们有时间来整理内务了。

恐慌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确实已经过去了，但是此刻出现的并不是股市最低的价格，因为随后还有太多因经纪人清算账户而被迫做出的忍痛抛售。随着银行不断要求更多的抵押，恐惧又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头。第二周，在一系列短期交易过后，股价再次下跌，直到最终的11月13日，出现了1929年全年的最低价。与9月份大牛市的股价相比，它们惨不忍睹。





| | 1929年9月3日最高价 | 1929年11月13日最低价 |
|---|---|---|
| 美国制罐公司 | 181.875 | 86 |
|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 304 | 197.25 |
| 亚纳康达铜业公司 | 131.5 | 70 |
| 通用电气公司 | 396.25 | 168.125 |
| 通用汽车公司 | 72.75 | 36 |
|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 | 137.875 | 49.25 |
|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 256.375 | 160 |
| 美国无线电公司 | 101 | 28 |
| 联合碳化物公司 | 137.875 | 59 |
| 美国钢铁公司 | 261.75 | 150 |
| 西屋电器公司 | 289.875 | 102.625 |
| 沃尔沃思公司 | 100.375 | 52.25 |
| 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 | 186.75 | 50.25 |

据《纽约时报》统计，50只领先股的价格平均几乎跌了一半，从9月的311.90跌到了11月13日的164.43；而25家领先企业发行的股票股价平均跌幅更大，从469.49暴跌至220.95。

大牛市完了。价值十几亿美元的利润——还有账面利润——消失殆尽了。杂货店老板、清洁工、女裁缝等人全都血本无归。每一座城市里都有一些家庭从昔日的显赫富贵落到了负债累累的境地。曾经梦想着依靠投资挣来的钱安度晚年的投资人发现，他们又回到了漫长的致富道路的起点，而每天的报纸上都会刊登有人自杀的残酷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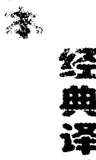
虽然“柯立芝—胡佛繁荣”还没有结束，但也行将暮年。在股市恐慌的冲击之下，许许多多先前未被注意的或者被对大牛市乐观预测转移了的病态开始困扰着整个经济主体，这就像当一个关键的身体器官不能正常工作时，病毒就会侵入整个身体系统一样。尽管由经纪人贷出的近 30 亿美元的股票抛售已经使信用紧缩，美联储也降低了再贴现率，这个国家的大银行和大公司也没有遭受重创，平安度过大危机的举措也令人深受鼓舞，然而，病毒已经侵入了：资本生产过剩；企业扩张野心过剩；分期付款和股市利润刺激的商品生产过剩；许多商品价格虚高；欧洲贸易的全面萧条状况；等等。无论有多少高级金融预言家会宣称市场形势将会好转，无论总统先生是多么诚挚地想要通过安慰的话语和白宫会议商谈来弥补损失，一次大规模的萧条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仅如此，繁荣绝不仅是经济领域的状态，它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大牛市也不仅是商业周期的顶峰，它也是美国大众思维和大众情绪新一轮波动的顶峰。现在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人的生活态度丝毫没有受到大牛市的影响，或丝毫没有受到希望突然破灭的震撼。随着大牛市的远去以及繁荣的渐渐消逝，美国人很快便发现自己生活的世界已经变了，他们需要寻找新的适应、新的观念、新的思维习惯，以及新的价值秩序。心理气候已经发生了改变，美国人奔涌向前的生活潮流正转入新的轨道。

战后十年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 第十四章　1930～1931年:余波

## 一







让这个国家接受"柯立芝—胡佛繁荣"崩溃的事实并不需要多长时间，也没有遭到任何人不满的反抗。这一口苦酒必须要吞下，而对共和党来说尤其苦涩，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经济周期是独立于政治策略之外的，却一直在说服自己繁荣是共和党的一项政绩；这一口苦酒对赫伯特·胡佛来说是最苦的，因为他曾经信誓旦旦要彻底消除贫穷。

当股市在1929年10月和11月陷入尼亚加拉瀑布的激流中时，国民生产的衰退突破了警戒线，国人们纷纷等待总统的举措。必须要立即采取措施来恢复公众的信心，阻止衰退向更多领域蔓延。胡佛先生已经不是引导公众舆论的新手了，他是学商业出身的，是国家的最高组织者，因此，无论他个人在与政客周旋以及在解决纯政治性问题方面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国人们都觉得，在出现这类重大的突发性紧急情况时，即便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他也会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

总统确实立即采取了行动：他承诺减少税收；他召集工商业领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表达了政府不赞成降低工资的立场；他建议兴建公共建设工程，以解决即将出现的就业萧条。总统和他的官员们开始坚定地重整工

商业领域中那摇摇欲坠的士气，他们宣称一切发展有序，并且在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他们宣称"经济形势"——那些天一直被重复的、很耐用的一个词——"从根本上来看很健康"。"我相信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已经重新建立了信心。"总统在他 12 月的年度咨文中说道。1930 年一开始，梅隆部长就预测"各项活动都会在春季复苏"。商务部长拉蒙特在 2 月时说道："经济形势没有什么扰乱人心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将会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到了 3 月，拉蒙特先生的预测更具体了：他预计商业会在两个月内恢复正常。几天后，总统本人也为政府承诺的经济恢复定下了日期：60 天内失业状况就将结束。3 月 16 日，那个不知疲倦、总在为胡佛总统的乐观言论"摇旗呐喊"的新国家商务调查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 · H. 巴恩斯(Julius H. Barnes)说起这段困难时期，就好像那已经是一件早就过去的事情："1930 年春天标志着一段事态严重局面的结束……美国商业正稳步恢复到繁荣的正常轨道。"

乍一看，美国政府似乎不仅成功地阻止了随即可能出现的大幅工资缩减，而且通过应用库埃博士的方案恢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在 1929 年底经济跌至低谷并将 300 万失业人员抛向街头之后，工业指数显示出了可测量的上升。股市正平心静气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前进，普通股仍具有诱惑力，那些没有在大恐慌中倾家荡产的投资人又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捞一缕"那只曾咬过他的狗的狗毛"。在 1930 年的前三个月，出现了多少与大牛市似曾相识的一个小牛市，交易量变得与 1929 年的那个黄金之夏相仿，一些领先股的价格实际上已经恢复到它们在大崩盘中跌落价格的一半位置了。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好像华盛顿的那些信誓旦旦的预言家们是对的，繁荣再次恢复，它似乎正在逐渐取得有利地位，以弥补 1929 年的惨痛损失。

但是到了 4 月，这阵短暂的幻觉开始被惊醒，很快就破灭了。国民生产的衰退反应再次显现，到了总统先生和他的商务部部长限定的 60 天期限时，商品的价格在下跌，生产指数在下跌，股市又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痛苦的猛跌。希望的被延期令美国人沮丧不已，库埃博士的方案也不奏效了，因为经济上的疾病绝不像一次短暂的神经衰弱那么简单，他是器质性的、根深蒂固的顽疾。

华盛顿的"医生们"面容冷峻，却依然保留着惯有的微笑，同时继续背诵着他们从经济学专著上学到的知识，他们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了他

们的治疗，不可能会因中途“更改处方”而丝毫不感到尴尬。5月初，胡佛总统说他相信“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在继续的一致努力之下，我们将会迅速恢复”。5月8日，美联储主席承认，国家正处于“似乎是商业萧条期”（“似乎是”——工厂倒闭，股价急剧下滑，领救济的人在大街上排着长队！），但是这队伍太长了，在华盛顿似乎没有人愿意来亲眼看看这严酷的现实。5月28日，据报道，胡佛先生预测国民生产到了秋天便会恢复正常。闹剧还在继续，“医生们”对病人们说着安慰的话语，病人们便每天越陷越深——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似乎每一次乐观的预测总伴随着新一轮的崩溃。只有当诊治失败已经明显到了令“医生们”羞愧的地步，官方才会转入暂时的沉默。

国民生产到底患上了什么样的经济疾病？在此我们可以分类列出一些病因。

1. 资本和商品的生产过剩。19世纪时，工业已经变得更加机械化，因而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1928年和1929年股市牛气冲天的时候，分期付款和股市利润在当时都增加了美国人的购买力。无数的公司都满心喜悦地扩大规模，紧随着工业资本扩大化的是银行信用的扩张。但是，当股市利润消失、分期付款的新买主很难再找到时，尤其是人们在为怎样才能为他们的汽车、收音机或者家具付清下一期欠款发愁时，各个厂商只得被迫一边等待购买力的恢复，一边不得不在产量减少就毫无利润的前提之下，让他们那规模已经扩大了的、生产能力很高的工厂继续生产。

2. 人为的商品价格。整个1929年，正如戴维·佛莱德(David Friday)所指出的，许多商品的价格都由于联营而一直保持在很高的价位。举例来说，铜业和棉业生产联营；在加拿大有一个小麦联营；在巴西有一个咖啡生产联营；古巴有一个糖业联营；澳大利亚有一个羊毛行业联营。联营导致的这些人为保持的高价又促使了生产过剩，而这种过剩隐瞒得越久就越危险。生产这些商品的公司发行的股票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消费极不成比例地集聚着；最终，当联营也无法再支撑股市价格时，当最终结算的日子不可避免地到来时，这些商品的价格便会一落千丈。

3. 银价崩溃，部分地是由于几个大国政府只认可以黄金为基础的交易——“金本位”的结果导致了东方各国购买能力的瘫痪。

4. 由于黄金被大量转移到了法国，只有少部分到了美国，这导致了国

际金融紊乱。

5. 外国的动乱。随着国际萧条局面的深化，战争导致的政治和经济混乱变得越来越明显，1914 年至 1918 年的“母鸡”重返家园时已经变成了“公鸡”。世界各地的革命和革命威胁增添了众人的不安与恐惧，也危及了美国在海外的投资。

6. 大萧条自生的后果。每一次破产，每一次暂停付款，每一次营业进度的缩减都会影响其他企业，直到几乎整个商业世界都是十柱保龄球戏中的柱子，在它们倒下的同时也撞倒了别的柱子。而每一个被迫失业的员工都缩减了国家的潜在购买力。

最后，还有——

7. 1929 年繁荣的深层心理反应。从根本上来说，也许商业周期是一种心理现象。只有当对艰难时刻的记忆已经模糊时，信心才能彻底地重新建立；只有当信心已经过度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它才会被阻止。对于胡佛先生来说，想要阻止此刻“心理钟摆”向下摆动的难度是和当年美联储设法阻止它往上摆动的困难是一样大的。

胡佛的种种乐观预测落空后发生的事件令人不忍再读。商品价格跌至令人震惊的水平。以小麦的销售为例，在 1929 年末，芝加哥的冬小麦卖到了 1.35 美元，而一年后的售价只有 76 美分。春小麦的价格在此期间也从 1.37 美元跌到了 61 美分。雷格先生受命主持联邦农业局，要承担起“阻止并控制任何农产品的生产过剩”的重任。他意识到这次价格骤跌可能会给整个小麦产区带来惨痛损失，于是，联邦农业局试图通过在最不景气的时候买进小麦来稳定小麦价格。然而，他们只是成功地积聚了过剩的小麦，因为他们的措施与比《农产品销售法案》颁布更早就存在的一条规律相冲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规律。尘埃落定之后，联邦农业局手上已经拥有了 200 000 000 蒲式耳的小麦，然而小麦的价格还是一落千丈。尽管雷格先生的继任者宣称，他们的购买行为已经使几百家将钱贷给小麦产业的银行免遭破产的命运，但这并不能减轻已经痛苦不堪的农民们的沉重负担。1930 年夏天的严重干旱加重了许多地区的萧条，农业人口似乎再一次被恶毒的咒语所笼罩。柯立芝繁荣原本就没给他们带来多大实惠，现在，他们成了 1930～1931 年期间那场噩梦的受害者中损失最大的人群。

与此同时，工业生产也在逐步下滑。到了 1930 年年末，国民生产已经下跌到了正常水平 28%以下的位置。股市价格在 1930 年夏天的小幅回升

之后，到 9 月份时再一次急转直下，而随着 12 月的到来，漫长的、一系列清算的“震颤”已经使股价远远落到了去年大恐慌过后的价格水平。唉！这可怜的大牛市！无线电的普通股在 1928 年和 1929 年时曾攀升至如此令人眩晕的高价，现在却折回到了不到三年前它刚开始股市之旅时的价格；其他的许多股票的“返程”之旅甚至更漫长、更无序。经纪人贷款数额的锐减令人不悦地表明了营业账户的终止，经纪人在人们的眼里已经不再具有神奇的魔力。多处经纪人的办公室混乱不堪，在快乐的大牛市期间成立的那些缺乏保障的投资公司都倒闭了，这些“流氓集团”可悲的致富愿望已经成了黄粱美梦。由于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价格下跌，1930 年有 1 000 多家银行破产。12 月份时发生了美国金融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那个声名狼藉的位于纽约的美国银行倒闭了。失业率急剧上升，到了 1930 年年底，据某个机构统计，失业人数已经有大约 600 万；卖苹果的小摊摆满了大街小巷，行政人员、办事员和工厂工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被扔向街头，他们纷纷为救助失业者的各项基金慷慨解囊；因为查理·卓别林将在电影《城市之光》里出演角色，一家剧院门外排着长长的买票的队伍，一个在百老汇大街闲逛的流浪汉看到了，上前关切地问道：“在排什么队——领救济还是银行要破产？”

1931 年年初出现了一丝好转的迹象，一直不景气的股市也有了一线生机。但是到了 3 月，这丝黎明的曙光似乎又转瞬即逝了，整个春季的几个月里股价一直在下跌。生产继续衰退，商品价格下跌，股市价格跌到了比 1929 年大恐慌时的价格水平还要矮一大截的位置。随着股息的下调甚至开始被忽略，破产接二连三地发生，人们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难道永远都没有到达最低谷的时候吗？

1929 年“玫瑰”般的繁荣印象似乎还没有完全褪去，此时又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持有大公司普通股的股民数字在 1930 年增加了。投资者们固执地期待着股市时来运转的那一天，他们希望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他们就在股市现场。然而股价一路下跌，似乎永无尽头，所有这一切折磨着他们可怜的神经。由“晚间世界”公司安排的在 1930 年 12 月纽约各大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写道：“有太多的人，从生意人到劳动者，都迫切地想听听那些道听途说的胡言乱语和不怀好意的流言蜚语，这些传言会摧毁人们的信心，制造出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氛围。现在这种莫名其妙恐惧的受害人已经遍布大街小巷和整个股市，它是对我们社会的一种威胁……许

多人深受群众心理的蛊惑，然而，也正是群众心理导致了普遍大恐慌的出现。”



“群众心理！”在大牛市时期也是因为群众心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全幅流程图画面终于完整了。

两年前，当胡佛先生在谈到贫穷问题时，他非常谨慎地加上一句“如果上帝保佑”。现在在他看来，似乎上帝有意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极具讽刺意味的玩笑，就像当年在比利时被入侵的问题上一样，胡佛先生很难为自己从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生产大萧条状况中开脱。然而，他曾经因为对比利时人的救济而声名大振，现在他要被点名来解救美国人民了，以便来弥补他曾那么轻松地谈到消除贫穷问题，这已经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胡佛先生是个能干的经济学家，在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他是一位能带领人民的英明领袖，然而，他的促使国民生产走出萧条的种种尝试却遭遇了明显的失败。其他一些经验丰富的商业人士也曾经和胡佛先生一样，不相信这种生产低迷、物价低廉的不景气状况会持续太久，处理起来会太棘手，但是当国民生产确实一步步走向深渊时，这些商业人士显然忘记了自己从前也是很乐观的，却和许多其他人一起指责总统缺乏远见，没有领导才能，甚至缺乏基本的常识。这些商业人士并没有使人们对他们的言论过耳不忘，但是人们忘不了总统的言论；这些商业人士并没有肩负起人们振兴经济恢复繁荣的期待，但是人们对总统的这种期待始终存在。到了1931年春天，总统的声望已经随着物价和股市利润一起跌落至一个新的最低水平，民主党人则向1932年投去了期待的眼神，他们已经开始为将在这年11月的大选中明显获胜而欢呼了。目睹了胡佛总统的困境之后，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从他在北安普敦的安全避难所通过报纸和杂志每天在各家刊物上发表约200字左右的短文，内容混杂着理性的判断与虚伪的吹捧，他一定曾经感谢上帝没有让他选择在1928年参加总统竞选；而史密斯州长也一定觉得，他自己就像是刚刚跳下那列直冲向已经断开的吊桥尽头的火车。毫无疑问，这届政府关于消除贫穷的乐观言论是过于热切了，但是胡佛先生最大的不幸在于他不应该就任1928～1932年的这一届总统。

事情的真相是，自大牛市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绝不仅仅是一次股市价格的循环往复和生产的下跌，它是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即便是在情况最糟的时候也还是有令人鼓舞的迹象存在。举例来说，资本和劳动力之

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对抗，虽然银行已经摇摇欲坠，但是联邦储备体系却依然有能力阻止货币恐慌。毋庸置疑，繁荣一定会最终以汪洋之势重返这片土地，但是，彼时的繁荣是不可能与20世纪20年代相提并论了：它将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不同的基础，垂青于不同的行业，从而激起不同形式的热情与歇斯底里。大恐慌已经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历史写下了最后的篇章。

## 二

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到来，整个国家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改变，有一些是在大恐慌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还有一些是在恐慌过后才逐步显示出来的。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则反映了美国人性情和生活方式的显著改变。

实际上，你只要走进任何一座美国城市的街区或者乡村地区，就都会注意到这些改变。以妇女们衣着的变化为例：裙子的长度随着股价的下跌而下降了；白天工作的套装比以往长了一些，虽然只是短短的几英寸；晚装简直拖曳到了地板。长及膝盖的裙子的拥护者们对长裙子的抗议声不绝于耳，但是最终获胜的还是新款式。短头发越来越不流行了，褶皱饰物、蓬松头发、荷叶边又流行了起来，胸衣制造商又开始微笑了。讲究礼仪的社交标准又逐渐回来了：出席听证会人士戴着长长的白手套、头戴丝质礼帽、身着燕尾服。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生产厂商和设计师们一时的奇思妙想所致。生产厂商和设计师们可能会发布流行趋势，但是只有当公众们愿意追随，时尚才能得以流行。早在20世纪20年代时，服装行业不是也试图让长裙流行吗？然而却无人响应。1930年和1931年的长裙、褶皱饰物和白手套其实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微妙变化的外在表现。美国妇女们的最大抱负已经不再是设法找一个胸部扁平、两腿细长、虽然已经懂事却依然穿着长及腰部童装的缺乏责任感的青年人。狂热的孩童型男士已经落伍了。1930年和1931年的时尚广告中为我们描绘的是一种新时尚：更加优雅、更加活泼、更加诱人，礼帽和浪漫开始在可能的范围内大行其道。

这些时尚与流行所揭示的当时社会状况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其他证据得到证实。习惯与道德的革命至少已经进入休战状态。

也并不是20世纪20年代被抛弃的那些老传统又全部都回来了。现在那些“年轻一代”中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人们竭力所争取到的各种自由并没有失去，我们也很难发现这些自由的用途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渐行远去的是，人们看到了各种禁忌的被打破、道德的被改变或者泯灭，以及整个社会行为模式的变迁。违背习俗的代价一直被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而在这些远去的变化中，在某种程度上至少还能看出，人们对性问题的近乎发狂的关注，这也是战后十年的一个特点。有关性的书籍和对话也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1930年末，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在《纽约客》上的戏剧专栏中表达了他自己的、也是得到普遍认可的看法：“我在此郑重地宣布：性，作为一种戏剧性质，就像那些陈旧的抵押那么令人讨厌，我再也不想听到它被提起了……我讨厌叛逆的青年，我也讨厌维多利亚式的父母，我不关心是不是美国所有地方的小女孩都被毁了，或者想要被毁了，或者设法不要被毁了。我只要求：不要写有关性的戏剧，我也不会耐着性子看完。”

很显然，许多剧作家和读者都开始和本奇利先生对此怀有同感。乔治·简·纳森(George Jean Nathan)注意到一批新的充满了浪漫情怀和诗意的剧作家们来到了百老汇，因此他认为“过了头的戏剧和文学作品……显然都逐渐衰落了”。亨利·塞德·坎比(Henry Seidel Canby)在为《星期六文学论坛》写稿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沉默寡言与深沉含蓄等美德已经从被放逐地返回了。确实，作为一部设法表现战争真实性的、并没有大量介绍亵渎与妓女的影片，《旅途终点》即便是在战后十年期间放映的，却大受欢迎，人们看完后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旅途终点》与《光荣何价?》的鲜明对比就足以反映大众口味的改变。而像《好伙伴》、《天使街》和《流泪的吉普赛人》这些小说的成功也许可以进一步证实这种改变。虽然这种变化趋势也有足够的例外来提醒人们，只是简单的、普通层面上的变化显然也是危险的，但是至少有两个结论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性不再是报刊的头版消息，优雅又开始盛行。

同样，人们并不能断言那些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或者19世纪90年代风格的方方面面都一定会遭到“现代人”的耻笑。收藏家在审视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时已经少了很多以往的轻蔑；对战前习俗心驰神往的人们在读过《紫红色的十年》和那些揭露真相的自传后，发现自己渴望能解读几年前威廉·吉尔特扮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以及19世

纪90年代的那首《甜蜜的阿德琳》里的伤感。

或许，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年轻人与比他们年长一些的20年代中期的人们相比，对生活的了解并不见得少，但是，他们却不太张扬、也不太有意要向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多么先进。拉马尔·沃里克(Lamar Warrick)是一所中西部综合性大学的教师，她在1930年秋天的《哈珀斯》上写道：阿道斯·赫胥黎的生物小说，约翰·B.沃特森(John B. Watson)的生物心理学，还有伯特兰·罗素的生物哲学都在她班上的学生们中"迅速地变得……过时了"。她发觉新的年轻一代已经厌倦了一名学生所谓的"会让你在30岁时就遭淘汰而变得玩世不恭的现代主义"。《德蒙市星期天登记报》的一名职业记者为了求证沃里克夫人的观点，对艾奥瓦州三所大学的教授和本科生们进行了访谈，与他交谈过的绝大多数人都告诉他，沃里克夫人所说的不仅在伊利诺伊州存在，艾奥瓦州也是如此。一名年轻的艾奥瓦州的大学生评论说，在他们的大学，现在没有哪一个单身的"时髦女郎"再与"5年前的那些穿着豹皮上衣，开着价格不菲的跑车，总是惹是生非的女孩"相像了。惹是生非实际上主要是由于易激动的人类天性，这次辛苦的求证至少能表明，炫耀卖弄的惹是生非已经不再像轻佻之风盛行时候那样，能使人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了。



知识分子的抗议已经声嘶力竭了。H. L.门肯的声音已经不再能从一个州的城市、从好莱坞传播到全国其他地方；而原本一直谴责乔治·F.巴比特和标准化危险的人们也有一些疲倦；许多曾经狂妄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冷静思考：生活是否就像他们曾预料的那样是一场可怕的闹剧。虚无主义的哲学和文学主题几乎已经演绎完，甚至连海明威，这位曾在1926年前后前往蒙帕那斯(巴黎的一个区。——译者注)的、被年轻的流浪者们一致拥戴为一切虚无主义的预言大师，此刻也做出了一个新的暗示，而且差不多是一个浪漫的暗示，在他发表于1929年末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描写的并不是一系列浅薄的、短暂的激情故事，而是很有价值的、伟大的爱。但是克鲁奇先生却对这些价值观的未来深表绝望。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1年宣称，克鲁奇先生应该意识到文明只不过是刚刚被褪去了一层死皮，并不会瓦解；芒福德先生还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宣布："失败的情绪已经死亡。我们还没有放下我们的旗帜，因为，就像惠特曼的'小上尉'那样，我们还能齐声说'我们还没开始战斗呢'。"在这里再一次表明了只有简单的、普通层面上的变化显然是危险的，然而，人





们不禁要怀疑，是否这些知识分子中会有一个代表来谈谈发生在 1925 年的打斗事件，并且依然觉得他能代表他的那些前卫的同伴们的看法。1925 年流行的时尚并不是好斗，只不过是优雅的沉默姿态已经被击溃了。现在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的幻灭情绪已经过去了，那件因无望而放弃的“外衣”的肘部已经有一点儿磨破了。

宗教是否正在恢复它那往日的威望？这很难说。1930 年，美国所有教堂的会费净利润仅仅有 1.1%多一点——自 1890 年 H. K. 卡罗尔(H. K. Carroll)博士开始他的年度汇编以来最少的净利润。但是，至少信教场景已经变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已经厌倦了他们的争斗；德顿小镇的审判案已经被人们丢在了历史的故堆里；科学的声音似乎不再能大到可以很权威地否认宇宙中精神价值的存在。当艾廷顿和吉恩斯的追随者们得出在貌似严密的科学唯物主义体系中也有一个裂痕的结论时，新教派牧师立即阐释道：这个裂痕大得足以作为上帝的容身之地！他们的声明并没遭到以前那样来势汹汹的反驳，这也许是因为新科技哲学体系太难懂，并且他们之间的争论持续了这么多年，早已令人疲惫的缘故吧。曾几何时，心理学的声音是那么震耳欲聋、令人迷惑，然而现在它也已经是权威扫地。很显然，不管是弗洛伊德还是沃特森，对于有关人性的所有问题，他们都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而心理学家们之间也不见得比民主党内人士团结到哪儿去。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被 30 年代逐渐取代，那些一直在观察各个宗教学院宗教生活的人们在怀疑，是否不可知论者的人数在减少？然而，他们发现的却是人们态度的普遍改变：已经很少有年轻的男男女女会对任何宗教或者所有宗教都充满敌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广泛、更一般性的愿望，即便是在那些怀疑者当中，他们也都希望能找到某种根据，从而能积极地、成功地阐释生活。上述对于各个宗教学院的认识大概是正确的，也是能在全国范围内行得通的。各个教堂也很难作出什么合理的解释，然而，或许这正是宗教没有消灭的原因所在，就像是在习惯和道德的改革过程中，基于不同基础之上的宗教显示出了稳定局势的功效，不管这种稳定是否只是暂时存在，但它恰恰被人们看到了。

普通的美国大众对于流行的消遣方式依然像以前一样满心怀疑。自 1929 年那个大恐慌的秋天开始，每天晚上 7 点，几百万台收音机又开始在千家万户响起，传出的是弗里曼·F. 戈斯登(Freeman F. Gosden) 和查尔斯·J. 科雷尔(Charles J. Correll)的声音。为大家更为了解的是《阿莫斯

和安迪》(美国家庭喜剧。——译者注):"我烦透了"与"核对,再核对一下"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谈话中的常用语,《安迪与餐厅》和《奎恩女士的烦恼》在广大听众心里的重要位置变得仅次于股市的行情。1930 年 9 月,商务部发现,至少有一个绝对繁荣的商业统计数据是值得宣布的:已经有几乎30 000个小型的高尔夫球场在使用,它所代表的是一笔 125 000 000 美元的投资,许多球场一个月的盈利高达 300%。如果说 1930 年的那个夏天人们其余什么东西都没有购买,他们至少购买了能将一只高尔夫球击过一个碾碎的棉籽平面上空、最终看它落入一个锡质管口的权利。

此外,那些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大肆吹嘘、盛极一时的"崇高艺术"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头。拜德上将当年的南极飞行探险使得他在所有美国人眼里成为仅次于林德伯格的英雄,但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种事情已经有一点乏味了,也许是因为宣传过度吧。当看到经过统一规划并且是由各大报刊联合安排的、每日一期发表的吹嘘文章,"英雄主义"本身无论是多么豪迈,也会多多少少失去它自然的魅力。就在拜德抵达南极几个月之后,考斯特(Coste)和贝龙特(Bellonte)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横跨大西洋的往西不间断飞行。然而到 1930 年末时,能够认得出考斯特和贝龙特的美国人比知道老贝比·卢斯的可能更少,曾经广为流行的英雄主义到了这一天已经变得非常平常。耐力飞行员仍然日复一日地在空中盘旋,企图创造新记录,但是他们发现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少,作为头条新闻来报道的收益以及所挣得的现金数量也越来越不惊人。至于希普雷克·凯利,这位在20 世纪 20 年代"坐旗杆"的第一人,据报道在 1930 年从百乐门大厦的楼顶纵身跳下,因为似乎没有人再关注他了。泳装选美大赛?也有故事可以讲,亚特兰大市停办了 1927 年以来的年度选美大赛。在整个 1930 年,没有一起能引起全国人兴趣的一级谋杀审判,没有一场一级的职业拳击赛,也没有一次伟大的新体育赛事好让英雄有加冕的机会。



确实,一个全民热衷运动的时代已经远去了。曾经知道如何鼓动大批观众花费总数达 2 500 000 美元来观看两个重量级拳击手比赛的里卡德已经去世。拳击也已经再次被蒙上阴暗的坏名声。登普西已经退休在家。滕尼在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卢斯还在苦练他的本垒打,而琼斯和梯尔登都成为了职业选手。纳特·洛克尼(Knute Rockne),20 世纪 20 年代最伟大的美式足球教练,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美国总统曾代表官方表示惋惜。随着格鲁佛瓦伦成为沃纳梅克百货公司的货源通道,一直吹嘘自己为百货

起源地的纽约市，也失去了曾经吸引各路英雄前往的"西半球奢华之地"的称号。类似于行情显示器读数纸条或百老汇下层电话号码簿被撕得粉碎的事件在 1930 年已经很少发生了。也许那个艰难时代应该为英雄壮举的减少而负责，但是，其中原因远不像今天看起来这么简单，大肆宣传的伎俩对于年轻人已经不再新鲜。时代已经改变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公众对待政治以及任何与政治相关事件的冷淡态度很显然一直没有丝毫改变。然而，1929 年秋天，当拉姆齐・麦克唐纳到美国充当和平信使、共同回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说教时，他受到了令人惊讶的热情接待。这在当时看来，似乎理想主义即将再次回归，就像在人们对自鸣得意已经习以为常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一样。这种情绪持续的时间非常之长，足以让解决海军军备尚有缺陷的新《伦敦协定》在参议院被顺利通过，为胡佛总统和斯廷森部长脸上增光不少。然而，在其他方面，玩世不恭和绝望言论依然盛行。芝加哥揪出了臭名昭著的汤普森，纽约市发生的坦慕尼丑闻都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恨。但是，随着 1931 年夏天的临近，大众的普遍态度似乎依然是一副"想办法又能有什么用?"的模样。然而，敲诈勒索的人却仍然像耐寒的野草一样，一有机会便繁荣茂盛；酿私酒的、走私酒的，还有禁酒法令问题，都是如此。

但是，如果美国人对政治和政治家们的期待还是像以前那么少，对帮派所起的作用仍然忍气吞声的话，至少，他们会对比柯立芝时期更加放任的国民生产政策多少有些不满。公众们对 1930～1931 年期间萧条的态度与以前的各次萧条中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肥皂盒上印的激进分子远没有巨大的红色恐惧时期那么令人恐怖，社会主义言论的宣传令人吃惊地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总体来看，它们几乎没有引起人们多少关注。也许，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大工厂主在应对这次危机时充满了深谋远虑，他们尽可能维持原来的工资水平，缩减工时而不是把工人一脚踢到街头；另一方面，在大牛市期间，无数潜在的激进分子自己也在股市中接受了保守的金融教育。因此，很自然地，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个人的资本主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必须要纠正——否则的话，现存的经济制度怎会将好几百万美国家庭拖入饥饿与贫困的泥潭呢?

现在人们对苏联的改革又重新感兴趣了，尽管其中混杂着很明确的恐惧。莫里斯・辛杜斯(Maurice Hindus)的《被拔除的人性》，在大恐慌的那个月出版，起初卖得很慢，却在 1930 年那个阴暗的秋天成为最畅销的书。

1929年夏天时，美国人对苏联还比较陌生；1931年，随着街上排队领救济的队伍越来越长，苏联的“五年计划”正成为焦虑不堪的美国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工业瘫痪持续的时间越久——看看它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人们的愿望就越迫切。美国人民急需一些适合美国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措施，或许这样才能避免这种灾难的再次发生；不能再将过度的权力移交给一个不能胜任的或者贪污的官僚机构了。

如果全面的繁荣能够很快恢复，这种要求自然也就不那么强烈。然而，这股不可避免的、曾在狂妄自大盛行的20世纪20年代被中断的、一直奔向集体主义的缓慢趋势，有可能会再次“跌跌撞撞”地卷土重来。尽管美国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或者任何预示着国家社会主义的趋势有着明显的厌恶，毫无疑问，事实已经证明，经济制度太复杂了，机器生产太强大了，不可能再继续不加任何约束地放任自流。或许，当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些人或者集团，他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可以了解何时应该勒紧马缰绳，并且也能有足够的说服力继续保持他们的控制地位。过去几年的经验已经表明，金融家或者经济学家们不太能令人信服地诊断出国家经济状况的病因，情绪激动的公众对他们“治疗”的反馈也是普遍地不信任。然而，这个在柯立芝繁荣的鼎盛期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却依然存在。1931年，人们艰难度日，月复一月，没有任何国民生产开始复兴的迹象，对于全体美国人来说，其他任何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似乎都不及眼前这个难题的一半。

## 三

许多变化的特定含义都是不确定的，或许其中的一些变化还是错觉。然而，1931年的美国已经远非战后十年时的那种状况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旧秩序正在给新秩序让位！

不久以后，历史距离感的薄雾就会淡化20世纪20年代的轮廓，人们在翻开这样的一些书时，会对那些有趣而疯狂的日子里的种种内容一笑置之：一台收音机就是一件令人激动不已的新鲜东西；女孩们留着马尾辫，穿着长及膝盖的裙子；一次跨大西洋飞行会让人一夜之间变成神；买普通股就会把大家都带入物质丰富的乌托邦，等等。或许到那时，他们已经忘记

了战后曾发生的希望破灭，那个无情年代里的痛苦觉醒，在此期间发生的石油丑闻，人们的精神瘫痪和刺耳的寻欢作乐声。他们只会谈论那些美好的昔日时光……

20世纪30年代等待人们的又将会是什么？

只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历史绝不会重演。时间的河流在前行的途中经常会有急转，但是，她总会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渠道。

# 附录:材料来源与致谢

我要由衷地感谢一些作家,我在写这本书时大量引用了他们作品中的内容。首先,我在第五章和其他许多章节中频繁引用到了《中心镇》收集的描述精确、内容丰富的资料。罗伯特·S. 林德(Robert S. Lynd)和海伦·梅瑞尔·林德(Helen Merrell Lynd)夫妇合编了这本关于一座美国城市的伟大的社会学论著,我想,任何一位尽责的历史学家在谈到战后十年时都无法忽略这个宝贵的资料库。查尔斯·A.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和玛丽·R. 比尔德(Mary R. Beard)合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中的最后几章,为我全书的写作尤其是有关华盛顿会议以及促成会议召开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威廉·艾伦·怀特的《伍德罗·威尔逊传记》以及他在《虚伪的面具》中对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的深入描述为我提供了许多细节材料,他对这三位总统的分析见解独特,对我尤其具有借鉴价值。书中有关禁酒法令的一些细节和结论,都是引自查尔斯·梅尔兹的《禁酒十年》,一本非常客观地对禁酒期间前十年的记录;此外,我还引用了梅尔兹的其他著作资料,如《福特来了》和《美国大流行》。最后要提到的是,这本书中的大量数据是引自《世界年鉴》、《纽约时报索引》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纽约时报》档案。像这样一本书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引述当时的报纸和杂志资料,而这些报刊资料是无价的,因为它们不仅如实记录下了当时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而且它们的广告栏、图像资料都可以让我从中了解当时的流行趋势、思想观念以及整个社会氛围。





第一章和第四章有关收音机广播开始流行的记录，部分地引自于西屋电器公司的副总裁 H. P. 戴维斯(H. P. Davis)于 1928 年 4 月 21 日在哈佛商学院所做的一个演讲。

在准备第二章“回复常态”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瑞・斯坦纳德・贝克的《伍德罗・威尔逊和世界局势》对我尤其具有价值，因为该书对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中的作用作了详尽的描述。当然，我将贝克先生的发现与豪斯上校、兰辛国务卿以及其他人的材料进行了综合对照。洛奇写给亨利・怀特的秘密信笺在艾伦・内文(Allan Nevin)为怀特所写的传记中被披露。对伍德罗・威尔逊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的记录是源自于我于 1923 年 11 月对他所做的一次私人拜访。

第三章“巨大的红色恐惧”中的许多事实都是根据帕尔默夫妇搜集到的由扎克丽亚・恰费创作的《言论自由》而写的。哈斯廷议员所宣布的内容引自 1919 年煤矿大罢工时《新共和》的封面。有关超级爱国者的许多内容是取自于 1924 年西德尼・霍华德(Sidney Howard)在《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芝加哥大暴动是根据对查尔斯・S. 约翰逊(Charles S. Johnson)的《芝加哥的黑人们》所收录的一些材料仔细研究而写成的。“华尔街大爆炸”中的许多事实是基于西德尼・萨瑟兰(Sidney Sutherland)发表于 1930 年 4 月 26 日《自由》上的一篇文章。

第四章“美国的复原”中有关萨科—万泽蒂审判案的内容大多源自于《纽约世界》当时的一系列新闻报道。

第五章“习惯与道德的革命”，如前所述，大量引用了《中心镇》、保罗・H. 耐斯特姆教授的《时尚经济学》、沃尔特・里普曼的《道德序论》和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现代趋势》。

在写第六章“哈定与丑闻”时，如前所述，我大量引用了怀特的《虚伪的面具》和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此外，还有 M. E. 拉维奇(M. E. Ravage)的《蒂波特山记事》，该书对“石油案件”一直追踪到了 1924 年并对此进行了生动记录；还有布鲁斯・布利文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有关“俄亥俄帮”的系列文章。本章开始引用哈里・M. 多尔蒂的一段话就是来自布利文先生在《新共和》发表的一篇文章。费城的蒙哥马利—麦克拉肯律师事务所的乔治・G. 钱德勒(George G. Chandler)在有关“石油案件丑闻”的写作中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援助。

第七章“柯立芝繁荣时代”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基于斯图亚特・蔡斯在

《繁荣，事实还是神话》中的事实和评论，而该书是一本非常简练的论述；另外，我还有大量数据是引自他的另一本著作《当前经济形势》。有关超级销售员、宗教和商业的内容大量参考了商业精英杰西·雷恩斯福德·斯普拉格发表在《哈珀斯》杂志上的各类文章。有关服务俱乐部的部分资料，我参考了查尔斯·W. 弗格森(Charles W. Ferguson)的一本即将发表的著作《参与者》所收集的材料；有关大学的商业课程和从商之道的一些内容参考了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美国大学、英国大学与德国大学》。

第八章"喧嚣的岁月"的基本思想是赛拉斯·本特的，任何读过他的《大肆喧嚣：报界的声音》的读者对于这一点都会很清楚。我从这本书中引述了许多内容。有关战后十年期间宗教地位的统计资料都来源于 C. 卢瑟·佛莱尔(C. Luther Fry)的《为总统了解社会趋势而对有组织的宗教机构所作调查的初步报告》，感谢罗伯特·S. 林德给我提供了如此宝贵的资料。有关德顿小镇审判的记录相当多地引述了阿瑟·加菲尔德·海斯在《让自由飞翔》中的叙述。西蒙—舒斯特公司的理查德·F. 西蒙(Richard F. Simon)为我提供了大量有关填字游戏热的素材。前《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编辑 W. B. 米勒，为我提供了有关弗洛伊德·柯林斯事件的一手资料。

我要特别感谢沃尔特·里普曼的《道德序论》和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现代趋势》对 20 世纪 20 年代幻灭状况所作的精辟分析；如果没有克鲁奇先生的这本细致精确、见解独到的著作帮助，我的第九章"知识分子的反抗"对当时幻灭状况的讨论是不可能完成的。

第十章"酒和阿尔·卡彭"大量引用了下列四部作品：查尔斯·梅尔兹的《禁酒十年》和《维克山姆报告》，弗雷德·帕斯利的令人爱不释手的《阿尔·卡彭》，还有戈登·L. 贺斯泰德和托马斯·安恩·比斯利的《这是敲诈》。

第十一章"佛罗里达，温馨的家"中沃尔特·C. 希尔列出的许多数据、事件描述和引文都是出自霍默·B. 范德布鲁发表在《土地和公共设施经济学期刊》(第三卷)中的两篇文章。在我引用的许多资料中，格特鲁德·马休斯·谢尔比(Gertrude Mathews Shelby)发表在 1926 年 1 月《哈珀斯》杂志上的《佛罗里达狂潮》对我的帮助尤其重要。关于纽约城内办公空间出租情况的数据是由一家纽约金融机构的房地产办公室为我提供的。

第十三章"大崩盘"，我从理查德·惠特尼于1930年6月10日在波士顿股票交易公司协会上所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929年恐慌中所做的工作汇报》演讲中引用了大量内容。

最后一章"1930～1931年：余波"引用的胡佛政府的各种乐观言论，取自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1930年的《哈珀斯》杂志上发表的《总统的繁荣》一文。

这些只是我在这本书中所引用的大量资料中的一部分，之所以在此单独提出，只是因为他们未在书中单独提出过，或者是我亏欠他们的太多。

我还要继续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有些曾经千方百计地为我搜寻各种资料，有些不辞辛劳地抽出时间来阅读我的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特别需要单独提到的有，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罗林·阿尔奇·索亚(Rollin Alger Sawyer)、阿瑟·贝塞(Arthur Besse)、约翰·G.麦肯提(John G. Mackenty)、厄里·百利叶(Earle Bailie)、C.艾莉森·斯库利(C. Alison Scully)、迈拉·理查森(Myra Richardson)、戈登·阿依玛(Gordon Aymar)、艾格尼丝·罗杰斯·海德(Agnes Rogers Hyde)、斯图亚特·蔡斯、罗伯特·K.哈斯(Robert K. Haas)、阿瑟·C.侯顿(Arthur C. Holden)和艾米丽·林那德·柯布(Emily Linnard Cobb)。我还要尤其感谢查尔斯·梅尔兹，从我承担起这个永无止境的令我着迷的艰巨任务开始，他对我的鼓励就一直没有中断。最后，我还要提到我的妻子，桃乐茜·彭罗斯·艾伦(Dorothy Penrose Allen)，直至她生命的尽头，她对我的帮助也一直是我难以言表的。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1931年6月
于纽约斯卡斯代尔镇

# 作者简介

虽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更认为自己是一名编辑而不是作家,但今天他最为人们铭记的身份却是一位文化历史学家。身为波士顿的文人雅士,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教育,而他的血统则可以上溯到普利茅斯的七位殖民者。他的作品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并且受到了各个阶层的广泛欢迎,其中很多都成为了畅销作品。

艾伦出生于1890年7月5日,父亲弗雷德里克·贝利斯·艾伦(Frederick Baylies Allen)是一位主教派牧师,母亲阿尔伯塔(Alberta)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虽然这个家庭并不算富裕,但是他们衣食无忧并且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12岁的时候,年少的弗雷德里克前往大名鼎鼎的格罗顿寄宿学校学习,并成为了该校校报体育版的编辑。在哈佛大学,他为《哈佛讽刺》撰写幽默文章,在文学杂志《哈佛呼声》担任编辑工作,也向这份杂志提供包括短篇小说、评论、随笔以及诗歌等各种形式的稿件,其中一首名为《的黎波里》的诗歌在他毕业那年(即1912年)还获得了学校颁发的劳埃德·麦基姆·加里森(Lloyd McKim Garrison)奖。

艾伦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同时还讲授英语写作。1914年,他的作品引起了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Frank Crowninshield)的注意,当时这位享有盛名的编辑正在为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筹建《浮华世界》杂志。艾伦拒绝了前往这家新杂志担任助理编辑的邀请,而是选择在久负盛名的

《亚特兰大月刊》担任同样的职务。一年以后，他受聘担任《世纪》杂志的管理编辑，并从波士顿搬到了纽约。在缩减每天日常编辑工作的同时，艾伦继续他的写作生涯，他的小说、散文以及幽默作品都出现在很多顶级杂志上，包括《浮华世界》、《民族》、《新共和》，以及英国的《笨拙》周刊。

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艾伦离开杂志社，在波士顿的作家爱国服务委员会新闻局担任主席，后来又负责与国防委员会进行情报联络工作。在华盛顿特区生活期间，他结识了桃乐茜·彭罗斯·柯布(Dorothy Penrose Cobb)，并与她结为夫妇，为婚礼担任男傧相的是艾伦在《哈佛讽刺》工作时的助手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战争结束以后，艾伦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管理集团的秘书，并成为了哈佛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任宣传董事。

接下来的四年里他一直生活在剑桥市，在那里他继续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一些顶级杂志供稿。1923年，他开始了一段持续终生的友谊，那就是与纽约的书籍及杂志出版商哈珀兄弟公司之间的友谊。他首先在贸易书籍分部担任编辑助理，不久就开始为《哈珀斯》杂志编辑文章。1925年，他被任命为杂志的编辑助理，1931年成为了助理编辑，而到1941年他就成为了杂志的总编辑。

艾伦夫妇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奥利弗(Oliver)，女儿名叫伊丽莎白(Elizabeth)。但是在1928年，女儿伊丽莎白因为患有脊膜炎不幸死亡，两年以后，妻子桃乐茜又因为手术并发症而去世。为了从这些个人悲剧的痛苦中摆脱出来，艾伦开始撰写后来成为本书《浮华时代——美国20世纪20年代简史》的原稿。他写作本书的想法源于其1930年初发表在《展望与独立》上的一篇题为《时代的结束》的文章，因为艾伦认识到1929年的股市崩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并因此开始对伴随着爵士乐时代的繁荣景象而来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变化进行描述。

《浮华时代》一经出版就获得了热烈好评。斯图亚特·蔡斯(Stuart Chase)评论说："这本书也许是一本伟大的著作，也许不是，但是它绝对是一本不可思议的引人入胜的著作……1960年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运用哲学的精确性对这战后十年进行总结，而这一点无论是艾伦先生还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目前都是无法做到的，因为1929年10月29日的回音还在我们的耳边萦绕，但是如果他不把本书作为主要原始资料的话，那他就只是一个平庸的历史学家。"《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评论员写道："出于谦

虚，这本书无论在主标题还是副标题中都没有告诉读者，它是这样一部将历史记录和综合报道完美结合的伟大作品。"默里·戈德温（Murray Godwin）在《新共和》中写道："艾伦先生给出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并对它们进行了整理，他的著作能够让你明确事态的方向。他经过仔细规划把那些本就应该在一起的材料巧妙地综合整理在一起。他把这种工作进行得如此灵巧而熟练，就好像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完全遵照自然规律发生似的。"

《浮华时代》被每月一书俱乐部选中上架，立刻就成为了畅销作品，售出了50多万册。根据《大众娱乐年鉴》的统计，本书在1932年的非小说类作品中销量第二。随后，艾伦又写出了《自从昨日：美国的20世纪30年代》，并于1940年出版。《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查尔斯·普尔（Charles Poore）对此书评论说："包罗万象而不是深刻尖锐，宽恕容忍而不是刻薄锋利，没有欺骗，没有痛苦。在《自从昨日》这本书里，几乎每个人迟早都会发现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得到了反映。这是一面折射出我们这个奇怪时代的绝妙镜子。"

1932年，艾伦与《哈珀斯》杂志的同事艾格尼丝·罗杰斯（Agnes Rogers）结婚，并且共同合作出版了很多带有照片的历史书籍，包括1933年的《美国行进：照片中的1860年以来的美国生活》、1934年的《大都市：照片中的美国城市》，以及1947年的《我清楚地记得：美国人民的家庭相册（1918～1941）》。艾伦的其他著作包括出版于1935年的《创造的上帝》，该书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如何导致经济大萧条的过程进行了审视；出版于1949年的《伟大的皮尔庞特·摩根》，该书是这位金融家的传记。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出版于1952年的《巨变：美国的自我改造（1900～1950）》，该书也是每月一书俱乐部的另外一本畅销作品。

正如他的作家身份如此成功而引人注目一样，他作为《哈珀斯》杂志管理人的工作也同样享有盛名。自从1941年成为杂志的总编辑之后，他通过刊登高质量的小说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科学、教育、商业以及经济方面的报道而为这份杂志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在1952年9月离开了总编辑的职位，原意是想多花点时间在写作上，却于1954年的2月13日因脑溢血猝然离世。

在他去世之后，《纽约时报》刊登了纪念他的社论，其中对他评价说："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将会因为《浮华时代》和《自从昨日》这两部作品而被无数读者铭记在心。这两本著作都是描写当代历史的伟大成就，它

们仍然新鲜，仍然可读，对了解美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历史仍然非常必要。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忽视它们的……”

“他在这两本著作方面的个人成就说明，如果他愿意，他能够为大众写出很多的优秀作品。他身上完全没有那种看不起‘大众’的势利。对身边各行各业的同胞们，他都同样热爱和尊敬——正如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同时也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愉快……他拥有杰出而迷人的个性，可惜他离开得太早了，人们将会深深地怀念他。”